

中文提要

基督新教在福建的神学耕耘几乎长至百年，这样积极的神学拓殖促使福建全境中基督教的组织行政机构、社会服务事工全面繁荣，而其中文字出版事业由于直接与神学信仰传播的授受关系密切而彰显基督信仰的最大内容载量和最持久的深远影响。从信仰的视野出发来思考整个福建教会文字出版事业所依持的借力正在于此。基督教会的文字出版事业按组织出版物的机构可以划分为教会及其附属机构、相关机构的文字事业，再详细一点可以分为教会直属文字事业、教会学校文字出版事业、青年会文字出版事业、教会外围组织如宗教教育会的文字出版以及信仰者个人的文字出版事工，每一类属下均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对教会文字事工从经济来源、编辑过程、文本制形、发行情况、发行宗旨等方面所衍射出的独特特点的全息解构过程是繁复的、细致的，这是本论文所致力之要点之一。教会文字出版事业宣行的教会文化是有神论的信仰主义，它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机缘之和是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表达模式——中国化的基督神学（汉语语境里的基督神学），这是本论文作为收笔的最终归纳之一。

关键词：信仰视野 福建 基督教 文字出版事业

Abstract

It had lasted for over a century that the Christian religion ploughed and weeded in Fujia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hristian religion made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service business for society of church totally boom. Among these service business for society ,the publishment,because its close and direct to the preaching-receiving of the religion's delivering a sermon, was famous for its great capacity of content and the deeply enduring influence.when thinking over the Christian relig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era in Fujian ,we will find that it quite depended on above effects,especially true for Christian publishment from the religious field of vision. The publishment of Christian church may ,if classifying them by organizer, belong to church's, subsidiary body's or related organization .In more detail ,they included those organizers such as the organizers directly under the church,the schools ran by church,Y.M.C.A and the organizers on the edge of administration of church such as the organizer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so on .And then the religious individual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ach category can be divided into certain amount kinds.The whole interpretation on Christian publishment ,in which there were many unique styles in funds origin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 ,in edition ,in appearance of publication,in distribution and in pricipal aim and so on,is complicated and has a subtle difference, which is one of this paper's aims.The church publishment propagates church culture which is atheism .It was a very long course that the church culture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The last inevitable result is that a new expression of culture pattern was presented,called as Chinese Christ theology or Christ theology in Chinese language .It is used as this paper's words,and it is a conclusion drew from numerous facts.

Key Words: the religious field of vision Fujian Christian church
Publishment business

上帝之笈：信仰视野中的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之研究

(1858——1949)

内容摘要

“基督”耕海梯山东米中土，其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玄奘西游，商业意义上的陆海丝绸之路在文化层上的意义相形微薄，文化意识力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信仰附着于两条商道姗姗迟来，面对中华文化的博广精深，其文化底色在羞涩的腼腆中不乏强劲的文化扩张力，中华文明因此而彰显今天的文化轮廓：百花竟放，相奇斗艳，于宗教文化何尝不是？宗教文化作为文化交流的前锋今天的遗存除了凌碎的十字碑刻和庙宇圣堂的直观感性外我们很难把握其宗教信仰的逻辑理性和真实仪态，历史时间的荒草爬生在酈落的圣台，经文传诵的声音也成为千古绝响，黄鹤飞空，斯人只能倚楼把盏蹉叹，尚好我们还能从车载栋塞的典籍遗留中发掘去者思想的脉搏，精髓从中可鉴，本文思想承接的历史意义正在此。

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文化代表了西方文化传承的精髓，自从入华之后它就试图寻找一种适合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话语以便解释弥赛亚的天国主义和基督救赎与普世的涵义，东西方信仰底色的差别决定了两种宗教意识的冲突，除了传教之外，教义的辨难也成为传教士需要应付的喋喋不休的日常，口诛笔伐，“正邪论争”，“儒耶论衡”，林林总总，留下了大量早期传教活动的记录，对这些记录整理的本身就是一次信仰的挖掘，这种边缘信仰活动的研究对于现今的意义在于帮助中国基督教信仰寻找曾经的丢失、被时间吞噬的东西方信仰之间的差别、理析基督教中国化的本色之路，从而坚定文化别景下的信仰之间的差异，莫立中国基督教会三自方针政策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基督教不仅是西方的更是中国的，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它的宽容不再来自神而是来自信众信仰的自由选择和真正意义上的信仰自由政策的依据。对于在中国发轫了几百年的基督文明来说，汉语基督神学早已成熟并斑驳流彩，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脱离母体而走上自主自立自传的道路，并形成了特色中国的神学，现今与西方的信仰对话便以此为据。

基督教在福建特别是晚清新教的入闽给“海滨邹鲁”增添了新的文化血液，新教在闽的传教事业中最为人所乐道的有教育、医疗、慈善和出版等社会服务事业，特别是教会文字出版和教育的纵深影响更是久远。他们发行的

报刊，出版的中西文书籍，一度成为福建地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相对应福建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近代福建的新闻出版事业的出版精神理念和物质技术即缘自教会；教会的西方生活意识籍借出版物潜传给福建最早接触基督者，从而扩大影响于整个福建的各个阶层；西学也是首先籍凭教会早期传教士并不十分雅驯的文白体传入的，并成为福建近代化的渊藪所在；作为“文化掇客”⁽¹⁾，传教士的文字出版物也向西方宣传了中国传统，特别是儒道佛等文化的精髓；另外重要的影响是基督教文字出版物所宣传的信仰分割了传统地方信仰的领域，以域外异质文化的眼神挑剔传统信仰（包括民间的非文书信仰），使福建有神论领域重分秋色。这些影响是显见的也是易于被人所领悟和察觉的，本论文的写作试图从文字信仰视角出发剖析基督教在福建的多端影响和对近代化的肇始意义。

以本文作者的接触了解，自从教会文字出版事业肇兴至今，教会文化和相关内容的研究者大多运用了大量的教会文字出版物，但对于这些出版物本身很少深究其渊藪，甚至很少发掘其文字背后的内涵，论文既少更勿提专著论述，全国如此，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的研究更形滞落，就所见无非是早期各地文史资料批判意识尚酣的政治应时之作，其内容只是追忆性的事实陈述，多数还史实含糊，如果不加考证的运用便会招致“敷衍塞责”和“缺乏学术考虑”之指责，况且文史资料也并非学术目的的著述，所以其撰写方法和内容只可借鉴不可临摹。随着史界对相应教会材料的集中运用，这些材料的发掘成为当务之需，因此就有为数尚寥的几篇对福建教会文字事业研究文论的出现⁽²⁾。但总的看起来，由于各个史学工作者的专业研究领域的不同，很难有相对专业的材料收集和研究，收集面和研究面较窄是其文章的致命根底，但起码这些文章已经觉察到此领域的可探之源，所以这些论述也难能可贵。另外一类材料研究较为集中的是福建出版志、福州出版志等一批志书和新闻研究著述的出现，其中都把教会文字出版作为地方近代文字出版的始源并加以记述，这类研究大多集中于版制、刊行情况、刊物的沿传等方面，忽略了其教会背景所起的刊行理念、刊行宗旨和刊行意识和内容等方面的支配作用，是为研究的不足。本文的撰写从接题到现在都暗自庆幸：幸而他人无开先河的研究，本文可作为本领域的开山，但庆幸之余却不得不为论文的撰

⁽¹⁾ 该名称的使用来自《剑桥晚清中国史》、《剑桥中国民国史》

⁽²⁾ 例如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朱峰著论文集《在信仰和实践之间——福建基督教史钩沉》第五章“文明初化——清季福建美以美会新闻出版工作”等一系列文章的出现。

写难度而担忧，由于无法借鉴成熟的论著，所以各个方面都是作者的摸索和闭门之作，又由于论文涉及宗教信仰、新闻、历史等诸多方面，属于学科的边缘研究，学科的交叉较多，所以难度加大。论文撰写庆幸的第二点是研究的材料较为丰富，大量的教会文字出版物又相对集中，所以可以游刃有余，但存在的维谷是材料的明确析分难度较大，可分的大角度很多，可分的标准更多，所以一种可以使阅者接受的分类标准成为论文写作的第一个障碍，以至于纠缠论文的写作很久才找到比较简易的一种分类方法，以待读者检阅。

本文的结构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内容相对集中于教会及其附属机构、相关机构的文字出版事业和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的全维向的透视和架构以及第三个主要的内容，也是本文根据掌握的材料并对材料进行研究后所得出的观点总结，这三部分构成了本文的主要框架。文章的第一部分为绪论，从基督教在福建一个多世纪福音传播的耕耘与收获以及其渐进的筹备等待和积极的神学开拓等几个方面，来述说早期教会传入福建的整体背景情况，作为教会文字出版事业的背景设置，也是教会各种事业叙述的前提必需，这部分主要介绍了差传教会的兴起、发展和成熟，以及其兴办的各种事业（包括文字事业）的概况。作为本文的绪论，第一章节相形概括。

论文的第二部分是教会（差会）及其附属机构、相关机构文字事业的概况叙述，文章的处理方式是把纷繁复杂的各类宗教机构和附属机构以与教会关系作为划分类别的标准，从各类文字出版机构主观上的宗教诉求出发，力图从信仰的角度再行解读教会所宣传的神学思想及其影响。具体说来第二章节可分为五个主要部分，文章从这五个方面着手进行研究，方法的选择是采用典型的例举个案分析与普遍类属的共性相结合的方法。文章把教会背景的文字出版事业分为教会直属的文字出版机构、教会学校的文字出版、教会青年会兴办的文字事业、教会相关机构的文字事业、传教士个人的文字传教布道等五个部分。关于教会直属文字出版事业则从基督普世的宣传意义层面述说，从四个方面剖析了教会直属机构的文字宣传。美以美会作为闽北三大公会在闽北影响很大，其文字宣传布道的意识是福建各差会中最为浓厚的，所以该会的文字建设机构最为健全，文章以福州美以美会年会的文字出版工作作为该会城市教会的代表，主要论述了直属该会的美华书局的起落历史和相应的研究项。兴化作为该会内地教会文字事业的代表，作者着重选择了该年会的美兴书局作为福州年会美华书局的可比对象，通过对两书局的对比，简

述比较了两个不同地区教会书局的发展情况和各自所呈现出的特点，以便说明教会文字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原因。圣公会作为对文字事业相对缺乏重视的差会被论文用来和美以美会做了对比，通过对比得出了差会背景的教会文字事业的兴衰随差会对文字事业的重视与否而起落不定这样的结果。地方基层教会作为完全的教会也有自己的简单出版事业，金井教会作为地方自立较早的教会有相应的资金来源，从而具有了兴办文字、宣传国籍汉语神学的力量并发行定期刊物《金声月刊》。但同样是地方教会的永春和古田新义山诸山堂则相形绌见：诸山堂虽发行有《新义》一刊，但出版无定期，根本无法与《金声月刊》相比；永春教会由于有圣经书会的支持虽地处陋乡却有自己的印书机构，以至于令闽南教会羡慕不已，但存在的缺点是设备简陋。地方教会文字事业的兴盛与否完全视教会自身的经济状况而定，因为来自差会和上级教会的款项用途较为固定，从而限制了地方教会文字事业的发展，除非一如金井教会那样的自立自养教会。

教会学校作为教会最为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性质虽是教会的附属机构，却有自己相对的自由（信仰宣传的自由），受教会背景的影响，其文字也竭力以信仰为宣传意识。但是出现在新式学校里世俗知识的授受却成为信仰的对立面与信仰的有神论相齟齬，特别是高等学校神学宣传的尴尬不得不接受国民政府的立案要求而着力于世俗知识的教授。该节分为高等学校（包括大学和相当于大学的学院及神学院等）以及中等学校（包括中学、中等职业学校等）的文字出版工作，文章选取了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及协和神学院作为高等学校文字出版事业之研究的标的，分析了三类学校里信仰宣传情况和文字出版情况，总结了不同神学信仰遭遇的原因。同时选取了不同地方的中学多所，简单介绍论述了该校的文字出版，中学文字宣传中信仰意识的特点：朦胧性和刻板性，中等职业学校由于与职业的选择相挂，信仰虽有所减弱，但由于是教会福利教育性质的机构所以毕业学生大多都受教会的左右，信仰则更浓，这也是一个两难。

教会青年会文字事业则随着青年会属的类别而有所区别，可分为城市青年会文字事业和学校青年会文字事业两类。城市青年会选取福州和厦门青年会的文字事业为个案，总结了两者存在的差异及在宣传意识倾向上的差别和相似，两者都作为社会福音派而力行主张社会改良，力避骤进式的社会革命，并与时事相错臂，对于信仰的态度与其社会改良宣传相合：力行基督的社会

生活化。

教会相关机构甚多，论文选择了基督徒布道会、宗教教育会和基督教教育会的文字出版机构来进行说明。三者既非教会附属机构也非教会直属，与教会的关系是以神学信仰为维系的纯信仰机构，所以其文字出版的神学宣传酣浓，其经费来源多采用会员集资制，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但往往会因信仰的暂时挫折而停刊，是为不足。

传教士作为神学宣传的主体其传教特点是个性化强，其传教手段诉诸文字的多为神学信仰的深层意识里精神动力的推动。具体来讲福建基督教(差)教会传教士个人的文字出版在开教初期较多，本文选择了《鹭江报》和山雅各的关系来论述传教士和教会背景的文字出版事业的关系。传教士个人的文字布道完全出于信仰的精神支配，对神之事工相当热心，是为其特点。

论文的第三章从教会各类文字事业的经费来源和支出、编辑过程、文本制形、发行情况、宣行主旨等几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信仰里的文字出版事业或者说文字事业里的信仰，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和架构以便于从整体上对之进行整理研究。关于各类文字事业的经费问题教会机构和世俗机构一样并不甚透明，因此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作者从收集来的零星的材料出发整理了一些不甚完整的论点，不足之处会随着材料的新发现而有所补充。教会各类文字事业的编辑包括编辑人员的选择和编辑过程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经过教会的两重选择的，因此相对来说对教会神学宣传意义较为重要，也可以说是两次神学选择，无论是稿件的采用还是文章的取舍标准都相应地体现了教会的神学宣传意识以及对世俗的态度，另外可以体现出各差会之间的神学偏见和争执。

教会发行物的文本制形除了和世俗文本相合的地方之外还有自身的某些特点，对文本制形的分析还可以离析出教会和世俗的经济文化等的交往关系，意义非浅。文本的制形包括开本的大小、纸张选用、装订通式、文体选用、字模选用及单叶册装的区别等多个方面，论文逐个分析试图理出世俗和神圣之间在出版物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和相似。文本的差异和教会的分立背景是密切相关的，教会为了便于宣传基督因此也时常与世俗文本制式相沟通、相模仿，尽管如此它还保留很多教会性质，例如纸张的选用洋纸较多、字模以英文和罗马字较多、单张多于册装等等。

教会出版物的发行很具有地方性，这与各差会的地方影响、文体选用等

诸方面的原因分不开。教会出版物的读者对象相对较为集中因此影响范围较小，其发行范围多集中于地方教会的辖区内，虽然有部分出版物具有海外影响，但更多的是域化色彩很浓的地方宣传。教会出版物的发行周期多是由于刊物来讲的，发行周期的长短和发行数量可反映教会刊物的发行状况，特别是宣传的情况。教会刊物的定价常常低于成本，属于非“射利”的折本经营，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扩大宣传神学信仰层面的需要。另外教会出版物的语言选择、每期刊物的字数多寡也有其自身的宣传目的，所以也成为本文研究的对象。

教会出版物的发行主旨相当明确：传神的国。大多数刊物的出刊词都开明主题宣扬基督信仰，信仰意识相当明确。这种发行主旨不仅体现在发刊词中，而且在教会刊物的出版实践中各类文章的选用比例等方面也体现出来，只不过这种宣传意图较为隐晦而已，属于编辑操作宗旨。

通过对教会各类出版物的分类研究和整体的结构研究，作者不昧，揣揣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研究的“心得”，也可视为作者的观点，这一部分作者把它放之第四章。本文观点要旨主要包括：教会的核心组织（差、教会）最具有神学宣传意识，而边缘化或已经完全世俗化的机构其出版意识大多带有很强的世俗倾向，即便是教会背景机构也是如此；教会神学信仰宣传色彩与事实公允之间的妥协，对基督的普世信仰的侵蚀是教会文化本色化所涌动的暗流之一；教会发行物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出版物的发行量越大宣传越有效，影响也越大，但同时教会的经济负担也更大，所造成的亏额也更大（因为教会出版物的定价往往低于成本，甚至于采取免费赠送的发行方式），在这样的两悖中教会出版物的福利性和非赢利性如何保持，是靠教会津贴还是靠广告费的偶尔解厄？这样会不会影响神学宣传的纯正性？在教会这样一个以精神信仰为维系的亚社会（本文作者斗胆提出这样的称呼，亦可称为次生社会）层次里，教会文字事业的作用在事实上、在宣传预期上可能与教会对外宣传材料和对内报告材料上的陈述有很大的出入，这也是教会宣传的策略之选；教会文字出版事业受囿于地方教育水平，发展具有连带性、整体性，并与教会的“扫盲”事业息息相关，地方语言、罗马字等适宜措施的选择是教会布道工作的得宜之选，但也使信仰群发展有限并走向了两个极端：知识阶层和文盲（包括罗马字识别者）阶层的完全分化，信仰交流受限；编辑中中国编辑人员的传统情结与新式新闻文体体裁以及与差会西人的磨

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结果是基督教教会文化的本色化、适域化（本文作者提出这样一个比本色化更小的地方化的概念并等待方家的指正）；当教会宣传物与时政相遭遇、相冲突时，教会信仰的维系往往显得相当脆弱，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接受时政并相应牺牲信仰，这是后期教会宣传的悲哀。

基督教教会从西方传入中国，其本身所具有的开拓性和封闭性在文字宣传上体现得更为显著，文字宣传作为基督精神的信仰载体与基督神学的衔接最直接，又由于文字影响的特点，其影响持续的时间最久、所招致的影响也最大。它既是引人入教的“上帝之笈”又是与世俗划判鸿沟的标志，成为在教非教的徽章，也成为基督普世主义的障碍，更是基督精神所受挑战的深层原因之一。教会文字出版事业在中国本色教会运动中使西方基督文化由一个尴尬徘徊的旁观者而直入中华文化厅堂，从而真正地参与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细腻中难免有粗糙并成为中华文化现时代多元中的一元。在思考教会文化时我们常痴迷于这样一个问题的解答：中国教会文化中谁是这种文化的主体，是“中用西体”的文化模式，还是中西合璧的两性同体文化典范？不管答案如何地存在争执，教会文化在中国或者说中国的教会文化已经勃兴，这其中教会文字出版事业所起的作用相当重要，有目共睹，是为本论文的存在意义。

第一章 百年神学拓殖：基督教在福建

第一节 基督神学比舟入传：新教在福建的发端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¹⁾，“因为这是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²⁾。基督新教与福建真正发生关系是在公元 1842—1850 年间英美各大教宗的相继入闽，因为在此以前新教传教士对福建的觊觎暗窥毕竟是偷偷摸摸“非法”的个人行为。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海禁和教禁以及大陆澳门天主教势力的排挤，早期来华传教士只能顾影徘徊在南洋群岛向隅叹息际遇的不济，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等待这个坚固的堡垒之门能被什么东西打开，事实上这种东西是早已预谋好了的，除了用炮弹他们再也找不到更合适于这个古老国度的敲门砖。十字架下祭祀用的葡萄酒和面包似乎稍显温柔了。在机会到来之前因为不能入中国内地传道而分别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槟榔屿、暹罗曼谷和爪哇一带华人集中的地区期待中国开放而入境宣读福音主义的欧美传教士们也并非在消极地等待，他们在南洋各地适宜地利用当地的华人人口资源做着各项入关传教的准备工作，这其中包括向当地华人移民学习语言和汉字。历史的机缘使南洋各地的华人恰恰多来自地狭人稠之“在海之闽”的福建。顺着历史的机缘闽移民成为南洋各地的第一大华人群体，闽语也成为传教士们所学习的第一大华语语种，以便能向当地华人用其可能接受的华语传教。如果说是“耕海梯山”使传教士不畏艰辛旅程甘为基督寻找东方古代传说中的约翰王的话，那倒不如说是西方人所固有的冒险精神中的异国情愫在作祟更为恰当，毕竟新航路已经开辟了几个世纪。本来上帝的福音早该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异教徒国家“臻于福地”了，但恰恰相反的事实嘲弄般地睥睨着这群急于登上大陆的神学传播的急先锋。等不及的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前就随闽人商船私自游历福建沿海，甚至于福建内地。这其中以郭士立最为突出，作为首位在中国沿海游行布道的郭士立曾在曼谷学习福建语，其后又被当地福建同安郭氏宗祠纳为郭姓，名士立，后来他曾于 1832 年和 1833 年再度北上，经金门、澎湖各地，在其游历中，每抵一地皆与当地百姓接触，并乘机进行传道，可见其闽语掌握程度。

西方传教士热衷于向远方传教的热情在精神上是取之于 17—18 世纪称为“福音奋兴运动 (*Evangelical Revival*)”的宗教热潮的。这次奋兴运

⁽¹⁾ 《圣经》“创世纪”第十二节

⁽²⁾ 《圣经》“约书亚”三章四节

动包括欧洲大陆的虔诚教派运动、英国的福音奋兴运动和美国的“大觉醒”运动，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世界特别是英国和北美英语民族的宗教和精神生活。著名基督教史家威利斯顿·沃尔克也指出：“福音奋兴运动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近代新教传教事业的兴起。”⁽³⁾从17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就陆续形成了一些向海外非基督教民族传教为目的的新教团体，这其中包括在中国颇有影响的新教派别如循道宗、浸礼宗、长老宗、归正宗和公理宗等。精神的动力是饱赋刺激性和诱导性的，美国继18世纪中叶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后，在18世纪末开始出现“第二次大觉醒”，并在19世纪初期前后达到高潮，其影响则持久难衰，直接导致了美国传教机构的产生，宗教界对传教的热情空前高涨，并对“亚洲的道德黑暗”表示“悲哀”，同时立志“向那个遥远的大地传送福音”。当然，印度和中国因其东方传统的浓厚而成为其传教之域的首选。“查一八三五年四月二十八号，美国卫斯理大学院布道使讲演厅，曾开过一个聚会，讨论设立差会的事宜，所讨论的题目，是‘哪一个布道使用武的最好场所？’结果大众一致赞成采行左列（下列）的决议：本会立差布道使往中国去，并在中国各大商埠设立印务局，那是适切中国的急需，助我们达到目的的好方法”⁽⁴⁾，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布道的好场所，在这个时会她向道的兴趣或者比地球上任何国的都大；她有户口三亿六千七百万……”。在诸多欧美新教差会磨拳擦掌的时候，至1851年已经有19个新教差会来华了⁽⁵⁾。这作为基督新教来华传教的宗教动因和宗教史背景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在欧美的兴起、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侵略势力对外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扩张相契合的。因为他们为传教活动提供了空前的动力，提供了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条件和政治上的保证，而传教士则为殖民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很大程度上起了帮助和配合的作用，这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着力批判的差会不光彩的暗色历史沉积。

但是即便传教活动在国内所有条件的成熟也无法预示着传教前景的乐观：清廷的闭关政策、广州一口通商制度、限制外国人活动的规章和严禁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的措施以及澳门天主教势力的宗派不宽容态度成为难以

⁽³⁾ 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595页

⁽⁴⁾ 力士搢著 汉如选译：《美以美会七十五年之经过》载于《神学志·特号·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季 第十卷第三号

⁽⁵⁾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该书作者根据所收集到的材料整理加工过后把“1807—1851年来华新教差会和传教士名录”作为该书的附录一，在附录中共统计“来华新教差会名录”19会，开始派遣传教士时间包括传教士开始到东南亚各地华人居留传教时间

逾越的障碍，所有的这些使新教来华的第一人马礼逊鱼梭于广州、澳门和南洋群岛凡二十余年。在中华大地门口的逗留是未来难判地“短暂”，为了传教需要的深谋远虑，传教士们选择了新教国家英国和荷兰辖下的南洋各地作为自己的暂时之栖，恰恰这时的南洋各地居民多是来自中国福建的移民。从《山海经》中“闽在海中”的描述一直到近现代，由于受地狭人稠生存条件的限制出海讨生的福建人比舟相攀，不只是沿海而且影响直至内地的客属人家，移民南洋的福建人多集中分布在马六甲、巴达维亚、宾榔屿、新加坡、暹罗曼谷及爪哇、波罗乃等地。这种移民区域源的分布结构为滞留南洋的传教士学习闽语提供了语言环境前提，也正是在与当地闽侨接触中，传教士们的视野越过广东而直上福建或者更远的北方。“非闽侨又何由习语言、学文字，作入闽布道之先机哉，迨海禁一弛，教士由南洋直入华疆，语言文字便可播道于闽南矣，闽中语言复杂，唯闽南语言一致，亦布道一大助力”⁽⁶⁾。是为当时南洋传教士所遇的实情写照。

在南洋一带的西方传教士积极在南洋各华人集中的居民区做各种准备活动：学习中国语言，主要是闽语、粤语、客家话和北方话；学习中国文字；向当地侨民传教；出版印刷传教宣传品；兴办教育等⁽⁷⁾。在南洋的传教士所占来华传教士总数的比例不算太小，特别是在南洋滞留期间及鸦片战争后的入华传教士多集中于广州和香港。在这些传教士中间有许多在鸦片战争前就随闽人商船私自游历福建沿海，甚至于福建内地，这其中以郭士立最富于传奇性⁽⁸⁾。这个普鲁士传教士于1831年6月3日乘中国商船离开暹罗，而在这之前，他已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并给自己取了“士立”这个汉名，把自己套在中国服装里并且说：“现在，我得完全遵守中国习俗，甚至不再看欧洲的书籍了。”郭士立的三次航行所显示出来的前景是：他证明了打开“中国之门”的可能性。也正是这个郭士立因为有过首次中国海岸航行

⁽⁶⁾ 许声炎：《闽南长老会八十年简史》载于《中华基督教史》（中编）第102页

⁽⁷⁾ 关于早期传教士在南洋的各种活动具体可参阅：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民国七十四年六月初版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年3月版

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载于《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传教伟人马礼逊》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Milne, William,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米怜：《新教在华传教早期十年史》）

⁽⁸⁾ 事见：Gutzlaff, Charles,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in China* 1831, 1832, & 1833, New York, 1834（郭士立：《中国沿海三次航海记》）

的经验，又“通晓福建语”，所以又在1832年2月27日乘“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北上进行第二次传教冒险。在这次航行中，他在福建厦门、台湾、福州做了或长或短的逗留，其中在福建的几个港口活动了将近一个多月，5月下旬才离开福建挥舵北上，结束了这赋予“历史意义”的沿海试探性的航行。1834年和1835年他还至少两次到过福建沿海，这时郭士立的身份早已涂上了鸦片膏的罍粟味。假设郭氏没有在南洋预先向华人学习闽语所奠定的良好的语言基础，他是无法在三度北上途径厦门、台湾、金门、澎湖、福州等地时操闽地方言与当地百姓接触并进行传道工作的。

早期入华的六十三位传教士⁽⁹⁾大多只能在南洋向当地闽省移民传教，日后能有机会带着客地闽语回到闽语母源地传教的为数尚寥：在六十三人中，只有八人曾在厦门和福州两开放港口城市服务，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基督教与福建的历史才真真实实地挂结起来。从他们所宣教的地区来推断，他们在南洋所掌握的闽语主要是厦门的闽南话和闽北的福州话。这其中包括在新教入华史上比较有贡献的几人，如：在闽南传教的首位美部会牧师雅裨理；在福州传教的首位牧师约翰生；伦敦传道会在厦门传教的首位牧师施敦力约翰等等。他们来到福建宣传福音完全是趁着鸦片战争未熄的硝烟而来的。雅裨理，曾在赧颜噶巴达维亚学习厦门话并在当地华侨中传教，当英军侵占厦门对海的鼓浪屿之后，他与能讲厦门话的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在英军的保护下，在鼓浪屿建立传教据点，还前往厦门、同安，甚至坐兵船到台湾做调查，他们在英侵略者和当地闽南人之间所充当的角色是译员。正是由于闽语的掌握使得传教士们认为已经有了北上传教的过渡工具，因此而更具信心。故而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在早期开放的五口中闽地占有两口，这与早期传教士在南洋掌握了闽语而谋求闽地传教的要求不无关系。我们更有理由认为随着传教区域的扩大，闽语完具备其传教重要语言工具的过渡作用，从而只局限于福建和南洋闽侨居住范围内，同时也完成了其在西方入华传教过程中必须的语言的过渡和传教中心地域扩张的过渡，更完成了福厦两口在过渡过程中暂时的传教中心的历史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结论：在学者们定义的“早期传教时期”期间，在南洋活动的传教士与客属闽侨所发生的关系，可以成为清末、民国闽地沿海基督教兴盛的原因，并使这一原因可直溯到远在南洋的域外福建人。所以我们认为福建基督教历史可以以此为研究的楔入点，这也可以作

⁽⁹⁾ 数据来自：吴义雄《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附录一”之二“1807—1851年来华新教传教士一览表”

为福建基督教史可溯的源头之一。

第二节 福建基督教史的第二阶段

教会的逐渐健全和差会划“疆”而治的“自我发展”过程

1842—1850年，英美各大教宗相继入闽。差会和传教士利用五口通商的可有利时机宣教，以福州厦门作为重要的宣教中心，这一时期多少不免也挂染些传教士个人传教的神学理解个体的自主性，相应地他们不缺少教义宣施的对象，缺少的是受洗入教的教义接受者，此时来谈教会团体的组成无疑是不现实的，因为无信徒和教众这种信仰受众的大量存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在福州和厦门的传教士是寂寞的，生活是单调的，除了声哑力嘶地向当地人宣传教义、态度诚恳地分发宣传册子之外，不同国籍不同差属的西方传教士们之间只有无助地唧唧我我了，情景相当荒凉，这在早期入闽的传教士所做的大量笔记和日志中表现得异常真实，写作和记录也成为其打发时光的消遣活动。时常的遭遇还应该包括闽语的嘲骂和闽人讥讽的眼神、地方人士的各种抵制、时不时投来的石块和最难忍受的本地文明的外驱力，早期在闽的各差会传教士无疑成为当时福建社会里外来的“弱势群体”，所以只有不同差会教士之间互相协同才可以增强传教士群体的抵御力。

传统来讲早期来闽的较大的差会有六，三个在闽南，三个在闽北，地域分割相当清晰，但是这些差会只是些许的传教人员，并不是严格的差会组织，其只能代表差会，而不是差会本身。总得看来早期入闽的宗派及其差使人员大致情形如下：

美国公理宗，亦称美部会 (*American Board*)，从1847年7月—1858年相继派遣来福州的传教士有杨顺 (*Rev. Stephen Johnson*)、弼来满 (*Rev. Lyman B. Peet*) 等12人⁽¹⁰⁾，最初居留地由福州中洲经保福山而后移于于山之麓，“最初十年间，教士15人，领洗信徒1人，传教士人数逐渐减少”⁽¹¹⁾。在培养了首批中华传道人之后，宣教工作才有新的起色。自1867年之后西教士来闽人员显著下降，且来闽的多为女性，宣教工作越来越多由华人担任，传教区域在1864年开始向福州外的长邑、永泰等周边地区扩展。但1884年—1910年随着总会派遣高潮的到来，美部会在福建的差使人数达50多人，并开辟了闽中、闽北两宣教区，差会开始派遣大量掌教人员(牧师)，

⁽¹⁰⁾ 数据来自：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七章“基督教士之宣教事业及其影响”之附表

⁽¹¹⁾ 数字来自：《福建宗教史》第五章“基督教”(未刊稿)

各地美部会属教会纷纷成立，并自此开始走向教会机构的自我完善之路。福州为“福建美部会”各项事业的中心、差会驻地。前20年间，会友仅64人，传道9人。由于教会经学书院在短时间内培养出40多名传道，使美部会进入了发展时期，结果是福州城区设立11堂。同治12年（1873）至1877年，该差会开拓邵武及所属各县为宣教工作区，惜数年间仅有信徒3人。至1899年已在邵武各地购地建堂37处和20多处祈祷所，传教50年，受餐信徒一千多人，慕道友万余人。美部会在早期宣教工作中，偏重于教育和医务，用于这两方面的经费比用于传教方面的多几倍，这是该会教会行政结构的特点。

美以美会1846年成立中国差会委办，主张把差会设在福州。福州成为美以美会在中国以至远东的宣教中心。“第一次被差来华的布道使们即柯林斯牧师（*Rev. J. D. Collins*）和怀提夫妇（*Rev. and Mrs. M. C. White*）”⁽¹²⁾。美以美会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教育方面——办学，在传教方面堂会组织的建设相对滞后，直到1856年才真正为真神堂和天安堂相继行了献堂礼，使灵修工作结束了居无定所的颠沛之苦，真正有了归依，也使传教士入闽的十年后才有长乐商人陈安的受洗入教，并成为该会的“首善之实”。从1857年开始，该会劝士、传道均由华人担任，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华牧，这时期的信徒量骤增。1869年林振珍、许播美等七人被按立为牧师，被誉为“七个金烛台”、“七执事”。这对于该教会的意义特别是对属灵之权柄重心转移的意义尤其重要。美以美会福州宣教区由于有了诸多华洋牧者的宣教，成绩斐然，教区不断扩大。咸丰6年（1856）福州宣教区开始划为东西南北四区，几乎囊括现福州市及下辖各县区。1873年兴化、延平成立牧区，1877年成立福州正式年议会，辖福州、福清等七个（数字变动较大）教区，正式信徒约两万人，105个教堂。会督任福州教区长，是教区地位最高者。教会的规模雏形已具，只待不断完善。1904年兴化成立年议会，1917年延平成立议会，1925年闽南年议会成立⁽¹³⁾，并且都成为美以美会全国十个年议会中的翘楚。1936年福州年议会拥有教堂150座，会友11666人，学校医院88所，职员471人。1941年美以美、监理会和美普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合中央会议后，该会改称“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结束了“美以美”的单独称呼。在所有福建的基督教差会中美以美教会的教区制度最为规范，教区管理也最为完

⁽¹²⁾ 《福建宗教史》第五章基督教（未刊稿）第4页

⁽¹³⁾ 《神学志·特刊号·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 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季第十卷第三号 第202页

善，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最为清晰。

英国安立甘会，即圣公会，于 1850 年开始派传教士来福州，先在驿有桥、安泰桥设布道所，后在南后街建萃贤堂，首批信徒为 4 人。1867 年北门道源堂的建立成为该会发展的起点。自 1864 年—1867 年开始外县布道，传教范围遍及兴化、连江、罗源等地，后又由中国该会信徒拓宁德宣教，然后沿闽江北上至浦城，而后于建宁、建阳、政和各县。20 世纪之前这一段时间，该会涌现大批华人传道，在开创该会福建教区工作中占重要地位。当时的华洋传教士大都从事教育和医务，或传教之余兼及其它社会事业。1906 年辖区行政上的安立甘（圣公会）福建教区成立，成立以前为开荒布道区，是港澳教区的辖区。圣公会在闽的前三十年专注于布道，1883 年布道区域已遍及 14 县，教堂 110 座，中西圣品十多人，劝士传道百余人。1882 年以后，大批传教士被派遭到各县宣教。福建教区成立后，该会西教士成为管理教务的核心。1900 年有信徒 23000 余人，1910 年改组省议会为正式教区议会，从而才相应地以完整的教会行政机构的形式管理教务，以至于发展成为居全国首位、闻名于国际的教区。

以上三会是在闽北传教的早期三个较具规模的教会组织，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早期都致力于宣教事业，然后建立基层教会组织，并以此为传教的辐射核心，向周围未化之域宣教；在宣教人员的使用上都以大量的国籍神职人员为主，逐渐在大量基层教会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教会体制；并在传教过程中由于对世俗事务的觊觎之心，使教会的社会性大大加强。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各个差会之间的教派主义的狭隘性在教区发展的中后期表现出极不宽容的态度。事实上的信仰纷争无疑是信仰的自戕，各怀觊觎的教区分立使“神”的畛域难于真正驾驭精神的信仰，也难以真正灌溉人心，天国事业难以体现基督的宽容主义。恰恰又是差会间的争执加强了差会内体制的逐步健全，借用西方总会的体制传统与临摹别会体制成为惯常措施，从而制定出适合中国处境下的新的教会体制，这是问题的另一面。

西方传教差会在福建除了以福州为传教辐射中心直至传播整个闽东闽北外，另外还在厦门建立了传教基地，甚至说闽南教会比闽北为先，继广东而为各省滥觞⁽¹⁴⁾，主要的影响在闽南和闽西。在闽南传教的差会主要也有三个：英国长老会、伦敦会和美国的归正教会。

⁽¹⁴⁾ 1931 年该年议会脱离美以美会

英国长老会 1850—1853 年派遣传教士用雅各、宾为霖牧师和仁倍牧师先后从香港来厦。在厦门新街礼拜堂与归正教会协作开拓南溪宣教区，两会教士在初期的协同工作真正体现了信仰的同宗性。早期的传教工作由于宾为霖“志在传教不在建立教会”、“以彼（承受真理者）不欲胶定一处，乃欲周流四方布道”⁽¹⁵⁾观念的影响下，教会的开拓成为无基建筑，连几番心血施洗数人而建立的白水营、石码等地方教会都交由归正教会管握。“时美皈正公会欲英长老公会相辅播道，治理会务，貌虽二会，实联为一”⁽¹⁶⁾。这种情况使初期长老会的自我发展很受影响，直到 1856 年长老会牧师杜嘉德博士抵厦，教务在他的主持下，“1856 年举行两会联席会议。宣教工作实行分工，厦门、禾山、同安、漳州、西溪一带由归正教负责，南溪一带，安海以北地区为长老会负责”⁽¹⁷⁾。自此长老会才算有了自己的传教基地，发展再无信仰外在的阻力。长老会与归正教会的扬镳之举使长老会有了很大的传教自主权，又有了传教所需的发展空间。1863 年教会发展到泉州城内，1862 年成立中华基督教漳泉长老大会。教会此时遍及泉属晋江沿海、南安、南溪、永春、德化等内地各县，至 1915 年南溪等地方教会相继成立堂会。泉州堂会在闽南长老会的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是这时泉西堂会自立，安溪堂会自立，直到闽南教会漳泉大会时代的到来，才使闽南英美差教会各自发展的时期自行结束，合组为中华基督教会的提议成为当务之急。“其组织法以各党合为根基，以中西牧师与代议士为会员，徐脱英美母会之遥制，而成自治”⁽¹⁸⁾。同时也说明英美公会的各自发展或已臻于成熟，亦或是两者的发展还如早期一样的胶漆关系。

美国归正教会是基督教各宗中最早传入福建的宗派，“溯 1842 年美归正公会，首先来厦播道者雅俾理牧师也”⁽¹⁹⁾。1844 年，波罗满、罗啻由南洋入厦，其在厦门仅获两老年人归主。波、罗两氏“乃谋营筹款以建新街会堂，自为监工，此堂为中华全国基督教首建之堂”，只可惜当时信主皈依者只二三人。随后又收取了长老教会所开辟的若干堂口，逐渐站立了脚跟。直到与

⁽¹⁵⁾ 许声炎：《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简史》（民国刊本）金非教会刊行

⁽¹⁶⁾ 许声炎：《闽南长老会八十年简史》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号）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季第十卷第三号

⁽¹⁷⁾ 许声炎：《闽南长老会八十年简史》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号）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季第十卷第三号第 101 页

⁽¹⁸⁾ 《福建宗教史纲》（未刊稿）

⁽¹⁹⁾ 许声炎：《闽南长老会八十年简史》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刊号”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季第十卷第三号第 105 页

长老会“郑重职守”之后，“以厦门与附地及漳辖西溪一带”为辖区，开始了福音的自种稼禾的神学耕殖劳动。直到漳泉大会时代才结束了这种小锅煲粥的传教活动。

英国“伦敦会开创伊始，先在厦门设堂布道继则传入内地，若泉若漳若岩若汀等处”⁽²⁰⁾。1844年即道光二十四年秋七月，伦敦会传教士施约翰自南洋马六甲入厦门，偕同继之而来的养为霖、亚力山大各择地于海滨建屋居住，尽心学习言语文字以待宣教之时机。入厦的伦敦会各牧师对于传教情势的兴趣远逊于其对于中国文字作品：养为霖作养心诗十三首，以浅文白话体，取于声韵和叶，容易了解，是中国颂主诗歌之嚆矢，并与归正教牧师同编罗马字，拼音切字，为妇孺失学之人识字读书的捷径，流传甚广，影响深巨，通行于当时闽南、台湾、南洋各埠；施约翰之于汉文，颇有心得，1847年至1855年首尾凡八年，助译圣经之汉文翻译。直到1853年施约翰才租赁民房公然传道。1856年施氏才在厦门泰山上建筑教堂，结束了“迁移靡定”的游定颠沛的传教方式。1856年入漳州布道，1866年入惠安布道，1883年抵漳平、宁洋、龙岩等地布道。1891年入闽西汀州一带传教，四年后才得一人进教。伦敦教会在各地很注意罗致人才、加增事业和筹划组织等工作，使教会的本地传道士在开辟扩充教会规模中作用尤其显著，教会事业特别是医馆的开办是伦敦教会的特点。“自1844年至1917年统计七十年中，伦敦会先后派男女教士来厦者，若牧师若医生若女士凡四十八人，自1872年至1921年先后按立华牧凡二十四人，他如传道师男女教员则未暇计及，查现在闽南伦敦会部受餐男女教友约四千人，小孩儿受洗约一千友奇，慕道友约在一千左右”⁽²¹⁾，数字的显示是客观的。“（闽南伦敦教会）自开创至今可分为三大时期：1844年至1872年初步时期，后收入教人员，大都粗浅无文，惟信心尚有可取，正如婴孩时代。1873年至1899年为中兴时期，华牧与传道师最为兴盛，举皆热心服务勉力进行，教友亦各遵守道规，进步自养自治精神，此犹少壮时代。1900年至1924年为退化时期华牧以次凋谢，传道师逐渐退缩，教友加入极少，守道愈形不固，正是衰老时代”⁽²²⁾。闽南伦敦会最具特色之

⁽²⁰⁾ 许声炎：《闽南长老会八十年简史》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刊号” 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季 第十卷第三号 第102页

⁽²¹⁾ 周之德：《伦敦会历史：在厦门方面》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号” 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季 第十卷第三号

⁽²²⁾ 周之德：《伦敦会历史：在厦门方面》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号” 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季 第十卷第三号 第22页

处在于“托治教会，颇有秩序”，与厦门长老宗旨趣相合。1919年长老会总会、伦敦会省议会会议合一，以达教会合一，共同发展，力挽教会的衰退，变教会宣教事业的被动为主动。

这一阶段闽南三个教会较之闽北三教会的特点在于：闽南三教会的自立意识和合一意识较强，漳泉大会脱离母会的斗争，伦敦会各堂口的勉力自养等是为例。这种教会自决意识的觉醒对中国本色教会运动有肇始意义，为本色教会运动提供了若干年的实践经验，难能可贵。归正教会与长老教会、伦敦教会组成的中华基督教会，曾作为“将来全国教会联络模型”而受到盛誉。但同时与闽北三公会相比，闽南三公会之间的传教区域划分则更为细致，闽北三教会则无明显的会议来划分传教区域，多采取的是传教区域相叉合，相互争取开发“未化之地”的方式，是为两者之异。

福建早期的基督教主要是以这六公会各自的发展情况为脉络的，而这六公会早期的发展都采取以一个个选定的传教点为基地伞骨似地向周围地区辐射传教的方式。同时随着教区的不断扩充，教会内部也不断地完善教会机构、组织和各种规章制度，最重要的是与其它临近教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一旦明朗化，福建基督教的发展也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节 福建基督教史的第三阶段：教（差）会合一及其中国化

早期进入福建进行信仰耕耘的六大公会从进入福建直到顺随全国教会合一的大潮流而进行不同教派之间的合一运动为止，福建的六公会自身的发展经过多半个世纪的发展已将福音之旄遍插全省各处，教会内组织体制也日臻完善，为合一提供了健全的准备。

早期各差会入闽的各派传教士由于自感身单力薄，处处维艰，所以不顾信仰精神、礼仪上的分歧而能共拓“神”的国。随着各个教派入闽人员的增多、教区的扩大和教会所处环境的改观，划分畛域的观念不单在信仰上而且在真实的传道区域上彰现了出来，于是各个教派形成了一如国外母会一般的自我健全之路，将力量集中于教派的自身。事实上新的传道环境下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又重新回归教会的协和上。这种联合或合一最初是先从同宗教派之间的合一和邻近教派之间的合一开始的。

教会的合一和自立最早的举动当推漳泉长老大会。同治元年（1862）英

长老会和美归正教会在厦门合组中华基督教会最早的漳泉长老大会，由各掌教牧师和各堂代表长者一人组成。在漳泉大会成立后就兴起“请愿”运动要求脱离差会遥控，实行教会自治，自此大会变成自治机构，并设立华人自己的宣道会。1871年大会集会新街礼拜堂，制定规条、公布宣告、教规、信条，治会严谨，这便是闽南长老宗教会的漳泉大会时期（1862—1892年）。它自成立起就实现了以自治、自养、自传的堂会为基础的自治模式。摆脱差会控制成为推动中华基督教会自立运动的力量。它所实行的教会自治在时间上比香港自立思想的出现和广东最早的自理会要早十多年，是本世纪初中华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和中国耶稣教自立运动在长老宗教会内部所萌生的最初萌芽。

自1893年闽南教会进入“总会时代”（1893—1920）“教会逐渐兴进，会务自必加繁，政治愈加重要。故漳泉大会决定扩张教会的唯一方法，为分大会、设总会。初拟招请台湾南北二长老会，岭东之汕头五经当二处长老，合组一总会。乃以种种障碍不遂所欲，而自设总，将原有大会分而为二”⁽²³⁾。总会分五个区会，下属各堂会自养情况逐年进步。从1909年至1915年总会为实现与和会的合一进行多年磋商。1918年两会合一通过了程序、草章、自治规条，逐条通过施行。1920年成立闽南中华基督教合一会，最高组织为大议会，下分六个区会，建立了更为健全独立的自立机构，与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关系也更为密切。闽南教会与美以美兴化年议会相毗邻，新一代的国籍牧师如许声炎等人“认为闽南教会合一自立运动，应联合闽北而后全国”，与闽北各会的联合首先是与兴化年议会的联合为尝试的。1898年泉西堂会长执会于永春集会，会后永春并附近礼拜堂联合成立堂会，这是闽南长老会在美以美宣教区设立的第一个堂会。大会成立后，永春教会隶属泉永区议会，但是由于联合永、德、大教会于闽南合一会的建议最早曾向福州美以美年议会提出时，以美牧华雅各、华牧谢锡恩的反对而中止。1900年夏又请于葛会督，及许，于是两会重新商议合一，虽遭西方人士的反对，合一运动还是取得初步成果，各牧区一致表决自养。1925年正式成立闽南年议会，1931年闽南年议会决议退出美以美会，参加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当时除蔡为恩外，全部美传教士均撤走。1932年泉永区同闽南年议会接洽举行联合研究会事宜。1932年的杭州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欢纳美以美闽南年议会参加

⁽²³⁾ 周之德：《伦敦会历史：在厦门方面》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号”第21页

中华基督教会，作为闽南大会的一个区会”，至此与美以美会的合一已经部分地实现，但实际上是从美以美会中的分离。

同属公理宗教会的福州美部会和厦门伦敦会与原来的差会关系由于教会发展新形势的影响而显得很微妙，也在走差联自立之路。由于“中西协和委员会”这种组织的出现，表示教会与差会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公理会的全部事业已开始由协会、和会管理，而不再是外国传教士单独掌理。自19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美部会改组活动直到1909年才取得著效。美部会与闽公理会之间确定为母会与子会的关系，公理布道会实行华人自理。1919年议会改三级制：堂议会、区议会和大议会，由于差会的存在以及一些董事会在差会方面的权力，在重大问题上参加中华基督教会时常遇到差会的掣肘。1927年公理会宗执行部组织的形成，使以后的闽中大会无法摆脱美部会的支配，使该会比公理会时期更加依赖于差会。这与美部会所发正式函文的两面性手段分不开：“现在福州公理会已到可以实实完全自立——以后美部会不施什么权力于一切事业。皆由福州公理会管辖”。但同时要求“公理会就如何需用美部会业产进行协商”，经济扼杀目的昭然显见。

厦门伦敦会于1872年按立了首批华牧之后，于1873年成立省议会——和会。1919年进一步取消和会名称，改称五带议会，成为各带教会联合的省议会。该会富于自治、自养精神，但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各教牧人员的凋谢而衰退。1907年伦敦会在上海举行百年纪念大会，主张主要中华教会务当联合，后经闽南长老总会与省议会的商讨，遂定合一，称为闽南基督教大议会。从此闽南自治教会走上合一的道路，取消各公会的长老会、归正教、伦敦会的名称。所以教派真正泯灭秦越之界实行联合合一已在二十世纪初的闽南各教会初步打开了局面。但是新立后的合会内许多事业仍由差会拨款补助，这时的西牧已很少直接参与传教，大多从事于教会各事业，包括本文所研究的文字出版事业。。

福建圣公会的合一走的完全是本宗的联合之路。1850—1905年福建教区正式成立以前，为开荒布道时期，属港澳教区管辖。1906年正式成立福建教区。1910年改组省议会为正式教区议会，操立法、行政权，议案自此无须请示西议会。自1896年以后福建圣公会已发展成为闽北几个差会共同的宣教区，圣公会继长老宗之后出现合一趋势，促进了中华圣公会的诞生。教区下属各支区教区区议会的议长则较早全部由华牧担任。1920年起已不再由外国

传教士担任。1912年英、美、加圣公会合组中华圣公会。1910年正式教区成立，1930年教区成立五运办事处，并配置专署的文字出版刊物和出版机构。1944年张光旭出任福建教区主教。1925年前后教区分布于各地的支区堂会医院学校已经全部归辖于教区议会（包括西职员在内）。在福建教区，西职员已不再支配教会行政，这使中华圣公会在全国各教区中属于本色华较为彻底的教区。1936年全教区52个牧区、236座教堂，而西传教士人数则只为3人。由于提倡教会自立、自传，各地所能负担的传道费用日蹙，男女传道由1925年的295人减为1945年的96人。到1949年福建圣公会有教堂251分布于13支区、53个牧区。

闽南实行教派合一，而闽北各宗派只是在具体事功上采取适宜性的合作，离合一的要求相去甚远，哪怕是在全国合一运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如此。1927年福州、邵武公理会参加中华基督教会。在全国总会属下，除闽南大会外，成立闽中大会、闽北大会。闽北闽中一带较具影响作用的美部会的态度对新成立的闽中闽北大会影响很大。美部会对其子会公理会参加中华基督教会的对策显得尤为苛刻：撤走闽北大会美籍人员，致使各种事业瘫痪；使闽中大会依附于美部会，由于美部会的作梗，闽中和闽北大会在中华基督教会中的自立和合一根基远没有闽南大会牢固，有时竟如风中败草，弱难经风。1927—1933年闽中大会执行部的工作无非是以下三个重点：安置越来越多的美国传教士；向美部会在美国总部禀报该会预算；推行差会交办的“新事业”。教会的津贴款项基本来自差会，所以公理会（闽中大会）与美部会的关系仍是斩不断理还乱，闽中大会虽加入中华基督教会却处于差会和中华基督教会的夹缝中，境遇尴尬，与西方差会的“奶养”关系未断，只是在名义上参加了中华基督教会。这是由于闽中大会的各项教务工作，各项事业的华牧太过于偏少（与闽南大会比较）的缘故，教会的自养等经济问题无法通过自我保障和提供来解决。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副）委员长许声炎牧师曾到此巡视教会之后，改称为闽中协会。这种称呼可见其教会与中华基督教会的关系之松散程度。1947年以后的三年间，差会势力与华人自立教会之间的对比发生很大的变化，“当时只有美国差会继续参预教会宣教和内部事务，因此差会势力分布范围仅限于过去美以美会三个年议会。前福州美部会、邵武美部会（即闽中协会、闽北大会）以及美国归正教重新渗透到自治教会内部的西溪、

龙岩等宣教区，势力中心在福州”⁽²⁴⁾。这个时期差会及其影响下的闽中闽北教会把注意力从宣教工作转移到中国农村工作和大中学校以及社会的宗教教育上去，相继发起了识字运动、乡村运动等。

由于不同教宗、不同国籍的差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历史上福建长老宗、公理宗、圣公宗、监理宗教会与外国差会的关系都不尽相同，英国、美国同宗教会与差会关系亦有差异。福建美国各差会对于各方教会的自立和合一处处显示其固执保守和霸道的美国作风，所以美国旗下的美部会对闽中闽北大会议参加中华基督教会阳奉阴违，处处施难，最终使两会又投怀送抱，自 30 年代起一直还是受差会津贴，受制于差会。而福州美以美会除了在 1941 年改称为卫理公会外，其传统的会内阶制和各种管理制度一如既往，依然故有，对于全国几次合一高潮均采取态度上的漠视，完全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发展之路，合一是不可能的，更别说大会的自立。在一些教育事业上则由于无力自办而教会又必需，则只好采取与闽北其它两公会协办的办法。比如福州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协和神学院及私立协和幼稚师范学校，医院如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等均有美以美会的参与。

20 世纪初至解放初期另外有孟那浸信会、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耶稣教会、内地会等海外差会传入福建，加上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基督徒聚会处（所）等，全省在解放前共出现过大小 12 个不同宗派的教会组织，一半属美国，占全省宣教区域的 3/5。圣公会和美以美会两大差会占全省的 1/3。小的差会如隶属浙江的内教会只出现于福建东北隅，隶属广东的浸礼会在福建南端，孟那兄弟会在闽西南，此外还有小数的独立教士自由传教。福建基督教的大概情形是由六个较大差会所组成的，然而如果不把存在过的教会描述出来终归不完整。所以笔者一并把其余教会组织简述以显不漏。

孟那浸信会属美国孟那浸信会差会，1911 年由美牧卫英士 (*F. J. Wiens*) 夫妇由广东嘉应传入上杭，起初只设一祈祷所，第一次受洗入教者有三人。1914 年在祈祷所成立了礼拜堂，教会开始走上正轨。后来教会分设上杭、武平、永定三县共二十祈祷所和堂会所。1923 年教友六百余人，从初期开始由于教会国籍神职人员的大批参与，“我们教会早就把自立的种子种下，想逐渐除卸差会仔肩，所以从初年就关于加会应办事业的费用，多由教友捐输兴办，所得差会帮助者甚少”⁽²⁵⁾。到 1924 年“上杭总会已完全自立之外，其

⁽²⁴⁾ 许声炎：《闽南长老会八十年简史》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号》第 107 页

⁽²⁵⁾ 葛敬洪：《上杭孟那浸信会史略》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乙编》《神学志特号》民 14 年春季第

他各堂差不多要脱母会而能自立了”。由于各堂会拥有田产、店铺、山场以及教徒的捐输所以很早便基本上能够自立。但是该会规模有限所以影响只限于闽西的上杭、永定、武平等县的部分地区。

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1904 年由华侨郑提摩太从南洋传入鼓浪屿。传播早期得到美传教士的合作。1906 年在厦门同安城北设会堂。1907 年在鼓浪屿成立闽南区会，隶属安息日会华南联合会，1907 年开始向周边泉州、海澄传教，并于同年创立厦门教会。1912 年入福州传教，1919 年—1920 年间成立闽北区会。1941 年以前由前西牧掌理会务，以后始由华牧担任会长。安息日传入福州后取得了较闽南更大的发展，在福州及其周边闽北闽东各县十六地区成立堂会。在闽北也比较有影响。“福建安息日会原由华侨传入，是华人自传的教会，由于美国传教士的渗透而依附于美国差会。在闽南区会闽北区会成立后，主要宣教工作仍然由华人担任，但是由于经济仰赖于差会的津贴，前期历届会长均为差会派遣的传教士掌握教会经济、人事和行政事务。华人牧师、传道无固定任所，成为流动性的宣教人员”⁽²⁶⁾。1932 年该会成立“中华总会”。1949 年教会自给能力不及 50%。相对来讲该会属于自立能力缺乏历史培植的教会。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成立后传入福建，莆田支会属最早支会之一，而当时该会仅有支会 80 多处。1920 年福州成立支会，到 1923 年福建已有观音桥、长乐金峰街、宁德小东门、建阳陈家同四个支会。该会的宗旨是“本爱国、爱教、爱人的精神要求完全脱离西人教会经济关系，由信徒自动组织团体、图谋自立、自养、自传”。总会号召自立教会合而为一，不受西差会管辖，换回教权。福建自立会后期主要分布在福鼎、长乐一带原为圣公会和公理会的宣教地，信徒也多来自这个教派。长乐金峰原为早期自立会流行地区。该会在福建教会中虽不具规模，但是其号召自立教会合一、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的精神对各教派华牧和教徒的脱离西教会争取教权意识的影响是巨大的。

基督教聚会处（所）是基督教聚会处和基督教聚会所两派的共称。它们是中国基督教界自立运动中中华人创设的教会之一。该会发祥地为福州，初期称基督教会堂，最初发起人和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倪柝声、王载，他们共同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地方教会。其神学思想颇受英国独立派女教士何受思和加拿大著名女信徒盖恩夫人的影响。而其地方教会、教义和教仪三个方面则明

11 卷第 1 号第 105 页

⁽²⁶⁾ 《福建宗教史纲》（基督教卷）未刊稿 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地方史资料室 第 55-56 页

显受长老宗、信义宗、浸礼宗教会的影响。该会最初设自福州仓前山于园王载家中。经过“基督徒会堂期的奠基后，逐渐注重于查经、解经和建立教会的工作。由于该会乃华人自创的教会，受当时的社会潮流和教会内部自立运动的影响，信徒多来自各公会的会友，因此故被各大差会斥为“小群派”和“偷羊派”，也显示其信仰神学的坎坷中国特色化和信仰多宗的斑驳色彩。1926年闽南厦泉等地相继有聚会处的出现。王、倪氏积极向香港、南洋等地传教，建立南洋华人独立教会。1933年该会已具有一定国际声望，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信徒内迁，聚会处随移民向省内拓展教务，并在战后开始有计划地“福音移民”。二战后上海成为其全国性的中心，福州则成为其全国性同工培训中心。该会从创设到发展只30多年，50年代在国内开始衰落。该会不与任何国家的差会发生关系，不受制于外国差会，很受城市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欢迎。其地方教会的设立无上下统属关系，无全省性或全国性领导机构，教会与教会间的联系仅靠共同的信仰维系，较为松散。由于其纯粹的“华籍”血统，同中华基督教会、真耶稣教会一起建立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华人独立教会的体系，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和声望。

真耶稣教会在福建的奠基者张巴拿巴1923年应福州慕道者邀请来传教，并接受了第一批十二人为信徒，设立长老、执事创立了教会。1924年在建瓯、延平、罗源、莆田、尤溪、长乐设立教会。1924年该会进入了发展时期，莆田、福清不久成为该会在福建最发达的地区。1925年之后该会传入闽南、闽东各地并由福建传入台湾、日本、新加坡、南洋、檀香山等海外华人集中地，其传播的中心仍然为福州。

较小规模的来闽差会或中国自立教会的共同特点是入闽或成立较晚，并在成立或传入后发展迅速，充分利用了早期六公会所进行的神学拓殖，并以自身充分的自立意识吸引了原六公会的信徒为教众，从而避免了教义教理的重复教育这一漫长的过程，由于其教会规模较小或自立意识较浓，所以未参加任何教会的合一运动，并以自身优势积极进行神学宣传直至向海外进行宣教。不足之处是由于组织机构的松散性，教会的发展常会遇到自养经费不济之虞，神学信仰的大规模借用和吸收转化有时显得过于粗糙。

福建各差会的宣传工作，就时间来说仅次于广东。至二十年代初期，差会宣教事业取得高度发展“开拓1164个布道区，建造63个差会总堂。美以美会拥有506个布道区。圣公会所建总堂占总数的1/3，是两个最大的公会”。

“在外国派遣人员中，英国派遣 205 人，美国 249 人，女传教士占 43%，妇女工作占很大的比例”。“此外，华籍人员与外国人员总数比例为 8: 1，其中担任布道工作的占 43%，使中国牧师传道人数居全国第一位，外国人员数量则居第六位，然而相对集中于福州，使福州成为全国差会势力最强的地区。

“布道区与正式教堂数目相等，均有中国教堂教牧人员，基层教会管理基本依靠华人并操于华人手中，因此教会的联合组织居于全国首位”。辛亥革命使全省布道区猛增 114%，从 1914 年—1920 年受按立的中国神职人员大大超过 8% 的增长。从 1913 年（甚至更早）在教会与外国差会间出现分离的趋势，尽管 2/3 的教会事业掌握在差会手中，只有施行较具妥协性的共管才能避免分离。相对全国教会而言，闽南各教会的自立意识最早，而闽北由中国人自己成立的教会的自立影响特别是海外影响最大。

福建的基督教信仰则可从地域上和时域上讲，地域上讲教会宣教大多在沿海，并且也多在发达的沿海地区，内地的宣教只能作为宣教成绩的陪衬和比较项。根据《福建省统计年鉴》（民 26 年版）统计民国二十六年全省教徒数（包括天主教教徒）共计 48522 人，财产估值 1500849 元，教堂数量最多的三个县市为仙游 70 堂，漳浦 21 堂，连江 26 堂，而教堂数量最少的四个县为：永安、清流、宁化、宁洋四县均为内地县属⁽²⁷⁾。在时间的跨度上来讲，最早的堂口成立于 1848 年，它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座新教礼拜堂，被称为“中华第一教堂”，直至 1949 年福建的基督教已经进行了近百年的神学耕耘，收获也是禾稼颇丰的——福建成为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信仰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两者内在的联系是否具有因果则已经不成问题。

⁽²⁷⁾ 《福建省统计年鉴》（民 26 年版）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 是福建省第一次统计的综合记载，数据来自“全省教堂”第 583-590 页

第二章 文字布道：

教会及其附属机构、相关机构的文字出版事业

第一节 教会直属文字事业：基督“普世”之旗帜

“请读”⁽¹⁾，基督“普世”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以文字等宣传物来宣传福音，在中国汉语语境中，基督的话语也必须由西方语言切转为汉语来向中国人宣传天国主义。但是用属地的语言来表达“普世”的基督精神，特别是用中文这种一点西方联系都没有的完全异质的文字，是否真的能与基督精神的原本相楔合得天衣无缝？事实上基督精神一旦从五埠入口，就很适时宜地把这种事工由异质慢慢转化为本土，而这些工作大多则是凭靠着本土教会在差会“领导”下的教会文字事业来实现的。教会文字事业的初期是由传教士个人事功喜好和专长以及差会的决议来支配的，教会文字事业随着教会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和教会基础的不断夯实而不断扩大和被人注意，但对这个工作重要性的关注并非一直都是教会工作的焦点。直到民国二十九年还有教会工作者为教会文字祈祷：“求主祝福教会办事的职员，叫他们能觉得文字工作的重要，尽心的提倡与鼓励。求主杂我们中间，培植新的作家，使他们能够在现代的立场上，用美满诚恳的文章与诗歌，来宣扬主的真理”⁽²⁾。其实教会内关于文字事工的重要性在当时已经有不少有见地的认识作，可以作为百年普世旗帜下的文字事业的一点点总结：“大凡一种宗教思想要使它深入人心，第一需要传达的工具，第二要这个工具能和文化背景发生化合的作用，然后才能得到人们的欢迎与信仰。所传达的工就是文字，因为它能流传久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谓与文化背景发生化合作用的工具就是这个文字须为一个民族的文化 and 一种宗教的思想调和出来的结晶。各种宗教都有这样的需要，基督教也不能例外”⁽³⁾。教会文字事业作为教会宣传中最直接的神学载体，它饱含的神学思想的传播较之于口头传播更为持久，因此它更有资格作为基督普世的鲜明的标志之一，无疑也会成为教会邀人信仰的一张张“请柬”和“上帝之笺”。

早期福建各差会和教会在组织上是不完全的，体制上是不健全的，神学

(1) 《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至三十一节“约翰”十九章一至三节

(2) 刘廷芳：《为教会文字工作祷文》载于《中华归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月刊 第二百零六期 民29年5月

(3) 朱立德：《我国基督教领袖应注重基督教文字事业》载于《中华归主》第二百零六期 民29年5月 出版第3页

意识的宣传是支离的，工作的重点之一便是集中在圣经的闽语翻译和出版上，以便配合口头宣传的需要（事实上大多时候文字较之于口头宣传更为有效）。早期福建基督教会圣经的翻译和出版由于时间的湮灭及时事的造作，早已不见了整体的样子。我们根据采撷的吉光片羽的残留可以知道最初闽语圣经的发行出版多是单章单节的小册子装，并且在出版语言上以福州和厦门方言为主，间或有厦门罗马字的出版物⁽⁴⁾。在当时福州方言 500 万到 800 万人口的传播范围中，第一部方言“创始纪”是由 *L. B. Peet* 于 1854 年翻译出版的，而同时 *R. S. Maclay* 翻译了福州方言“约翰福音”。以后不同版本的《新约圣经》出版了多次。福州语的新约由 *Wm. Welton* (1856 年)、*L. B. Peet* (1853—1856 年) 和 *R. S. Maclay* (1863 年) 各自出版的。新约节选本重版在 1866 年、1869 年和 1878 年。旧约的福州话本第一次出版是在 1884 年，1891 年全本圣经的福州话本第一次出现，1895 年又版。自此又出了几版，包括以后由罗马字母出版的福州话本。

厦门方言（闽南方言）在当时有 700 万至 1000 万的使用者，主要分布于闽南和台湾、南洋一带。早在 1852 年“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都以罗马字母字的形式出版。这部“马可福音”是 *A. Ostrom* 的翻译作品。而“约翰福音”至迟出版在 1860 年之前，是由 *Mr. Ostrom* 翻译的，仅有 80 页规模。厦门话新约也是以罗马字母出现的，被发行在 1856 年。另外一版是在 *Glasgow* 印刷的，在 1873 年发行。同年闽南三公会联合准备根据官话本翻译闽南语的旧约，整个翻译过程在 1880—1884 年间完成。1902 年旧约出版，同时新约修订。*Dr. J. C. Gibson* 在写作罗马字母的闽南语版圣经时说：“我认为它将被一个很大数量的人口所不断使用在闽南和整个台湾，并且这是唯一

⁽⁴⁾ 根据 *A. J. Garnier,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34*, 中统计:

Title in Chinese	Notes	Publication
路加传福音书	<i>the Gospel of Luke, Foochow dialect, Baldwin</i>	<i>Foochow 1853</i>
-----	<i>Ruth, Amoy dialect, Talmage</i>	-----
-----	<i>Ruth, Amoy dialect, Romanised, Talmage</i>	<i>Amoy 1853</i>
-----	<i>The Gospel of John, Foochow dialect, J. Doolittle</i>	<i>Foochow 1854</i>
-----	<i>The Gospel of John, Foochow dialect, Maclay</i>	<i>Foochow 1854</i>
-----	<i>Genesis, Foochow dialect, Peet</i>	<i>Foochow 1854</i>
-----	<i>The Epistles of Peter and John, Foochow dialect, Maclay.</i>	<i>Foochow 1855</i>
圣经新约福州平话	<i>the New Testament, Foochow dialect, Welton</i>	<i>Foochow 1856</i>
新约全书	<i>The New Testament, Foochow dialect, Peet,</i>	<i>Foochow 1853-56</i>
马可福音书	<i>The Gospel of Mark, Amoy Romanised, A. Ostrom</i>	<i>Amoy 1858-60</i>
新约圣经	<i>The New Testament, Foochow dialect, Maclay and others</i>	<i>Foochow 1863</i>
新约串珠	<i>The New Testament, with references The Pelegates' Version modified, No. 20. O. Gibson</i>	

的一本完整的罗马字版圣经”⁽⁵⁾，直到三十年代这部圣经才被完整地出齐。

福建基督教早期的文字事业是不健全的，至为重要的圣经出版都显得拮据，更不能和后期文字出版事业的多样性相比。但是正是从早期开始教会便打出了这样一面神学宣言般的旗帜，不过从客观效果上看它们都显得力孤势单离普世的目标尚远。但毕竟嫩稚的教会是要长大的，这是社会规律，假如各种条件都成熟的话。

如果说早期教会文字出版事业显得形式单一、内容不厚的话，那么中后期的福建教会文字事业却显得异彩纷呈，又让史家感到相当扑朔。所以本文作者不昧，以各宗派的文字出版事业的机关为整理线索的根据和标准，并分析了地方基层教会简单的出版事业，以求对教会直接和间接兴办的文字事业做一个大致分析。

一 福州美以美会美兴书局：参商与俗经营的信仰边缘

1835年4月28日美国卫斯大学院的布道使讲演厅的一次聚会讨论设立差会的事宜，最后大会一致赞成采取的决议如下：“本会立差布道使往中国区，并在中国各大商埠设立印务局，那是适切中国的急需，助我们达到目的的好方法。”因为“她（中国）有一种通俗语言易学，不象平常一般人所猜想的那么难。现已有多种基督教书籍是中国字，没什么国度受文字影响改革得有中国那么快”⁽⁶⁾。在这样一种对教会文字作用的传统认识下，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十二年后从波士顿起锚东来。其美国总会的布道部组织了一个中国差会委办，该委办主张中国差会应该设在福州，因此福州就很凑巧地被给予了一次机会，成为美以美会在全国福音宣教工作的渊藪所在。

刚入福州的美以美会“庶务丛集，百端待举”，但是到“1859年，布道部委这事（建设一印务局）拨了五万美元，但是由几处凑集的，美国圣经会三千元，‘为以福州土语刊行圣经之用’。圣书公会许可：‘若圣经销路好，这款可年年续助’1862年马克先生报告：‘我们差会的这部分工夫，现在很有成效购买了一部是华盛顿式的印刷机，引工很好。有一幅号中文铅字，一小幅英文铅字，为印中英合参之用。印刷所应用的印具，尽有了，我们雇了一广州工头，三福州协理，造了一适宜的办公室，曾印出了一千本小册子

⁽⁵⁾ A. J. Garnier,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34, P64-65

⁽⁶⁾ 力士韬著，汉如选译，《美以美会七十五年之经过》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号》第十卷第三号 民13年秋第200页

书，二十二页，题名‘道理和奇事’(Doctrines and Miracles)五千本马太福音，五千本约翰福音，我们盼望来年增加铅字使印工效力加大，次年巴的文先生(Baldwin)呈请布道部，差一个最好的印刷家来中国，担任印务，当时禁止印宗教文字以外的东西，据报告，1867年结算，差不多有了八百元美金的净利。中国差会委办命将这赢利拨归印刷之用”⁽⁷⁾。七八年的苦心经营所带来的赢余是可观的。它在早年所出的书籍正合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福州方言圣经选本的情况，在缺乏具体印数资料的情况下，文中所开列的印数极具参考价值。这就是美以美会美华印书局的最初情形。

根据美国总会的训令，教会应该印行基督徒需要的圣经与文艺书籍，目的再明确不过了：宣传福音神学。美华书局的所在地与英、法领事公馆靠的很近，后隔墙为教士们的庐舍，鹤龄英华书院、女神学院、毓英女塾、幼儿园、马高爱医院、华南女中等教会文化行政机构均在附近，学校林立，人才济济，书局设于此，对于用文字布道及推行文化宣传，其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书局最初设有印刷工厂、装订室、铅版印刷工厂、手工工作室及泰西各国色纸洋薄文具等贮存室，另外还设有专管寄递及收取报费事宜的办公室。1862年1月正式开工，使用的是活版机的设备，因而成为闽省活版印刷的发轫之举。随着书局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教会需用文字宣传品量的增大，书局的业务也由原来单一的印售圣经等宗教书籍扩大到承印、装订与发售各种书籍、印发报刊杂志、编著、译著国内外书籍、对外交流印务技术等多项业务。这时的印书局已不仅代表教会承印本教会所需的各类书籍而且还代闽北三公会、圣经会、大美圣经会等刊印各种宗教书籍，以用于布道宣传之用。同时它还还为传教士印发学习中国语言的书籍，这距离其神学宣传宗旨毕竟间接了一些。

成熟后的书局已从神圣的“神工”宗教属性中试探性地表现出世俗活动的端倪，使得书局的教会属性表现得驳杂不纯：它代各学校承印教材课本、字典、学校规条、课程表、章程、地图、学校捷报、中西书籍、执照及各种参考书籍等；代商界承印仿单、股票、招贴、商业广告；代售教会圣经书籍、泰西各种色纸、名签、洋薄、文具及上海广学会书籍等。书局由原来由教会津贴到赢赚第一笔净利而走上了自裁自决经营的道路，但是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书局由于过多地参与了世俗的商业赢利活动，虽把赢利作为教会之捐，

⁽⁷⁾力士韬著，汉如选译：《美以美会七十五年之经过》载于《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号》第十卷第三号 民13年秋 第204-205页

但已与教会貌合神离。教会经济主要靠捐输和差会拨款，波动性极大，而书局则显的收入相对稳定，所以书局作为教会直接经营的机构对教会当局的财政义务而显的尤为力不从心和不愿意。

书局印发报刊杂志在福建教会内外都极具影响，所以这一业务也成为书局工作的一个亮点。其中《教务杂志》、《闽省会报》、《福报》、《华美报》、《华美教报》和《左海公道报》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教会而具政治宣传功用意识，所发行的范围也由福建而向海内外，成为中国报学史上一批早期较具影响的刊物。1894年福州美以美会和监理会开始讨论在上海创办一个联合总的书局，直到1901年谈判才取的突破。1902年经两会同意决定设总局在上海，但同时附属于美国纽约总会。1903年局址选设在上海吴淞路，监理会书籍委员会负责出版，名称定为上海联合书局称为华美书馆。原福州美华印书局40年的作为教会直属机构的功用对教会、学校、社会贡献极大，联合后改为联合书局的一个支局，名为美华书馆，从这时起的美华书馆与福州美会已无隶属关系^④。纵观美华书局的简单历史和主要业务可以看出，该书局的刊印业务早已超出一个教会直属印刷机构所应该担负的单一的神学服务义务，而广泛深入世俗的商业活动，射利虽不是其目的但至少已经成为其各种结算的成绩依凭。

二 兴化美兴印书局：来自内地的特色教会书局

1862年（同治二年）12月21日，南日草湖村的一个“吃鸦片、流浪江湖、教练拳术”的浪子林振珍由于在福州受洗入教而成为兴化卫理公会的第一个信徒，并“决志以宣道救人为己任”。1863年正月二十林在往福清渔溪宣道的路上顺道返里，在南日岛各处宣道，至8月始有三人信道入教。兴化教会就这样由一个中国牧者打开了信仰之门，这也成为兴化这样一个内地教会今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特征所在：中国神职人员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1867年兴化成立牧区，首任牧师就是林振珍，1867年10月美国传教士麦利和和薛承恩巡视兴化教会，这是西人在兴化的第一双足迹。自1863年基督教的传入至1871年，由莆田而仙游，九年间已设牧区十二、堂会廿九。1872年兴化教区成立，地区性的教会已较具规模。1890年冬十一月，蒲鲁士偕妻蒲星氏驻兴化，成为第一双驻兴化的洋人，正是这对基督徒夫妇对兴

^④ 关于福州美华印书局的具体历史情况可参阅：李淑仁：《福州美华印书局简史》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

化教会甚至于兴化地方文字事业的贡献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1891年（兴化）教区长李长水，布道头蒲鲁士（美帝），是年创立兴化平话语拼音字母（简称罗马字），是年倡设识字训练班”⁽⁹⁾。兴化语拼音字的创立和识字训练班的开设使教会在布道宣教过程中有了一种十分有效的工具，而稍后的罗文《奋兴报》和教会书坊以及后来的教会印书局（美兴）的设立，使教会文字事业有了一块坚实的宣传阵地。

美兴书局未设之时，连“传道之法及牧师之法二书为此时教会不可缓之书”的出版都没有良法筹印，甚至于连《美以美兴化年录》这样重要的教会历史记录也要经由福州美华书局活版印刷，一直到1915年第二十次年录才由美兴书局活版印刷。所以中国教会长老、华字书记、书籍托事宋学连等“请立兴化印书局一座”⁽¹⁰⁾以“助传道奋兴法度之益”。由于罗马字的推广和教会规模的扩大对文字宣传的需求加大，所以教会当局很快便对印书局事宜进行了筹划。次年教会书籍托事陈日新等再次请立兴化本地字书局，并且还要求设立书坊一座“专办教会各等要用书籍以便传道者随时采买”来作为书局的配套机构，同时就“宋学连先生新造字母请公会查察可否通行于会”⁽¹¹⁾。其实早在1893年蒲鲁士夫妇在1892年苦心创立兴化音罗马字母拼音法后，便向圣经公会请求分设罗马字母印书局于兴化城了。但由于教会经济工作重心偏重在组织机构人员的薪俸上，无力给予答复，所以教会的这种态度使成立初期的美兴印书局“洋字无几，器具缺少，且负债甚多也”，但是由于书局自身“给诸人所作之工钱亦后，且亦未有自减下其价与我争作也”优势的鼓舞下，书局工作人员充满了“每望明年必无欠债之事，而器具亦必至于充足”⁽¹²⁾的希望。书局在1898年新设之初是带有教会机构的社会福利性质的：“本年（1898）初立一新规即将书局内工夫与诸生徒雕摆，以供口食，如此者，可使贫寒子弟亦获肄业之良机矣，且免有徒受济施之忧。此机若历久必广，则获益者必多”。在这样赈济性质政策影响下，印书局第一年的成绩斐著：印圣经一万二千本计共十六万四千面，杂书七千五百本，计共十七万九千面，又印单张四千二百二十张。同年，在福建基督教会史上较具影响的《奋

⁽⁹⁾ 《兴化卫理公会史》（油印本） 卫理公会兴化年议会办事处编 1959年9月5日 第11页

⁽¹⁰⁾ 宋学连等：《书籍报单》载于《美以美兴化第一次年录》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 福州美华书局活版

⁽¹¹⁾ 陈日新等：《书籍报单》载于《美以美兴化第二次年录》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福州美华书局活版

⁽¹²⁾ 武林吉：《印书局报单》载于《美以美兴化第三次年录》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福州美华书局活版

兴报》也创立，并出版发行了第一期月报。印书局创设的第二年“法度规约略变新，以本年特聘一印书司傅……在局中料理”。这位印刷师傅“工艺甚为精熟，望能久在局内料理”。这时的书局遇到的还是设备上的问题：“所有器皿皆系旧式不便于用，而字只亦过少，并缺大字以印字母并大字书本，留为老人并初学者驶（使）用”。教会为达到以文字宣传福音的目的可谓良苦心机，把宣传对象从老人一直注意到初习字的人，作事可谓细矣。

书局早期的事工虽由蒲鲁士负责但由于其“不暇料理”所以书局事务实际上是由蒲星氏、万姑娘及林心香等人在料理。这时的书局除“每月皆印有月报十余页”之外，还印有教会急需的新约和赞美诗（皆平话本）。除教会宣传所需书籍之外书局还印有“数本西学之书即算学、地理问答、英语入门”等书，并相信这些书“后亦大有用途”，如果蒲氏的认为没错的话，这些非宗教书籍的确在兴化府宣传西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只不过它体现在世俗的意义上而非神学信仰的意义上。该年的书局印圣经两万六千本，什书九千七百九十七本，印单张十四万七千，都是平话字，由于蒲氏等人以“诲不识丁之读平话，乃为第一辛苦之事”为信念⁽¹³⁾，所以为这种简易西化字体的使用和推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立第二年的印书局仍处于“机器皆古式而铅字且见无多”的困扰中。由于早期书局中做工者都是教会直属学校的学生，所以这样既能为书局培养未来的技术人员，又可节约许多工酬，所以到1901年的书局已“再购许多新字，再置许多器具”，并且“资本又未见其不敷焉”，书局终于由初期“不娴操作，资本缺少，器皿不敷”而“规模略具，化粗陋为精纯”了。这时书局所印圣经的精美程度可以“寄数百本至日本焉”。由于书局经费中大部分是由什书会、拜日学会及圣经会等教会组织所助，所以应几会的要求，书局还是以印行圣经为主，以神学教材为辅，也出版一些翻译文论⁽¹⁴⁾。

早期书局“经五次迁移演化，最后在1906年于今（兴化城）仓后路设美兴书局，增置机器，添购汉文活铅字，设备日趋完善，业务不断发展”⁽¹⁵⁾。美兴印书局正名之前。“1905年，蒲鲁士又向美国（募）捐美金二千元。在莆田城关文化巷建造包砖楼房一座，作为美兴印书局”。这笔资金足以供给

⁽¹³⁾ 蒲鲁士：《印书局报单》载于《美以美兴化第四次年录》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福州美华书局活板

⁽¹⁴⁾ 蒲鲁士：《印书局报单》载于《美以美兴化第六次年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福州美华印书局活板

⁽¹⁵⁾ 郑金灿：《莆田最早的报纸》载于《福建宗教》2003年第1期第44页

书局成立和发展之敷用。“1908年，添购汉文铅字一付，隔十年，又先后购了印刷机一架和2、3、5号铅字各一付，并再建办公楼及门市部一座。1939年局址迁往文化巷营业。1948年，改为奋兴报社印刷部，不久又复为原名”⁽¹⁶⁾，直到1956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入地方国营莆田印刷厂。由于印书局所出书籍直接作为教会信仰所需之“灵粮”。其文字出版物对教会意义重大，所以自1893年至1943年，书局负责人都由西教士担任，其先后有蒲鲁士、高哲理、佳尔逊和韦德等人，直到1944年至解放时才由华人陈筠任局长，可见西人对教会重要机构的控制牢牢不愿让于华人，无形中扼杀了教会文字事业本色自立的萌芽。

书局印务多集中在“救灵之粮草”的基督宗教信仰用书上，而这些书籍也大多由蒲星氏、林鸿万、陈祖荫、陈庆临及蒲鲁士本人编著，例如《赞美诗礼文并对读之诗篇要书》等书籍。其余大宗印务是代圣经书会、务德会、拜日学、布道会以及为兴化年会总务机构所印的书籍、单页宣传品、办公用文件等。至于说书局对外所承担印务的文字记录却甚少，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有，这一部分的印务也只是为书局宗教性质出版物的发行作些点缀而已，同时由于书局开始时是由美国圣经书会拨款而设，所以书局常因为外款不济和为教会印务的服务性质（偿金常不足以顾成本），而陷入“局内本银有减无增，器具低料亦甚欠缺”的困境。为摆脱困境，书局曾“与上海托事商议将兴化书局与上海合而为一，另设一分局于兴化……如福州印书局”。并认为“然果尔，则后此兴郡之印书局所有遗漏皆可补全焉”⁽¹⁷⁾。书局当局这种把解厄方法乞借于外力的态度与其西人主理和业务单一有相当的关系，很明显，这一措施显然是没有成功的。西人与教会较之于华人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教会常常“请书局主理禁止凡属迷信及妨碍教会者无论报章、传单、通告等不得代印”⁽¹⁸⁾，这样保证教会当局以纯化信仰为借口来加控对地方教会神学思想的垄断。正如同教会人员为书局所定性质一样：“书局为文字布道及印刷宗教教材机关，请年会酌量拨款为扩充印务而发展文字宣传事业”⁽¹⁹⁾。目的是很明确的，书局与教会的关系也因其经济划拨关系而彰显得更清

⁽¹⁶⁾ 陈绍勋：《基督教传入莆田史料》（一）载于《莆田文史资料》第五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1983年8月 第183页

⁽¹⁷⁾ 蒲鲁士：《兴化印书局报单》载于《兴化美会第十次即正年会第二次年录》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1905）福州美华书局活板

⁽¹⁸⁾ 《事业机关提案（印书局）》载于《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兴化年议会（卫理公会合一）第八次年议会纪录》民国36年（1947）

⁽¹⁹⁾ 李淑仁：《福州美华印书局简史》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省政协

楚了。从民国廿四年至民卅七年历年“美兴书局报单”中所载的出入款项来看，每年的报单包括“购置产业方面；银货存留方面；各顾客欠款方面；存留书籍方面；款项被欠等方面”可以看的出来，自此以后书局的经济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养，但是报单中只报了款额的存留情况而无收入支出情况，所以难以从整体上对之进行探视。

同属美以美会麾下的两个年会所属的书局，在各自的建立发展过程中工作的重点却迥异。主要区别有下面几点：一，从机构设置上来讲，福州美华书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功能齐全、业务种类繁多的较为健全的较具现代意识的出版机构，其设立的较早，其筹建的理念直接来源于美以美会美国母会意欲在中国设立书局传道的多次讨论，是为厉行美国布道部训令，由布道使们筹建的。“根据美国总会的训令，教会应该有印刷厂打印基督徒需要的圣经与文艺书籍”，所以在书局的设立过程中一直得到了美国总布道会的人员支援和美国圣经会的经济捐助和设备更新资助。这样就使美华印书局从一开始成立便“衣食无忧”，有巨大的经济后盾来采购机器、建设书局建筑、雇请工人，特别是设备的更新周期短得几乎与同时期西方社会印刷技术同步。所以有 1892 年赠送兴化教会印书局罗马式的雕刻盘一架之慷慨之举，以显示自身设备之精和教会间的“团契”精神，而事实上该雕盘是书局闲置之物。美华书局有实力不断健全内部机构，所以才会在业务上可以游刃有余地扩展业务范围，除了代教会承印各种书籍外，它还有能力承印闽北三公会、圣经会等周边教会组织所需的各种宗教书籍。除了维持教会组织的需要外还向教会外承印、承售各种印刷物品，业务对象已经由教会内扩展到整个闽北社会层。相比较而言，美兴印书局却显得甚为寒酸，书局的筹建是入兴化的西人传教士主动向美国圣经书会申请的，而美国圣经书会的热情已没有象设立美华书局那么高了。答应蒲鲁士的美金寥寥，只够购回罗文铅字一付，而美华书局向美国圣经书会要钱则一次就可以得美金五千之钜，并得许诺：以后还会继续捐给。早期美兴书局的发展，资金短蹙时常襟不遮肘，由于印刷设备的陈旧，书局无法扩大业务范围，而设备的更新更是缓慢，“隔十年，又先后购了印刷机一架和 2、3、5 号铅字各一付”⁽²⁰⁾。又由于书局建筑狭促，使书局印务工作很受限制，这样的书局情况，别说业务向世俗业务发展，即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 月

⁽²⁰⁾ 陈绍勋：《基督教传入莆田史料》（一）载于《莆田文史资料》第五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1983 年 8 月

便是为完成教会机构所要求的任务都会觉得有心无力了。所以美兴书局从成立伊始直到并入国营印刷厂，一直把业务围着教会打转，除了信仰书籍的印刷外，几乎没有参与任何承印世俗的印务。这样的局内情况决定美兴书局只能在教会信仰圈子里打转，根本没有向世俗发展的空间可能。因此在书局发展的理念上也只能选择服务教会为宗旨，不可能象美华一样走书局联合的道路。即便书局主理者也曾尝试，但终不能成为一个由现代出版理念支持的印书局。

两书局的区别之二在于无论书局主理、参与管理者还是书局的印刷工人、技术人员，都几乎成为不可较比的对象，两者在人员采用上措施不同，结果自然难以处于同一层次。美华的创始人万为对印刷技术更新具有先天本能的自觉性和出外采购设备印刷技术的自由性，而美兴之蒲鲁士由于教会初创，万端待举，事务难以一肩擎之，所以常有顾此失彼之憾、举而难扩之慨。又加蒲氏本人着力于兴化罗马字事务，而荒疏（或根本没有）技术更新意识，而对印刷相关的配套技术更难顾及。万为之后的美华主理保灵、斐来尔、麦利和、李承恩、力为廉等承秉万为办书局理念，并都具有很强的开拓意识。美兴的历届局长在任中对书局的贡献都无出于蒲氏之右者。在技术人员的聘用上，两者差别更大。美华书局万为在书局创设之初便从广州聘请一位熟悉操用印刷机器的技术人员来榕，他本人也曾亲自在香港印书局学习印刷技术，这样为书局在技术人员的选聘上树立典范，并在后来形成制度。美兴在技术人员的选聘上从创设之初便立下新规：“将书局内工夫于诸生徒，雕摆以供口食，如此者可使贫寒子弟亦获肄业之良机矣，且免有徒受济施之忧，此机若历久必广，则获益者必多”⁽²¹⁾。在这种助学的福利思想的影响下，其“工人”多来自教会学校学生，其选聘司傅多雇自福州，其第一个技术人员“其人虽忠，惜于罗马字未探底蕴，故工夫犹有缺憾，书籍亦多遗忘”⁽²²⁾。又换司傅也“既前年福州之印匠也，督率十余名学生逐日学习拾字印书”⁽²³⁾。书局内印务技术非求之于先进而就近求于福州，且多为传统匠人，不谙现代活版印务，并且由学生充当印刷工人，向司傅学习印务，又使这种落后的传统雕版技术因因相陈，难以革新。技术的落后取之于观念的落后，美兴的发

⁽²¹⁾ 武林吉：《印书局报单》载于《美以美兴化第三次年录》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福州美华书局活板

⁽²²⁾ 蒲鲁士：《印书局报单》载于《美以美兴化第五次年录》光绪二十五年（1900）福州美华书局活板

⁽²³⁾ 蒲鲁士：《印书局报单》载于《美以美兴化第五次年录》光绪二十五年（1900）福州美华书局活板

展缓慢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了。

区别之三在于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美华从创设初期便把服务目标扩展为海内外，而美兴则一开始便把地方方言——兴化平话罗马字作为印刷品的主要载体，眼光只在兴化。取美华书局所发行报刊来看，除采用榕腔出版有《榕腔日报》、《榕腔小孩日报》和罗马字的《榕城报》外（而这些在局内的影响不甚重要），还以英文刊行有《美以美会第一号中文月刊》、《教务杂志》（1867年的 *The Missionary Record* 或 1868年的 *The Chinese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或 1965年的 *The Chinese Record*）。另外书局所刊行的中文刊物占有极大分量：《椰山使者》、《闽省会报》、《福报》、《华美报》、《左海公道报》等在福建乃至全国都极具影响。由于这批宣传物的刊出，使书局能够有足够的中、英文编辑的实力代上海、广东、香港等地印行各种书籍，又由于局址设在福州天安山麓，非常靠近外领事公馆，从此说话更具政治底蕴，又由于周围教会机构、医院、学校遍立，对推进该局的影响不言而喻。相反兴化美兴书局的设立，是在地方教会成立后的无奈之选，有利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更是不可企及的遥远。蒲氏和宋学连两人将福州音罗马字母平话改变为兴化音罗马字母，使兴化音罗马字母与福州音罗马字母完全异质。蒲氏还刊行学习罗马字母的书籍，并用罗马字发行大量书刊，甚至于罗马字圣经，同时命令男女教牧人员及部分负责教徒首先学习，普遍推广，这样使教会书籍罗马字化，相应封闭起书局以文字与兴化外的联系，并“定罗马字为兴化教会的文字，为男女教友所必读”⁽²⁴⁾。连教会的对外喉舌《奋兴报》最初也由罗文出版发行。兴化方言罗文的影响有多大？最多只能是200万的人群密度（当时兴化全境总人口也不过200万，信众也不过万余人）。兴化在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上不如福州那样有利于教会文字事业的发展，又加上采用文字的限制所以美兴书局的影响只能局限于地方而很难与国内外教会、世俗社会发生纵深的联系和广泛的联系。

在与教会关系上由于美华书局经济上的自养，所以虽隶属教会，却实则在经济上、制度上相对独立。除书局主理还是由教会年会“派司”外，书局已浸带有较浓的世俗倾向。过多的世俗商业参与必定使宗教文字宣传事业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优势换转为经济利益的内趋，从而使信仰服务在书局事务中所占比例份额相对缩小，单纯的“代商界承印仿单、股票、招贴、商业广

⁽²⁴⁾ 《兴化卫理公会史》（油印本）卫理公会兴化年议会办事处编 1959年9月5日 第101页

告”，及代售泰西各种色纸、名签、洋簿、文具已是纯粹的商业活动，这已与书局设立之初的宗旨有径庭之别，汾渭之界。所以在这种商业活动的参与过程中，书局在某些商业事务上与“神圣”事业的细节冲突中难免首鼠，两端难执，信仰有无偏斜也成为问题。由于各种经营活动的相对独立，使得书局与教会的关系较为松散。相比较言，美兴书局一直到1944年才由华人教士担任局长，所以可以说在美兴书局成立的五十余年中，它一直都在西教士的掌控之中。兴化地区“地偏人陋”，商业活动也不至于过多影响美兴书局的参商意识，所以其勤勉地做着“天国事业”，勉力为教会服务。又由于书局的款项来源多靠地方教会的捐募和西方差会的拨济，所以这种奶婴关系断不得。直到解放，美兴这个颠预的教会机构还是躺在地方教会怀中没有成熟，更别说独立。另外教会书刊的销售，教会另新设美兴书坊来办理。两者并无统属关系，所以更加切断了美兴书局从事俗凡事务的机会。所以来说美兴书局一直以来与兴化美会的关系都是隶属，并一直都在为教会勤勉地贡献着，以上是为两者区别之四。

美会兴办的出版机构除美华和美兴之外还有与美会有密切联系的永春多玛印书局。这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地方印书局，印刷技术取自商务印书馆。1919年秋开设，起初以石印起家，民十四年靠传道教友捐款，购入铅印机器及铅字，开创了永春铅印的新纪元，对于永春教会文字布道事业颇有贡献，同时也对永春当地印刷事业颇有影响。所刊行的教会报刊《崇道报》较具地方影响。

三 圣公会及其它差会的文字出版事业：

以社会活动为主的传“神”之工

圣公会的入华以其浓厚的英国传统气质显示出其独特的教会组织体系：“自使徒时即有三会督（亦称主教）、会长、会吏等品职。……公会之会政，不偏不易，性质纯尚中庸，亦旧亦新，主义惟取文稳健”⁽²⁵⁾。圣公会在这种尚中庸、取稳健、亦新亦旧的教会“圣职”制度支配下，教会会政的制定、实施，施行的是“议会合群制”基础上的三级分责任制。这种独特的会务操作系统对教会文字事业的影响可能决定于其对文字布道的态度：圣公会会政多以务实的社会实践为主，所以圣公会从全国总会一直到基层支堂会都以教

⁽²⁵⁾ 胡厚高：《中华圣公会》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欖基金会根据中华续行委员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民国三年十一月初版影印

育、医疗、布道、福利事业为工作取向的重点。对于传道有时间间接性影响的文字事业则采取装饰主义，而缺乏印书局、出版机构、编辑机构等文字事业的基础机构的设立。即便在“非基”运动时期，论战双方都以文字为武器的文字事业的白炽时期，圣公会亦无动于衷。

中华圣公总会虽有书籍委员会之设，但该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和基督教出版大擘——广学会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实际上也还是广学会单方面的援助关系：“几年来英圣公会广学会总是我们忠实的援助者，现在他们（圣公会书籍委员会）已与广学会成立了协作，我们可以期待广学会能增加圣公会可援用的书的产量，第二件事就是我们书籍委员会也和广学会接洽好了，我们的书籍随时由他们印行，并且他们还答应与我们以更大的广告，以期待更大的销路”⁽²⁶⁾。中华圣公会与广学会所建立的协作关系是由于圣公会缺乏必要的文字宣传事业的基本条件，所以这种寄靠关系是不牢靠的：“本委（书记办）与英国广学会所定三年之合同，至 1923 年底期满，然可确信再续定三年之合同，亦非不可能，本教会得自该学会之助力，实非浅鲜，苟无该学会之辅助，本会编辑事业将为之停顿”⁽²⁷⁾，与广学会的合同关系是有限制有条件的，该委办必须“要求之款小”，否则两者则再重新议合。圣公会总会既然是这种文字布道的态度，那么福建辖区的文字事业态度当不在其右，亦无突出之处。

圣公会福建教区的初始工作始于 1856 年 5 月 3 日英人韦尔唐（*Welton*）等人的入闽。十年后无一人奉教入会，英国布道会曾拟予停办。1861 年四个中国人领洗入教，教区才真正进入了发展阶段，由于早期“因专重布道工作，未顾及行政组织”，致使“事工散漫，缺乏系统”。直到 1906 年贝嘉德（*Price*）祝圣为福建第一任主教，福建才正式成立教区，“各项事工始有组织及管理可言”⁽²⁸⁾。这以前的圣公会并无健全的行政体系，文字事业更是没有统一筹划的个人行为，影响极为有限。1910 年教区议会成立，教区内一切事务则均归教区议会裁决处理，此时尚无专门系统的文字事业机构，每年一次的区议会对于文字事业有决定的权力，相比较言，福建教区的布道、教育、医务和慈善事业相形较著，而文字事业则没有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一如布道部、教育

⁽²⁶⁾ 《书籍委员会报告书》（1934—1936）载于《中华圣公会第九届总议会报告书》1938 年 7 月 7 日第 13 页

⁽²⁷⁾ 《书籍委办报告书》载于《中华圣公会第五次总议会报告书》附录十二民 13 年第 166 页

⁽²⁸⁾ 杨淳：《百年来福建教区鸟瞰》载于《圣公会报》第三十九卷 第十二期“福建教区百周年纪念专号”1950 年 12 月 15 日出版

部和医务部等十个基本部门一样，所以圣公会内的文字事业是脆弱的。

直到教区五运时期所成立的五运委员会才附带些许五运总干事专理文字事业和教区的文字宣传阵地——《福声月刊》的责任。而 1933 年的《福声月刊》印刷费才区区 25 元，编辑费 335 元，并把月刊强摊于各支区教会职员购买。至此福建教区的文字事业才由一个非专门的五运委员会大胆地打开了一个缺口。同时也使教会明白文字布道的作用：“可施之于未信者，使其由阅月刊而明了教义，托诗栏而精熟经义”⁽²⁹⁾。教区内“教友识字”运动也广泛展开，作为文字事业的辅助事业。1934 年福建教区议会议案决定停办刚成立一年的《福声月刊》，并创办《福建教区月刊》，使之成为教区的机关杂志，在各支区推举“投稿员”，并由支区常务委员会主任牧师负责收缴支区内教会各机关职员所缴刊资。《福建教区月刊》的这种由采稿到发行的“教区化”方针极大地封闭了教会宣传事业的外拓品质，但是另一方面却夯实了圣公会的宗教信仰的群众基础，这是问题的两面。由于五运委员会将《福声月刊》事务并五运布道事宜划归男传道总部办理，所以从此《福建教区月刊》正式成为教区文字事业的主要机关。

《教区月刊》的经济收入有几个主要来源：刊资、总会来款、文字布道款、广学会来款和特别款。其中总会来款等于刊资和文字布道款两者的总和。支出主要有：主笔薪金、印刷月刊（年十二期）、邮资、津贴会内所印书籍，印刷月刊是其中的大宗。由于圣公会没有自己的印刷机构，所以多由美以美会的华美书局承印，另外还时常由中华印书局、公诚书局等社会书局承印。月刊的编辑也常因经济关系而增删篇幅，节缩经费。由于四十年代后期物价腾贵，月刊的发行周期远远滞后于物价预算的进度，所以曾一度“以月刊是否值得继续出版敬恳酌裁”⁽³⁰⁾。月刊的负责人对于月刊的继续筹版缺乏信心，视月刊这一教会内唯一的文字事业为教会赘疣，所以圣公会的文字事业与美以美会相比无疑是会内最缚弱无力的机构，穷之于根由，一则是教会内历来缺乏对文字事业所具有的传播功能的认识。二则由于其教区内没有自属教会的印务机构，由外面印书局承印所付的印刷费成为教区经济的负担之一。三则，教区月报直接对教区议会负责，事由大小均由教区议会议案议决，

⁽²⁹⁾ 《五运委员会报告书》载于《中华圣公会（1933）福建教区第二十三届议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廿二年二月第 86 页

⁽³⁰⁾ 江中美：《教区月刊报告》载于《中华圣公会（1914）福建教区第三十七届议会报告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第 35 页

这样无疑加大了月刊作为新闻传播机构的运作周期，从而使月刊常延期出版，致使“所有稿件已失时间之性”。四则月刊的发行由于受编辑原则（教区机关刊物）的限制，只能以教区为发行范围，所以发行量只能维持在 550—650 份之间徘徊，数十年无进展。五则，月刊编辑人员多是身兼数职的教会神职人员，非专业出身，缺乏新闻从业的职业意识，虽然“曾受神学训练，道德学问崇高”，但对于月刊的运作都感到“才短力绌”，并时常流水换人，致使刊物宗旨不能常守。六则，月刊经济来源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刊资常常是读者收到刊物后尚未交齐，先读后买（先消费后付款），使刊社常常有心无力。直到 1949 年教区月刊的报告书还一直围绕着月刊社刊资的收纳问题而动摇于“来年如有继续出刊”的问题上。福建圣公会的文字出版事业一直到百年区庆时（1950 年）都没能从以上困扰中摆脱出来，从而缺乏对文字事业所具有的天生敏感性。

无独有偶，与圣公会文字出版事业态度相似的还有除美以美会以外福建的其余四个差会（教会）组织，他们较之于圣公会的文字事业多有过而不及，甚至于连供给教会的连续出版刊物都没有，更别说设立书局、印刷厂。比较起来各个差会在福建所侧重的工作重点不同，美以美会有继承于美国母会对于文字事业一贯依重的态度，所以把文字出版事业作为福音宣传的主要借助工具，因此几个设在福建范围的年议会都设有自己的书局，并且不断扩实书局的发展；以满足本会和整个福建教会的印务所需，甚至于业务跨入世俗领域。这样美以美会内几乎大小所有的出版物都能由自己的书局承印、发行，而不需借助外力。与美以美会的出版意识相比，其余几个公会或把工作重点集中于教会宣教和机构建设、或医疗事业，或慈善事业，或布道或其它的社会活动。这些实践性较强的事业较之于文字事业的长期践效性而言属于较直接的时效周期较短的活动，相比较起来，文字宣传一开始就注重于“属灵”事业，而其余事业的“属世”性较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字宣传对福音的宣传则更为直接，影响也最为深久。另一方面讲，正是由于美以美会办有良好的系统出版机构，已经能很好满足教会出版需要，如果其余差会再兴办出版印刷机构的话，则会出现差会之间的恶性竞争，所以各个差会之间似乎已达成某种默契，各有各自工作的重点领域。

在文字宣传中采用的措施也是不同差会文字工作成败的关键。闽南教会的文字事业就是因措施不当而失却这块福音阵地的。“（闽南教会）所有汉字

的刊物，除用文言文不算外，所有刊载语体文的文章，大多是‘教会八股’，所以弄到免费赠阅，亦引不起会友的欢迎，最后只有关门大吉！于是乎大家都说：‘闽南教会的文字事业是会友最不欢迎的事业’”⁽¹⁾。语体上的采用造成了出版物发行的障碍，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教会牧师、传道的读书态度也起了关键的影响作用。“一班教会主持者——牧师传道，不但不肯介绍会友阅读书报，同时自己亦不愿阅读书报。甚至自鸣得意说道：‘《圣经》以外没有值得读的书’”⁽²⁾。在这种握持教会教务人员态度的影响下，以文字宣传福音是永远不能成为暗室明灯、迷津宝箴的。事实上闽南教会先后兴办了二十余种定期刊物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闽南教会虽有“圣书公会”和闽南圣教书局两个出版机构，但由于宗派的轩格和出版机构内各种工作倾向的不同，所以很难使这两个闽南各（差）教会联合组织起来的出版机构在出版工作上真正统一起来，更不用说让上帝的福音通过这么一条狭窄的交流渠道眷顾信徒并与之交流了，其出版事业渐趋式微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闽北、闽南基督教圣书协会：

教会属联合组织的专门文字机构

如果说教会直接所属的文字部门和文字事业委员会属于教会内非专业的文字事业部门而显得有点外行的话，那么闽北和闽南基督教圣书协会则作为两个教会联属下的相对独立的专门文字事业机构而更应该受到我们重视，因为它们所有的业务均围绕为教会提供“信仰食粮”。圣书协会的成立“以广销圣教书籍，文篇以代布道为宗旨”，其内部组织采用会员制，机构由于是较松散的会员制，所以对教会文字事业的决定不具太强的约束力，而实际上两个书会与伦敦、纽约两圣书会的关系则更为密切。

1、**闽北基督教圣书协会** 闽北基督教圣书协会创设于 1892 年，原称闽北圣书会，1924 年改称闽北圣教书会，1930 年又称为闽北基督教圣书协会。1897 年开设书局附于英华书局内，1920 年迁往（福州）岭后山一号圣公会办公处，1930 年随圣公会办事处迁至仓前山对湖路 2 号，始终没有独立自办的一个书局业址。它对教会的依赖性很强，最初书会就把“一切筹备与伦敦

⁽¹⁾ 蔡重光：《闽南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回顾与本报的前瞻》载于《闽南圣会报》续刊第十一十二期合刊“闽南大会廿五周年纪念特刊”中华民国 34 年 6 月 15 日出版第 19 页

⁽²⁾ 蔡重光：《闽南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回顾与本报的前瞻》载于《闽南圣会报》续刊第十一十二期合刊“闽南大会廿五周年纪念特刊”中华民国 34 年 6 月 15 日出版第 20 页

圣书会及纽约圣书会同一主义”⁽³³⁾作为其宗旨之一，实行交纳会费的会员制，日常事务由执行部办理，年举行周年会议一次。最初的业务主要是发行各种书籍，募捐也成为其经费来源之一，其执行机关“概由三公会并青年会之西人组合成立，华人无与焉”⁽³⁴⁾，可知其在西方差会中的重要地位。后于1917年修改旧章请三公会各选派一人，组成执行部，会员亦不分中西，只要缴会费皆视为会员。自1917年才有中国信徒参加组织，在此之前则仍由西人传教士包办。1930年修改章程，继续强调其“不背伦敦、纽约圣书会的原则”，但此时的执行委员会范围由三公会扩大为美以美、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各派三人、青年会一人、协和大学一人组成，其“籍以提倡并促进基督教文字事业”的目的性相当明确。为维持营业，1937年合圣公会书局、中华圣经会书局及闽北基督教圣书协会的书坊称为基督教书局，但各书局的经济仍是分开的。解放后圣书协会于1951年3月24日向人民政府新闻处办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津贴经营文化教育接济机关及宗教团体”书店登记。同年8月20日向工商部门登记，发证“私企4264号”成为福州市工商户之一。

书局从一开始成立就以基督教内的书籍编辑发行为主要业务，以编辑发行并推售宗教短篇书籍为宗旨，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地方教会。1924年以前的出版物主要是榕腔写作的，其中包括16种福州土腔，3种榕腔罗马字，18种文言小刊物。另有多种由英文译来的小丛书，除此之外还编辑有一些专为灌输、训练一般妇女的初浅教义，编有“圣教诗歌”，除主要登载诗歌外，还有经文和浅显教义，供教会“外塾”儿童使用。1924年圣书协会为适应闽北区各地教会需要，开始从外埠批进各种刊物、图表，为扩充营业范围，也从国外批进外文书籍、月份牌、圣诞节及复活节用的贺卡，兼备礼拜堂内用的小件器具如铜或木头刻制的十字架、花瓶、烛台等。但这时开始闽北基督教圣书协会的出版物主要是小学（外塾）用宗教教科书及简易分级主日学课，编辑费用和印刷费用皆由伦敦圣书会寄来补助款，指定为编辑之用。

协会书局除发行本版书籍外，还经售全国基督教各机关出版的图书单表等件，其中榕腔类出版物极占份额，可见其地方教会附属性质之强。在1932年一年中，其售卖的榕腔类书籍达21种，除榕腔类外还有“文理类”49种、“诗歌类”57种、“语体类”119种、“识字类”19种、“教道类”（多为宣传

⁽³³⁾ 刘玉璋：《福州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回忆》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第19页

⁽³⁴⁾ 《闽北圣公会修正章程.附函》1917年刊印

单式) 25种、新春布道周之宣传材料5种、大张图画8种、中号图画9种、小张彩图8种、传单4种、挂图4种, 另有圣公会书局出版书籍47种, 第三届基督化家庭运动周刊物7种⁽³⁵⁾。一年的售书种类可谓不少, 无论是什么类的书籍均是出于满足宗教信仰需要为主, 书局出版的宗教教材成为宗教教科书系而颇受当时全国基督教教育界的重视, 并由上海广协书局和广学会代售, 销路颇广。直到1944年10月由于福州的第二次沦陷, 日寇占驻书局房屋, 其教科书系的稿件与印刷所用的锌板散失或残缺不全, 因而书系才不能继续出版。书局还独立或合办刊物多种, 籍以广泛传播福音, 《榕城报》(*Ban Yan City News*), 以福州土腔罗马字出版。1922年出版榕腔注音字母《快字》月刊。1925年曾与闽北协进会合办《协进公刊》, 1930年改为《协进季刊》, 这些刊物的发行极大地宣传了文字神学, 只是由于所用语体的限制发行范围有限, 影响也很受局限。

2 闽南圣教书局 闽南圣教书局设在厦门, 始于1908年, “与大英圣教书会、大美圣教书会连属, 且多得此二大书会之济助”⁽³⁶⁾。闽南圣书会与闽北圣书会都是中华民国时期全国基督教界所立六个圣教书会之一, 计1915年“闽南书局则有预备入教课本一卷, 综计一年, 已增书十三种, 劝文四十三种, 从此愈增愈多, 进步岂可限量”⁽³⁷⁾。书局1912年重译厦门土白之新约全书, 用罗马字次第印成。1915年2月20日中华续行委办会圣教书报特委办曾于沪上开讨论会, 到会者代表十五机关会议组成基督教书报公会。由于“闽南圣教书会以局势尚小, 限于一隅, 故未入会”⁽³⁸⁾, 此时的闽南圣书只是雏形规模。1915年全国各省印书机关(基督教)出版新书中, 在其所列九家发行所中闽南圣教书局出版发行的只有“教育类”的《训蒙琐言》一本, 而“训幼类”中《青年宝筏》一书由厦门伦敦会山雅各译, 却不在闽南圣教书局出版而于上海青年会组合书报部发行, 可见闽南圣教书局在当时并不具备良好的出版条件, 只是教会出版业中的“支流余裔”。闽南圣书公会的机构组成、经费来源、业务范围均与闽北圣书公会相似, 只是闽南圣书公会以服务闽南地方教会为目的, 并不以出版发行书籍为业务重点, 并且多为全国教会各大书局报刊代售书籍刊物为主。例如厦门圣教书社是《真光杂志》14

⁽³⁵⁾ 文中统计数字来自作者根据《福声》第一卷十二期至第二卷1—9期尾封面的闽北基督教圣书协会有经售书籍的广告单的统计结果

⁽³⁶⁾ 雷振华:《各省圣教书会》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6年卷)委第102页

⁽³⁷⁾ 雷振华:《各省圣教书会》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6年卷)委第102页

⁽³⁸⁾ 《圣教书报特委办报告》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5年卷)第48页

处国内外代理处之一，除代售书籍刊物外。闽南圣书会也出版自己的刊物《闽南圣会报》月刊，以闽南方言罗马字出版，后改由汉字出版，民二十五年发行量为 600 份。“为适应传教的需要，……印刷和销售大量的圣经教义、圣诗、基督教故事和基督教三字经等，仅用厦门白话印刷的上述书籍就达一百多种。远销南洋一带，成为闽南地区唯一的非纯营业性的宗教书局”⁽³⁹⁾，使闽南圣书公会也具有了海外影响。

闽北闽南两圣书公会之间的同大于异，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服务地域性的不同。闽北圣书公会以闽北闽中部分教会为服务区域，帮助其发行出版物，向其推销宗教教材和书籍刊物，由于公会所处为省垣，所以出版业务规模较大、品种较全，影响也较闽南公会大。单就 1915 年两书会情况比较如下⁽⁴⁰⁾：

会名	收入项	销售数	售书款	所出书籍劝文	1915 年所出书籍劝文
(来自两书会书目表)					
闽南圣教书会	1478.99 元	16757	375.6 元	不详	预备入教课本一卷 书 13 种、劝文 43 种
闽省圣教书会	4701.50 元	90353	3734.35 元	50 种	无计

数字的比较是直观和客观的，闽南圣书会地处厦门一隅，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后，美国传教士打马利（字）来鼓浪屿，聘请在厦以刷银箔和刻木印字为业的安溪人白瑞安到他开设的“萃经堂”印字馆做工，印刷英文和白话文。由于白不懂英文，所以打马字又从香港请来懂英文的人协助工作。这样“萃经堂开创了厦门手工印刷业的生产，接着由木板印、石板印发展到铅印。这便是厦门早期的印刷业，也是福建早期的印刷业”⁽⁴¹⁾延至闽南圣教书局成立之时也无多大改观，特别是闽南教会的文字印刷事业的阙如更是严重。所幸，闽北福州等地的教会印刷事业进步很快，而闽南一带的教会印刷事业却由于各公会忙于自立，而疏于文字事业的联合筹办，所以到后期对教会文字需求显得相绌许多，也成为教会人士呼吁力办的重点工作。并在事实上援引闽南教会的印刷事业与永春地方教会的印刷事业相比较，“查永春区域之小，教

⁽³⁹⁾ 郑明哲：《上帝 基督 教会》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3 月版 第 185 页

⁽⁴⁰⁾ 雷振华：《各省圣教书会》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6 年卷）

⁽⁴¹⁾ 郭坤聪：《早期的印刷业》载于《天风海涛》第 2 辑 厦门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 第 108 页

会有多马（玛）印字馆，闽南大会区域广大，竟无印刷馆，遇着有印刷品，要四处招人承印”⁽⁴²⁾。早期的刻木印刷的“萃经堂”并无长足的进步，所以至民 34 年时，闽南教会还在筹议办理教会印刷馆事。闽南圣书公会正是处于这么一个文字印刷环境中，所以多数业务不在刊行书籍而在编辑、代售书籍为主，虽有伦敦会百年纪念会上曾表示关注文字事业，列为该会的重要事工之一，并在教会人士认识到闽南圣书局的发行功能后，建议在将来闽南教会的书刊发行“以鼓浪屿圣书局为发行部”，但直到新中国的建立为止，闽南教会的印刷事业还只是一纸蓝图。

两圣书公会各是闽北闽南地方教会的各公会联合组成的文字事业机关，它们对于闽北、闽南地方教会的影响是以属灵文字为借助工具不断扩大的，两书会通过自行编辑、发行书刊和代售书刊几种方式来经营业务，但“绝非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可以说两书局由于有西方圣书公会的经济支持，所以完全有实力做“神”的属灵工作。两书会是不同教派的联合文字事业机关，所以在出版物上各自教派虽强调教派的神学特点，但由于要公开发行于整个教区，所以各教派之间的神学畛域之分有意无意地消融了许多，而注重信仰实践上的合一。

五 地方基层教会的简单出版事业：金井、永春和《新义》刊

教会直接开办的文字事业机构，无论是书局还是圣书公会都是较大教区层面上的，另外还有许多地方基层教会所办的简单出版事业，它们作为教会文字事业的朵朵奇葩开放于成熟的基层教会中。它们的一些特点（劣势？）是：设备简陋、文字出版业务较为单一，发行范围不大等。

金井教会肇始于 1879 年，福州台南信徒施金川者携眷回乡，不倦于往返三日继行七八年而于主日往安海礼拜，后于 1890 年当地信徒在安海堂会协助下建堂于金井。自金井堂成立之始就倡自立自养，各地教堂多为自建、自聘传道，实行自传。随着金井教会规模的扩大，教会逐渐将工作视点移往文字事业的宣传上。1931 年创办《金声月刊》，宣传“因信称义”之道，向国内和南洋发行。在著名的国籍神牧许声炎的主持下，《金声月刊》作为金井堂的出版机构，随着全国协进会一同推行新神学、新事业，对差会的渗透进行坚决的抵制、树立“中国教会应该由中国人来负责，一个自立、自养、

⁽⁴²⁾ 潘醒我：《战后闽南大会应做的工作》载于《闽南圣会报》（续刊）第十五期 民 34 年 9 月 15 日出版

自传的教会，表明福音为中国人所了解、所占有”的意识，并增强基督神学的传统化，一如许声炎牧师在讲道时“选读有关爱国经文，讲述古今中外圣哲义士以至平民百姓爱国事，勉励会友协力为国效忠”一样⁽⁴³⁾。

金井教会的《金声月刊》创办于1931年2月，它是集杂志和出版为一体的文字事业机构，到1937年其发行量已达1000册，它以文理和白话为语体选择，以期雅俗同览之效，内容大多涉及宗教培灵布道和教务消息方面。该刊社“全无经费，只得同志多寡捐助而已”，杂志发行范围远达南洋，小吕宋有寄售处。由于整个闽南教会缺乏印书机构，所以该刊社的出版物均由鼓浪屿启新印书局等教外印刷机构承印。由于杂志内容多关于神学教义，稿件多来自各方自由投稿和约稿以及编辑人员的撰写，所以刊社只设记者一人、总编辑一人，又由于发行范围不同，所以有本会、国内、国外三种定价。刊的宗旨“本刊所有言论，悉本圣经求益教会”⁽⁴⁴⁾。金井教会的文字出版机构金声月刊社除了发行《金声月刊》杂志一种外还兼具出版书籍的功能，自民国廿二年十一月至二十五年四月间全国基督教新刊书籍的547种，金声月刊社独出10种⁽⁴⁵⁾。作为地方自立自养自传教会的典型，金井教会无疑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教会能重视到文字在福音传播的中心作用，并把之实践出来，创刊物发行书籍，金井教会无疑也是成功的。金声月刊社身兼出刊、发行书籍等诸功能于一身成为全国地方教会少有的设有文字出版机构的鲜例。但由于受整个闽南教会印刷机构不景气环境的影响，金声月刊社的出版物也同样要由教外印刷机构承印，这样多多少少也会限制了该社出版物的进一步扩大，是为不足之处。

⁽⁴³⁾ 《福建宗教史纲(基督教部分)》(未刊稿)第50页

⁽⁴⁴⁾ 《金声》第三卷第七、八期合刊“闽南教士第十六届退修会专号”中华民国廿二年十月一日出版之“例言”

⁽⁴⁵⁾ 根据《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1936年卷)第十三期载“国内基督教新刊书籍一览(自民国22年11月至25年4月)”摘录列表如下：

书名	著者	性质	文体	页数	版期	版次	定价	发行所
生活的主日学	黄葆真等	主日学传书	语体	----	民 25.4	一版	0.2	金井金声月刊社
布道镜(1)	黄葆真等	布道	文白	58	民 24.2	二版	0.1	金井金声月刊社
布道镜(2)	吴炳耀	布道	文理	102	民 24.2	一版	0.15	金井金声月刊社
布道镜(3)	黄葆真	布道	语体	56	民 24.2	一版	0.08	金井金声月刊社
耶稣从此经过	罗查理	培灵	语体	60	民 24.4	二版	0.1	金井金声月刊社
浸礼与洗礼	许声炎	----	罗马字	24	民 24.8	----	0.05	金井金声月刊社
许声炎家庭信道史	----	历史	文言	90	民 25.1	----	0.2	金井金声月刊社
奋兴布道短歌集	黄葆真	诗歌	----	----	民 24.2	二版	0.2	金井金声月刊社
奋兴讲坛	宋尚节黄葆真	培灵	语体	120	民 24.6	----	0.2	金井金声月刊社
救护(1)	黄葆真许声炎	----	语体	72	民 22.4	再	0.2	金井金声月刊社

不定期基督教杂志《新义》是古田新义诸山堂出版的，它属于典型的地方堂会文字出版刊物。诸圣堂是圣公会于光绪 22 年（1896）建于古田县城新义山的一处堂口，是古田华山惨案发生后的新堂，是圣公会在古屏地区早期重要而且集中的宣教地，其中心就在新义山。该处学校机构林立，又有原古田支区萃贤堂等圣公会重要堂口，所以诸圣堂刊物的出版不怕起不到宣传作用。《新义》的出版有“新义之端，讲道之山。新义之刊，卫道之坛”的美誉⁽⁴⁶⁾。《新义》共刊出三次。首次三百本印费十二元，第二次刊三百本印费二十元，第三次亦三百本用费 24.125 元。该刊为不定期刊物，亦非卖品，函索即邮奉，十分着力于福音的推广工作，但因此也陷入“未筹常费，经费常短”的尴尬局面，所幸刊物是不定期的，可以等筹足经费后临时出刊亦可。其筹资方式是求人“惠赐印刷之资，不论多寡均所欢迎”的捐取方式。该刊物的宗旨“在联络海内同道感情交换意见”，稿件来源依靠投稿，“凡有鸿篇钜牍，惠光篇幅者无任感激，欢迎惟有关于时局或军政问题及含有攻击个人名誉性者恕不刊登”，在实际编辑中也是主要以神学讨论为主，与时常一点干系都没有。单取第三期而言，主要是教会信息、讲经、布道、心得等事关“圣事”内容的。由于古田教会缺乏必要的印刷设备，可知《新义》的印刷也是由会外的印书机构承印的，由于印刷数量不多，在古田教会区域即可发行售毕，所以其影响极具地方色彩，从各个方面而言《新义》刊都是一个走向成熟的未熟刊物。

永春地方教会的多玛书局曾一度被闽南教会援引为例，力促教会内印刷机构的筹建。由于推进文化事业需要配套印刷机关，永春教会有鉴于此，于民国八年春，派姚锦文前往上海，在商务印刷馆实习石印术，是年秋学成返永开设多玛书局，是名是为了纪念故布道使王多玛。后来又以石印出品较缓，又于民十四年将教会入闽七五周年永德大各牧师传道教友捐款，拨购铅印机器及铅字。当时在永春尚无铅印机设备，此举可谓开永春印刷界之新纪元。该局的历届主管者为贺为理、薛贻松等六人。书局对教会文字布道事业贡献颇多。特别是书局所出版发行的《崇道报》充作布道宣传上的文化“徇路之铎”。

多玛印书局成立后的民国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创刊《崇道报》，初用石印，民十四年改用铅印。最初为周刊，民二十六年改为三日刊，颇受各界欢

⁽⁴⁶⁾ 张贻：《新义刊出版纪念》载于《新义》1932年第3期 古田新义山诸圣堂出版

迎，销于省内外及国内诸多省，而且还远销于“南洋英、荷、法、美各属各坡，均有崇道报之足迹”⁽⁴⁷⁾。编辑全部由国人担任，迨至民三十一年因太平洋战事，南洋交通断绝，消息阻滞，经济发生困难乃改为月刊。该报的经费除由教会援助外，主要由海外华侨捐资。直到1941年3月由于太平洋战争和教会经费均告中断而宣告停刊。“由于《崇道报》是教会创办的……因此能比较自由地和客观地报道永春的实际情况”⁽⁴⁸⁾。《崇道报》的内容多关于地方政情及国内外时政，所以已非严格意义上的属灵报章性质，但是该报的存在价值也正取决于其属世的性质。因此而保存了大量较为客观的地方史料。

多玛书局与崇道报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承接印刷的业务关系，两者由于都属永春教会所办文字事业，所以两者的关系应该撷取永春教会为联系点来分析，两者都是永春地方教会为达宣传基督的需要而诉求于文字机构，所举办的两个互为配套的文字事业机构，两机构的共同价值服务取向均以教会为主，多玛书局由于经费全部来自教会，所以与教会的联系尤显紧凑。而崇道报由于有两大经济来源所以除宣传神学外，还要报道地方时情来满足国外永春籍侨民知悉乡情的需要，因此内容多关于永春地方报道。随着发行周期越来越短，时政容量越来越大，而神学宣传却游离于末，成为配角。作为一个地方教会永春教会自筹印书局、出版刊物，组成一个配套的健全的教会文字出版系统，实属不易。但由于该系统偏离于中心教会区，所以神学信仰意识体现在出版物上只能以非全职教会刊物的形式出现，由于书籍编写人员的短少，所以几乎不见其有什么教会书籍出版，如果不承印社会业务，则印刷设备可能闲置。所以说永春多玛书局和崇道报之设满足的不只是教会文化需要，而且也满足了永春地方世俗文化的部分需要，其意义将大于其教会的文字宣传作用。

无论是金井教会的短缺印书机构还是《新义》刊的地方色彩，抑或是永春教区的印刊俱全的教会文字事业，总的说来，它们都存在着某方面的不足，并且这些不足是当时教会所无法解决的，这些不足使得地方基层教会的文字出版事业显得形式单一，内容单薄，并且后力不足，很容易随着教会当局的局变而发生改变，这也是基层教会文字事业不牢根基存在的原因。

⁽⁴⁷⁾ 《基督教传入永春七五周年史略》永春大同堂会编印 1945年12月 第51页

⁽⁴⁸⁾ 颜文稚：《漫话〈崇道报〉》载于《永春文史资料》第15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永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5年10月

第二节 教会学校的文字出版：

知识的属世性与信仰属灵性的冲突？

福建各宗基督教会（差会）及教会相关机构究竟在福建相继兴办了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的教会学校，至今尚无一个精确的数字，从后期的高等院校到中学、学堂一直到小学、初等小学堂、男女学塾、男女小学堂以至于外塾，这种教育体制类似于后世的大中小学教育制，只不过它更具雏形意义。另外还有专门的神职学校如道学院、神学院、福音书院等，以及各种专业学校如医学校、护士学校、农学校、工业学校和师范学校，专业划分可谓齐矣。此外还有许多临时性的学习机构如主日学、妇女学、拜日学、夜学校、暑假学校等等，所以数目难求精确。1908年延平流芳学堂内班次就划分为高等、初等、预备三班，又另设福音一班四人，还附设师范班等。这种教育模式很难适应清末民国学制改革的要求，因此也更加增加了统计难度。又如在1908年单就福州美以美会教区内外塾数量就达186所⁽¹⁾。诸多学校中与文字出版事业有涉的只有中等以上的学校，即使它们也大多只是以不定期的校刊、纪念刊为宣传需要，而福建教会的两所高等院校是例外。协大不只是有多种固定期刊，而且还设有自己的书局，出版的印刷、装订、发行流水程序相当完备。事实上教会学校在创办初期多注重培灵的灵性教育和道德教育，把学校看作神的精神畛域而以信仰灌输人心，以达基督征服的目的，但是当信仰灌输遭遇到世俗时局、时策和现代知识等属世性极强的对手时，信仰的属灵性只能采取含蓄措施，阴鸷地诉说上帝的话语：表面上遵守学制改革和政府教会学校立案的要求，以及以世俗知识成分为主的规定，背处却颀顽阻碍。体现在学校文字事业上的知识属世性与信仰属灵性的两花竞放，两者竞争的渊薮即始于此。

一 “天堂主义”最尴尬的地方：教会高等学校的文字出版景况

信仰的文字宣传在世俗知识密度最浓的高等院校里，陪同上帝的终极实体的价值信仰系统一起，很容易嬗变为纯道德宣传，而非神学守持，文字的福音主义在这里更适切地称之为“道德神学”而非原初意义的“启示（救赎）神学”或“理性神学”。上帝已变做信仰践实的工具而非感性体悟的目的。教会办高等院校里文字宣传中福音主义无疑行的是一条自我戕戮之路，境遇

⁽¹⁾ 柯志忠：《外男塾报单》载于《福州美以美会第三十三次年录》福州美华书局活板 光绪三十四年（1908）

与西方教会学校一样：意图自我圆说的尴尬。福建教会所办高等院校出现较晚（萌芽很早），最终只形成了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学院两所“世俗”大学和福建协和神学院等几所高等神学院校，这其中以协和大学的文字事业以其驳杂不一的文字宣传品而堪称典范。

1 知识与信仰冲突的前沿：

酬酢相和的福建协和大学文字出版事业

福建协和大学的创立完全是为满足福建各公会“以教育作为宣教媒介”的需要的，它也是各差会秦越相视、畛域攸分之后暂抵成见的一个最著声名的联合事业，为“神的版图”开拓了一席高等教育里的块颐领地，六差会背景赋予了协大“殷忧启圣培养人才”的福音使命。但协大短暂的三十五年校史却使神学使命大大打了折扣。在协大，神学宣传是宽容的，但世俗知识的传授却是“必须的自由”，两者在相处共宣中难免有冲突，冲突是平缓的，从来都没有过象二十年代的非基运动那样激迫。属世知识和属灵信仰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协大校内文字出版上的是两者相安无事，甚至于相互以对方刊物为自己的宣传阵地，两者的关系是轻松的非对立的。

协大的发展历史大抵可分为三个时期：庄才伟的草创期、高智的转型期和林景润的扩展期。协大文字出版最为兴盛的时期恰恰在该校的第一任华人校长林景润主政时期。协大的文字出版物根据组织出版者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出校方当局组织的出版组织包括教授出版委员会（协大出版委员会）、中国（福建）文化研究会、协大校友部及各院系所组织的出版组织等。二、各类学生会社组织的出版团体，这部分的出版品品种最多。三、具有政党色彩背景的出版物。四、具有基督宗教宣传色彩的出版品。除这四大类外，另外还有为数寥寥的协大校职工组织的出版物⁽²⁾，由于数目极少，所以本文不列为类别第五。根据内容分协大各组织的出版品可分作：学术期刊、新闻通讯、校务讯息、宗教教育等。根据出版形式可分为：期刊、书籍、校友录、纪念刊以及小册子、壁报、校外报纸的附刊等形式。文体可分为：中文（白话文理均有）、英文和中英文合刊三类。

校方当局所组织出版的刊物学术性极强，许多刊物当时很具有专业声

⁽²⁾ 此类刊物，例有《协大周刊》第八卷第七期 民 29 年 4 月 8 日 载有：“协大教职员为提供公余正当生活并求学识之增进，乃有“健社”之组织，并编辑《健声》期刊行世”。

望。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中国（福建）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福建文化》以及《协大农报》、《协大生物学报》，堪称协大文理学科的最高专业成就。另外如中国文化研究会出刊的不定期刊物《文史丛刊》，中国文化研究会《协大学学报》（年刊），教授出版委员会编辑的《协大学术》及《协大消息》，教育系主办的《协大教育季刊》，中国文学系主办的《协大艺文》等也称为该校文科的翘楚。理科方面还有《协大科学年刊》（*Science Journal*）、《生物学报》等也较具国内甚至国际影响。由协大校方当局组织的校友部所刊行的不定期刊物《校闻》转为定期的《协大校友》半月刊后，对于海内外协大毕业校友极具沟通作用。校方当局所组织的刊物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学术探讨上，所出刊物多具有超越协大校园的海内外影响。与此有别的是学生社团所组织的刊物，无论影响力和持久性上均不及校方当局的刊物。

学生会社组织的刊物种类繁多，单就民 31 年来讲，协大的各学生会社团团体共计有 25 个，以后多维持此数。民 36 年校内会社仍有 23 个，出版物（正规）有 14 种。大多数会社都有自己的刊物出版。并且同一组织在先后时间里出版不止一种刊物，或月刊或半月刊、季刊、年刊、不定期，或铅印、油印，或以期刊、小册子、宣传单、壁报或以正规的社会报纸之副刊的形式出版。此外还有数十个曾经存在过的会社组织所发行的出版品。这些出版品良莠不齐，之间的差别很大，但是即便是最简陋的学生出版物也要接受审核。学生出版物由协大校方当局组织的群育委员会审查，并到训导处登记为核。并且规定各学生出版物还必须聘请校中教师若干名作顾问，出版之前需先期将稿件送该刊顾问审阅，并于出版前两日汇缴群育委员会“训导处”审核盖章后始准发行。这样学生出版物完全由校方群育委员会的《学生出版规则》和《壁报规则》等规范^①起来。

各学生刊物在假期大多停刊，所以其发行常集中于学期。同一学生组织下的各部门也往往发行自己的刊物，学生自治会作为校内较大的学生组织下属若干部，每部几乎都出版有自己的刊物，体育部国术队有《国术》；出版部有《飞帆》半月刊、《协大学生》（后由学术部刊出）、《协大季刊》；出版部下属出版股有《直透社专电》壁报；编辑股有《协大周刊》；自治会学术部有《协大学生》；自治会属下之时事研究会有《时政研究会壁报》；自治会

^① 两规则内容详见：

《协大周刊》第 17 卷第 3 期民 31 年 4 月 27 日 《群育委员会公布学生出版规则》

《协大周刊》第 20 卷“庆祝迁邵五周年专号”第 5 期 民 32 年 4 月 12 日《壁报规则》

学艺部有《时事报》、《协大无线电讯》；自治会抗建剧团办有《舞台人》等。另外学生会下属宣传部有《协大月刊》，宣传部之编辑股有《协大新潮》刊出。另外如各系院学生均组织自己专业出版物如农学院农艺学会出版《农艺季刊》、《农艺论文索引》、《劭农》、《农经会讯》等；生物系生物学会出版《生物学会报》、《生物界讯息》；化学系化学社之《化学社消息》、《综合科学》等；教育系教育会出版《教育讯息》。此外还有由各年级出版发行的壁报、级刊等，例如民 35 级级会主持的《民卅五》壁报、民 34 级的《民卅四级级刊》，民 36 级《草原》等。这样以院系以年级为组织的单位几乎囊括了所有在校生，此外还有出于爱好而组织起来的学生社团也出版自己的刊物：协大笔会之《笔报》和《学报》；社会科学社《社会学刊》；历史学会《史地月刊》、《山海经》；诗之叶社之《诗之叶》；荒洲文艺社之《荒虹》等。另外还有同乡会组织的浙江同学会的《小园》和《协大浙江同学会会刊》，闽南同学会之《协大闽南会教育学会手册》等。

学生会社所出刊物内容多集中于专业学术的讨论和学习心得及会闻消息。会社组织的消息交流和作品的发表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大多刊物采取壁报、油印、宣传单等花费较省的形式，甚至于为扩大影响而又为了节约经费，许多刊物借用省内正规报纸主办其副刊，在协大这种较为适宜的出版方式很是普遍。例如：历史学会借《大城日报》办《东南史坛》半月刊；农学院之农学、农经、园艺三学会联合刊行之《劭农半月刊》借《民主报》星期日综合版办《劭农半月刊》；教育会假《南方日报》副刊出版“教育园地”，并承“社教推行委员会”委托办理“民众学校”，民 22 年的《教育园地》每星期四出版一次，并由福州《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历史学会在《前线日报》辟《宇宙观》，每月刊出两次；荒洲文艺社出版的周刊《文艺》由福州《国光日报》发表；荒洲文艺社《荒虹》在《求是》报上编辑荒虹副刊连出数十期；农经系之《经济周刊》襄借榕城《南方日报》出版。学生襄借日报副刊既宣传了自己的社团宗旨，锻炼了专业习作能力，又极大地把协大宣传给了福建社会层。

协大学生会社组织的出版物数量极多，内容较为繁芜，但各学生社团都有自己明确的立社宗旨，大多都游走于基督信仰之外，几乎都取以世俗知识为价值趋向，每个组织的出版品却也没有有碍教义宣传的思想。由于校方当局学生出版规划的规定，所以在这些刊物中虽有世俗知识的宣传意识但也小

小心翼翼地避走于与信仰的冲突，尽量不在出版物中引起无谓的俗灵争议，相反在某些文学性较强的刊物中还留有明显有信仰创作意识的痕迹。在这里，最具反叛精神的学生团体所宣传的集体意识却很奇妙地演化为一种对信仰主义的集体默认，这也正是教会大学信仰主义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协大学生团体的出版物是为例。

如果说学生团体所出刊物还极具自由民主色彩的话，那么协大具有政党背景的出版物具有的却是政治宣传意识，这类的出版品也不在少数，并在协大极具宽容的环境里占得一隅，并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斗争和管理。

“中央直属协大区（国民党）党部”负责经常费用而出版的《协大壁报》于民30年10月20日首发。国民党中央直属校区党部还编发有《同志》壁报，“对于宣传党国方针及组训党员工作，甚出努力”⁽⁴⁾。《党声》半月刊创刊于民32年4月10日，也是“党部”主办⁽⁵⁾。“党部”所办出版品的政治宣传是协大迁邵后的事情，由于迁邵，差会对协大传统的影响正在减退，西方背景也由于远离差会驻地而更具中国化特征。又由于国民政府对大学校区的政治网络监视和管理的需要而把党务组织渗透入校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国民党组织及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办宣传品得以在校区出版是得之于校方当局许可的。否则国民党党部赤裸裸的政治宣传话语是很难出现在学术、信仰、自由气氛很浓的校园里的，因为它是与之凿纳不入、判若汉河的。除了国民党区党部的出版品外，中央三民主义青年团部宣传股出刊“《团友》（青年团第三区队主持）；《诗与戏剧》（青年团青年剧社编导股主持）；《青年团刊》与《青年论坛》（青年团协会六分团部主办）”等⁽⁶⁾。《团声》是协大分团部第一区队所办，《之江团声》是协大青年团第五区队所筹办。与党部所办刊物相比，青年团组织的刊物尚具有青年期的朝气而尤显蓬勃生气，所以其政治宣传也更具隐秘性。除了国民党及其辅助组织青年团所出的政治背景较强的刊物外，协大还出有中共性质的刊物两种《协大新闻》和《协大通讯》。“民国37年，福州协和大学地下党支部，利用学生自强会的合法形式，公开发行《协大新闻》后改为《协大通讯》，铅印，对开四版，不定期出版。支部派林世芳主办这刊物，……（两刊合共）前后共出版11—12期，报纸

⁽⁴⁾ 《协大周刊》第17卷第3期 民31年4月27日载《中央直属本校区党部在校内发刊〈同志〉壁报》

⁽⁵⁾ 《协大周刊》第20卷“庆祝迁邵五周年专号”第5期 民32年4月12日载《本校区党部举办党声半月刊登附设民众学校》

⁽⁶⁾ 《协大周刊》第21卷第2期 民32年11月17日 《生活丝片》

内容报道学生运动情况，宣传解放战争形势”⁽⁷⁾。由于政治色彩的渲染，两类有政治背景的刊物对信仰主义的关系无庸置言都几乎同样是态度上的漠视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压制，在这里政党背景的刊物是少数，处弱勢。

由于协大的创办所具有的差（教）会背景，所以在校内基督教青年会、宗教教育委员会、宗教委员会等组织的存在是允许的，它们所出出版物也是符合校方当局早期的教育理念（以基督教教育为本）的。协大学生青年会出版有《晨星》无定期（后改为每周一出版，又改为半月刊）刊物，“它是宗教和道德的研究地，教会和团契的呼声”⁽⁸⁾。协大学生青年会文字委员会刊行（后由学术部编印）的《协大青年》，秉承该部“以宣传福音、提倡灵修、研究宗教文艺、介绍世界青年活动、沟通国内教会消息及会务之报告”的宗旨⁽⁹⁾。另外还有《青年壁报》周刊一次，主要内容是宗教文字研究、国际通讯，其前身为青年会办的《世界公民》无定期刊物。《学联消息》是邵武基督教学生青年会联合会（协大、之江、格致、高农、文山五校青年会组成邵武联）所刊行的会刊，协大青年会是其主力编辑部门。青年会的主要经济来源和信仰精神的支持多来自于校方成立的“协大灵修委员会”、“协大宗教教育委员会”和“宗教委员会”，它们虽没有直接的刊物出版，但却通过指导和支持青年会的刊物来宣传影响，所以由于青年会的设立，协大教会大学的性质才愈加彰显出来。

协大的出版物尚有多种是由英文出刊的，这也显示了协大学术际遇与国际接轨的宣传意图。《闽声》是英文会筹办的定期出刊的壁报（后改为印刷品），“该刊既为校内唯一英文刊物，而内容复以学术、文艺为归”⁽¹⁰⁾。《华声》（*The Chinese Voice*）“内容系将最近出版之什志，其关于国内重要运动之著作，并其它关于政治、社会、教育等事件的批评，撮要译述，按期分送外人”⁽¹¹⁾。《协大科学年刊》（*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Science Journal*）是理学院化学系、生物系、物理学系合作的刊作，出版以来所刊皆用英文。而《协大生物学报》（*Biological Bulletin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则是中英文合版的纯学术刊物。《协大农报》的发行则更具有国际意识，自第九卷开始与国内外有关农业学术机构进行交换，

(7) 《福州近代报刊名录》（手抄本）庄可庭编（上下两册）署期为1993年12月

(8) 《协大学生》（生活特辑）1943年春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学生自治会学术部编《壁报一瞥》

(9) 《协大青年》第8卷第1期

(10) 《协大周刊》第12卷第4期 民33年1月17日 《以崭新姿态出现之英文刊物——闽声两周刊》

(11) 《协大半月刊》第2卷第6期 1932年

除国内赠阅及交换一百六十个机构外，国外已进行交换地点计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美国、英国、南非洲、新西南、西贡、印度、锡兰、瑞典、苏丹、加拿大、澳洲、菲律宾等国家，共计一百廿四机构云⁽¹²⁾。《协大周刊》每期寄赠国内各文化团体 300 份，又寄闽北各县文化团体 100 份。自民 27 年 12 月 19 日第三卷第 5 期起，加印 150 本，每期达 750 本，除分赠全国各文化团体外，国内外校友亦各分赠一份，宣传效果极佳⁽¹³⁾。而由学生组织所办刊物的发行多集中于校友会会员和其他师生，对校外宣传则不甚积极，并且亦无积极的必要，由于此类刊物多是会务消息，所以不具社会意义。

协大为了推销和印刷本校出版物还专设有协大书局(店)和协大印刷厂。协大书局本是经营书籍采购销售的校内书店，后来由于该校出版物的增多才设为书局，代售校内外出版物。校内有定价公开发售的出版物，除了由校外如商务印书馆、福州中华书局代售外，大多都在协大书局代售，书局之设成为协大籍借印刷物对外交往的一扇窗口。协大在迁邵之前由于地处省垣，出版印刷机关林立，校内不设印刷机构，全凭校外印刷机构承印即够敷用。但迁邵之后，由于邵武地处内地较具现代印刷设备的只有永生堂等几家颇具实力，但随着多家文化消费机构如协大、文山、之江等的迁入和协大出版物数量的猛增，兢新印刷所、永生堂等已不堪重负，致使校内定期刊物的出版常因印刷困难而延期发行，或时发时停，几成不定期刊物，或远求福州诸家印书馆印刷。《协大文艺》一刊的创刊号由福州麦园知行印务局印，第七期由福州观井路中华书局承印，迁邵后由邵武兢新印刷所印刷，迁榕之后又由福州合记印书局(住安民巷口)和福州风行印刷社等承印。由于承印机构的变迁不居所以常造成版本式样的不一，印刷质量时好时次。另外《协大生物学报》和《福建文化》也由多家印书机构承印过，如《协大生物学报》第一二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第三卷由上海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印刷，四、五卷由福建协和大学印刷所印刷，第六卷则由福建孤儿院工艺传习所印刷部印刷，是由协大印刷所印刷的质量较好的几种杂志之一。

协大印刷所成立于民 33 年，由一所职员宿舍改建成，在弼敏霖主持下，设备充实很快，到 1933 年 3 月“已有中英文铅字四千余磅，六开、八开印刷机多架，此外如裁纸机、打稿机、打钉机、打孔机、压纸机、烫金机、截

⁽¹²⁾ 《协大校刊》第 32 卷第 1 期 1950 年 5 月 25 日出版 福建协和大学校刊编辑委员会《红五月活动》

⁽¹³⁾ 《协大周刊》第三卷第六期 民 27 年 12 月 26 日

铅机、刨角机、冻胶机等应有尽有”。由于印刷设备之充实，则“今后本校各种刊物与课本等刊印之困难当易解决，教学之效率亦得加速增进，而对东南半壁之文化界亦有相当贡献云”⁽¹⁴⁾。自此协大书店有了配套的印刷体系，居邵期间，两机构同设在校内2号楼，楼上为印刷所，楼下为协大书店，颇具一个健全文化出版机构的雏形。协大印刷所设立以后，其影响虽不能夸口对东南半壁文化界贡献云云，但协大自此“出版书刊较前尤多”，起码满足了协大内印刷要求的部分需要。由于书局和印刷所的设置，协大的文化事业不断走上正轨，并颇具规模。

由于协大的教（差）会背景，基督信仰的宣传是其最初的办学目的，“其教育理念随以基督教教育为本，而以美国大学模式为仿照对象。至1928年后，国民政府推行三民主义教育政策。该校教育理念与设施，由是更动，转而趋向本土化”⁽¹⁵⁾。协大文字出版物品最为繁荣时期即为向本土化转型之后的时期，在此繁荣期基督教的宗教义理采取较为自由的宗教熏陶的方式，并不象早期那样开宗明义。协大各类宗教组织的信仰宣传出现在较具现代教育理念的高等院校，这与协大借以立身的理科科学知识显得格格不入，表面上难以合流。但事实上，信仰的有神论正如前面所讲的，在教会大学里已从信仰底色中升格为道德信仰，“神”不再是天国版图之主，而是人间道德秩序的监督管理者，所以与科学的授受并无层面上的直接接触。因为在三四十年代协大扩展定型期，协大的人文学科建设并未真正接触到本体等最终极底色的层面，在教会董事的要求下和多具基督信仰者身份的校方管理者的双重管理下，也无对终极实在讨论的可能，所以在协大里上帝还是信仰者的上帝。

协大的理化农等科学系院于信仰无涉，因而协大学生的基督教信仰者在在皆是。协大灵修委员会每年为欲明了基督徒学生人数、家庭宗教背景、宗教信仰的困难及改善本校宗教生活的意见起见，于每年举行宗教调查一次，并将调查毕，同学所提宗教困难问题，编辑油印后外发各教职员，以为参考之用，并尽力设法添购所缺优良宗教读物。校方当局为欲明了在校各生兴趣及思想起见，于民28年春季举行“学生兴趣调查，心理测验，生活调查”，其兴趣调查A项宗教兴趣的答案令校董事满意：基督教67.83%，无神教

⁽¹⁴⁾ 《树立文化建设新旗帜——本校印刷所成立》载于《协大周刊》第22卷第1期 民国33年3月23日

⁽¹⁵⁾ 《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第一辑《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综览》吴梓明 梁元生主编 崇基学院宗教研究丛书 1998年5月第一版 第193页

11.88%，儒教 4.89%，佛教 3.49%，其它 11.91%⁽¹⁶⁾。次年协大“训导处为欲明了学生一般心理的趋向起见”，举行心理测验，问题：你信仰什么宗教？调查结果与上相仿：儒教 10%，道教 1%，佛教 2%，回教 1%，天主教 1%，基督教 62%，无神教 12%，其它 1%⁽¹⁷⁾。先置调查程序和方法的科学性一旁，单就公布的两次调查的结果来看，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比例数字出现在教会大学的协大里也不足为奇。但我们对校方当局进行的调查意图却更感兴趣，一次又一次宗教信仰调查结果的公布，基督教信仰的绝对优势比例无疑传递着某种信仰指示的暗示力。暗示力的结果促成了基督教信仰成为协大校内的流行，也成为协大精神的构成要素之一。如果说调查结果是具有推测的暗示的话，那么协大协和堂会的信徒及宗教活动则体现了基督教刊物和校方调查结果在协大宣传所产生的根深影响。

协和堂会系协大和之江两所大学的基督徒教职员、学生、工友等所组成的，不分宗派的正式教会，隔周举行主日崇拜会，其余主日则留作会友参加本地教会崇拜与事工的机会。会友来源是在校信从基督、公开领受水礼者，或由他教会转入该会者。该会一直未聘专任职员，一切事工概由兼任义务牧师与各职员及热心会友分别负责，其工作是与两大学其他宗教团体及省内外诸教会取得密切联系与合作。它的创设在于使两大学有一个自己的教会，“以期在工作崇拜中能充分表现其宗教信仰，并与全国全世界之教会有密切之联络”。（载于《中华基督教协和堂会年刊》第一期 1944 年 1 月福建邵武协和堂会董事会编印）在堂会创设之前，两个教会大学，“只以前缺乏一正式堂会，不克使师生得到基督徒应有之宗教生活，以致时有学校毕业，即等于与基督教脱离关系之现象。或说不必参加教会可以做基督徒，有消极之批评，缺乏积极之贡献更有人以为自己理想以少数人之结合远胜于现在之教会组织，二大学有鉴于此，深觉将其理想付诸实验之时机已告成熟，乃创立教会，冀能建设一名符其实之基督教会也”。（同上《绪言》）该堂会的成立使两大学的基督徒有了宗教活动中心，俾使全体基督徒在灵性、智识、道德、社交各方面之发展事工上，彼此能通力合作。1943 年 2 月 12 日堂会设立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校当局林景润、李培恩校长，教师代表申鸿荣、顾琢人等教授及学生代表陈维新等商讨成立典章草案及信条的拟订。4 月 11 日正式成立，到会百余人，通过堂会典章草案，选举董事会职员 9 人，包括两校校

⁽¹⁶⁾ 统计情况详见：《协大周刊》第 5 卷第 8 期 民 28 年 5 月 22 日 《协和大学学生兴趣调查报告》

⁽¹⁷⁾ 《协大周刊》第九卷第七期 民 29 年 6 月 3 日 《学生心理测验结果》

长，学生3人。4月24日堂会会友已达160余人。堂会的日常活动为“主日崇拜”，隔周于协大新礼堂举行，称为“大学崇拜”，并开设有慕道友训练班，为入会者提前培训，堂会职员全属义务性质。

根据《中华基督教邵武协和堂会会友名录》(1944年1月31日止)统计在总数224名会友中，在校学生152人，其余为两校在职员工及其家属。协和堂会的成绩虽不甚骄人，但在内地教会中已属不易，况且还是高等学校里的教堂，协和堂会的成绩多来自两校内各种宗教组织的各种宗教活动和宗教期刊的潜移默化。也更显示教会大学在促使基督信仰在校内的思想意识独立化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是成功的，起码对教会差会来说是如此。协和堂会也有自己的刊物出版：《中华基督教协和堂会年刊》，1944年1月出版第一期，由协和堂会董事会编印，福建协和大学印刷所印刷，内容主要关于堂会的沿革、会务和现状等情况的。发行对象为堂会会友。总的说来，协和堂会存在于现代化意识较强的大学已经显得圆凿方凿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高等教育方兴未艾的国度，并且堂会又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繁荣更是无法解说，尤其是在校学生信徒的为数众多更让人度猜基督信仰的魅力。

协大本该是知识和信仰冲突的最前沿，但由于校方当局宣传监督管理机制有意的“纵容”，从而使出版的审查核准对于基督信仰了无障碍，通过信仰文字出版物的发行和校内教会辅助组织甚至于校内教会堂会对学生着力地信仰感化，并使其所受科学教育软化，使两者应有的冲突缓和为相互间的宽容，在这里执文字为武器的笔伐是不存在的。所以协大的文字出版事业从未起有波澜，既传播了科学又宣扬了基督，天国主义在这里不再尴尬，因为协大的基督信仰尚未遭遇科学的威胁，对学生宗教兴趣的调查和协和堂会的信众成分便是整个福建精英青年所表现的思想倾向的一角。

2 单性别高等院校的文字事业：信仰浓缩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与协大相比，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各个方面都显得单薄了许多，特别是宣传自由的文字出版物尤其短促。由于该校为美以美会所创办，其办学宗旨自然着重秉承宣教及培训教会人才，即便在三十年代后全国教会大学办学方向的日趋中国化与世俗化，宗教精神淡薄的时候。华南女院却甚为例外，宗教色彩甚为浓厚，教员多具有基督徒背景，学生多来自有教会倾向的都市社

会较高阶层，并与教会有亲缘关系。课程及课余活动多以宗教为主，所以孕育了华南女院学院生活基督化的特色。美国传教士也曾对华南女院的师生的基督化吹捧：“（华南女院的）基督教教育为发挥基督精神之绝大工具，而此工具竟能发挥于素称轻女之中国人中，出屈抑来束缚之妇女而提高其地位和文化，使其知识、灵性自己发展，可谓为中华女界辟一新纪元”⁽¹⁸⁾。华南女院从始建到新中国院校重组与协大合并为止都始终笼罩于基督精神的呵护下，使知识和灵性的教育平行发展，是为华南女院的校风精神所在。

华南女院在基督普世救赎精神的影响下，在西迁南平期间广大师生也投入抗日宣传和救国活动，主要是扫盲和赈济工作，以合基督五饼二鱼舍济贫苦的精神。正是在华南女院的社教推广活动中，举办了一些通俗周报一类的文字宣传品，并规定从事社教推广活动的学生每星期都要抽出一些时间从事编辑和抄写工作，极力从事宗教宣传。其文字宣传品的目标之一即为：“培养服务的人生观与宗教信仰”。校内也有青年会组织，对于加强宗教教育、宗教宣传尤其出力。青年会出版部经常出版《真光》刊物，这是包罗见证、通讯、答复神的问题等信仰浓厚的一种纯宗教的刊物，在校内影响较大。除青年会等宗教辅助组织外，另外还有学生组织出版的《华大青年》一刊，主要内容是关于校内讯息和校务的杂志，由学生自治会发行，这是华南女院学生组织文字出版的简单情况。由于华南女院学生人数过少，性别单一，所以各种学生组织相应少得多，并且也没有协大那样思想活跃，所以文字出版的发展也很拘谨。

除学生出版物之外华南女院校方组织有出版委员会，专门负责校内文字出版事业，由它编辑和发行的《华南女子学院》（1928年）属校刊性质，其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早在1928年华南女子大学期间校方就发行《华南女子学院》一刊。1933年学院获教育部准予立案，由于不足三个学院，根据部定不能名为大学，校名改称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35年3月更刊名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刊》，以半月刊的形式出版发行。1941年又更刊名为《华南学院校刊》仍为半月刊，期数另起，一直到1950年6月，成为该校最具盛名的出版品。内容大多关于校史、校讯等事项。例如：民30年12月30日第六七期合刊即为“程前校长纪念号”（内容是追忆前校长程吕底亚的）。整本杂志大小，24页规模，校刊一般在寒暑假停刊。另外校方还组

⁽¹⁸⁾ 张涵深：《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概况》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 第516页

织出版《南风》(1936年)、《华南学院》(1937年)等刊物,内容多为介绍该校情况的宣传品。

与协大文字事业相比华南女院的文字出版事业既缺乏必要的印刷机构和设备,在种类上又显得过于单一,学生组织的刊物内容又多与基督信仰有关,缺少青年大学生应有的朝气。基督教在华南女院的宣传应是公开的、宽容的和自由的,这种宽容和自由同样表现在华南女院的文字出版物上。影响在学生身上的是基督的团契精神和社会服务意识的加强,学生基督徒比重大大高于协大。1926年毕业共38名,全部信徒,1936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统计,华南女院学生信奉基督教者估占80%以上,其宗教氛围远浓于协大,原因是宗教期刊影响了学生,还是校方宗教灌输决定了校内刊物的基督意识,答案更迭难说。

3 “我为牧者”:以栽培本色后起为任的福建协和神学院

福建差教会在福建所办的各类神职高等学院是为了培养神学后继为宗旨的,中间虽有良莠但宗旨归一。“闽北三公会鼎峙,原来各有专校培育教会人才,如公理会(即中华基督教会)的圣学书院,安立间(即中华圣公会)的真学书院,及美以美会(即中华卫理公会)的福音书院等。她们各有相当历史”⁽¹⁹⁾。类似的神学鼎峙、各立门墙的情况照样也出现于闽南地区。早期的神道学校与世俗的大学教育学阶并不一致,亦无授神学学位的资格,所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神学院,即便1912年协和道学院作为三公会协和事业也无力培养较高层次的神职人员,闽南三公会合办的回澜圣道院亦一样。福建协和神学院作为最健全的高等神学校,是福建唯一一所有大学程度的神学校,所以最具代表性。

1912年合并后的协和道学院遂在仓前山福音书院原址建校上课。其学制中三科之一的“特科”收高中毕业生,已与高等院校入学资格相同,可惜特科只读两年不足称为真正意义的大学程度。1927年非基风潮澎湃,各会以时局故,经公决停止上课,协和事业暂入休眠状态,不久各公会由于神职人员培养之需各自恢复其旧有道学校。当时由于中华基督教会未有自行设校之准备,遂将其学生寄读美会道学院,并于1935年正式加入,并改称为福建协和道学院,并且与美以美会女神学各级并圣公会一年级新生合堂上课。抗战

⁽¹⁹⁾ 《协和神学院简史》载于《协神消息》第一期 福建协和神学院青年会编 民36年

期间道学院迁闽清顺昌上课，并把学制改为五年，前两年先保送协和职业学校受农业训练，之后再回院修毕道科教育三年，实行世俗职业教育与神职教育的尝试性衔接。1943年闽北三公会、协大、华南女大、真学书院及协和道学院代表召开福建神学教育研究会，是主张道学院与协大、华女大合作，改为大学程度创办高级协和神学院。1945年春，宣布协和神学院成立，院方“积极提高神学院各方面水准，以应付现时代的要求，培养教会高级人才”。其四年制的学院科课程与大学课程联系，其中一部分课程在华南女大上课。其入学条件已具教育部高等教育要求条件，在华大或协大报到。亦由两校向教育部注册。学生毕业时准发神学院神学学位，另给教育部文凭。从此真正意义的高等神院校才正式成立。由于神学院是研究学习神学的场所，灵性的畛域攸分远甚于世俗的地理观念，各立门墙的难化成见是在华各差会难以逾越的交流障碍，也成为“中华归主”目标面前的一堵成见屏障。“神的召选”也喧化为教会各自的道学传播活动，并不具普世意义。而作为高等神学院的协和神学院由于其各公会和各大学校联合的属性，要取信仰的唯一，所以在文字出版事业上特别谨细慎微，以防出现信仰偏差，各种神学思想和观念的均衡是其文字出版的宗旨之一，并颇见成效。

协和神学院对文字出版事业相当重视，院行政教职员会下设各种委员会中专门设有图书委员会和刊物委员会，是专门负责校内文字事业的机构，另外其它委员会也编辑本委员会相关出版物。此外校青年会也负责出版发行自己的出版物，其机构设置中的灵育部、智育部、群育部对于文字事业出力尤卓。该校青年会相继发行有《协神消息》及《协神青年》两刊。《协神消息》首刊于民36年2月10日，目的在于使“本院全体全工同学倚赖圣灵和彼此帮助检讨自己，并奋发自己的机会，使自己的生命配为这消息的底本，堪其反映为福音之真书籍”⁽²⁰⁾。但由于“限于人力，兴辍无常”，并于解放初停刊。另在校内有多种壁报板出版。例如智育部之编辑股经常出刊“芥子园壁报”，是为简单的公开刊出之物。自《协神消息》及《协神青年》停刊后，由于神学思想交流的需要，在院长及各教授的倡导和学生协助下，又发行新刊《协神通讯》主要传播范围是在校师生，各教会机关和协大、华南两校及神院校友间发行，创刊号发行在1950年11月。另外神学院还出版有小宣传册子多种，例如：民国32年8月出版有《福建神学教育研究会》一册，

⁽²⁰⁾ 《写在刊前》载于《协神消息》第一期 福建协和神学院青年会编 民36年

记录了该次会议的议案等重要校史资料⁽²¹⁾，并于早期出版有《神学报告之研究》小册子等。

神学院的文字出版事业著力于神学讨论，是基督信仰底色的接触。由于神学院以自觉的本色神学教育、为培养中国本色牧者为己任，所以神学院的文字出版事业已颇具汉语语境化的神学信仰色彩，多以中国本有信仰比附基督信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基督宣传因子，所以多集中于“基督教与中国”、“谈中国基督教”等讨论上，连庄子思想也成为神学院教员所“浅解”的对象⁽²²⁾。无庸讳言，神学院中西教职员所努力培养本色后起的神学教育是其主要目的，所以整体上来讲，神学院的文字出版还是以神学教育为服务对象的，文字事业只是其工具而非目的。

协大华南女院和协和神学院在文字出版事业上各具色彩，作为福建教会背景的高等院校代表，足以管窥一些教会大学的文字出版情况。由于协大无论在学科规模还是在师生数量上都有后者不可比拟的优势，校中非教徒出身的学生很多，所以校风较为自由，纯基督信仰内容的文字宣传只占为数很小的一部分，学生社团和学术氛围都较强，所以文字多以宣传科学知识和社团消息为多，而非信仰。而华女院有其独特的学生源（多来自教会信徒家庭和基督教会上层家庭），所以宗教氛围较浓，因此文字宣传多围绕基督信仰。协和神学院由于其入校学生均有“献身传道”的志向，学院是专业的神职高等院校，是基督信仰最核心的机关，所以神职最盛。校内所有事工都与信仰关系密切，而文字事业则是与信仰最直接的一环，首当其冲，所以所有文字出版均围绕神学教义转。以上是为三者文字事业所具有的区别，也是福建教会大学、学院和神学院三种高等院校文字出版事业的一些简单情况。

二 递嬗变易的中等学校：由启蒙向基督精神知识化的切口

教会各类中等学校的开办即成为幼稚园、义塾、外塾等各类小学启蒙教育（特别是基督精神的启蒙灌输）后教育的开始，也是进入世俗或教会大学专业化及走向社会职业化的开始，此一阶段的教育尤其显的重要。福建各公会早期所办的各类中等学校既包括各类书院、中学又包括后来所办的各种职业学校、护士学校，因此在类别上要比教会高等院校丰富繁芜得多。所以对

⁽²¹⁾ 内容详见：*Fukien Conference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held in Foochow July 26---Aug 3, 1943,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Herald Industrial Mission Press, Foochow, China*

⁽²²⁾ 李黎洲：《庄子思想浅解》载于《协神通讯》创刊号 福建协和神学院发行 1950年11月出版

这些中等学校文字出版事业的研究也显得层面过宽，难于全窥，又加之时政当局对各类中等教育政策性的规定较多，规范较高等教育为严，所以教会中等学校递嬗变易得较为频繁，以便适应中等教育近代化的趋势要求。

福建基督教各差会所办中等教育由于所需生源、差教会的经济支持等原因，大多集中于福州、厦门、泉州等教会力量较强、生源有保障的地区。而相应的内地地区教育筹办的各类资源却阙如不敷，所以即便有中等教育的筹立也很难有较好的前景可瞻。综观福建教差会所办的中等教育（中学）的校史可知教会中学大都经历了如下情况，使教会中学一层层蝉蜕为颇具规模的近代化学校，并持耳福建中学教育：首先，从学生来源来讲，早期教会学校的学生家庭背景都较为贫困，多为城市贫民、工人、农民家庭出身，他们的入读首先以牺牲传统信仰而改信福音为代价。随着中学规模的扩大，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学校向政府立案制度实施后，教会中学的生源背景一改为官僚、地主、资本家、工商业者、职员、教师、医务人员和科技人员等相对较高阶层为主，贫困家庭的学生只做零星点缀。其次，中学学制的变化最具传统私塾式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转变的特征。晚清民初所立教会中等学校一般采八年制，这是一种不规范的学制，学生毕业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水平，可直接进入高等院校从一二年级续读。福州有传“英华（学校）八年四”的说法，即意此。这些学校在校名上往往冠之以“书院（男校）”、“女斋”、“女学（女校）”，实行男女校分离。后来于民国前后，各校参照美国等西方中学学制改为六年三三制中学（部分中学还有四年制的过渡阶段），这个改制过程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初各学校向政府相继立案的完成，校名也由学院改为学校。第三，学校教育权（非所有权）的变易是政治变居的影响后果。以1927年收回教育权为时间截点，前期校行政及教育权往往集中于差会所派西人代表手中，其后则按教育部门规定由华人出任校管理者，但实际上西人以董事身份往往在校务上掣肘中方管理者。第四，教育内容上而言，立案后各学科内容均按教育部规定开设，并禁止教师在课堂上的公开宣讲信仰，宗教教育移于课外，宗教课也由必修变为选修。学校内实行信仰自由，并与学校教学活动相分离，信仰已不作为校方当局教育理念的主要支撑。第五，教师队伍由设校之初的教会神职人员及其配偶充任而转向教徒知识分子，最后为适应学科发展需要而向社会聘任，教师的信仰背景已不作为在教会学校持教的依据。第六，经费是学校存在的直接决定力量，由于早期学校生源极窄，为扩

大影响，特别是福音扩张的需要而实行学生学费全免，抑或有食宿减免的规定。而办学经费往往来自差会津贴，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大，有限的差会津贴已不敷用，所以办校经费采用津贴为附、学费为主的方式，另外挂靠社会捐助也是其融资渠道之一。教会中等学校（中学）各方面的嬗变与其差会背景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也因此决定各中学的文字出版刊物由于各方面限制，而只能采用校刊、纪念刊等形式出版，内容也多以阶段性的校情反映为主，间接反映了当时的时政信息，至于说宗教事宜则由有实力的青年会发刊，但刊物的内容载量已不完全围绕宗教，而是多与时局相关。

厦门毓德女子中学作为女子中学，其出版部发行的《毓德校刊》属连续性刊物，至1940年6月24日已出版56期，内容多是对校内事务的记录和讨论，亦有文艺作品，作者大多是校内师生。学生作品中有明显的基督信仰的痕迹，但更多的是中学青少年所特有的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人生》⁽²³⁾一文作者对人生的探问没有将答案赋予校方所极力宣扬的基督救世上，而是认为“（人生）永远是迷茫地，永远是玄虚地，永远是不可能明了的人生”。多数学生作品（校闻报道等专门编辑报道学生作品除外）所表达的内容思想与世俗学校同龄学生相仿，基督信仰并不是他们解决青春期问题的可选途径，可见校方的基督信仰的刻意宣扬并未真正深入毓中学生的最深意识，而只是停留于表的“主义和口号”。学生对时政如抗日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宗教的深思。高中1947级毕业歌一句歌词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关系：“同背十字分道扬镳，勿忘沟壑哀鸿”⁽²⁴⁾。同样一期的校刊上，明显表露出时代青年的两种思想倾向。与学生作者不同的是负责编辑和通讯学生的信仰意识较浓，一篇《园丁的话》（千字左右）引用圣经6次，借用圣经典故词用多次，明显走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1930年毓中注册立案以后就改行三三学制，并按教育部规定设课，使用统一教材，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但毓中教员绝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归正教会安插在校董事会中有三人，并设有宗教主任一职，所以立案后毓中的宗教教育仍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但是从学生组织的校刊所载内容来看，其宗教教育的效果却未如所料，这是出乎教会当局意外的。毓中的学生组织称呼很特别：“毓德市政府”，设有市长、局长等职，其“出版局”是下属五局之一，专门负责校刊的出版和贴文壁报的宣传，是毓中唯一的文字出版机构。该校青年会没有出

(23) 佚名：《人生》载于《毓德校刊》复校第2期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元月出版

(24) 《高中一九四七级毕业歌》载于《毓德校刊》复校第2期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元月出版

版组织之设，该会主要发行校刊一种。另有学生组织“文艺研究社”向《江声日报》借一块园地发表社员作品，但仅出一期。该校校刊由“校市会出版局”编辑，由校方公开发行，由于缺乏印刷设备往往由社会上印书馆承印，常常由于印书馆业务繁忙而造成一个学期只出一期，甚至于印书馆对该刊“一连三个礼拜多都没有排半个字”的怠工情况，可见该校校刊的出版是相当脆弱的。毓德女中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厦门）的优越，是为城市教会女中的代表，其文字出版事务尚且如此，那么内地女子中学的文字宣传当是另番情景。

设在仙游的陶德女子中学地处福建内地，由美以美会设于民前十四年（1897），初为蒙学，后增设高级中学。民21年立案，1934年6月经“教育部”核准设立初中，定名“陶德女子初级中学”，为“全邑女界唯一之最高学府”。陶德女中于民24年11月20日曾发行刊物作为校刊。出刊的动机：“检阅本校初中同学们的写作能力，和鼓舞青年学习写作的勇气”⁽²⁵⁾。所以刊中作者都是该校学生，纵观全刊宗教气息了无余痕，完全是初中女学生的艺文习作，只有在“校闻”中才见到学生组织的宗教活动。其校内宗教氛围却相当浓厚：其教职员大多毕业于教会大学（特别是华南女院）和教会中学，多具有良好的教会教育；校内学生组织只有“级会”和“女布道会”两种。“级会由各级自行设立，以改进学校生活，革除不良习惯，进行学业为主”与宗教教育无关。而女布道会则每月开会一次，会时“祈祷诵读圣经”，颇具信仰主题。即便如此也未影响到学生观念深处，学生习作作品无丁点儿信仰意识，未曾对基督所预言的天国多加注意，而是将视角全部转移到身边世俗生活和对国家时局的关注。《陶中校刊》作为陶中唯一的文字宣传刊物，展现的是陶中的精神精髓，遗憾的是其文字宣传物对宗教的态度则不甚热心，是否是教会性质的陶中宗教教育的失败？

厦门毓德女中周围教（差）会较为集中，信仰浓度较仙游陶德女中为高，所以相应校内宗教精神也较陶中为浓，是为两校刊文字出版工作的宗教意识厚薄区别的原因之一。和华南女院一样，由于女子中学单性别的学生源成就了两校简单的文字出版：形式单一，内容单薄，时政热情较为含蓄。

南平剑津中学为基督教卫理公会传教士薛承恩于清光绪年创办的，初称流芳学堂，后与淑馨女子中学合并为私立剑津中学。1932年收回教育权后分

⁽²⁵⁾ 《卷头语》载于《陶中校刊》（创刊号）仙游私立陶德女子中学编辑发行 中华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出版

男女两部，学生多系教会牧师信众子女。学生数抗战前较多，有二百余人，后逐渐减少⁽²⁶⁾。“南平地区基督教卫理公会最盛的时代为1920—1930年的这十年中”，连最偏僻的乡村都有教堂。但综观剑津中学的发展情况最盛时当在南平地区基督教正在逐向衰落的二战前十年，特别是30年代初立案后逐步走上正规发展之途的时候。校内各种学生组织已不再局限于宗教团体，但仍然以宗教组织青年会为中心组织。在学生青年会与自治会领导下，学生对校内外的活动益形活跃，为的是要“提高学生灵性的修养与德行的陶冶”。其它组织如各级级会等也争献热诚，特别是抗战初期学生的爱国热忱远浓于宗教灵修。

表现在文字出版而言，校内的刊物不下十余种，如《海燕》、《新论》、《剑光》、《微波》、《级光》、《剑风》、《晨曦》、《笔垒》、《新群》等定期不定期刊相争鸣于时。该校学生自治会解散后，青年会成为青年活动的中心。在《剑中青年》出版以前，校青年会曾办过《剑光》和《剑风》等刊，因为种种愿因未能继续出版，另外该校毕业校友亦在各地组织“剑津××同学会”，并出刊以资联络，洋口组织“剑中留洋同学会”，所刊的《剑》成为校友刊物的肇始。《剑津校友》是“邵武剑津中学校校友分会”编辑发行的刊物。其出刊经费来源于母校津贴、校友总会津贴及校友筹捐，是为报导校友近况，刊载母校消息而出版的，主要发行对象是剑津各地校友，但有虎头蛇尾之嫌：开始三期铅印出版，后来油印发行，颇为简陋、草率。

剑津中学虽地处内陆，但由于抗战福建文化中心暂时西移也激活了南平地方活跃的青年思想，剑津中学作为“闽北最高学府”则直接从中受惠。所以校内文字活动异常活跃，其出刊种类和持续的影响是闽北其它学校所不可比攀的，甚至于比沿海各地教会中学有过之不及之叹。其校内刊物的发达主要受抗战时局的影响，战时邵武、南平、永安一带俨然为福建东南沿海抗日宣传鼓动的中心地区，各种文化机关的内迁极大地丰富了本地文化资源，也开拓了地方各类学校的视野。该时期成为整个福建百年以来的近代新闻史上报刊出现最多的时期，无疑闽中闽北各类教会学校也逐浪起波，出版多种宣传刊物，剑津中学作为最典型最突出者，当为之记。

相比较而言沿海教会中学本应最具发展潜力的30年代前期，由于正着力

⁽²⁶⁾ 该校具体发展情况见刘光耀陈必珍《解放前南平中等教育的回顾》载于《南平文史资料》第一期1981年

于学校立案、机构设置等诸多事宜，校内学生组织相对来讲不甚健全，校内文字事业也不是其工作重点。又由于校方对宗教的温热态度，所以也不太关注学生组织对世俗时局的热心宣传和参与。三十年代的沿海福厦泉等地的教会中学中出版事业并不见有左于剑津者。抗战期间本该是教会学校学生支持当局态度积极参与抗日宣传的绝佳良机，可惜沿海各校的沦陷或内迁又使沿海各中学失掉一次文字宣传的良机。战后返回旧址时又受薪桂米珠的胁迫，已无力筹措出版周期远滞后于物价上涨速度的文字出版事业，从而沿海各中学校又失掉了解放前的最后一次尝试，所以沿海各中学文字出版工作不能作为教会中学的代表只能作为陪衬。厦门英华中学“1931年学生会的学术股曾出版《英华学生》刊物好几期”⁽²⁷⁾。几期而止，仅此而已。较具影响的有泉州培元学校的《培元》、《何时》，晋江培元中学的《培元》，莆田哲理中学《哲理声》等。

教会中等教育除开办有男女中学之外还有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在福州的如协和农业职业学校、青年会商业职业学校、协和幼儿师范学校、协和护士职业学校、塔亭护士学校、柴井护士学校等，其它如南平卫理护士学校、福清惠乐生护士学校、莆田圣路加护士助产学校、霞浦仁爱护士学校、古田怀理护士学校、龙溪仁恕护士学校、晋江惠世护士学校、厦门救世护士学校、厦门闽南职业中学校（福民学校）、永泰同仁初级畜牧职业学校、仙游模范职业中学等。这些职业学校职业也是教会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培养社会所需的职业人员为办学方向，以便扩大福音信仰的阶级层面。这些职业学校内的宗教教育一如普通中学一样成为教差会关注的重点，在其出版的较为专业的刊物中亦有所体现。

《协职消息》（*Foochow Union High School News*）是协和职业学校（协和农业职业学校）所发行的一种刊物，由该校出版部编印。内容多以校闻、校友通讯为主，但也有对牧师传牧工作等属灵工作的心得发表，与学校性质显得格格不入。例如第十二期中有载：《牧者生活的日记》、《牧者的生活》、《牧者的生活·静的生活——修养》等⁽²⁸⁾。由于该校是由中华基督教会、卫理公会、圣公会联合举办的教会系统内学校，所以学生在校所接受宗教熏陶

⁽²⁷⁾ 许声骏：《鼓浪屿英华中学见闻》载于《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原载《厦门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第150页

⁽²⁸⁾ 林德恩《牧者的生活——静的生活——修养》；陈德彰《牧者生活日记》、《牧者的生活》载于《协职消息》第十二期福州私立协和职业学校出版部编印 1946年6月15日

不亚于中学。各年级有宗教部之设，学校有青年会之设，各种宗教团体经常“研讨宗教难题”。至于“救主复活”、“圣诞”等宗教节日则异常活跃。“教会名流莅临滨海者，冠盖连续不断，以营造优美宗教环境”。所以学生毕业后有许多进入教会工作，还有许多进入神学院继续研读，一反最初办学入学的初衷。协职毕业学生从牧者尤多，所以反馈在《协职消息》上的便是以校友身份用文字向未毕业校友宣传教会工作之优势。协职青年会对于文字宣传则采取专题特刊的形式，间或以基督精神点缀其中。例如 1946 年春季一个学期内，协青刊物便出了四期：《创刊号》、《东北问题特刊》、《青年号》、《诗辑》。协职的文字事业字里行间都能剔出信仰字眼，可能与其办学减免学费、膳食费用以招贫弱的福利性质有关，学生的信仰和学习是代价有偿的。

闽南职业中学校的校史发展也经历了合并、升格、转变办学方向等一系列变化。最初设立为中学，名为福民学校，民十以前以普通中学课程教授为主，民十“为应社会的需要特设了这个工业科，专授学生以工业上的智识和技（技）能，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能力，服务社会的精神为主旨”⁽²⁹⁾。工业科之设奠定了福民学校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沟通教育和职业的合一”。该科学生的学费书籍免纳，并对品学兼优技能纯熟者酌给膳食费，对贫苦子弟颇具吸引力。后来随着工科不断发展壮大，学校亦更名为职业中学，全息以职业教育为宗旨。职业中学的教会背景也决定它必然要成为神学布道的场所，其校内文字出版事业所必然具备的色彩之一便是为教会文字宣传的需要，该校办有刊物《道南》和《福闽声》。

福民学校的《道南报》创办于 1913 年，初为周刊，名为《道南》，以校方名义发刊，由厦门萃经堂印务公司代印，后改为《道南旬刊》半月一刊，后又改为十日刊，专门成立道南报社负责出版，社址设在福民学校内，改由闽南职中印刷科印刷。该报的出刊宗旨正如编者自诩的那样，“本报为闽南教会刊物之最具有历史者，自创办以来，已历数十寒暑，为沟通各地教会消息之机关”⁽³⁰⁾。该刊除了出若干期宗教内容的纪念号、特刊之外，其它平常期数的内容多以基督教新闻、全国、福建新闻、时局评论为主，对时局特别是全国、世界局势的关注几近占刊物容量之泰半。以其出版周期之短，也相对固定，所以很具有近代新闻报纸的功用，内容又以时政要电为多，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该刊又超越了宗教教义宣传的范畴而与时政相合，以满足读

⁽²⁹⁾ 《鼓浪屿福民学校附设工业科招生广告》载于《道南》第三卷第四十期 民 10 年 4 月 27 日出版

⁽³⁰⁾ 《编后》载于《道南旬刊》第十卷第十六期 “全国查经大会纪念号”

者了解时情之需。而对于该校校内讯息的记载尤少，这样看来《道南》很不具一般学校的校刊性质，而更具教会综合新闻刊物的性质，是为教会中等学校所发刊物之鲜例。

如果说《道南》作为教会职业学校所出刊物太关注时事的话，那么莆田圣路加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所编印的《圣路加校刊》则是教会职业学校完全的校刊，而尤其关注本专业的情况。教会医院附属护士学校是教会护士学校所特有的筹建方式，学生多为信徒，即是学生又是医院的实习护士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基督徒。教员多数是该院医师，少数课程由护士长担任。由于学生的基督徒身份，所以也担当了部分向病者布道的责任。该校创设于民国四年一月，由历任护士长主持校务。民国六年，向中华护士会备案分为看护学校和产科学校，立案后定校名为“私立圣路加医院助产学校”和“私立圣路加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后合并为“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所授课程均为医科专门，无一涉及宗教信仰⁽¹⁾。该校校刊《圣路加校刊》刊物的整册除校情院况的述说之外，多是关于学生专业学习的报告和感想。关于基督教消息的只是一些基督教医务事业的调查，而毫无神学教义宣扬和布道意识。医院附设护士学校由于是教会医院的二级关系单位，又由于受学于专业医护人员，其宗教信仰宣传意识远逊于普通中学，多数都未受过直接的神学锻炼而只具教徒身份，所以对宗教而言，自感不是其责任。福建省民31年教会医院调查显示全省有医院附设护士学校8所，助产学校2所，大致情况也如圣路加学校一样，并且大多数医院附校少有刊物出版。

基督教职业中等学校的文字出版多具个性化特征，其共有的特征是较之于教会普通中学而言，即其校刊物等文字出版更显专业化的特色。至于说它们对于以文字宣扬基督的热心程度，则看校方对宗教态度而论，不一而足。例如圣路加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由于其专业教育特点，该校当局对于南丁格尔的护士服务精神的培养比基督宗教精神的培养更为注重，体现在其校刊上也是一样的态度。

总之，基督教会的中学教育是教会教育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由于中学生所特有的对宗教初始的认知化特点，所以此阶段是对其进行宗教灌输并形成足以深远的人生观，并且是人生稍纵即逝的黄金时间段，教会中等学校秉承教会意旨也倾力于此，但就一些典型的中学和职业中学的文字宣传物来

⁽¹⁾ 该校所授科目见《护士科各学年应授科目及教学实习时数》、《助产科教学科目及时数表》、《助产科各学年应授科目及教学实习时数》载于《圣路加校刊》第三期 民32年7月1日出版

看，教会的宗教宣扬并不十分成功，但也未招致由学生编辑出版的宣传物之嫌，宗教的宣传在这里是自由的，附带的，而不是目的性的。拿当时的眼光看尚不知教会当局对其宗教教育的此等影响满意与否，不过今天我们单从文字剩余来分析，推敲的结果可能让教会失望。这与学校各方面经历时局变化而迁徙不居的办学宗旨和教会势力强弱变化以及学校在教会的附属地位有关，这决定了学校特别是政府立案后的各类中等教育学校，对于宗教的热忱也随之大大折扣。事实的另一端是：由于教会信徒子弟在家庭、学校、校内青年会等组织和校内刊物的影响下，对基督的信仰在中学阶段得以培实。在教会当局看来，教会的中等教育无疑是从幼稚园、小学的启蒙宗教教育进入知识化基督精神之域的切口，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

第三节 “非以役人，乃役于人”：青年会文字出版——深向世俗的基督精神之触角

基督教育青年会在中国的肇创与福州颇具渊源：1885年在福州鹤龄英华书院设立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这是全国最早的学校青年会，初称幼徒会，1888年改称少年会，1892年改称青年团会。1905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协会派马拉林、裨益知（Dr·Beard）两人来福州，在仓前山乐群楼的烟台山麓朝观音井街的坡上租了一座洋房，作为福州青年会的会址。五六年后，又有几个美国人来厦门，在寮仔后成立厦门青年会。到1914年已在福建的福州、厦门、兴化、漳州成立城市青年会，成为当年全国30个城市中的四个福建市会⁽¹⁾。而当年由于福州学校青年会人数过众所以福州单独成为夏令组，跻身于全国七组之一，全省共有校青年会十五处（当年全国共计98处），而福州也成为全国已建会所的十处城市会之一，颇具规模⁽²⁾。福州青年会发展颇为迅速，据1925年调查，全市会员人类约2400人，是解放前福州四个国际性社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³⁾。

青年会之设本着“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的宗旨标榜，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为会务指导。青年会多涉足娱乐、饮食等，福州全市解放前的旅社、西菜馆、理发所、游泳

⁽¹⁾ 范子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各处之成绩》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

⁽²⁾ 《基督教青年会纪略》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附录第18页

⁽³⁾ 另外三个国际性社团为国际扶轮社、国际联欢社、国际联育社，详见黄毓沁：《记福州青年会、福州联育社》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170页

池、篮球房、租用礼堂等多由青年会经营。其商业虽“以服务会员为标榜，但纯以营利为目的”⁽⁴⁾。“青年会不仅是一个干预政治生活，散布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基督教外围组织，而且也是一个经营类似服务性行业和娱乐场所的事业单位，……”⁽⁵⁾这是会外人士对其看法。而会内人士对其作用则持看法的另一端：“青年会乃一彻底的宗教团体，是故其所兢求者乃恪遵其所定之宗旨，用副基督教之名义，否则青年会或将由渐而替，降为一种纯粹的俱乐部矣，夫青年会所以能扶翊个人或团体，其唯一能力之源，即耶稣基督。惟然，而其所奉高尚之使命始无陨越之虞，惟然，而其事业乃能蒸蒸日上”⁽⁶⁾。无论青年会是教会的外围组织也好，是“一彻底的宗教团体”也罢，其“视社会之情形，而因宜施应”，“详审群众之需要，自为伸缩支配以求与此需要相为应合”的社会事业的参与度却甚为积极，也是其会务扩展之基。基于此，青年会无疑成为基督教入世最深、接触社会层面最广的教会外围组织，是为教会伸向世俗的触角，取的是世俗利益，洒散的是神圣信仰。青年会的文字出版事业无疑是基督教开向世俗社会的一扇最大的窗口，成为社会福音主义最大的宣传版块。

青年会由学校青年会和城市青年会组成，另有女青年会之设。福州作为学校青年会的滥觞之地，极具发展扩张的历史基础。与社会接触较深的城市青年会的发展也颇有开拓意识，无论是城市青年会还是学校青年会都把文字事业作为宣传阵地，基督的福音由此点滴宣向世人，并成为基督教出版事业的翘楚。本文拟将城市和学生青年会文字出版事业分述比较如下。

一、“荣神益人”：城市青年会文字宣传物的“社会福音”底色

福建省内基督教城市青年会发展较为完备的两个市会是福州和厦门，也只有这两会才具有连续文字出版、宣传会务和基督精神的实力。福州城市青年会曾刊出《福州青年》（《福州青年会报》），它创办于晚清，二三十年代尚在连续出刊，是民初省垣较具影响的几个有基督教色彩的出版刊物之一。《闽南青年》（1915年10月创刊）即《厦门青年》，连续出版的时间更为持久，在厦门的影响也较大。本文试以现存两刊的残本来作文字上的重新认识，以

⁽⁴⁾ 黄毓泌：《记福州青年会、福州联育社》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

⁽⁵⁾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12月第2版

⁽⁶⁾ 来会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单行册）民国年刊印 第21页

图管窥豹斑。

《厦门青年》由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印行，民 25 年起，按月出版，发行量千余。其发行宗旨在于“联络感情，报告会务，与夫各级机关暨各地市校会互通声色”。最初的《厦门青年》由青年会学术部编辑，由会外印刷局印刷，例如风行印刷社等。青年会总务部仅备有“手印匣，自印信笺，信封卡片传单各小型印件”。后于民国 26 年“拟采购四开或六开纸印字机一部，以应付全部刷物，每年刷费节省不貲。”并于该刊登“征购”广告，载明“欲购置四开或六开印刷机一架及附件，无论新旧均可”⁽⁷⁾，求购的迫蹙程度可度，在此之前由于会内印刷条件的限制，青年会的文字事业不甚昌明。《厦门青年》作为其重要的文字出版物，发行范围也只是会员间的交流及寄送各学校收存之用。其内容也多关于会务消息，尤其着力于社会改良思想的宣传鼓吹，对于基督福音主义也力宣不误。从该刊所载内容我们可以全窥青年会活动的大要，以月为时间单位来统计的话：月中青年崇拜四次，其余如各类运动比赛、常会、学校（夜校等临时学校）授课、演讲会以及住宿、餐饮、洗浴等营利服务，另外还有为人力车及其家属医药、施药等活动⁽⁸⁾。刊内有“个人消息”一栏，多登载一些会员的近况简要，可以总结得知会内干事会员多肩负（多为兼任）社会福利慈善、学校、医院董事等非政府机构和政府所设各类委员会职务，几乎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有涉及。

青年会的组织活动也把触角伸向非教会学校，厦大、厦门同文中学、双十中学也成立有青年会组织，除了组织一些公益活动如民众歌咏班、游泳班、夜校、音乐班、英文班和国语班外，青年会对政府的各类纪念活动也热心参与，“孙总理诞辰纪念、双十国庆、蒋委座寿辰祝祷会”，甚至还组织有“蒋委座脱险庆祝会”（西安事变事），踊跃参加者逾五百余人，规模可观。所有关于这些活动的文字还套印入封面、首页等醒目显眼的地方，以示该会的政治倾向。青年会的教会背景决定了它对信仰的热忱：每逢宗教节日、全国性、全球性、教会性的宗教活动也力行组织配合宣传，每主日所举行的崇拜会也是必不可少的。邻童主日学班是向“童界德性之陶冶与教育之灌输”而举办的，另外查经班、布道、益智、励行、灵修等活动内容繁多。与教会合办的基督教青年修养会对于“宗教经验、人生真谛”的感情铺垫不遗余力，这也是青年会组织的皓的。而《厦门青年》作为青年会的舌喉，对会内宗教活动

⁽⁷⁾ 《总务部节流》载于《厦门青年》第 26 卷第 2 期 民 26 年 4 月 5 日

⁽⁸⁾ 详见《厦门青年》每期的“月份本会事业统计”

的报道不烦其细，哪怕每期都有相同组织的相同的活动，也从不同方面来采访报道，不厌其烦。青年会会内会员互称“同工”与教会组织内称呼相一致。

《厦门青年》对青年会的商业经营活动则大肆渲染，每期必有青年会的广告以招徕客源。宿舍部“为谋求住客认识基督教真理起见，特于每房置圣经一本，俾住客业余得以浏览”，同时为保客房清洁却又规定“妇孺恕不招待”，宗教宣传微细如此，青年会怎能不兴盛。除了登载会内广告外，《厦门青年》还“招登广告”，从事经营广告，这一点与教会其它组织所出刊物只登教会内广告极形差别，也是青年会作为教会外围组织从事世俗社会活动之深的又一表现标志。

与全国青年会出版物所经历的一样，早期《厦门青年》着重于宣传宗教，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着重于改良意识的宣传，以呼应全国教会改良主义思潮。三十年代增加了鼓吹不抵抗主义和反共意识等消极抗日的言论，也包括大量的基督社会福音主义的意识在内。但无论哪一时期，《厦门青年》一直都把教会的信仰事业作为自己的基本事业而常行不辍。其社会改良主义的编辑态度决定了其抗战前夕、抗战中的一贯态度：从来不会沸起的温水态度。1936年12月全国反日宣传热火朝天，厦门青年会一边组织全国青年协会学生干事刘良模的《基督徒学生救亡运动》演讲，一边又组织厦门金鱼展览会，“提倡高尚娱乐，促进爱美品性”，与救亡情绪难以合一。而该刊秉承青年会的改良主义和宗教组织的“超然”态度，对鱼展用的文字渲染比重比刘良模的爱国鼓吹所占的分量和版面要大的多。其救亡方式也仅限于“为国公祷”、“举行民众歌咏会”等，况且会内救亡运动也多以个人名义参加。如果说《厦门青年》的入世是教会组织中最深的话那么也只是商业上而言，于救亡的政治行动则是冷漠的。

《福州青年会报》由福州青年会筹办，发刊之初以无点逗的文言形式出版，“福州基督教青年会，为福州基督教同宗惟一服务社会之机关”，抗战期间“对于该会宗教基本事业按常进行不辍，尤致力于抗建工作”⁽⁹⁾。《福州青年会报》创设于宣统元年（1909），最初为不定期，第一年发行期数不详，第二年发行三期，第三年不详，第四年由于福州青年会筹划建筑新会所，手续纷繁，编辑人员恨不能分身，所以停刊一年，第五年拟月出一期每月二号出版，但无专司编辑之人，故常滞迟出刊。发行至第七年，刊名变为《福州

⁽⁹⁾ 《福州基督教青年会消息》载于《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通讯（福州版）》第10、11期 民33年8月1日出版

青年》，改为每星期出报一张，每月底之星期则出月报一册，专赠会内会员。该刊从发刊起，一直在会内发行，且为免费赠阅，所以在内容上极倾向于会闻消息等。早在福州青年会成立的第二年该报作为青年会的喉舌宣传机关也随之成立，并以“纯尽义务，开启青年”为出刊的实践宗旨，自始至终该刊都秉承以“德、智、体”（后来又加上“群、育”共称“五育”）三育来教化青年，以图以此改良社会，其社会改良取向并未随全国、福建局势的改变而改变，是为该刊的特色之一。

青年会自称“为品高而价廉之一俱乐部，充积基督教真理而不染尘俗气味，与涵有政治性质之团体绝异”，并且会内“无宗派之分，而为各公会代表所管属，此所以保存基督教的性质而不使与教会同样也”，会中各种设施如藏书楼、健身房、澡浴室等“不论信教与非信教，皆可一律享受”⁽¹⁰⁾，并且入会会员并非全部都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所占比例甚至远远超过基督徒会员，所以在刊物宣传中主要以“改良社会恶习，宣传博爱、自由、平等与牺牲服务诸主义”为价值根底，并不是以基督信仰为出刊宗旨的全部。“研究圣经，冀收灵益”在刊中的宣传分量相对较小，而关于三育言论较多，主要涉及青年修身如拒毒、拒赌、卫生、节俭、救国等。另外有青年会聘请来会的各届要人的演讲也很多，内容大多集中于科学演讲。美国实业家高智安在榕青年会演讲词《钢铁之制造》，医学博士古雅各演讲《最新发明免病法》等均撮要在刊中刊出，对青年的科学普及作用斐效。另外尚有部分涉及青年娱乐的内容，以西化为倾角，引进许多西方现代体育娱乐活动，并在刊中简要介绍。由于青年会的社会改良主义态度，所以使青年会虽保存了基督教的性质而又与教会的宣教热忱有异。这也是青年会力图避免周围社会以“教会之佣”来评价和称呼它的有力策对。“率循基督模范”，以基督献身牺牲精神为该会服务人群的信念支持，少却许多信仰意义，而增强许多基督人格精神的鼓舞，“改良社会陋习”这是除却神格后的基督精神鼓舞的行为目标，是目的，是青年会立会之意，既然青年会有如此行事口号，那么《福州青年会报》也承袭这种意旨，并不把布道基督作为刊物文章的重点，所以纵观所存该刊则发现直接的宗教说词较其它教会刊物为少，宗教已成为道德说教的借用，潜隐于意而不言行于表。

除却偏薄的宗教说教之外，该刊随着福州青年会会务的不断扩大，而着

⁽¹⁰⁾ 《福州青年会报》第六年第四期 1916年3月4日《基督教青年会小评》

重增加会内要闻信息的刊载，至停刊为止，都一直作为青年会会刊的性质而起作用。为解决部分出刊资金的短缺，则在页尾附有会内外广告，甚至为福州外埠公司广告。总的说来，该刊与社会的联系是依籍对青年的道德规劝和新式文明的引进、介绍来推行的，并力图避免教会式的宗教布道。作为教会附属机构的出版物，《福州青年会报》最具代表：欲盖反彰的宗教劝说遁形于道德话语的表用之中，意图创造信仰良机。所以可以说青年会组织的文字宣传是染了色的宣教喉舌，并且社会改良主义倾向有时会浓于基督的底色，而代之为基本出刊意图。

城市青年会的文字出版由于城市青年会所参与的社会活动的多样而在内容上表现得斑驳杂芜，难以用固定世俗态度的宗旨把握其刊物，但多能反映时局，不过在对时局的态度上却萎缩得趋于保守，从而表现出保守的改良主义，采取的虽是服务社会人群的“社会福音主义”，宣传的却是龟缩于宗教的纯粹主义，这样其会训“役于人”的信念很难实现。“热心主道，努力社会”成为城市青年会会员的人生价值取向，其会内非基督徒会员也有基督倾向（向教倾向），这也成为《厦门青年》、《福州青年》等一批城市青年会出版物宣传福音的暗色和内张力。

二 走出象牙塔的十字架：积极救世意识的学校青年会文字出版

福建学校青年会经历了几个时期不甚明了的阶段：各个学校的青年会发展阶段；以城市为组织单位的“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阶段；以城市学联或校会为单位组织区域性的学联阶段。各个阶段出版物的组织者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文字宣传的视野也随之扩大。

以闽北地区为例可明显看到各个阶段刊物发行的变化情况：自教会办鹤龄英华书院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学校青年会以后，各教会学校相继成立青年会。以协大青年会简史为例，1927年以前实行的是学生即会员的方法，属强迫性质，1928年以征求方式请学生加入青年会，重组青年会，但签名者仅三十余人，1929年春增至八十余人，1930年增至106人，占学生总数的5/6，1932年秋为实行男女学生入会把会名由Y·M·C·A改为SCA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1930年的宗旨：人格修养、校内团结、校外联络、社会服务。1935年改为：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谋求民众生活的改善。1930年会员分基本会员和征求会员两种，前者为基督

徒学生，后者为非基督徒学生和教职员。1935年改为一种会员⁽¹¹⁾。自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产生以来，各地基督教学生团体（男女青年会、立志证道团等）联合会相继成立，省学联因以成立。初时入会者不多，继则福州市基督教学生团体踊跃参加，1930年虽成为福州学联会，从这时起，协大青年会在学联中多负领导之责。未几，兴化、古田学联依次成立，遂合并此三学联而为闽北学联，同时厦门教会学校也有闽南联之产生。每年的闽北学生夏令大会为闽北、闽南两联互通声气之活动机关。起先一切联务皆由同学自己计划执行，嗣因联务日渐发达，势难兼顾，故有聘请干事执行该联事工的尝试，主要联务有：退修会、青年崇拜会、事工研究会、夏令会、救济难民筹赈会、夏令儿童圣经学校以及其它宗教活动和社会服务事业。

闽北联创初伊始，一切多与福州青年会合并，闽北联以校会为单位，经济除由各校会分别负担外，不敷之款概由当地基督教机关或其它热心学运之士筹募而来。职员任期一年，分主席、书记、会计、庶务、进德部、学术部、交际部、服务部。闽南联成立两年，会员稀少，“终有实力难敷之憾”，为扩大学运前途起见，该会特于民21年将会员资格由“学生基督教青年会”改为“学生基督教团体”，结果会员即由四校增至八校，均系教会所创立的学校，以上是为校青年会学联在福建闽南闽北的概况。各教会学校曾出版大量文字刊物如：南平剑津中学青年会学术部出版有《剑中青年》，莆田哲理中学基督教青年会编印的《哲理青年》以及协大青年会出版的多种刊物⁽¹²⁾等，此类数量众多，种类难以统计。福州青年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学术部出版有《动声》，兴化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学术部编辑有《活力》，闽北联出有《闽北联通讯》，以合学校青年会各级通讯之需，本文拟就以上列举刊物加以研究说明。

南平剑津中学青年会所发行的《剑津青年》创刊号载有出刊目的“研究学术、砥砺学行、沟通消息、及激发基督精神”，另外有刊行宗旨：“本基督之精神，适应抗战环境，创造青年团契，建立健全人格，发挥青年能力”⁽¹³⁾。该刊发行正处于抗战期间，校内青年会本着“发扬基督精神，促进社会战时一切事业”两大原则推行社会活动，特别是抗战期间，抗战与灵修共举，成为该校青年会活动的创举。该校青年会秉承以上两大原则“为救世救人而努

⁽¹¹⁾ 具体情况见《青年会史集》载于《协大青年》第一卷第一期 1949年8月17日

⁽¹²⁾ 见本文附表一“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刊物一览”之协大青年会出版刊物

⁽¹³⁾ 陈光：《刊前赠言》载于《剑中青年》创刊号“五四特辑” 民29年5月16日

力”，积极加入伤兵之友社，开展救护伤兵行动，组织剑津青抗建剧团，公演抗战剧目，举行讨汪锄奸化妆游行。并与基督教各校及全国青年会的团体取得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希冀在青年会大运动的原则下通力合作，推诚相与，来负起救世救人的使命，颇具积极的出世意义。该校青年会的救亡爱国行动如此，在刊物的编辑倾向中也以积极的救世意义为取向，例如该刊的创刊号中仅有一篇关于基督与青年的文章，其余均与抗建有关。第二期则以学校生活为重点，宗教内容被挤入“杂俎”中，字里行间还不忘该校“积极”的活动——组织抗建宣传的记载和报道，但其“消极”的行动——宗教信仰的灵修活动也异形活跃，两者并举，把基督精神中的救世精神在爱国救亡的实践中贯彻到底。《剑中青年》从创刊即表现出与世俗特别是与当时的社会青年运动和学运的关系比与宗教的关系更显亲近。该刊创刊号即为“五四特辑”颇具五四遗风精神。学校青年会原本是宗教意义很浓的学生组织，除了例行各种宗教活动之外，几乎都成为校内一切青年活动的中心组织，包括抗建活动。而《剑津青年》也秉承青年会意志，刻意于立会的宗旨。

《哲理青年》的发行一开始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表现为彻头彻尾的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在第三期封面套红印着“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字模，这无疑成为其立刊的宣言。内容上讲，该期的十二篇文章几乎全部与青年救国运动有关，相应地宗教宣传意识很薄弱。其卷头语编者的话极具救亡意志：“今日者，敌氛益炽，国难日深，救国有心，忧时无泪，正志士枕戈待旦之秋也，而哲理青年之刊，适此时出而问世，抒战时之文学，应时势之需求，意者先正流风，于今未歇”⁽¹⁴⁾，并以为有志救亡者立券焉，这也成为《哲理青年》出刊的践行宗旨。宗教组织的含情脉脉被爱国青年饱满热忱的激情所替代，灵修是个人的事而救亡才是青年们的集体意识：“在这样万分严重处境之下，我们青年们要预备流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揭破侵略者的丑面目，来夺回我们中华民族国家的自由解放”⁽¹⁵⁾，这与当时全国学生运动的总潮流相衔接得如同一辙。而教会学校所一贯表现出的宗教浸染，在该刊中表现的于无踪影，连半句宗教语言都没有，即使是圣经经典中犹太民族自救和神助这样激励人心的事例，信仰言论也无半点引用，宗教宣传寂寞了。在这国难方殷的时刻，宗教的说教已遮蔽不住国家沦亡的时情，两者在青年人图存的理念中孰重孰轻，谁是真实的，被判断的真

⁽¹⁴⁾ 杰甫：《卷头语》载于《哲理青年》第三期 民27年1月28日出版

⁽¹⁵⁾ 《抗战期中青年应干的几件事》载于《哲理青年》第三期 民27年1月28日出版

真切切：国家沦亡，生命将何所寄托？宗教灵修并不能如同教会当局所讲的自修以图存，这是“小我”，民族复兴才是“真我”。教会学校青年会在与世俗政治潮流的接触中无疑成为宗教的叛逆，神的天国只会降临在信仰中而不是在现世。虽然刊中没有表现出对信仰的挹伐，但是有意无意地置之不用的冷漠也足以让校方、教会董事局寒心的了。在校方指定的大教堂中的朝会中，“大家手中拿着爱我中华的歌”，而校长所要演讲的题目也与教堂的信仰气氛不相协调：《抗战给我们的教训》。校内青年往乡间宣传抗日、组织演剧宣传、参加军训、参加救护训练等宣传活动与校内战时服务活动相得益彰：组织宣传队、特务队、纠察队，慰问伤兵，救济难民游艺会，捐助战区难民等等救国工作，而《哲理青年》对每次活动的记述都不遗其细，以资鼓吹。《哲理青年》之所以有这样浓烈的救存热情和胆识，是由于哲理中学青年会虽系基督徒学生组织，约占全校学生三分之二，但其会中领导角色则由学生自己选举出任，学期中心工作由职员会议议决，十分注重民主，而校方所要求的宗教活动相形减略不少，每次议决的结果则“注重救国工作，及出版工作”，而非宗教活动工作。所以其出版工作中所征求文章“皆属爱国言论，亦文字宣传救国之工作”，所以该刊有如此救亡图存的热心。在该刊的影响下，每星期三上午的全体学生早祷也由校方定为“为国祈祷时间，专印爱国诗歌，以供开会之用”。该刊的特色之一是刊内载有数则抗日救国的漫画，这是其它教会学校刊物所不具有的。

教会学校青年会所出版的文字宣传物在抗战爆发前着重于推行“公民教育”、“宗教活动”以及提倡“人格救国”、“读书救国”等消极的救世色彩，并极力宣传在这种意识指导下的“公民教育运动团”运动。这时期的刊物属学校青年会的一批保守色彩的救世刊物。而一迨抗日图存的全国学运的兴起，教会青年会为扩大校内外影响一改颓疲色彩，重新组织或创立新刊以宣传青年救国精神，而少却许多宗教宣传，纵观整个福建教会学校青年会的出版品，大多都创刊于此阶段，青年救世的悟醒不谄只靠宗教灌输而是要靠苦难时情国事的目睹耳闻，现世的苦难和救亡的急迫尤能刺激青年积极救世意识的觉醒，这是宗教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如果说《剑中青年》、《哲理青年》等一批学校青年会刊物所宣行的救亡意识只局限于校内外的话，那么学联所组织的《活力》、《动声》以及古田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古星》、邵武基督教学生青年会联合会《学联消息》及

《闽北联通讯》的宣传，则已经扩大到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的范围。《动声》开始是由各校会轮流举出编辑人员，意在避防“偏枯之虞”，第一期由文山女中编，第二期由协大编辑，由福州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学术部（后改为学术委员会）出版，开始时是不定期，后改由两月出刊一次，由协大负责编辑出版。其出刊的宗旨原为“为福州基督教同学，发表思想和生活上的新探讨，以阐扬基督教的真面目”，至第八期宗旨变为“为闽北基督教同学发表思想和生活上的新探讨，以阐扬基督教的真义”，宣传辖域相形由福州扩大为闽北，是由于闽北联成立之初诸事皆与福州联合一之故。《动声》刊的组织者福州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在《动声》之前曾刊出《学联会年刊》寄赠国内学校，余数议定发各校代售。福州学联宣传物影响的范围也仅在福州闽北地区。该刊的内容正如其办刊宗旨中所述的一样，大多集中于会内消息、全国学运消息和关于基督教及世俗问题的一些言论，内容相当狭窄。由于福州学联的产生是福州青年会的直接参与下成立的，所以与城市青年会的关系相当密切，在对待社会的态度上也行走的是社会改良的温和路线。

学联以校青年会为单位，会员之间的联系相当松懈，会员与学联的关系不是隶属的上下级关系，只是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的关系，会内在出刊问题上难免有摩擦。初期采取的是各校会轮流主刊一期的做法，几期后才由协大青年会固定编辑。刊物对宗教活动如夏令会、退修会的消息报道尤其详道，对于会内会务更负起机关刊物报道之责，对于宗教与青年的讨论也费篇幅不少，内容多集中于此，对社会活动则报道不多，对政治则更是讳莫如深、缄口少谈，该刊的宗教意识较浓，零星尚有点许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火花。由于全国学运大势的影响，该刊后来也注重学运趋势，积极讨论参与国货运动，渐渐与全国学运潮流相一致，而不再局限于宗教讨论，但这种学运的参与在刊物中体现出来的还是很受限制的不彻底。

《活力》的发刊经历和《动声》类似，其创刊号就是以宗教活动报道为主的“退修会与春令会合刊”。其刊物一直走到闭刊为至也如同在发刊词中所说的一样“我们（基督徒学生）认定要向革命路上走，必须巩固革命的基础，惟一的条件，就是革心，革心非空言所能实现，也非意志薄弱的青年所能做到圆满地步人事所究，必须要籍神的功能及救主耶稣的真理来给予我们进展的活力，使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责任完了，这才是我们很大的期望”

咧！”⁽¹⁶⁾，在如此举事理念的支配下，青年作了神的奴隶，完全丧失了青年充满朝气的特点。兴化学联的社会青运运动也仅仅是提倡提倡国货运动而已，其会内人士认为国难中的基督教青年所要做的是“要具坚决的信仰”。其宗教青年会的保守意识与福州学联轩轻难较，有过之不及的程度。

闽北联包括福州及其以北各地区公私立中学，以及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青年会或青年团契等团体，为扩大宣传决定每年出版《闽北联通讯》四期。该刊发行之目的在于“沟通各校会消息”，此外大约别无其它⁽¹⁷⁾。它是闽北地区 23 个学校青年会的联合组织，也是闽北地区基督教学生运动最具影响的组织——闽北联出版委员会主编出版的，其刊物的编辑倾向也如《动力》和《活力》一样拘囿于宗教范围内。甚至于社会的激烈动荡也无改这个出刊宗旨，很具宗教的“超然”态度。对于学运与基督的关系则认为“学运的目标是本耶稣基督的精神，建立完全的人格，服务社会以谋人类的幸福与解放”。空洞的宣言落实也仅有“五里亭的服务社”等一般改良农村活动，成就不大，归根结底是由于学运在社会改良主义的支配影响下，不可能象基层校青年会那样激烈昂扬地进行救亡抗建等积极救世行动的宣传，也没有校会那样与民众直接接触，更不可能参与到救亡的事工中去，学联的学运只是停留在“口号的敷衍”上。较之于校青年会来讲，学联的青运、学运无疑是倒退的保守的，而学联的刊物秉承的也是这种态度。说到底学联由于与城市青年会的关系不可能超越城市青年会的社会福音主义态度，从而也使学联也浸染上社会福音主义的底色，而成为城市青年会的主要支脉。

第四节 “灵之工”：宗教教育会、平信徒组织和基督教教育会等教会附属、相关组织的文字出版工作

教会以其机构功能的齐备而颇似一个社会组织，世俗社会以法律、伦理等规范人与人的关系，而教会则以信仰为维系存在的基础。教会是信仰的核心，是信仰浓度最高的地方。其它外围组织如平信徒组织，教会附属层次组织如教会宗教教育会、基督教教育会，由于是个体自愿“以工事神”、“为灵工作”的缘故，因而其信仰浓度也很酣浓，对于各种培灵布道工作的细致程度和热心程度与教会相伯仲，由于其本身组织的松散性（不象教会那样有完

⁽¹⁶⁾ 《发刊词》载于《活力》（创刊号） 兴化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学术部编辑 民 22 年 4 月出版

⁽¹⁷⁾ 详见徐吾行手稿本《福建期刊简介》（续篇）（福建现代史料简介之一）1963 年 8 月 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备的堂会等有效管理组织),其组织内部的消息交流、事工经验的交流以及向外布道宣传等尤其倚力于文字事业,所以这些组织的文字工作多为该组织所看中,工作成效也益形显彰。

基督教教徒的平信徒组织出于宗教的热情故成立福州中国基督徒联合会(亦福州基督徒总布道会、全国基督徒布道团)。福州布道团成立的信仰之因是二十年代后期“教会对原有基本信仰,逐渐被‘不信派’,所谓‘新神学’以及似是而非之‘社会福音’所蒙混,而至动摆,大有灵性破产之虞”,而教会内部则出现“精神不振,灵性破产,充满妒忌,缺少爱心,故凡关心教会前途者,莫不黯然忧之,欲谋所以补救之道”。由于教会不能“荣耀主名”,每次奋兴会只能唤起暂时的信仰踊跃,“迷途亡羊”离却“主栅”甚多,这也成为教会信仰价值动摇的症结⁽¹⁾。有基督之体之称的教会在救赎工作上的无助不力成为信仰坚实的信众矢志为“道”宣扬的刺激力,所以有“以灵为工”的平信徒组织基督徒布道会(团)的成立。

1934年9月30日晚福州基督徒布道团经过多时筹谋,如愿成立福州天安堂,成立时共有112队,阅年增为132队,队员592人,主要是男女学生(占70%)、男女信徒(占30%),其入团队员要具名立志布道,立志每星期至少对人宣讲“耶稣十字架救恩”一次,每月第一个主日,召集全体团员,开总会一次。主要事工情形:每星期下午聚会救主堂,唱诗、祈祷述说见证、讲经,参加人数多寡不一,多时千人,少时29人(假期学生毕散之故),团员每周布道一次,方式可选露天演讲、个人讲道、文字讲道、文字宣传、刊物赠送等。其外方布道团散布福州近郊诸县,远涉厦门等地。其工作对内则“注重培养工夫”,对外则“注重向外布道”,活动往往与各堂会相洽合作。其工作成绩也颇形显著:一年工夫由布道团引导到礼拜堂者或入学道班,或领洗者仅在福州即引四百余人到各堂礼拜学道,二十余人“领洗归主”,在未闻福音的乡村,由布道团帮助设福音堂一处,成绩颇佳。

基督教布道团尤其注重文字宣道事业,文字事工分为对内对外两种措施和态度。对内文字注重促进灵性之提高:每月有布道消息出版,每团员一份,使知全国消息,“收互通声气,彼此代祷”之效。其它如总团长时常通信,领发通告,使其中退缩团员,有所促进。对外文字工作注重布道事工:由总团推举文字委办五人,负责编辑布道单张与材料,中有十余种,翻印外来单

⁽¹⁾ 吴景崧:《福建布道团工作简述》载于《全国基督徒布道团报告书》第3期

张，其印行数目，九个月间不下二十余万张，同时分送或售卖福音单本数万册。“使每一接受单张与福音书者，得闻信耶稣得救之一语”⁽²⁾。在一年时间里单本圣经售出二万三千余本，大小布道单张十余种，共赠二十八万余张，颇为可观，其文字布道热情丝毫不于教会当局。另出版发行有《全国基督徒布道团报告书》（不定期刊物）一度达到每期发行量 5000 余册，成为福建教会刊物中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在全国布道信众中的影响相当大。

《全国基督徒布道团报告书》主要内容是关于教会会务、神学修持的一种文理白话兼用的不定期刊物，采取赠送的发行方式。第一期为“全国布道团查经大会特刊”，内容多关于神学经义的论坛、经筵（串解圣经）、信徒证道见证等纯宗教事，其撰文作者则包括神牧人员、教会职员以及平信徒、信众作者为多。除福建本省作者外，多来自全国各地及南洋一带。其出刊的目的也如该刊封面上所言“这天国的福音要传偏（遍）天下”，“以求团联络，籍表主内之合一，冀声气相通，精神固结，以符圣保罗所谓：肢体苦乐相关之道，互生代祷关系”⁽³⁾。作为教徒自发组织的布道团体，本以力挽神学信仰的颓靡，但对于正规差（教）会而言，这种四处传布福音的活动即扼杀了各差教会的畛域相区，又从各教会挖走了诸多信众。该团的团员多来自各教会，所以地方教会无疑会以其为“小群派”相疑，而对于该团的“偷羊”活动则暗中羁绊扰阻。所以在该刊中诸文对教会的“误解”多有微词，消息中隐有批漏：直辖教会要求其归于权下听其指挥不可，所以对该会所组织的奋兴会多有阻挠。“女职业学校原有一队（基督徒布道队），热心可佳，惜因校禁森严，不许每主日下午来堂聚会，是以该校团员难伸其志，……幸该团邱明贞，毅勇可佳，某次因来堂聚会，被当局发觉大遭谴责，……校方加紧，终亦降服”⁽⁴⁾。该团对教会“精神不振，灵性破产”的信仰倾颓也颇有微词，但出于教会外围组织对基督信仰的需要，该团也力图与教会表示合作，所以有奋兴委员之设，专门与教会联络，其布道活动也往往与堂会合作，而这些与教会的龃龉和合作关系在该刊中表现无遗。教（差）会的辖权问题一直是教会合一的最大障碍，无论从属世意义的属地辖权，还是属灵意义的信仰派别辖权，教（差）会之间都存芥蒂，甚至于影响到对富有饱满布道热情的信徒组织，可见属灵的争端并未随着合和圣经的协一、中华基督教会协进会的

⁽²⁾ 吴景崧：《福建布道团工作简述》载于《全国基督徒布道团报告书》第 3 期

⁽³⁾ 叶见元：《全国各地基督徒总布道团职员名录》载于《全国基督徒布道团报告书》第 3 期

⁽⁴⁾ 叶见元：《福州布道团成立缘起及一周年概况》载于《全国基督徒布道团报告书》第 3 期

成立、高等神学院等教会合一行为而泯没，这是解放前中国基督教会信仰的最大问题之一，从《布道团报告书》可窥些许。

基督教教育会的成立可追溯至光绪三年（1877年）的“益智书会”，经过民国元年的改组，与原有的目的及功能大异旨趣，“原为一个注重普通教育并谋求其改进的学会，一变而为专门商讨宗教教育及教会学校本身发展的问题”⁽⁵⁾。福建基督教育协会的成立旨趣当以改组会内会务为重点，主要商讨福建教会所办各类学校的宗教教育及学校发展问题，其会员也以教会各类学校为主，会费则取之于各校所纳及年会代表费，该会与基督教协进会关系密切，协助基督教协进会进行多项事工。该会对于文字事业特别倾力，举办流动文库宣传教会新出书籍，翻印宗教教育材料，出版《教育讯息》、《教育消息》等刊物，以期沟通各会员学校消息，兼及神学教育。

《教育讯息》季刊产生于抗战期间各沿海教会学校内迁时期，由于基督教会学校以设立于沿海者为多，战自衅开，日舰和日机时有肆扰，华南战事起后各教会学校纷纷内迁闽西闽北一带，“俾得安心办学以免无谓惊扰，殊为善策，然而散处各方不能如前之密迹，声气阻隔，固所难免，本会有鉴及此特发不定期刊一种，专刊各校消息，分寄各方以资联络”⁽⁶⁾。其出刊背景如此则其编裁发行也该是如是旨趣，其稿件多来自各教会学校当局及教职员，尤其对各校消息报告至为欢迎。其它如对教会教育的诸人意见或介绍新知。由于受战时诸多条件的限制，该刊只能以类似稿纸状纸底油印出版，制作相当粗糙，内容也很单一，基本内容为各校动向，第一期排列出16个教会学校的动向。自第七期后，本拟在可能的范围内每周出版一次，也相应增加宗教教育新书的介绍及其它宗教教育材料的介绍，在该刊中也对教育会会务进行报告、讨论。该刊的后期出版已改由铅印，页码分量也加大，对于教育新讯的介绍内容比例加大，并发行数期特刊，如民29年发行“抗建中的福建私立学校”特刊。

《教育消息》的内容也是关于省内各基督教会所办教育机构消息沟通的刊物，不定期刊出，内容多为各校未来计划、最近校闻、个人消息、学生活动等。目前见到的最后一期为第七期（1950年6月10日）。另有南平基督教育协会（1944—1946年4月）出年刊《教育消息》。1949年8月31日出

⁽⁵⁾ 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载于《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林治平编 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80年版

⁽⁶⁾ 《教育讯息》（油印）第一期福建基督教育协会编印 民27年11月出版 《编者小言》

版的福建基督教协会第十九届年会专辑是教会面对解放后的会务讨论，主要针对“学校行政”、“训育设施”和“宗教事业”三个讨论中心来讨论“时局转变中的基督教教育”。《教育消息》是在教育会所有会务中仅次于年会的第二个重要事业，根据《福州基督教教育协会经费收支报告（1949年2月—8月）》统计可知该时段教育会共收入401·10美金，而年会用耗221·30元，付印刷教育消息66·50元，除年会用耗之外印刷花费几乎相当于其它用费的总和⁽⁷⁾。如果说《教育讯息》尚不具备一个正规刊物条件的话，那么相比较而言《教育消息》则为一完全的刊物，无论从制形还是内容上都较先期出版的《教育讯息》正规，并附有铜板照片，印刷精美。

作为教会附属专门协会组织所出的刊物，无论是《教育讯息》还是《教育消息》都以报道各校校情、讨论教会教育为旨要，力主把教会事工紧限于教会学校教育中来，以专业的教育为教会当局服务。但又由于该会耗用费用多来自各教会学校和教会的捐助，增减随人，所以常有借两刊物催捐的“乞即见掷”之言。勉强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会的文字事业规模和进行的深度。该会的文字出版物对于教义宣传和时局涉及很少，颇具专业态度，同时也限制了其出版物的发行范围。

美以美会在闽北地区是会内会务制度最为完备的一个大差会。年议会是地方教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年议会闭会期间，由执行部处理一切事务，执行部下设“中小学教育委员会、宗教教育委员会、医务、文字（宣传）、妇女等委员会。宗教教育委员会的职能有别于教会教育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差会会属的各类宗教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美以美会将该会的全国宗教教育机构设立于福州，其用意深远，称之为“福州中华美会宗教教育总事务所”，并发行刊物以文字来倡兴该会的宗教教育事务。该会最持久昭著的刊物是《广闻录》季刊，1934年创刊，刊名由教会名人刘廷芳题写，每年发行一卷，每卷四期，三、六、九、十二月发行，每年七八两月停刊。原为英汉文合订本。自第六卷开始为“欲读者得享全部之材料起见”，将英汉文分开装订，权做一年试验，若无阻碍，又能得读者赞许，则继续分刊，不然各位读者以为合订本中仅有少数英文材料较佳，则愿如读者愿⁽⁸⁾。自民国34年10月第21、22期开始，封面的“卫理公会通讯”名称适以“广闻录”，因为《广闻

⁽⁷⁾ 详细数字见《福建基督教教育协会经费收支报告（1949年2月—8月）》载于《教育讯息》第五期 1949年8月31日出版 第23页

⁽⁸⁾ 详见《广闻录》（圣诞专号）民27年12月第5卷第4期 《本刊启事》

录》已向国民政府内政部、邮政部登记，成为核准刊物，且有多年历史，并且“已经登记之刊物较之未登记者，邮递方面更为便利”。该刊的编辑、消息采源较具完备的体系，在各地设有“消息通讯员”暨各年会宗教教育部部员，负责该地消息汇报，消息不局限于会内采编，除各地宗教教育干事之外，“主内同工”、“教友义工”或青年团体义工、青年团体也是其报道的消息源。该刊的发行主要面向各堂会男女主任（赠阅）；要求其阅后借与教友义工“轮流阅览，以广效用”。该通讯“编辑责任未有责任人员主持，仅由同人等义务分担，分英汉文编辑”。因编辑人员身兼各种教会义务工作，“需费精神于时间匪鲜”，所以编辑常有所换动。

该刊常以专号形式出版，对材料的取舍性较大，如第九卷第三期的采编总题为“新中国的家庭建设”，主要篇目多关于基督化家庭运动内容，而会内其它重要消息和论述则暂时搁置，并未严格于该刊的出刊宗旨。该刊能够根据时情和教会内所发生变化而酌增减变化其出刊宗旨，最初的宗旨在于“沟通宗教教育消息；介绍宗教教育方法；交换同工工作经验；提倡教会合作精神”，随着抗日战事形势的发展和教会工作重点致力于青年社会运动的倾向，该刊的宗旨又增加“提倡青年联合运动，促进义工服务精神”为附加宗旨。该刊的出版发行也如教会其它文字出版所遇困难一样：时局和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抗战爆发，沿海兵燹四起，沿海居民迁移内地者十余万，一般梓民亦纷纷迁徙，宗教信仰组织成为脆弱之体，所举事业如劲风疾草：华南战事“几使本刊为之停顿，今幸如期出版”，在编辑人员版后自言庆幸之余，经济短竭的打击如期而至：“重庆总会对于本华南区文字事业款，已停汇多时，因此本通讯之经费来源亦告断绝”^⑨，解决经济的方法“幸得本区各年议会之爱护，捐款补助”但对于能否继续出刊则不具信心并有“俾能继续出刊……”之类的踌躇之语云云，其采编之情形颇令人伤感，该刊作为教会机构内置委员会宗教教育会最主要的事工，对该会的意义和教会的意义同等重要，其服务信仰的意识形态，几成为教会宣讲布道的喉舌，这是其与教会关系的密切程度切切相关的。

基督教附属组织的文字出版工作往往与教会凭借信仰发生联系，故采取以信仰主义为中心，力求与教会当局意识的同步。特别是宗教教育会和平信徒组织，他们的成立便是以信仰灵修为组织内联系的纽带，籍借文字表达对

^⑨ 《丁先诚启事》载于《广闻录（华南版卫理公会通讯）》第21期并第22期 民34年10月出版

“天国”的信仰和对教会的态度。作为教会外围或围内组织，他们的刊行规模很具有宗教组织本身所固有的固囿性——发行仅限于会员和教会各机构，而对会外而言，采取的门墙主义态度，信仰很具符号化特征。各机构的工作无疑可称之为“灵之工”，它们与信仰之外的鸿沟随着其灵之工工作的深入而不断加深。

第五节 信仰者个人的文字事工：《鹭江报》与英国牧师山雅各

清末民初福建各种报刊所宣行的内容纷繁杂芜，除具有很强政治色彩的维新派、民主革命两大派以及地方的立宪主张、自治主张的小派系外，尚有许多综合新闻、侨务、娱乐及宗教色彩的报刊出版，甚至于日本人、美国人等也以非教会身份插足刚开端启的福建新闻界，以图“开通风气，启发聪明”，是为此阶段福建出版业的情形特点。

政治形态及制度之选成为制度体制嬗变临界时民众关注的热点，《鹭江报》的产生正应了民众对各种未来新政的预测之需。1901年5月《鹭江报》创刊，1905年停办⁽¹⁾前后共出版90期（册）⁽²⁾，每月出版三期，旬刊性质，每十日出版一期，连史纸，直竖排四号铅字印刷，每册20—25页，三四万字规模，装订成册，到后来已演变为固定的旬刊。后来又加增篇幅，每期四万字左右，《鹭江报》的发行采取在各地设立零售点、接办订报等方式，其设立的零售点省内除厦门及鼓浪屿外，闽北福州、闽南大部分地区都设点售卖，省外如汕头、天津，国外南洋、日本一带，特别以南洋各属地最多⁽³⁾。刊前附有英文目录，每期刊印数目不详。

《鹭江报》的创办者是在厦门传教多年的英国牧师梅述·山雅各（J·Sadler），山雅各自兼主笔、总理人。起初编辑只有四人，以后陆续增至十三人，除山雅各之外，其余十二人都为中国人，其中发表最勤者如早期的侯官林砥中和一个拣选知县冯葆瑛，另外如连横、严复、吴汝纶等也在该

⁽¹⁾ 1905年1月20日（光绪30年12月15日）出至第90期，后因刊载金门教案事被英国领事胁迫厦门地方政府予以封禁，葛公振持此说，待考，《厦门首家现代报刊〈鹭江报〉》（载于《新闻研究资料》总第五十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作者郭稼对终刊原因有疑义，本文暂从郭说。

⁽²⁾ 国内有86期说（葛公振）有90期说，但郭稼对此均有疑义，所以待考，本文暂且从90期之数

⁽³⁾ 该报的发售地点很广，省内除厦门及鼓浪屿外，还有福州、泉州、惠安、金井、安海、同安、马巷、金门、漳州、石码、石美，省外有汕头、天津。而徐晋行认为省外则只有汕头一地，误，国外为香港、失力、吉宁、檳榔屿、小吕宋、怡朗、巴城、安南、望加撒、神户及台北等地

刊发表文论，还有西方文人美之李佳白、英人亚提等亦有篇幅⁽⁴⁾。由此可见该刊采编之广，该刊“社说”除“来稿”之外多为社中编辑撰述、译作。而该刊主编山雅各本人在厦门传教多年，早已熟悉中文，从该刊中雅各发表论说的几种变辞可以看出山雅各作为一个中文作者从学习者到写作者的变化。最初几期山雅各发表述论多署为“英山雅各树意，×××释词”或“山雅各撰，×××述”，亦或用“山雅各立意，×××遣辞”，到后来几期已变为“英山雅各撰”的落款了。1904年该刊由于种种原因而读者锐减，销路日绌，最终因经费困难而宣告停刊。

该刊的内容分“述说（社论）、时事、西文译编、闽峽琐闻（近闻）、上谕恭录、紧要奏折、外国纪事、外史、专件、诗界搜罗集、路透新电、译谈随笔”等相继出现有数十个栏目，但刊物多集中于社论（或论说），每期有两篇五篇不等，多以“政论居多，宗教言论也占一定分量”⁽⁵⁾。力主宣扬新学（西学），偶尔刊登一些介绍科学技术知识的文章⁽⁶⁾。报中“汇论”一栏系转录自国内同时期有名的报纸，如《政艺通报》、《苏报》及《大公报》等。

“名家谈丛”和“西文译编”两栏则都采录当时各种名著，但篇幅不多。“中国纪事”、“外国纪事”及“路透新电”三栏，均属新闻报道性质。“上谕恭录”与“要紧奏折”则与日后公报所刊载者相同。“闽峽琐闻”为附录，其中与福建地方有关者亦只限于此“附录”而已，它是福建地方新闻汇报，内容多集中于福州、泉州、漳州及厦门四地，尤以闽南地区为多⁽⁷⁾。

《鹭江报》主编山雅各以基督教牧师的身份从事救灵布道工作。《鹭江报》的创办与其说是宗教信仰意识使然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其改良的社会与舆论意识促成的结果，因为该刊的出版意图与信仰内容的宣扬距离甚远。山雅各的社会改良意识是借助于林砥中等中国文士之笔而表达出来的（或者说中国文人从这位英国式士绅那里浸染了民主改良思想，而又借诸于山雅各之口表述出来）。山雅各最初所办刊物，林砥中则是其有力的助手，山雅各的文章大多经过林砥中、冯葆瑛等润饰后刊出，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中国特色的。林砥中又名仗脚，侯官县人，著有《林氏罪言》及《后三闾文集》等书，“集

⁽⁴⁾ 严复曾在该刊第32册撰有（疑为转载）《群学辨言叙》；吴汝纶在第30册上撰《原富叙》（疑为转载）；连横作为该刊的编辑在该刊发表多篇如第61册《惜别吟诗集序》等及专论《满洲最近外交史》；李佳白在45册发表《中国与法国政治之异同》（疑为转载）；英国亚提著有《楷泰记》（开罗）等

⁽⁵⁾ 邱艺玲：《辛亥革命前后的厦门报刊》载于《厦门文史资料》

⁽⁶⁾ 如第76册，“寓日本许自立豫庭来稿”《诗界搜罗集》就以七律形式介绍了“电信”、“电灯”、“电话”、“写真器”等西方最新科技发明

⁽⁷⁾ 单就第25册而言计有：福州方面3则，泉州5则，漳州11则，厦门7则

中伤心思古，慷慨激昂”，爱国之心，改良之意拳拳，对此山雅各似乎持同情态度，甚至于该刊有 1902 年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时，有《论鼓浪屿充作万国公地之关系》论说文章的发表，以揭露西方列强在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过程中的阴谋，这种内容的刊出与山雅各主编西人身份很不适宜，更与该报的支持者的办报意图相去甚远。该刊有三个支持者，一个是英国驻厦门领事馆的领事满思礼，一个是厦门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辛盛，还有一个是兴泉道道宪延年。该刊“在政治上代表英国在华的殖民利益；经济上代表在华英商的掠夺、剥削等利益；同时又是英国传教士和厦门、闽南一带基督会的喉舌”而作为地方行政主管官员的清政府道宪，只不过是《鹭江报》装饰门面的“陪客”^⑧，这虽不是十分确切的说法，但它也说明了该刊编辑发行的部分倾向。实际上而言，山雅各只是一个形象代言人，一方面充当殖民当局和英商的舆论之箭，另一方面却又被地方的民主团体文士所利用，充当了福建闽南地方开启民智、灌输民主的先导，而这一切都是政治意义而非其牧师本职工作的意义。林砥中、连横、冯葆英等颇具爱国民主色彩人士，借雅各之口抒发爱国热忱和民主改良的政治观点，言辞相当苛激。在当时的厦门，《鹭江报》无疑成为闽南民主思想的温床，对地方的反帝反封建意识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着实起了推动作用。直到《福建日日新闻》旗帜鲜明的革命鼓吹，《鹭江报》才由于其过于温和的改良革命态度而销路日促，失去读者基础。但《日日新闻》的发刊与《鹭江报》渊藪很深，连横等厦门文人曾经借助于山雅各的《鹭江报》宣传政治观点，是《鹭江报》培养起来的一批专业编辑人员，但“连君雅堂近邀同志在厦门太史巷创建福建日日新闻社”，《鹭江报》称赞连横“笔法奇横恣肆，著作如林”，以替其宣扬^⑨。正是这批鹭江文化和思想精英的相继辞职，山雅各本人也无力独撑孤帆破陋的改良之舟。又加之原先支持《鹭江报》的厦门富商林珞存、黄廷元以及鼓浪屿牧师周之桢转而资助《日日新闻》，鹭江的经费也告短，这是《鹭江报》停刊的两大原因。

《鹭江报》的创刊虽无明显的教会背景，但山雅各、周之桢等人的牧师身份和职责势必影响其编辑观念，虽然该刊着力于政论时政的讨论，但宗教也成为其编辑策略之一——鞭挞本土社会陋习及民间信仰，替入华传教进行开脱。山雅各面对中国社会中被刑律的犯罪分子不能悔过自新，反而“籍是以夸耀于其社会而自称为伟男子，意为彼等社会之所欢迎者”。他认为此“无

^⑧ 邱艺玲：《辛亥革命前后的厦门报刊》载于《厦门文史资料》

^⑨ 《福建日日新闻出现》载于《鹭江报》第 76 册 1904 年

他，西人知耻，华人不知耻”是原因所在，并提出数端举措，建议中国社会采纳，措辞相当作言，“华人无耻之尤，胥吏为最”⁽¹⁰⁾，在山雅各眼中，这也是华人质性特征之一。对于本土民间宗教活动，山雅各的态度相当挪挪“普度巨费，毁封造庙”是针对尤溪县署所封娼馆被乡人择为基址，擅自毁封召工起建“孛庙”而进行的报道，态度相当嘲讽。而对于入华传教士中基督教在华所遇到的“教难”问题，山雅各极力为传教辩护。他认为“华人最集矢西人者有两端：一西人只传教内地，一阿芙蓉（鸦片）之入境”⁽¹¹⁾，并认为传教士在历次教难中占被动地位，是受害者，认为支那之隔绝不和并暗涵危机者有五端，其第四端即为“民教之隔，外人跋涉重洋，传教内地，皆具一片苦心，即民间之入教者亦因善起见，并无为害平民之心，乃平民嫉之必深，焚毁教堂之事，各省层见叠出，于是于外人以口实，因而召外兵，因而求割地，因而索赔，平民愈嫉教民，教民愈恨平民”。“若夫平民能爱教民，教民亦必爱民，则教案不作”⁽¹²⁾，此时该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正需舆论辩护之时，山雅各把战争之责停放在教案上，夸大其辞用心显见。并提出假设平民能爱教民（这是前提）教民才会爱平民（这是结果）其辩教态度与其牧师身份相合。但统观现存的《鹭江报》阙本，该刊虽有山雅各的护教倾向，但无宣教之意，对于基督信仰的宣传却只字罕见，只是以个人态度表达对信仰的拥护。在山雅各基督信仰的影响下，林砥中则明显带有基督信仰倾向，在其著作中称“救世教好言魔鬼……”并把顽固大宪比附为魔鬼⁽¹³⁾。总得看来，山雅各作为一个西方人对其周围编辑者士人及社会的影响主要在于其西方政治意识而非宗教信仰，它的政论由中国编辑加工后变作爱国、自强、反帝、反封建、立宪、革命等诸多思想的鼓吹渊源，至于说雅各兴办《鹭江报》所宣传的信仰色彩则极为隐晦，只是一些教会内外关系的讨论，与神意布道则无丝毫关系。

山雅各所办《鹭江报》总得说来是成功的，它关于地方的新闻常被国内大型报刊转引，如《东方杂志》等，是全国各地籍借报刊了解福建的一扇窗口。但就山雅各的宗教宣扬意用来讲无疑可说是失败的，原因在于该刊的殖民背景太浓，编辑者（特别是国籍编辑）很难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取舍，所

⁽¹⁰⁾ 山雅各：《论华人之质性及其律法》载于《鹭江报》第76册 1904年

⁽¹¹⁾ 山雅各撰，钱塘高用霖述：《论中西情不通之缘起》载于《鹭江报》第27册 1903年

⁽¹²⁾ 山雅各撰：《以爱力换支那之危局论》载于《鹭江报》第24册 1903年

⁽¹³⁾ 林砥中撰：《妨害新政之魔鬼》载于《鹭江报》第23册 1903年

以所有的编辑思想集中在政治宣传上面，又由于中国籍文人参与编辑，使山雅各更难统一编辑理念、左右编辑的多元格局。所以该刊实际上成为具有反满、改良、革命等意图的中国文人借助该刊西方背景发表政治主张的一块阵地，通过替山雅各释词、遣辞、修润等来借取西人以抒己之政治意图。可以说山雅各此时已很难表现为一个有神论的信仰者，而扮演一个积极的世俗救世主义者，或者可以称之为革命导师？也可以说是山雅各对牧师身份的背叛，对自己信仰的失范，山雅各亦无力以个人独撑《鹭江报》这片天国块颐之地，从而表现得更象一个社会活动者，带着原本有的、很难在母国实现的“社会政治”抱负来借中国这块待耕国土一显身手，宗教难以成为其主要的支配意识，山雅各与《鹭江报》的关系可说是宗教布道意识在世俗时政面前的折腰。

传教士个人所办的文字事工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很难表现出对基督的坚贞，他们办刊的目的在于布传福音，实际上往往沦为时政之婢，传教士个人所办文字事业主要在传教初期。中国“教化”待开，籍借文字布道往往容易招徕信徒。传教士个人所办刊物等文字出版浅少，大多是以专著以纵深的神学思想来实现信仰传布的目的，而办刊物的任务往往由新生的教会当局接管。但并非每个传教士都会遭遇山雅各与《鹭江报》的这份尴尬。美国传教士打马字用方言撰写宣传基督教的刊物《漳泉圣会报》月刊，英国传教士布德创办的中文月刊《厦门新报》刊载一般新闻和教务情况，用地方方言写作，这些刊物由于出刊策略的适宜，信仰宣传和时政消息均能合璧一体，成为传教士个人举办刊物成功的典范。

本章小结：教会各类文字出版事业中的宗教出版情结

教会各类文字出版机构所发行的文字刊物等出版物中所凝结的宗教情结俨浓，是教会背景特色的最集中的体现，不管教会文字事业如何分类，其目的都在于籍借文字来宣行教会的各种主义特别是教会的神学主张。教会文字事业是教会布道的最佳工具，但这种工具的操作有间接和直接之分，教会的直属文字出版事业对文字传道相对来讲最为热衷，也力行不辍，勤勤勉勉，教会神学宣传靠的也主要是直属文字事业的工作。相比较而言，教会的各种边缘机构其文字出版意识虽没有教会直属机构那样谨严但却有自己的出版特色：与各自机构所办社会事业结合，借用社会事业的成功来附带宣传教会

主张，同时又补充了教会社会事业的宣传不足，其成绩和影响丝毫不亚于教会直属文字出版事业。

特别是当教会各类文字出版事业的编辑人员聘任自教会各类事业的职员和教会神职人员的时候，教会各类文字事业所宣传的宗教意识就更浓，天国之城也被尽行扩大，神学耕殖等待着牧者的收获，各类文字事业的宗教出版情怀既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又是以宗教信仰为服务目的的。教会文化底色衍射的色彩所呈现出的大气通过文字渲染给世人，“执信”的出版理念通过阅者阅读的“恭默思道”和“区字潜移”等出版的宗教情结移植给读者，销蚀读者本有的传统文化的免疫力，最后是信仰的大同？似乎教会文字事业的宗教情结的“终极关怀”在于“牧灵”，在于执握上帝之笔书写一纸基督蓝图？是为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难破之谜。

第三章 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全维向的透视与架构

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所表现出的内在的结构特征与存在状态已经随时间的湮灭而显得模糊不清，从这些文字的遗存中我们试图寻找一些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不完整的内部整体。从各个方面来讲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都有着与世俗新闻刊物的区别，特别是我们从横向的对比中发现的这种区别更为明显。所以从基督教文字出版物本身出发所进行的肢解透视与重新架构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也具有了学术探讨的必要和价值。本章从教会文字事业的经济来源、刊物的编辑、刊物的文本制形、刊物的发行和刊物的出刊宗旨等几个方面来试图理析整个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的特殊与一般。

第一节 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教会各类文字事业的经费来源

中国基督教会由于有差传教会的介入，所以在经济上往往陷入难分难解的差会拨款与中国信徒捐输之款的口笔讼案中，直到差会来款的用途有了明确规定，这桩纷讼才有了阶段性的公断。而在教会各种社会事业中属于并不是十分举足轻重的文字事业的经济收入与开支则完全成为教会财政的配角。

一般来讲，各类文字出版事业的经济来源有三：一、教会（差会）当局的拨款（包括教会内资金的第二次重新分配）。文字出版事业作为教会比较重视的四大社会事业（医疗、慈善、教育和文字出版）之一，所以教会一般均有相对比例的款项划拨。教会直属的书局、报刊等由于属教会直辖，对教会工作相对重要，所以拨款项也较为充足。属于教会附属机关如学校、青年会、医院等所办的文字出版事业与教会关系相形较远，又由于这些机构在行政上的管辖，所以其文字出版事业的经费多由附属机构在机构内划拨，经济来源相对狭窄，这决定了附属机构的文字事业多出现反复，甚至有仅出一刊而由于经费问题停刊的。但是一些有相对稳定经济来源的附属机构除外，如一些有经济独营能力的学校、医院等，还有青年会所采取的会员缴费及开办商业活动等。这些机构虽有相应收入，但与教会的福音宗旨可能有悖，过多地参与了社会经济活动。在这里经费划拨的不同情况直接间接地反映了直接划拨经费的文字出版事业，与附属机构的文字出版事业两者以文字所表达的对基督信仰的不同浓度。一般来讲，教会重点拨款的文字事业，信仰浓度较高，两者成正相比例。教会附属机构的文字出版事业的经费与教会之间有一

层行政管辖的过滤器，所以信仰浓度也大大打了折扣。教会当局的拨款受诸多条件的限制，例如该年教会的捐输收入、西方差会来款、其它机构当年经费比例大小等等。刊物所辖主管行政机构的拨款补助对于刊物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协大青年》第一年经费由学生会出，校当局‘帮点忙’，第二年校当局由全年四十元的津贴达到六百元的津贴，发行量开始是 500，后来增到 750，再后来 1000”⁽¹⁾，《协大青年》事已经足具代表。

各类文字出版事业的经济来源之二是社会各界的捐款，一般讲，发行量越大，影响越大的刊物接受捐款就越多。一般刊物由于经费不甚沛足，所以常在刊中刊登募捐的广告。对于刊登募捐启事这样的措施，在福建教会刊物中已经成为普遍，并且所达到的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教会而言似乎总有乞钱之嫌。《闽南圣会报》甚至于有这样的“启示”：“望爱主兄妹，慷慨解囊，其认捐五百元以上者，则聘为本报董事，苟力有未逮者，亦可随意捐助”⁽²⁾。该刊还一度发起捐助该刊的“一堂一万运动”（一个堂会捐助一万元的口号），以此来鼓励地方堂会勉力捐助，并在该刊中肆言渲染该运动，可谓把劝捐发挥到了极至，收到的捐助款项比较稳定，效果颇为可观，以至于该刊有实力“扩大篇幅，充实内容，增印报份，添加稿费”⁽³⁾。《协大学生》属教会学校学生自治会所办刊物，除校方教务处津贴五百元以外，尚有社会商业机构的捐助：“隆丰等赞助六百元，福光公司等赞助四百元”⁽⁴⁾，此次捐助已足够出版一两期之用。基督教背景的文字出版事业所得捐款不仅是由教内信众出于信仰支持而进行的捐助，而且是由社会上其它无基督教背景的个人、商业及其它机构所力行捐助的。社会各界的捐助，并不是不竭之源，大多带有很强的分散性、偶然性等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所以并不能成为基督教刊物的可立之基，只能作为文字事业的经费补充。

教会文字事业的第三个经费来源是刊资。最初教会出版物由于宣教布道的需要常常把文字印刷品免费赠送。赠送的出版物数量不能过多，否则教会则重压难以堪负。所以随着宣教规模的扩大，免费赠送渐渐变为略收刊资以保证成本，刊资成为文字出版事业又一稳定收入来源。一般来讲大多刊物仅取成本，非赢利目的，宣传颇见热心（如果专以射利为主的话，这种经营信

⁽¹⁾ 《协大周刊》第四卷第二期

⁽²⁾ 《本刊启示》载于《闽南圣会报》（续刊）第一期 民国 33 年 7 月 15 日出版

⁽³⁾ 蔡重光：《再谈‘一堂一万活动’——石码堂会倡导于前，漳州堂会急起直追，漳中会堂不让专美》载于《闽南圣会报》民 33 年 9 月 15 日出版

⁽⁴⁾ 《编后语》载于《协大学生》（生活特辑）1943 年春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学生自治会学术部编

仰的“商业”活动的赢方会是谁，答案则很耐人寻味)。但是刊资收入作为正常的资金来源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时常表现出不足和滞后。刊资收入的不足是由于教会当局对于以文字宣传福音热心的敷衍，这又使得教会疏于制度规范的健全，所以致使教会刊物在刊中登载催收刊资的启示，词语颇形无奈。特别对于连续性刊物和一些未筹常费的刊物而言，此笔资金尤其重要，刊资的拖欠更是雪上加霜。教会文字刊物由于内容的限制发行量有限，所以许多刊物多主张薄价折扣售书。这样的销售措施所产生的结果对教会而言是成全了发行量和信仰宣传，牺牲了教会的经济为前提。《奋兴报》在该报中刊“购报者注意”：“购至十份，九扣准收，五十以上，减取八折，报资先惠，邮票亦可”⁽⁵⁾。《闽南圣公会》的折扣优惠办法较之《奋兴报》过之不及：全年十二期定价五十元（邮资在内），五份以上合寄者八折，十份以上合寄者另有优待方法⁽⁶⁾。教会刊物折扣的具体数额还可以详见下表所列《福声月刊》的折扣与原价的比较。在信众读者不普遍的情况下刊资折扣措施的采用并不失为一种适宜之选，有利于刊物的宣传。刊资虽可作为出刊的保障资金，但订刊的惯常是先寄书后纳资的方式，先进行信仰的消费后付帐，读者旧年欠下的刊资、报资在在皆是，对之的追缴声明以促款的事情多见诸报端。所以无形使刊物常处于经济拮据无法赴梓的尴尬中。又由于所收报资力求低廉，只及印刷费之一部分，所以编辑人员的工作只能为信仰尽义务，而无薪酬可计。从而保障了刊物的顺利发行，刊资等报刊收入却只敷抵印刷费之用，如果没有捐款和教会当局拨款支持则很难发展。教会当局有时还会直接插足刊资收入，使之纳入教会财政统筹，脆弱的教会文字事业更显局促。《福建教区月刊》的刊资由教区会计处接收，刊社则直接向教区议会负责，刊物无论从资金还是编辑上很难独立成为教区的附属。刊资收入存在的上述问题对教会刊物的制约是负面的，所以也决定刊社不能将之作为发刊的资金依凭。

三种经济来源是教会背景下文字刊物的三种主要经济收入，比较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此外还有许多刊物也采用缴收会员费的方式来敛资。《福建文化》作为协大校方所办刊物学术性很高，读者群相对有限，又由于作为教会的二级间接机构，失去教会的支持热心，所以只能自己筹划经济收入。其所采用的会员制收费方式颇具代表：“加入本会（福建文化建设协会或福建文

⁽⁵⁾ 《奋兴报》中华民国二年三月十四号 第六年第一期

⁽⁶⁾ 《闽南圣会报》（续刊）第一期 民国 33 年 7 月 15 日出版

化研究会)为会员,付予会费全年八角,否则恕不赠阅”⁽⁷⁾。该刊收入的前提之一是身份资格阅读,之所以有这样的限制是因为该刊此时已颇具影响,又由于其学术专刊的性质而没有信仰的丝毫内容,所以读者群相对集中。会员制的资金收敛措施还见之于城市和学校青年会所发行的刊物、教会附属组织如宗教教育会、平信徒组织、基督教教育会等组织的出版物,所以会员制的会费缴纳方式可以说也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教会刊物的所有资金来源方式中,个人资金对刊物的举办始终未见端倪,个人独资或合资的刊物很少见,个中原因,似乎与基督教刊物的负赢利有关,别不赘述。

文字事业的收入之源虽有多端,但其开支却颇形相似:印刷、纸张、油墨、邮寄费、什物杂费以及部分聘请编辑的薪酬。教会刊物和世俗刊物一样有许多的支出是付与原料购买和邮寄等支出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世俗刊物大多的经济支出是付给编辑和印刷等工作人员的新酬,而教会刊物中,编者薪金却时常由于是义务为灵工作而不计酬劳,所以省却了此笔支出。这里所列的是圣公会《福声月刊》一年中四月至十二月共计九期的收支明细,可以对问题说明一些:

收入数:

地区	份数	全年价格	定期折价
闽侯	91	27·80	19·20
福清	48	12·00	7·47
高山	39	11·7	7·33
连江	48	14·40	11·18
罗源	50	15·00	11·25
宁德	37	11·10	7·25
福宁	37	11·10	7·88
古田	76	22·80	16·98
古东	28	8·40	8·30
屏南	24	7·20	5·10
建宁	54	18·50	12·15
莆田	41	12·80	9·28
仙游	30	9·00	6·75

⁽⁷⁾ 《福建文化》第二卷第五期

外埠	14	3·30	3·60
赠送	39		
总计	651	186·60	130·67

注：份数单位“册”，价格单位“元”

开支之数：

期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第九期
本数	500	500	620	650	650	650	650	670	710
印价	42·7	38·44	31·45	34·55	36·80	39·80	44·50	35·54	42·00
邮费	4·86	4·71	4·66	4·30	4·10	4·20	4·30	4·20	5·10

注：本数单位“册”，印价和邮费单位“元”。印价一年总计 340·28 元，
邮费一年总计 40·45 元

收支总数：

应收之部：	报价按九期折算	130·67 元
	林特幼君广告费	12·00 元
	福清广告	2·75 元
	以上三条应入：	145·42 元
付支之部：	九期印刷装订费	340·28 元
	九期邮费	40·45 元
	付邮挑工九次	1·80 元
	包报牛皮纸	12·00 元
	电报费	73·74 元
	以上共用	468·27 元

从以上三表根据福声月刊社 1931 年 2 月 31 日公布的刊物一年帐目（该年发刊九期）制作来看，这里可知《福声月刊》一年里刊物的发行情况及其经济收支情况：收入相抵实亏大洋 323·1 元。在明细中可以看出：报价和广告费是收入的大宗，印刷装订费、邮费、电版费是开支的大宗，两者相比

并不具相应的近似比例；定期折价使本来昂贵的成本上又凭空多了许多亏欠。由于该刊是圣公会福建教区的机关刊物，所以教会对其的扶持主要是划拨专用款项以抵该刊的亏数。《福声月刊》做为教区机关刊物，所受到来自教区当局的青睐是其它非直属刊物所不比的，所以《福声月刊》可以连连亏空，而其它刊物却不得不费心思于自筹资金，以免破产停刊之虞。这里的经济状况说明只是《福声月刊》一家的，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基督教刊物经济状况的普遍共性和特殊个性：收支的普遍亏额是由于刊物的非赢利性导致的，从更深层次来讲，假如基督教刊物以赢利目的来操作，那么它能走多远？所以亏额是正常的，否则就是为异常。教会刊物的经济除非来之于教会当局的支持，否则就有朝刊夕停之虞。教会刊物的折扣定价，实际上是在变相宣传信仰，代价的抵偿是否等值则很难评述，因为信仰和货币很难站在相同的天平托盘中，失衡的情况是正常的。福声月刊社就九期的发行来看仅折扣一项就年亏额近 56 元，当年的收入之数也不过区区 145 元之数，谁赚取了此数？有信仰的阅读者？信仰的价值兑换的是不是这样的价格？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如果《福声月刊》一家还不够说明问题不够代表性的话，我们这里又选取了同样是圣公会机关出版物的《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月刊》一年的经济状况，统计却很耐人寻味：

教区月刊款收支报告（根据《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 29 界议会报告书（1939 年）》列表）

收入：

承去年结存	185 · 34	总款来	549 · 96	刊资	215 · 3
文字布道款	221 · 53				
		共计收入	1172 · 13		

支出：

主笔薪金	288	印刷月刊十二期	387 · 2	邮费等	56 · 3
津贴印刷袖珍日（1938 年 40 元，1939 年 30 元）		70			
		共计付出	801 · 5		

收支相抵尚存 370 · 63

教区月刊的经济状况由于有较充足稳定的收入来源，规模又不大，所以尚能做到收支相抵后的赢余，难能可贵。但同属圣公会的《福声》就显的拮据

据得多，“（由于）订阅者从无现款，故此项巨数，不得不由私人尽先筹垫，且今年（1933）刊资增价，其款额照旧有加，倘不预备现款订阅，则筹垫更多”⁽⁶⁾。福声刊物的刊资还要由编辑私人垫付，刊社并无现金支付，可见刊社的经济尴尬情况，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原因只能通过上述数字来说明了，对此本文作者也只能揣测而不是肯定，况且自揣的结果也未必如读者愿，所以问题的遗留比问题的不科学解答更好，本文采取遗留问题的方法。

教会背景文字事业收入三个主要源头的分散性、不确定性很难保障刊物发刊的持续性。支出款项又多与会外商业印刷机构、邮政机构相联系，多受商业牟利的影响，所以支出款项的大宗是必须的。因此也造成了各类文字事业的入不敷出。大多刊物对该刊的经济收支情况都讳莫如深、遮遮掩掩，如《福声月刊》这样以透明态度刊布收支情况的很少（该刊也是为了向社会募捐，所以往往只刊出亏数年度的情况）。大多刊物除了有自己的刊社会计财务机构外，还要受刊物所属机构的会计财务当局的管辖，双层的财务管辖模式内部的繁琐也是经济收支难以公开的原因之一。这就使我们对教会背景里文字事业的整个经济状况难以透彻，多存疑问的遗留。

第二节“灵程随笔”：“上帝之笈”的代笔者

——基督教各类刊物的编辑者及其编辑过程

教会各类出版刊物编辑人员的选聘及其编辑过程，均有其刊物性质和宗旨要求以及教会当局的背景影响等特殊性和特殊性，共性难求。但就各个刊物的出刊目的来讲，刊物的编辑过程却有再明显不过的目的：为信仰服务，这种服务包括隐性的服务和显性的服务，所以从信仰本质上来说明教会文字的编辑不失为文字宣道的便宜之策。

一、“上帝”之选：编辑人员的选择

教会刊物编辑人员的选择条件之一（也是最基本的条件）便是信仰的热忱和坚贞，这无疑于说是对上帝的选民之选。他们对信仰的重要不亚于传教士的身教口传，更何况他们中的许多本职底色身份便是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和后起的中国神牧人员，编辑工作只是兼职，所以从信仰上来说教会背景的刊

⁽⁶⁾ 《本刊第三卷之卷头语》载于《福声》第22期 民22年1月1日 1933年第3卷第1号

物编辑者宣扬宗教应该不成问题。但也不能排除一些对信仰的游离者，这多出自世俗化很深的社会时政类刊物的编辑上，否则在教会范围内教会当局的影响以及编辑身份的制约决定了游离的不可能。

从早期入闽的传教士所办刊物来看，这时期的刊物多由传教士个人所办，编辑人员一般由传教士本人出任。他们对出版工作的态度是既将之作为一种宣教手段又作为一种本职工作，传教和编辑之责不分，又加之早期教会人员有限，所以更难说有责任之间的明确分工。所以一种刊物有一贯的神学色彩——传教士（编辑者）很强的个人自由神学色彩的宗教意识和早期传教士个人对中国文化风俗的很强的肇始认同感，以及其对基督宗教的无限热忱。

早期教会刊物的草创时期大致经历了由西人为编辑的英文刊物时期和西人与华人合编的中文（包括地方腔罗马拼音字）时期。早期刊物的另一特点是：与教会的关系密切，属教会的直属，待教会机构健全之后，教会刊物也随之健全，包括编辑人员的不断专业化的分化，刊物的规模也相应扩大。早期来华的西人办刊者身份既是神牧又是刊物的编辑人员，身份的双重决定了刊物编辑者世俗和神圣两个职业特点。《教务杂志》与裴来尔（又称惠勒即 *Wheeler, Lucian Nathan*）及美以美会、北长老会的关系；《教会使者》与柯林斯及美以美会的关系；《少年友》与传教士的关系；《郇山使者》（*The Church Advocate*）与李承恩及美以美会（卫理公会）；《闽南圣会报》与教会神职人员及闽南圣教书局和教会的关系；《福音新报》（*The Glad Tidings*）和乌尔斯通的关系；《厦门报》和傅民的关系等等即是其中的显例，编辑个人、早期教会和刊物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是扑朔迷离，其中的圣职和世俗的态度和目的职分更是难断的讼案。

早期外人在福建的出版物，内容主要关于三个方面：商业、时闻和宗教，其中宗教内容的刊物数量为最。刊物的编辑多由西人执其大者，即便有中国人参与也属编辑的陪角，即使是这种陪角的身份也多由地方的名士和国籍文化信徒来充任，信仰意识相当浓厚。但有意思的是早期刊物中宗教内容的比例显得相当耐人寻味：宗教内容在大多刊物中不居半数，而时闻内容和教会文化与地籍文化风俗的争执（或者说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慎和挑剔）却占了相当的分量。《清英教会报》载“圣教仪文”就教会的圣堂形式、婚姻礼节、殡葬礼节、别种礼节、节期规例等方面向“安立间所研究诸君各

抒所见”，并“珍稿乞寄”⁽¹⁾。如此早期教会刊物就教会礼仪和教义与地缘中国习俗文化信仰的磨合、适应作为该时期编辑的原则之一，相当受传教士重视，所以内容分量很多。早期教会刊物编辑人员由教会神牧来组成，并且刊物从开始创办就有中国编辑人员（身份信徒和非信徒各半）参与（英文刊物除外），《华美报》的编辑人员甚至为称该报的主理为“美国进士蔚利高仰之甫”，副主理为“中国茂才黄治基尧臣甫”。此时期教会出版物的编辑人员既是编辑又是发行、印刷等事务的杂务工作人员，一身兼数职，所幸刊物规模尚小。

在传教差会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国籍人士参与编辑的现象，随着教会（差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出版文字事业的相形扩大，越来越多的国籍知识分子参与编辑活动，甚至刊物的绝大多数篇目都是国籍文士的作品，传教士在文字编辑事工中的作用相对减小，主要集中在对教会文字事业的行政领导上。以至于民国前后教会文字事业则主要由传统和西学知识化的信徒来操作和编辑，这些中国文人多出自教会学校或在教会学校任教，对基督教有很深的信仰情感。所以说来教会文字事业有着一贯的出刊宗旨：信仰神学的宣传，不管这种神学是西教士西方背景的，还是中国文化孕育的中国神职人员所持的中国神学，总之到民国前后教会的刊物出版则以中国编辑为主，西人反成为陪角，甚至在大多数刊物中根本找不到西人的存在，这也可说是中国教会自立的一个方面的体现。《清英教会报》的编辑人员是“施埔广学书院华会长黄君芬芳”，此时由于教会中华人领导者数量的聚多，文字事业的兼职也多由华人来掌握。“社长、职员担任义务，十分热心……编辑主笔陈君韵仓按时势以立言，珠圆玉润，永春曾君秀山，仙邑杨君继明，林君书玉等诸访员尽职可嘉”⁽²⁾，此中所列编辑、访员均为国籍人士，并已显见编辑经验，而该报的创始却由西人为肇，尽管此时西人尚在中国主理该报，但已经把文字事业的编辑操作权放手给中国编辑人员，个中原因大概是出于文字宣传中文化适应的需要。文字编辑虽由华籍人士来做，但文字事业的帐目管辖权的转移却是很晚的事情，西人对文字事业赖以存在的经济命脉的掌握却相形绝对，因为早期文字事业的费用主要来自教会（差会）的津贴和圣书会的补助。“华美报黄艾庵先生与蒙，虽多事关心，亦不敢忽于华美报，盖此举大有关

⁽¹⁾ 《清英教会报》第19册 丁未七月 1907年9月

⁽²⁾ 王佐材：《奋兴报稟单》载于《美以美兴化年议会录》（第21次即第13次正年议会录）1916年兴化美兴印书局活版

系于中华也，吾甚感诸君之见谅，吾才于月报也”⁽³⁾。已脱离编辑业务的蔚利高一直对文字事业情有钟集之意，还一直紧小于华美报，“不敢忽于华美报”，认为“此举大有关系于中华也”，从而反而又加强了对该报的掌握，并出任教会文字事业的干事，对华美报进行管理。

不管是由华籍知识信徒还是由西籍传教士来充任编辑，教会文字事业的编辑工作都表现得和世俗刊物一样受诸多方面的限制，人员的变动是其一。“本刊 1944 年一至三期由于会吏总代编，四至六期由郑永庚牧师代编，七八九三期中美（江中美）接编，十月间福州沦陷遂告停刊”⁽⁴⁾，主编人员的变动不居造成的后果是隐性很深的隐患：神学意识的不连贯和编辑业务重复培训使磨合周期加长。编辑人员工作多是兼职，所以经常会造成编辑时间的被挤用，编辑工作也因此而滞退出版：“惟因（编辑人员）时间精神均感不敷支配，以至今始出第三期而第四期尚在印刷中。”所以《教区月刊》编辑要求选用专职的神学人员来担当此举：“至于质之方面，最好能有曾受神学训练道德学问崇高的之牧师负责主编，庶能提高内质，万一未能此目的则恳指派牧师二三人担任讲道及圣经解释或研究各一题，如需刊登时事，则亦恳指定编辑时事负责人，按月撰稿，至各地负责通讯员亦请钧会选派充任”⁽⁵⁾。虽然此次编委会组织之后曾经正式集议认定必须有专任总编辑一人，以负编辑责任并请会督指派，然限于经费与人才故，是以未获实现。所以由于编辑人才的短缺，一旦一个熟稔的编辑人员离职则会造成刊物的暂时恐慌：《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通讯》（华南版，后又改称福州版）编辑主任陈兆恩，又任华南区文字事业干事，尚未就职即“蒙主召归天”，“致使重要事业乏人主持”使该刊“陷于停顿”，幸旋即又重新组织编辑部，才使工作正常进行⁽⁶⁾。教会文字事业的核心所在应该是编辑人员，而教会各出版机构由于采用的是编辑义务工作制度，无津薪可拿，所以此项重要工作往往会有“不经意的”怠工现象和相互推委的现象，问题的解决主要靠经济的补充，否则编辑的工作则会一直“不经意地错失”下去。教会文字事业的管理和编辑人员的选择

⁽³⁾ 蔚利高：《福州连环报单》载于（英）萌为廉等编《英以美福州年会录（第 27 次）》光绪 29 年（1903 年）

⁽⁴⁾ 《福建教区月刊社报告》载于《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 35、36 届议会报告书》（1945—1946 年）民 34、35 年

⁽⁵⁾ 《福建教区月刊社报告》载于《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 35、36 届议会报告书》（1945—1946 年）民 34、35 年

⁽⁶⁾ 《力会督召集文委会会议决出版华南版卫理通讯》载于《卫理公会通讯》（华南版）发刊号 民 32 年 9 月 15 日出版

是没有分开的，甚至与刊物的经济管理都是在一起的，所以西人面临着经济的集权和编辑的放权这样一个两难，最后不得不把经济管理设立专人负责，意图对刊物的控制长久。

二 神学选择：教会文字事业的编辑过程

教会编辑过程与世俗编辑过程的异象之处和同象之处同样多。早期的教会刊物经历了从个人编辑到集体编辑的这么一个过程，同时也经历了记者加编辑两重身份于一身到记者和编辑职能相分离的过程，过程的时间分野则是模糊的，大致在民前后这种编辑的举措已经颇为完备。民后教会刊物逐渐由国人编辑，同时教会文字机构又相当健全，各教会（差会）相继成立文字委员会设立专职文字干事，负责教会文字事业的工作，当然文字工作的重点是刊物的出版，特别是刊物稿件选择的编辑过程更是文字委员会着力的地方。下面谈一谈教会文字编辑的特点。

教会文字出版物的稿件来源与世俗新闻机构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优点和缺点并在。教会刊物的稿件在早期多出西人编辑、撰写和转引他刊，所以内容不足以成就广大信众的信仰之需，大多稿件往往集中于时政和经书的解说，内容相当单一。行之后期，各种刊物不断健全，编辑和记者职责相分，稿件内容也相形丰富，相比较而言信仰的浓度比也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卫理公会成立了“新闻文字布道处”使刊物布道有了机构专责依据，并“请各牧区同工，并热心教友及神学生多写作短篇布道材料，以供新闻布道处采择应用”⁽⁷⁾。这里指出了教会文字出版稿件来源：多来自教区范围的各机关和教会当局。“请教区主任及牧区主任每年最少四次将本区本堂教会情形或特别新闻寄登卫理（报），”这里连每年负责几次撰写的任务都详细规定，可谓不愁稿件之穷。同时还要求男女信徒也要有相似义务：“请男女布道士及本地平信徒一律拥护本报（卫理公会报）随时投稿。”不仅于此，还要求“年会男女学校校长教职员时寄学校新闻及弘篇巨著以光篇幅”⁽⁸⁾。教会当局这样收敛稿件的收效是显著的，从早期教会刊物所载内容来看，早期教会刊物的编辑稿件来源也主要来自各地神牧信众的“惠赐”，并且“各公会信友不

⁽⁷⁾ 《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福州年议会第七十届卫理联合第八届年会录》（1947年）民36年11月11日至16日 福州中正路环球印书馆承印

⁽⁸⁾ 《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福州年议会第二届年会录（1940）》民29年（12月4日至8日）福州观井路中华印书局承印

分畛域时惠鸿文”，这些都是编辑稿件的范围⁽⁹⁾。在向教会辖域内征稿的同时，各刊物还在刊物上登募稿的声明，但是同时又规定“（来稿）收登与不登概不覆”。对于稿件，大多差教会实行的都是在教区内设立专责通讯员负责向机关刊物投稿的制度。《福建教区月刊》举编辑委员会由“召集员”一人负责召集，并从委员会外推举编辑，各支教会的通讯员公推各支会会正担任，会正负责投稿事宜，编辑委员会负责组织主持编辑事，“各区支主任牧师、各校院、各机关首长任消息刊物负责通讯员”已成惯例。《福声》在各县设有对该刊负责的投稿员，并要求负责的投稿员“不论长篇、小作、会闻、记事，务于每月20日前寄到，以便编辑”，各地投稿员对刊物的责任不亚于编辑。《剑中青年》“一切作品概由本会会员自由投稿”。《金声月刊》每刊均“等待所约投稿诸君来稿”，来稿主要关于各地教会消息、各类演说稿等。从上面可以看出教会机关刊物的稿件来源与世俗刊物比较，主要在于教会稿件来源的制度化，而世俗刊物则多以专业分类之的来稿自由化和约稿的规定化相结合的方式。两者相比，教会刊物当不致短稿，但事实上是教会刊物由于神学信仰和教会新闻范围的局限，往往出现稿件不足敷用的现象，甚至于因稿件不足而闭刊的也有。早期福建出现过的英文刊物停刊的两个原因即为：读者群小和稿件告短而停刊。“本刊（《卫理公会通讯》）材料贫乏，尤以会闻一栏甚感贫血症，深除以下提案中请各牧区主任牧师均负责通讯员外尚祈多惠救治之方”⁽¹⁰⁾。短稿现象虽不尽普遍，但时常表现得断断续续，稿件不甚集中和充沛，所以教会刊物采用这种教区负责人稿源制度。除此之外，各教会还采用专门专件负责的方法，宁德支区议长向福建教区月刊社提举犹太人消息记者一人，负责供给关于犹太人之消息；福建教区月刊社向福建教区议会提举国外会闻记者一人，负责按期供给国外会闻⁽¹¹⁾，这样的新闻源分工相对于普遍征稿更有稳定的保障，相对于支会、区会负责人稿源制内容更为集中，也是新闻现代化的趋同方向之一，所以可以暂时弥补稿源短缺的状况。不象世俗刊物，教会刊物来稿刊发后，酌以该刊或其它书籍酬谢，无稿酬，有时营营小利也会让神圣信仰因短稿而蒙尘。

稿件的各种稿件来源制是编辑前的首次神学选择，稿件集中后的编辑过

⁽⁹⁾ 《华美报》第36册 光绪庚子年十月朔旦

⁽¹⁰⁾ 《卫理公会通讯》（华南版）发刊号 民32年9月15日出版

⁽¹¹⁾ 《福建教区月刊社报告》载于《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32届议会（特别会）报告书》民31年3月

程是又一次的神学选择，这次选择过程是由编辑的整个程序来完成的。由于教会是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层次，所以教会出版物的编辑在“酌增删，以符篇幅”的编辑活动中主要选择与教会信仰宗旨不悖的篇目，对一些内容的删留则有很大的保留。在各类的编辑发行工作的编辑设置中各种校刊的设置最为健全，分工最为细致。以《协大新潮》为例：该刊设有宣传部主任、编辑主任、编辑、发行主任、发行、顾问等职，事有专责。《奋兴报》职员、社长、副社长、干事长（若干）、干事员（若干）、经济部长、发行处总理、编辑员、督印员、校对、访员（若干）等热心公益，担任义务。众多事务中与信仰最直接、作用最关键的是编辑和编辑员的作用。他们工作的效率决定刊物的出版周期，《金声月刊》因该教会正赶筹青年团成立及新堂落成种种筹备，是以推迟付印，此种现象繁多。该刊所编辑的刊物内容，除各地教会消息、各类演说稿外，该刊还刊布一些公告、启事、转载他刊一些文段。其次就是编辑者和记者的文论、谈丛，这里的记者身兼两职，黄葆真既是该刊记者亦是编者。该刊出版周期短、载量较大，但所有的编辑工作只有两个人来做，一个总编辑和一个记者，而这位总编辑又是金井教会的神牧、负责人，“辅灵”工作相形繁重，所以刊物的发行常因编辑滞后而推迟。除由教会组织推举编辑外，许多刊物还聘请有文化基督徒来充任编辑。卫理公会华南文字事业委员会决议组织编辑部，外聘有协和大学的多位教授，进行文字编辑和稿件的选用工作。《福声》月刊有自己明确的编辑主张，称为“十不主义”，不妨全文录下：（一）不离旨；（二）不抄袭；（三）不转载；（四）不合刊；（五）不间断；（六）不阿谀；（七）不登载他机关之通告；（八）不登别教会事；（九）不空白；（十）不交换。（载于《福声》第三十三期《殿刊词》）在这样编辑主张的支配下，编辑实践的操作无疑使这次的神学选择尽可能地保持了派别的纯正性，也加强了教会内部的信仰意识。

神学意识的争执及选择体现在教会文字编辑中往往是以稿件的多寡来决定的。青年会刊物《动声》由福州各校会轮流举出编辑来担任，意在避防“偏枯之虞”。但并非每种刊物都愿采用此法，《福建教区月刊》就明白说：“本刊系就圣公会立场而编辑，凡欲明白圣公会之情形者不可不阅”⁽¹²⁾。刊物中稿件的寡少和涌多关系着很严肃的神学选择，另外时闻内容的简化或略刊，然而同时又多刊名牧经坛、论著，这也是一次神学选择。当稿件拥挤的时候

⁽¹²⁾ 《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月刊》第五卷第十二期 1938年12月15日

则会有“本期稿件挤，有许多佳作或仅刊一份部，或竟完全未刊，敢乞惠稿诸生原谅，容日后陆续发表”的礼节性话头的出现。编辑的选择是整个出版活动的核心，神学的宗旨是编辑者可依恃的质地态度。如上所说，编辑的活动是意识的选择，所以各个刊物对编辑的选择也很慎重，委员会或文字事业部门等集体编辑活动可暂时解决编辑的一些偏颇，但不是根本的解决。

教会文字出版的另一特点是多有专辑形式出现。各个刊物由于受稿源、编辑人员的限制，刊物多采用较为节俭的编辑措施，专辑形式的稿件集中便是其中措施之一。甚至在各种神圣的宗教节日，各种辑刊就更成为相关文章的辑子。编辑过程中对相关文章的集中多以特刊、特辑和专号的制式出现，这样内容往往集中在会闻和神学讨论上，相应时闻内容则成为不选，往往造成新闻时效的拉度，所以编辑往往会有“曾经计划出刊，惟所有稿件已失时间之性”的遗憾。各刊每期均有相应的计划，但计划的执出则随着时情的需要而显得有心无力。“第六卷原以解释周年圣节之意义为编辑之旨趣，虽然各期编辑时与原拟计划颇多相左，但因得诸位圣品人惠赐适合于节期之讲经，亦颇能得社会内外人士之爱护”⁽¹³⁾。各期相关内容的集中看稿件的多寡，多则施行辑刊，少则采用以神学论述和讲经来填补不足，神学内容相形增加，对信仰的宣传相形加大。是为教会机关刊物的一个特点。

教会文字事业的编辑人员和编辑过程的特殊性完全取决于教会的神学信仰。对编辑人员的选择原则是以对基督的信仰与否为首要前提，所以编辑多出神职人员和知识平信徒来兼任或充任，神学意识随之演化成文，不负教会谆谆以嘱或信仰暗示。稿件的采用和稿件的来源是教会刊物特别是教会机关刊物更可称道的特色：以教区、支区负责人为稿源，施行定时定量的稿件“强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会刊物稿件促短的尴尬，同时也保证了信仰文字化的连续性。文章取舍标准的神学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读者群的扩大，随之的问题是教会文字事业的最终目的（劝人闻道）受到蚀。得与失难以在量上准确衡量，这是两悖问题，答案只可选一，教会选择了文章取舍的神学标准。文章的取舍不仅是圣俗之间的两悖，也是不同教差会之间神学争执的主要战场，面对这样的难题，教会采用神学争执的“搁置”措施，总体看来效果尚佳，不至于发生笔诛口伐。所以说教会机关刊物的相形稳定是编辑人员和编辑措施的一次又一次磨合的结果，神学争执在中国也渐趋

⁽¹³⁾ 《福建教区月刊报告》载于《福建教区中华圣公会第30届议会报告书》1940年

“协和”。

第三节 “上帝之笈”：教会刊物的文本制形

早期教会出版物随着时间的湮灭所存不多，其制形也无法从总体上给出一个概括性的述说，所以本文仅就所能见到的光绪后期之后的刊物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总体上来对教会刊物进行说明。

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制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别解说：外装可以从开本大小、纸张类型、装订形式、字模大小、单页和册装等几个方面来说；内制则分为文体的选用、论著、期刊、教材、校刊、宣传单等几个方面。教会出版物在制形上与世俗出版物的主要区别是：在福建地区还在刻木为版的时候，教会出版物已经在尝试从西方引进铅印活版印刷，所以在制形上教会刊物较之于会外刊物则更趋向于出版的现代化，同时还略微带有西方出版物的特色。

一 “表为象”：教会文字出版物之外制形

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开本大小一如会外出版物一样毫无统一的必要，各刊以自身内容的多寡来决定开本的大小，由于教会刊物稿件的多寡随着时段而有所不同，所以在规定了刊物的开本大小后经常会发生开本大小不变而页码时常变化的情形。早期的教会刊物《椰山使者》报“约是 16 开本、二十页的小册子”（由于材料的阙如，该报原件已罕见，此处所说开本页码规模也是因因相传，有传讹之嫌）^①。教会刊物的开本一般以 16 开规模为主，特别是教会学校的刊物多是如此，但教会刊物的开本大小又往往不太一样，同样是 16 开大小但有的稍宽，有的稍长一些，很难统一。另外由于民国时期纸张规制和现在的不太一样，所以很难用现在的开本大小来形比教会刊物的开本。有的教会刊物采用更小一点儿的开本，32 开大小，或稍大一些，没有定制，为应合教会印刷机构的印刷机规制的需要，开本也往往变化较大，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旦开本规模固定下来，以后则很少再有开本大小的变化，变化往往发生在页码规模上。虽然教会刊物在开本选择上与西方甚至于与中国近现代印刷开本有很大的相似，但教会刊物却也有为适应清末教内外知识分

^① 《黄乃裳传》詹冠群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福州 第 17 页

子的需要而发行的线装书似的刊物，新酒旧瓶，以适应清末文化知识分子矜持的怀旧和教会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媚和。不只是教会刊物开本大小甚至从内容上来说教会刊物都很能与世俗文化衔接，文化的衔接切口找的相当确切，衔接也相当自然，起码在清末后期来说是如此。这种刻本大小的印刷物以《鹭江报》、《清英教会报》、《左海公道报》、《华美报》等大批为例，时间多集中在1890—1910年间，民元之后则很少见，民国后则多采用稍大于16开的制形，小开本也越来越少见。教会刊物开本大小的选用则由刊物读者群的大小、出版机构实力、读者需要等若干条件的限制，所以在开本上没有达到开本大小一致的同，从而呈现出一如基督教教会内部宗支纷立的多彩性。教会刊物开本之间的协和倒不如与世俗文化机构开本的跟随更紧密一些，因为读者是面向社会和社会中的“亚社会层”——教会信众的，所以没必要在开本制形上标新立异，否则被会外异议教会人士耻为“异端”，于教会、于刊物都相形不利，所以这也是教会刊物向世俗文化的妥协或称为便宜之选，很具灵活性。

教会刊物页码规模也是随着刊物稿件多寡而定，此刊不同与彼刊，甚至同刊不同期的页码数都不一样，所以这也是较难统一化的制形问题。大多数早期刊物多为寥寥数页刊出，很象现在的宣传小册子，但由于期数相连，所以才具有“刊”的特征。中后期教会刊物的页码也很不固定，受稿件和出版经费的限制，刊物页码的变化有一定的固度。但即便是最单薄的刊物由于是宗教刊物，相关内容稿件不敷时由一贯的编辑措施可以用大量的圣经解说和名人演讲等神学讲义来充数，所以在页码上不至于少得让刊物显得过于尴尬。但也不至于过量地塞充神学内容而让刊物页码毫无节制。笔者见到的最厚重的刊物是《协大艺文》，32开教材大小的刊物每期页码均在百页以上，甚至多达二百余页，是为福建教会机关刊物之最。教会刊物的页码规模多维持在二十页左右，多寡由刊社来决定，一般来说期刊出刊周期较长的刊物页码较多，反之则较少。

教会文字出版物采用的纸张类型大体与俗世文化机构所用的纸张应该无多大区别。大体来说，会外经济充裕的文化机构印刷所使用的纸张根据机构经济状况而有毛边、新闻纸、连史纸等滥贵之分，而教会文字事业则受教会当局的态度而决定纸张的粗滥和精贵，教会经济对纸张采用的影响则随教会在什么样的时局下的经济状况来定。据笔者所见的教会出版物，纸张的采用

大多尚精，尤其是《圣经》和神学教义的专著等更形精美，多采用西方进口的洋纸、白新闻纸以示信仰尊重。而对于教会刊物来讲，大多刊物都力行把纸张选用得较好。在战争时期由于战局的影响，纸张相当紧张，所以这时期的教会刊物和世俗的刊物一样都因纸张的匮乏而踉蹌蹒跚，甚至于宗教教育会出版的《教育讯息》在抗战时采用信笺来作为出版纸底，油印出版，情形感人。但具体说来由于教会文字出版在教会诸事业中时轻时重，所以决定了文字纸张也有精粗相间的采用。教会文字事业所用纸张多来自福建内地，特别是早期教会出版物所采用的纸张多来自福建内地的土纸产地，与会外无异。内地多竹木，纸作坊很多，纸的品种也多，教会早期所用连史纸、毛太纸、毛边等均产于此，所以早期刊物出版较为粗率。但早期教会刊物也采用白报纸等西方进口纸张，这些是由福州和厦门两个开放口岸进口的，特别是外国洋行来进口的。民国后福建纸张的进口主要通过几家厦门埠口的日本公司和中国公司从日本和台湾等地进口，在厦门共有 14 家进口商行，主要有进口纸张业务的进出口商行有 8 家，所进口纸张包括印刷纸、旧报纸、蜡写纸等⁽²⁾。除了进口洋纸外（福州）福建造纸厂的纸张也是教会纸张的来源，该厂在抗战前的生产能力在国内仅次于上海造纸厂，主要生产印刷用的道林纸、连史纸、毛边纸、玉扣纸等。但是“由于当时（抗战前）我省出版事业不发达，产品成本高，洋纸充斥市场，故销路困难，……”直到“京沪沦陷，沿海告警，销路虽因洋纸绝迹稍有起色”⁽³⁾。洋纸由于自身的纸质质量而倍受青睐，美华书局在采用中纸的同时还常备有“西国官堆纸”、洋纸，中纸则随时采办“以西国官堆纸以助中纸之不及，其价较中纸约高十分之一，然其料亦较佳，故其料亦较佳故其纸颇为合用”⁽⁴⁾。洋纸和本地纸张的双源地产生的后果是教会刊物的纸地质量参差不齐，出版物由于本地连史纸等的采用，印刷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类似线装的出版品，而进口纸张的采用则大多与西方近代出版品相规范，特别是白报纸的采用。美华书局曾有多次付印西纸时“洋纸用尽致延搁多日未便即印”的情况，并且“自中东战后中纸之价骤涨，故书多刻以西纸，至于圣经则更多以西纸刻印，是故书局自兹以往须常备洋纸约值数千元之谱以便刊印各等书籍”⁽⁵⁾。教会出版当局采用不同

⁽²⁾ 《全国进出口商行要览》（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出版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Shanghai, China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directory* 中华民国 25 年出版

⁽³⁾ 任仲全：《福建造纸厂琐忆》载于《福建文史资料》第 20 辑

⁽⁴⁾ 《美华书局报单》载于《美以美教会年录》（第 23 次）福州美华书局

⁽⁵⁾ 《美华书局报单》载于《美会第二十二次年录》光绪二十四年 福州美华书局活板

的纸张受教会经济条件、国内外进口的政治环境、编排人员对刊物的重视程度等的限制和影响。

教会出版物的装订形式大体来讲不外两种：中国传统的线装和西方传入的“洋装”。线装和洋装在教会入传福建的早期和中后期所占比例份额是不同的。具体说来，早期教会出版当局多把与传统中装作为可采用的装订形式，这样就避免了“洋”和“夷”的嫌疑，也不容易被中国人目为异端，从而进行“民族自大精神上的排斥”。这是西方传教士的合宜之选：既宣传了基督信仰、西方社会生活和政治意识，又可直接参与中国文化的延续。根据作者所见，早期刊物大多都是采用右订线装的传统装订式，再结合刊物竖版文字，如果忽略刊物内容的话，几乎与传统古籍版式相形无几，大多刊物还采用连史纸单面印刷对折装订等完全中国化的装订方法。随着“西学”（广泛意义上的西方生活方式等西方与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相异之一切）的广泛、深入持久地传入，洋装的形式逐渐流行，左装、横排更方便，更易于与国际接轨和交流，否则会被国外的出版文化视为异端而难免受冷落。这是教会文字出版文化策略的第二次采宜，所以民国后的教会文字出版物已经很难见到有线装品了。由于教会刊物的出版寿命大多相形较短（不只教会刊物，世俗的各类刊物也大多如此），所以很难见到同种刊物早期用线装而后用洋装的现象，而采用洋装，刊内则竖排的式样却成为普遍现象，西文横排习惯的便宜性在传统文本制形的顽固面前也无能为力，这是两种出版文化互相妥协的结果。从文化底蕴上讲也是西方泊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可奈何的让步。作为文化思维浓度最高的出版品，文化的争执意识也最浓，文化的底色也最不易被销蚀，但文化的争执毕竟是温和的，所以教会刊物是采用中国传统装还是洋装的问题根本就不曾成为传教士们要争论的重要问题，采用中装和西装一如渠水关系，很是谐和自然。

字模的采用具体来说涉及的是刻本和铅字的字号，更具体说来，教会文字从来就没有涉及和采用过刻板印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说字模问题时只是说活铅字问题。教会文字事业作为印刷事业近代化的先驱，不只是在信仰意识上而且同样有重要作用的是在物质意义上的，铅字印刷即是显例之一。教会刊物印刷中铅字的采用最初是铸于国外、泊入国内的这么一个过程，但随着教会文字事业的不断扩大和出版事业的繁复，所以在华传教士在华籍文人和刻工的协助下自筹刻铸铅字。美华书局 1861 年创办伊始，从英国伦敦教会

处“购买了一台华盛顿式印刷机，一副双十二点中文活字模，另外还购买了一小副美国产的英文字模和字盘”，雇请工头和协理负责印务⁽⁶⁾这是所见福建最早的活字引进。到1862年除这架美国式印刷机外，只有中国自制的12点活字雕刻石盘一个。1884年购进大小滚筒印刷机、印模、华英活字、铸造图版、铜铅花边书边等印刷机装置。到1895年还在购置铅字：购日本铅字、英文铅字等。1898年又购置乐谱铅字、英文花子。1899年又买了中文铅字、罗马字铅字等，还购回英文花体字铅字、乐谱铅字，甚至在1922年榕腔注音字母的铅字还是托上海商务印书馆代铸，由汉英印书局承印⁽⁷⁾。最初的购进是直接向西方向国家，然后向广东香港和南洋一带购进，直至到后来向上海购进，问题含在里面：福建的印务技术虽起步较早（宋元时期的福建版本之滥最能说明福建传统雕版的渊源问题，这里所说是活字印刷）已明显落后于国内的广东和上海等西方文明传入的重镇。这样的购进过程一直到美华书局有自铸铅模的能力为止，甚至到后来美华书局公开打出售卖铅字的广告：“……兼置模坯自行铸造大小华英活字，品类殊繁铜铅花素围栏清明且丽所应需机件独推此完全发售……”⁽⁸⁾。教会印刷所用的活字字模自制技术一直是福建活字印刷的渊薮。教会印模的发展厦门和福州几乎同步：翠经堂（美国传教士打马字开设的）开创了厦门手工印刷业的生产，接着由木版印、石板印发展到铅印，印刷英文和白话文。这样就使得模字印刷过程更为清晰⁽⁹⁾。内地铅印字模的采用以多玛印书局为代表，也至迟在1925年5月才改石印为铅字来排印《崇道报》，相对于沿海教会则落后较多。铅字字模直接关系到印书和出版，对教会文字出品意义较大。表现在刊物上来看，自最早的刊物出现以来，教会在活印技术上一直是采用活字铅印的，这与世俗印刷业的雕版印刷很是不同，所以在铅印活字技术上教会一直是领头羊，直到民国世俗印务的突飞猛进，格局才有所变化。大多教会出版物采用相当于现在的四号五号字字体，印刷较为灵活，各种字号混合使用，排版相当娴熟，字号的安排也错落精致，排印技术相当精密。教会文字出版作为神圣世界的喉舌除了对宣传天国信仰主义有重要的精神暗示作用外，在印刷物质文明的启示和

⁽⁶⁾ 《在信仰与实践之间——福建基督教史钩沉》朱峰著（香港）汇美传意出版 2002年6月

⁽⁷⁾ 《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

⁽⁸⁾ 《左海公道报》第十八期刊封之“美华印书局广告”辛亥十月望日 福州闽北圣书会刊发 福州美华印书局摆印

⁽⁹⁾ 郭坤聪：《早期的印刷业》载于《天风海涛》第2辑 厦门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

实践上更具启蒙和始创意义，此意义丝毫不亚于神学精神的灌输，只是这样的技术灌输是西教士所没有意识和前瞻到的，因此可以说传教士是主观的精神传递者和客观的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两种身份一点不矛盾。

教会文字出版物在外形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根据宣传信仰的需要，它采取了较为多样的出版形式，具体可分为单张和册装两类。单张包括宣传单、挂图、招贴、报纸等。单张根据宣传的需要，大小规制差别很大。单张主要是未装订的散页，因为它本身具有携带方便、内容具有针对性、便于散发、造价较低、印刷较易（省却装订程序可节省印刷时间）等优势，所以它对教会宣传信仰的作用很大，是教会乐于采用的最佳宣传物。它们主要用于传道士游行布道的需要、宗教仪式用的礼赞诗歌和家庭用的招贴和挂图进行固化信仰的需要。单张的宣传作用主要集中于早期基督信仰蒙混未开、劝人入教的时候，到基督信仰“八闽同化”的时候单张就主要用于完全的神学信仰的需要了。册装包括各种书籍，几乎全部为线装，可分为封面内线装和封面外线装两种，订装很少见。封面外线装大多是早期书籍所采用的，几乎全部是传统中文书籍所采用的，早期的英文书籍和当时西方的装订一样：粘装。而早期中文书籍的装订外式几乎和中国传统的线装没有任何差别，连左翻的习惯都一样。正如上述，这是基督文化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妥协表现，也是教会文化的适宜措施。后期包括教会所出版的全部的书籍在内，均行采用西式，但不能说这是教会文化的最终胜利，因为教会板制和装订只是教会精神传播的措施而非目的，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结果，因为近代化从教会神学目的中脱颖而出，本身就具有自己的目的：中国近代化的世俗目的而非神学信仰的有神论目的。教会出版物的单册装是根据宣传的实际需要而定的，灵活性很大，所以这样的问题只能概括如此。

二 “内为体”：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内制

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内制是由编辑过程来选定的，与编辑者的关系较近，所以内制与神学最为接近。文体的选择是由原稿文字所限定的，大体分为中文、英文、中英文合用、各地方腔罗马拼音字。中文又分为文理和白话以及界乎两者之间的文白语体；各地方腔罗马拼音字可分为闽南语罗马字和福州话罗马字及兴化、连江罗马字等多种，大多集中在教会机构较为稠密的地区。

各刊根据宣传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文体，但不同文体的读者群不同，一般来说文化层次较好的读者群大多阅读的出版物是文理体，早期的期刊和书籍都属文言体，句读不分，完全适应教会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信徒需要。著名的中文刊物《鹭江报》、《福音新报》、《郁山使者》、《兴华报》等都是文理体的刊物，这些刊物大多都是早期教会开拓和发展初期的刊物，此时间流行的书面文体只能是文理，以体现教会信仰的知识性和宗教信仰的宽容与和合性。同样被早期教会出版物采用的是英文，这种文体的读者群较为固定：外侨商人、传教士、领事人员等外国在华人员和国外相关人员和研究机构。英文文体的采用具有相当大的排斥性，不仅是信仰上的而且还是文化上的。其中《*The Chinese Recorder*》最著声誉，另外有《*The Foochow Courier*》等数种，这些英文文体的出版物对教会传教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但对差会人员的神学信仰的交流作用较大。

早期教会出版物中还有一部分是采用各地方腔的罗马字，这是一种拼音字，对初识字者来讲这种文体是助习基督信仰的工具，因为早期的各腔罗马字都是由传教士对中文各地方腔加工而成的，最初的目的也是用来传教的，较为著名的刊物如《*The Children's News*》，是用福州方言榕腔文体，仅在福州发行的，另外有如《榕腔日报》、《榕城报》（罗马字版）等。还出版榕腔《圣经》、《串珠圣经》等书籍。各腔方言出版物的发行范围受囿于地方腔方言传播范围的影响，所以阅读层也相对有限。知识分子的信徒很少阅读这种“通俗”的出版品，甚至其读者也被目为不耻。早期三种主要文体都具有自己出版的针对性、读者的选择服务性，有此限制，早期刊物有几个弱点：读者群小，影响较小，发行周期较长，刊物寿命较短等。教会中后期的出版物只保留下来一种早期的文体：各腔地方方言罗马拼音字。早期采用的文体由于携生的缺点所以很容易被淘汰，特别是宣传目的很明确、实践性很强的教会刊物对文体的选择更加仔细。早期以特定读者为对象的文体刊物大大限制了基督的普世内涵，教会也很难作为，后期的刊物力避这种弊端，除了以各地方言为宣教工具以保持地方信仰的坚固，并且大量采用新式文体：白话，这是一种新流行文体，特别是民后。文体的选择是教会策略之选，是途径不是终点，最终的目的是要“八闽同风，共泽神恩”。所以教会也受流行文风的影响，否则很难成为中国文化的支脉，而只能在边缘徘徊。此一时期的刊物和书籍几乎全部是白话和文理兼用，一些学校刊物还采用中英合刊

的形式，而单纯的英文和文理刊物几乎不见。这正是教会出版物的适宜之选，是中国世俗文化的涵盖对教会信仰内容的包容，还是教会信仰的自主融入？答案难以揣度。

从教会出版物内制形出版方式上来讲大致可分为论著、期刊、校刊、教材等几个方面，严格说来这样的划分并无习惯根据，但为了更清楚说明问题，所以笔者采用这样的分类方法。在来华传教士熟悉了华域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之后，他们论著中国的专著也随着熟悉的程度而不断深化，但早期的传教士所出专著一般在国外出版或以手稿方式保存下来，而一旦中国教会出版设施健全之后，这些专著很乐意在中国出版，为续来的新的教牧人员提供自己的生活学习经验和神学理解，试图劝说其与中国文化的渗和而不是基督宗教严格的矜持。这对传教的帮助很大。相对来讲专著的神学信仰更为集中，但缺点是缺少信仰的多元色彩，呈现的只是著者个人的单元思想，有深度但缺少角度。对于早期的中国信众来讲基督信仰的接受是从神圣传说开始认知的，而不是艰涩圣经解颐和神学发幽，所以早期教会出版专著论述的传播范围较窄，阅读者作为神学思想的受众缺少基督信仰的蒙化阶段，断然的神学深层次之论说对身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文士和普通大众来讲很难替代原有信仰意识，从而并不具有信仰改宗的说服力，是为教会专著论说在早期的际遇。后期教会神学论说专著的读者群相形扩大，信仰深度也由于有了国人自主的理解，基督才开始在中国找到真正的知音，相倾心室，恨晚相逢，这时期的专著大多由国人来撰写，最为出名者如金井教会之许声炎、闽南教会之吴炳耀、基督徒聚会处（所）的倪柝声、王载等人，阐发基督信仰为国籍新神学，也就是今天所讲的基督神学的本色化或本土化。专著形式的教会文化的出版物可分为属世和属灵两种内容，一般来讲属世内容的出版品相对较多，比如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中西生活方式的比较及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风俗的只眼观察等，内容较为驳杂。属灵意义的出版品由于信仰的专注，所以阅读面较窄，因此出版和发行较少。专著以其信仰的深度而执信仰的荦荦大端，是为教会文化的精髓。

从出版的周期和连续性来讲，报纸期刊是最为重要的出版品，也是最为重要，影响最大，受众最多的一种。报纸和期刊以其本身的出版时效性和内容的广览性特别受教会职员和教会神职人员及热心信徒的欢迎。总的看来从19世纪中期福建第一份教会刊物出现以来，各教差会均有刊物刊行于世，内

容林总，形式杂复，出版周期长短不一，出版寿命也不一样，宣传的意图也各行各业，但无外两种：纯宗教内容的和纯世俗内容等属于单一内容者，另外还有世俗时政和宗教内容混载的刊物，并且数量较多。

教材类的出版物包括教会正规蒙学、小学、中学及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教材，这属于知识性较强的教科书，还有一类是完全为主日学、妇女学和成人识字班所印行的教材，内容主要是教授读者识字从而让读者具有圣经阅读能力的信仰性较强的教材。专门的学生教材用书发行量大，单就闽北圣书协会 1924 年 10 月的小学用教材第一次就付印 5000 册，由教会学校统一印刷，读者相对较稳定。“闽北基督教圣书协会的出版物主要是小学用宗教教科书及简易分级主日学课。编辑费用和印刷费系由伦敦圣书会寄来补助款，指定为编辑之用。……同时由执行委员会选举一帮编辑委员负责校订工作”。教会学校所用教材历来受教会重视，从经费、编辑到发行自行严谨恪尽职责。教会学校二三十年代立案之前教授的多为宗教内容，立案后虽有改观，但宗教内容还有相当意识存在，对国民政府福建省教育厅的“宗教书籍不得明文妄自指为‘小学校初级用’，不得擅自称为‘教科书’”的规定，1931 年 5 月 23 日经编辑委员会定把宗教教科书（共 12 册供小学用）改称为《圣经》读本，并将“小学用”等字取消⁽¹⁰⁾。由闽北基督教圣书会出版的教材使用范围很广，几乎全省的教会学校都采用这套教材。具体来看此教材的编辑和使用：它的编辑标准和细目是按照闽北三公会宗教教育要员部所拟订的，教授年龄从 7 岁开始“使儿童能认识上帝的仁爱，并能承认他”，8 岁“使儿童由上帝保护方面能唤起他行上帝的旨意”，9 岁“指示儿童以耶稣如何行上帝的旨意”，10 岁“指示儿童以古今英雄如何行上帝的旨意”。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神学启蒙，教会学校的学生对教会、对基督的亲缘关系耳目浸染，影响甚深，教会的“教材神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神学启蒙从儿童做起。

“教科书神学”的另一种类型是各种临时神学识字培训班所使用的识字教材，其中以主日学为重要。此种教材的编写由专门成立的主日学教材编辑委员会负责，并经常得到全国宗教教育促进会编辑部协助，并执行委员会之指导。该委员会所编辑的主日学课本曾被公认为“极适合各地主日学之用”，并请求全国各地主日学教员推广并提出修改意见，这部简易分级主日学课，省内外各地代售处多处，销路颇广。此书的编辑修改经过十余次并经过一年

⁽¹⁰⁾ 刘玉璋：《福州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回忆》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 月

多的研究和讨论可见神学教育的细致程度。该教材的性质和特点大体概括为：每课均根据圣经要旨，注意表彰耶稣基督生活，籍以培养读者身、灵，并基督化公民道德基础，以及必需之智识及技能；同时在比方、故事、图画、诗歌、手工等方面则尽量采用中国本土材料以便将本土固有的道德观念引到新的基督教的思想中去。该书由于信仰意识最炽，所以能得到教会大量的经济补助，因此售价低廉。其它主日学识字课本多为简单的常用字教授课本，但就《福声》杂志封4的闽北圣书协会的售书广告来看就已经包括多种：《平民千字课》、《福音千字课》、《平民千字课表加罗文》、《识字运动应用字》、《教友识字运动的初步工作》、《三字经》、《四字经》、《五字经》、《入道要学》、《平民高级课本》、《基督化与平民教育运动》、《进教初学》等数十种教材，内容主要集中在识字和成人神学培养。另外尚有数种单张多得以为十为计数单位⁽¹⁾。教会办学校和主日神学识字培训班的教材出版数量在所有的出版物中为数最多，对教会内外的影响最大。在学校立案政策规定后，神学教育逐渐由教会学校移归主日学校等非正规的神学兴趣培训班，由于该班的临时性和学生的成年等特点所以并未招致太多的非议，基督教后期神学的延续在民间完全由该类学校完成，它对教会信众基督信念的转折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也成为教会对信仰成就评判的一项重要标准。各级教差会的会议报告关于主日学校的记载在在俱是。所以说教会教材类的出版物由于属于教会内的信仰之需所以在发行上带有福利性质，无论从价格还是从发行策略上讲都受到教会的优惠，从长期的效果来看，教会教育影响已经超出了信仰意义而更具有中国近代化的世俗识字和扫盲意义，只是主观目的和客观效果存在差异而已。

教会各类学校所出校刊是教会出版物中比例较大的一种，包括学校所出各种出版物，关于它的分类上文已经有述，别不赘言，只是教会学校的刊物作为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内制在总的类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本节所要记述的。教会学校由于受立案的影响，所以在校内刊物上也有案前单一信仰宣传和立案后世俗和宗教宣传并举两个阶段。立案前教会学校的发展完全自觉，断少受世俗政治的影响，所以在内容上也以神学教授为主，这时校内较为拘谨，刊物较少，即便有也是信仰的讨论场所和学习的园地，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此时期的学校刊物极为少见，所以对之的内容讨论和研究只能暂置待补。立案后的校刊神学内容大多是由校内的基督教青年会来宣传的，而

⁽¹⁾ 《福声》第13期中华民国21年4月1日（第2卷第1期）“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八十周年专号”

校方的刊物由于受当局的影响也不是纯宗教内容的，神学宣传遮遮掩掩，而青年会作为教会组织和校内“民间”组织，具有很大的神学宣传自由，无所顾忌，甚至这种非正规组织还在非教会学校普遍设立，可见其自由之滥以及政治当局对之的无奈，宣传教会主义也在所难免。教会学校的非神学宣传是由学校世俗的一面决定的，学校宣传的是与宗教信仰有悖之可能的知识，所以对世俗知识的宣传只要不受私立的教会董事的掣肘该是相当自由的，因此教会学校的知识载体化意识并非完全由教会所能掌握的，信仰是不能强制的，也不是享受“义务教育”的。

宣传单有其自身简约的宣传特点，方便携带，便于阅读，售价较低，印刷快捷所以相当受教会当局的好看，因此在闽南和闽北圣教书局此类宣传物品种最多，数量也相当惊人。从早期简单的单张上只印“信教主吧”到后来内容十色：诗歌、圣经格言、经语招帖、证道、圈字、图画、圣经故事、识字表格、疾病预防和治疗、生活常识、祈祷卡片、标语、传单、明信片甚至教会章程也以此形式出版，内容不一而足。单张大多是以数十张甚至上百数百张集中一起出售，很类似现在拆开的连环画。单张的宣传特点是它比较接近大众生活，通俗易懂，很少艰涩，实用性较强，可反复使用从而强化信仰，也可使教外人凭此对基督有直观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大肆的发行宣传挤占了中国有限的文化空间，使民众的知识启蒙在接触本土文化的同时又接触了基督信仰，不同于专著和期刊等基督文化宣传物，单张是以自觉不自觉的无意识地进行浸染教化的，这种方式的说教是很难防范和抵御的，文化精神的基督启蒙也多来自此。

教会出版物的内外制形是与世俗的出版物相适宜的，但其中又不乏有教会出版物自身的特点：出版近代化的启蒙者和西方基督文化甚至整个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在时间上教会出版事业总是引领本土出版事业亦步亦趋而走向与西方的接轨，对本土传统出版的排挤是隐性的不易被察觉的，特别是策略性地与本土装印方式的最初磨合、铅活字的采用、版式的变化、编辑思想和方式的近代化等等都是教会文字出版对本土的贡献，也是对本土传统出版文明的潜性否定。在这种意义上来讲，不只是出版业，整个中国的近代化中教会的作用亦是如此。

第四节 “周流广布”：教会出版物的发行情况

教会出版物的发行情况本节拟从读者对象、发行范围、发行周期、发行定价、发行数量等几个方面说明。由于教会文字出版的发行也属于教会内不易于材料整理的一个方面，所以资料较为分散，本文对问题的说明可能受此限制而有所偏颇，是为不足。

一 “天国读者”：教会文字出版物的读者对象

早期教会出版物的读者多为在华的西方人和埠外西人，因为此时间段内的读物多用英文，内容也多关于商务和信仰的，该读者群由于流动性较大，数量又比较少，所以不作为述说的重点。稍迟的信徒可分为完全文盲群，这一部分的比例相当大，因此教会要想对之进行宗教教育则必需对之进行文化教育，首先是识字教育，所以这部分“读者”是奏效期较长的读者群，主要是接受口头信仰的灌输，称为口传信仰者。另一部分是文化知识分子，他们对基督信仰的过程一开始就是从接触文字出版物开始的，称为阅读信仰者，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对象也大多集中在此读者群。具体来讲教会各出版物都有自己的发行目标和自己的读者群，最主要的和最稳定的教会内部的读者群主要是包括各宣教机构的职员（包括西方差会）、各教会学校的师生、教会图书馆、阅报室、各地方教会的信徒和向道者，教会外主要是偶尔接触基督教宣传物者、与教会各机构有相关关系者以及与教会刊物相交换的出版物等。

在教会各种出版物的读者中，信友读者数量最多，由于许多教会出版物采用地方腔的罗马字，所以这种读物对当地没有受过这种文字训练的知识阶层来说是陌生的，也是不可读的，又由于教会从传入福建就创制了此种新体文字，并竭力将此种文字传教给未识字的社会下层，所以对受过这种文字的广大信众来讲，该文字就可作为接触基督的最直接的借助工具之一，此种读者的数量比例最多。美华书局曾出版数种榕腔读物，并谐请各地传道员和牧师趁年会时间购回地方会堂以便转售与会友：“兹因本会会友多不识文理书籍，故此书（《纲例撮要》）特译为榕腔以便各会友易于识用也。余（美华书局主理力为廉）劝会议（福州年会议）兄弟并诸传道等当于未别之前俯降本

书坊来购数十本，转售于其所属诸会友家中，以便考究本会撮要之条例，即为会友者所当守以”⁽¹⁾。发行这样的榕腔书籍有特定的读者群，所以发行目标相当明确：不识文理者。不独书籍的发行如此，连刊物的发行也瞄准了特定读者群的稳定性所以专门用地方腔出版刊物：“本报（《小孩月报》）特用榕腔刻成，缘教中会友不识文理者多，若诸传道阅读是报，则易于识悟也”⁽²⁾。不同的出版物均有特定稳定的读者群，地方腔读物的读者群主要是不识文理者，此读者群为数众多，各地地方堂会受过教会学校、主日等临时学校教育的小孩、成人和老年均在此列，他们被拒斥在传统的正统阅读物之外，于文理丝毫不通，甚至于基本的启蒙都没有，所以他们对传统文字宣传的佛道及儒家经典存在着很深的文化隔膜，所接受的佛道信仰也只是来自口传而非文本，而教会所创造的地方腔文字由于发音于日常，又有基本的学习规律可寻所以易学易懂，“盖男妇老小不难于数阅月内便能习读之”⁽³⁾，作为阅读工具又相当简单实用，因此很受该读者群的欢迎，这也是基督信仰能在普通大众特别是传统教育外的社会底层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但由于受地方语言传播范围的限制，该类属出版物的发行地方性很强，由于“语言式文字”的限制，发行只能拘囿于地方而缺乏信仰的普适意识和功能。“《小孩月报》分发各循环拜日学会，并设一法专售是报于上下游榕腔所能通用之处”，除了闽江上下游外，榕腔《小孩月报》的读者是罕见的。知识“浅薄”阶层作为教会信众的基本信仰群体尤其受到教会当局的重视，而劝化、固化他们信仰的有效措施之一便是为之出版浅显的地方腔文字和文理通俗浅白的读物。卫理公会兴化年会所印书籍大多“廉价售给会友阅读，使他们领会圣经要理，做忠实会友，这是应付已识字而圣经智识浅薄的会友的需要。至于一般初入教会而不识字者，则编有《福音千字课》，亦用汉罗两种版本，使他们易于学习，逐渐识字明道，达到能够自己阅读圣经而后止”⁽⁴⁾。不独此种用法，《小孩月报》还被广泛用于教会所办义塾等教育圈，使之成为信仰启蒙的教材。由于受教会中信徒识字能力的限制，教会发行物发行规模很难一蹴而就，所以教会文字出版人员有“我侪深望会友俱为读书之人”的愿望，希冀教会出版工作的繁荣，但仅靠教会基数很大的无知识之信徒还不足以有更为深远

⁽¹⁾ 《美华书局报单》主理力为廉报 载于《美以美教会年录》（第22次 福州）1898年

⁽²⁾ 《美华书局报单》主理力为廉报 载于《美以美教会年录》（第22次 福州）1898年

⁽³⁾ 《美会第二十五次年录》（福州）1901年 福州美华书局排印

⁽⁴⁾ 《宗教教育报告书》载于《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兴化年议会录》第48次 1943年

和扩大的影响，因为地方上更为有力、影响更大的阶层尚未被包括其中：知识阶层的读者相形比较，更为重要，但是受中国传统约束也最深，所以是很难袭破的信仰堡垒。

由于教会地方腔文字出版物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所以知识阶层被排除在这种读者之外，因为地方腔罗马字是教会为了信徒的快速阅读需要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但对象却不是文化阶层。对知识阶层的信众以及可能的潜在的“信众”（这部分人是要争取的，是在传统与教会文化之间的骑墙者），教会当局另有大量的文理和白话的出版物来满足该读者群的需要，而此种读物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优于地方腔文字出版物，在教会中的作用相比较而言更重要。在知识阶层的读者中传道士和教会各机构的中西人士为数众多。在美兴书局出版的几种报刊中“计能熟读报纸者传道约有过半，会友约有数百，此外或初学或已学者又多其人也”⁽⁵⁾。传道一职的资格审查相当严格，其中之一便是要求传道士要通过相应级别的教会考试，所以传道大多能熟练阅读，因此也成为教会文字出版物最主要的发行对象。教会各机构的神俗职员也是文理出版物的读者群，教会各机构职员的选任本身就是对知识文化底蕴的一次检测，所以大多职员都有相当的知识，加之教会出版机构又要求各机构的职员均要订阅和购买教会文字出版物，因此他们成为教会文字事业最坚实的读者基础。另外如社会官、绅、学各界也是此种出版物的读者。他们的身份相对较为自由，可以是信徒也可以是信仰的批判者，大多是倾向新事物的慕道者，这要看教会文字的信仰色彩在出版物中的比重。时事内容较多的文字刊物，会外人士出于新闻知悉的需要而购买读之；信仰内容比重较大的文字出版物，会内的读者占绝大多数，会外读者不与之。《奋兴报》（汉文）全年五十期约计四万号，“官绅学界教会信道诸君争先快览”，之所以受会外各界欢迎是因为该报内容主要集中于地方消息和国内外消息，信仰内容比重较小，教外人士由于该报在早期地方的新闻垄断而必需购买后读之，对于点滴的信仰内容尚能接受。早期的报刊尚有《华美报》一种，“久为教内外雅俗所共赏，……俾城厢内外以及邻迩村庄皆得遍发以广其传，此可抵一传道之功”⁽⁶⁾。此种“雅俗共赏”的读物无非是对识字的读者来说的，其中的“雅”当为教内人士，“俗”应该是社会各界的会外人士，泾渭析分的较明确。《闽省会报》“闽省籍缙绅购阅颇多”。总的说来教会发行的文理文字

⁽⁵⁾ 《印书局报单》载于《美以美兴化第五次年录》光绪 26 年（1900 年）福州美华书局活板

⁽⁶⁾ 黄治基：《论华美报续论》载于《美以美教会年录》（福州 第 23 次）1899 年

出版物大多都有相应明确的读者对象。为了向教会外宣传信仰，对内的订购优惠措施也适用于会外人士：“（教会教义著作《五更钟》）分售教外，原价每部二角半，教会津贴一角，每部实价一角五仙”，虽有此优惠条件但视其内容，其目的再明确不过了：“此中书籍足以破教外之迷信，每纸一二文价廉而益广”，宣教口吻十足。教外识字各界作为教会文字出版物的主要读者之一种，由于经常接触教会文字而受其影响从而改宗信仰的也不少见，这样教会的宣教目的也就达到了。

教会文字事业的出版品还有另外一种读者：西方传教士和教会机构中的西方职员，他们人数虽少，由于是教会各种事业的主理而足以对文字事业的前途起着相当的影响。为此，福州美华书局1910年夏“特在鼓岭开一支店，致西人避暑岭上易于采购，而书局生理更见畅旺”⁽⁷⁾。特别是一些西文书籍的出版和发售，其读者大多是在华的西人。《教务杂志》英文出版，刊物虽时有辍滞，但一直能够坚持数十年，难能可贵，原因无外是其编辑是西人，读者更多的是西人。由于该刊所登内容广泛，除涉及宣传各种基督主张的内容外，还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大量的论说，对中国的国情时政相形热心，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可读之物。西人读者群的舆论成为教会文字事业成绩优劣的重要评判标准，也是刊物差会拨款和捐助等事项的重要决定力量，所以在教会文字事业的行政上来讲相对比较重要。

教会文字出版物读者群之间的分野是相当明确的，地方方言拼音字出版物由于是由教会所创，习学者大多受之于教会，所以这种文字不为地方知识阶层所掌握，因此该种易学文字成为社会下层的信友所适用。而各界知识阶层由于不谙这种文字而很少阅读和订阅此种文字的出版物，这是读者群分野的一个原因。知识阶层由于自身所掌握的文理和白话所以选择了教会文理阅读物，但同是文理读者的阅读者，又可分为教会内信仰者和会外持异者两种读者。这两种读者群构成了教会出版物读者的绝大多数，但之间的分野往往造成了两个直接的影响：由于分野的阅读面，所以两个读者群的交合成为问题，也造成文字界面传播相对狭窄和社会舆论难以契和，这样就使受众成为宣传的牺牲品：掌握的知识是分割后的不完全信息。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阅读界面的分野却可以促成不同的单界面信仰的深化，特别是对地方腔文字的使用者来讲更是如此，由于教会地方腔出版物的内容相对集中于信仰的宣

⁽⁷⁾ 《福州美华书局报单》载于《福州美以美会第三十四次年录》1910年

传，该类读者由于掌握了各腔方言拼音字，所以对阅读相对热心，对信仰也相对诚挚，无形中加增了信仰感情。分野的读者群是利弊兼收，但对于教会目的来说，分野则更为有利，毕竟平民读者所占信众是多数。

二 “神之畛域”：教会出版物的发行范围和发行方式

一般来说教会出版物的发行很具有域化的地方色彩，除上述地方腔文字的使用之外，教差会的传教地域划分也是域化的重要原因，另外如内容的会闻较多、地方新闻较多、各地方教会文字宣传的独立和封闭及当时邮传等社会设施的限制都是教会出版物地方色彩浓厚的原因。在教会各文字出版机构的出版理念里，其出版物的宣传目的就是地方性的。在发售的过程中由于区域外也有零星的订阅者，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讲地方教会也称得上具有了大区域的广传性。早期的英文报刊由于有特定的西方各界的读者群，所以大多发行在开放的各埠和海外，而同时期的中文报刊一般也发行在本埠和其它各埠，在海外也有发售。《教务杂志》系国际联和派各差会唯一的英文月刊，主要发行面向在华各差会等。《福报》以其主办人黄乃裳的基督教背景而与基督教宣传相偕同，该报馆就设在美华书局内，内容主张维新。该报在福州城内外和厦门、上海都设有销售点，影响已经超出地方，成为当时著名的刊物之一，与其发行的广博不无关系。《华美教报》（即《教报》）售往华南、华北、华西、福州、兴化、厦门、汕头和南洋的吕宋、新加坡等地的教会，也售往美国、日本等处，售发范围相当广，但主要的订阅者还是在美以美会传教范围内的各地方“连环”（支会）、“循环”（堂会）。与这种教（差）会的机关报相比，地方教会出版物的发行范围就相应小得多。《奋兴报》虽有“南洋各地凡有莆仙旅外之人均有订阅”，但大多数的发行量还是在兴化府的地方范围。拿1914年的汉文《奋兴报》的发行来看：“本报为星期报，每期出版八百号，售外国共十一号，京师外省共六十号，本省七十号，本郡共六百二十号，合共七百六十一号，与各报馆互换者有数号，每月四期约计三千二百号；全年五十期约计四万号”^①。每年发行四万号，发行外埠的也仅千余号，订阅者多为本埠。不过汉文《奋兴报》外埠的发行逐年增多，只不过比重数字叫小而已。1915年发行比旧年加增五千，其中增加“外洋十一号，

^① 《汉文奋兴报稟单》载于《兴化美以美第十九次即第十一次正年议会录》1914年

京师外省廿号，本省一百一十九号，”其余是兴化年会议辖区各教会所增加的。相比较而言比早期的埠内发行已经是进步不少了，早期《奋兴报》的发售主要是在兴化府的范围内，基本没有外埠订阅，1907年“全年共计印出一万零八百册，计府城连环销售四千五百册，仙游连环销售三千六百册，涵江连环销售二千四百四十册，永春连环销售百二十册”^⑨。由于《奋兴报》采用的是汉文出版所以才能有如此发行成绩，相比较榕腔各报、建宁罗马字音各报和兴化罗马字的《奋兴报》等就没这么大的区外影响了：《榕腔小孩月报》每月仅售五百本，《榕城报》（榕腔）每月约售六百本，与旧年同。因此两报的发行人员也感慨号召“此月报家家宜俱有之”、“此报之销路亦宜推广”。

教会刊物的另外一个发行方式是与省内外各刊物的交换阅读，这也是教会各刊物扩大宣传的又一发行之路。这些报刊主要是汉文报刊，各种地方腔的罗马音字很难对外进行交流。汉文《奋兴报》与各报馆互换者有数号，这些报馆包括：上海圣报、上海新闻日报、兴华报、山东烟台晨星报、广东真光报、全闽新日报、闽南日报、闽报等。分赠国内外各机关也属此种发行方式：《福声》杂志“分赠省内及省外各机关者三十一本”，绝对数量虽不多但所占比重却很可观，当年的发行量才每期七百本。与外机关交换和互赠规模最大的要属协大的《协大农报》，自第九卷开始与国内外有关农业的学术机构进行交换，除国内赠阅及交换一百六十个机构外，国外已进行交换的地点计有十四个国家一百廿四个机构，影响极大。因此不管是汉文刊物相对较广的发行范围还是地方腔罗马字刊物的地方发行意识，它们的发行范围的重点都集中在地方教会各机构和基层教会，这才是它们发行的主要视点，对外的发行只是光亮的点缀，不足成为发行比重的大部分。但两者之间又有发行范围上的差异，其中对象上的差异上文有述，在发行的立足点上，地方腔刊物走的是彻底的地方本位路线，服务的重点也是地方，开拓意识不强，但对地方妇孺影响深远，所以在地方影响深度和影响层面上可说大矣，是教会（特别是地方性的差会和教会）加固信仰的策宜之选。汉文作为知识界通用的文字，影响面更大，但由于受教外读者的限制，所以对信仰内容有所排挤，即便有了较大的发行范围和数量，却缺乏影响信仰的深度，所以往往成为较大的差会和教会出版的选择。两者在发行范围上表现出的差异性不足以影响两

^⑨ 《奋兴报报单》载于《福建兴化美会第十二次即正年会第四次年录》1907年

者的共生共存，但遗憾的是地方腔罗马字的前景并不甚看好，民元之后，地方腔罗马字的刊物则很少出现，存有的也微若游丝。原因可能是地方教育的启蒙在民国时期已经全面展开，根本不需要另外一种文字赘物，随着地方文字水平的提高，拼音字而逐渐走下坡势。教会刊物的发行范围往往与发行刊物的教会机关的影响范围相重合，流出于外者很少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教会发行的刊物其实就是教会各机构的宣传喉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秦越之界，信仰籍借文字宣传物而进行意识斗争，会外读者的消极订阅属于较为缓和的抵制，拒绝订阅甚至教会出面禁止订阅和使用别宗别派的出版物则属于较为剧烈的抵制，文字形态的信仰斗争一如灵界的斗争一样繁复琐碎和点滴不让。因为文字作为教会信仰宣传的“养灵之粮”对教徒的影响很大，是其信仰的直接来源之一，对此教会当局深信不疑。

教会出版物的发行方式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教会传教范围内进行强迫和捐劝发行，以及在教会外公开发行两种发行方式相结合。在教会内，发行机构由于是教会的直属机构所以可以向教会当局提议相应地扩大发行的措施，并且这些措施往往也很容易被教会当局通过，因此而成为年会决议，要求地方教会尽相应的购买义务，这属于强迫性的捐卖，这样可以保障教会出版物的发行。在这种捐卖的方式中存在着几个环节：教会出版主管部门进行指定书籍和刊物的发行、书籍刊物的编辑、印刷；发行机构进行书籍的准备并以书局或刊社的名义向教会当局建议发行措施；教会当局年会议决定，并要求地方教会根据决定进行购买；在购买的过程中各类教会机构的职员和神职人员首当其冲，并承担向地方信众劝买的义务；发行的最后环节是信众，作为最终的发行终端，他们往往又受地方教会信仰的劝诱而进行购买，但又不乏真心购买者。所以在发行过程中书局（或刊社）、地方教会负责人及信众成为发行的关键，特别是传道一职，由于直接联系教会和信徒，在出版物的发行中的作用更显重要，往往成为教会出版物的义务售卖者，并在购买书籍中具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兴化美兴印书局“请兴化府城宜设书坊一座，专办教会各等要用书籍，以便传道者随时采买”，建议之后兴化美以美会既而在兴化设书坊，以合传道之需。传道者对信徒的影响是直接的，他们可以对信徒进行文字的授受和信仰的传输，所以又成为教会读物最大读者群的培育者：《奋兴月报》社编印《经斋课》、《益赛会题目》等书力劝传道、属长等用来教授会友。1898年《小孩月报》发售未有如从前之多，较1897年约减

售一百本，因此美华书局要求来福州开会的传道“须更出力转售是报”，并要求其在回乡之前“俯降本书坊采购数十本，转售于其所属诸会友家中”，这样本来无所属关系的传道却成了书局的书籍“掮客”。另外拜日学和义塾生童也成为书局发行的中间者并希望能“助理转售”会友家中⁽¹⁰⁾。不独地方教会的出版物要购买，另外全国性的“真光报、青年报、通问报为近时最关要之报纸，请各传道均须购买”。传道作为教会内新知阶层应该“略明新学、洞悉时事，奚能导上流之人使之亲炙基督”，并勉诸同劳购买新书报，这样才可以“道德智识不逊于人”，才可作为“时代之传教师”⁽¹¹⁾。传道在书籍的发售中所充当的角色相当重要，既要承接教会对之转售书籍的重任，又要传教信仰，所以早期教会的售卖途径之一便是传道者和售书者的四处奔劳。后期这种售卖方式还未曾有较大变化，教会当局还往往要求各支会购买，并要求各地方教会的负责人直接充任教会书局的售书者，特别是教会机关刊物的售发者。《福声》一刊作为圣公会福建教区的机关刊物，所以通过教区议会议决“凡属本教区圣品男女传道教员等必须各定本刊一份”，是为强迫订阅的发行方式。另外在教区内“各支常委会或会正牧师负责汇报以便派寄”，地方教会的负责人员的义务征发身份还未解脱⁽¹²⁾。《福声》月刊也要求“凡本会（圣公会）男女传道教员均宜各定购本刊一份，会友及其他职员如能购定更所欢迎，请就近向各地牧师或会正接洽，以便转函示知住址，按期照寄”⁽¹³⁾。这就是教会刊物中典型的强迫发刊形式。

另外教会当局在各地设立书肆、藏书楼、书坊等固定的售书点也是发售方式之一，这是随由信徒直接购买的方式，属较为自由的发售方式，也是面向会外人等的发行，不是勉强的强迫发行方式。这些书坊大多以星散的方式四散在各地，最初是城市，随后深入城镇和农村等教会信徒较为集中的地区。但以报告的效果看来这种书报发行方式不甚尽意，也为多数刊社所不取，只是由书局来经营。

教会出版物的发行范围和发行方式的地方色彩相当浓厚，与教会（差会）的地方性影响相一致，往往集中于教（差）会的辖区，如果有辖区外的发售，也是零星的、小规模的影响不大，即便是设立在福建的几个全国性的教会

⁽¹⁰⁾ 《美华书局报单》主理力为廉报 载于《美以美教会年录》（第22次福州）1898年

⁽¹¹⁾ 《书籍部报单》载于《兴化美以美第十九次即第十一次正年议会录》1914年

⁽¹²⁾ 《福声》各期封二内“本社启事一”

⁽¹³⁾ 《福声》各期中附页“通告”

机构如全国基督徒布道团、中华美以美会宗教教育会等机构在福建省范围外的影响也相当有限。由于受教会出版物地方性内容较多（特别是地方教会教务消息）和文字选用（特别是地方腔罗马字）等地方意识倾向太浓的影响和决定，地方教会的出版物不可能有较为广泛的辖区外影响，除了随着信徒的“信仰移民”而迁移海外尚有续订，与海内外相关机构互有交换外，读者往往是地方的。不同的出版物传播范围不尽相似，校刊一类的影响就相对更小。

三 “期月经年延搁迟”：教会出版物的发行周期

教会出版物的发行周期主要是对于刊物来讲的，和世俗刊物一样，教会刊物的发行周期常常也分为年刊、半年刊、季刊、双月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双日刊和日刊，以及不定期刊出者。刊物的期数较为明确，一般都在刊名上体现出来，直接名之为“××月刊”、“××周刊”等，但多有刊物时常存在出版周期变动的情况，这样的刊名就成为变动后刊物要考虑的变化因素之一。总的看来教会刊物的出版周期经常经年累月地延迟，以至于成为教会刊物被讽谏的原因之一。教会刊物的出版周期能反映教会出版效果：周期越短表明出版物越受读者青睐，相反越长则表明刊物的相对影响较弱。教会各机构出版物的出版周期根据每种刊物发行的需要而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教会出版物表现出的周期长短错落不一。一般说来福建教会期刊的发行周期段主要集中在月刊，为数最多，其次半月刊、季刊等发行时间较为充足的刊物，数量也很可观，数量最少的是较短周期的日刊（几乎未见到有发行）、双日刊（仅见1884年英国牧师傅氏创办的中文报刊《厦门报》等寥寥几家，都因读者罕少不久停刊），周刊的发行数量也很为勉强，只有协和大学的几种周刊。时间周期越短的刊物发行受编辑时间、印刷和销售时间的限制以及“报风未化”的影响，读者购买有限，诸多的限制决定短发行周期的出版物并不是合宜之选，并且有可能成为刊物发行的累赘，影响刊物的正常运作。而相应周期较长的刊物则由于发行准备时间较为充足，往往等到资金筹足才把已经编辑好的文稿付梓出版，不足之处是这样久长的周期（以年刊和半年刊来说）所产生的信仰内容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拉度而有所减耗，并且既失去了信仰的持续热度又错失了时闻的时效性。

另外对于教会出版物中书籍的出版则根据读者对象的急缓之需来确定，这些书籍包括教会教育的教材类、神学研究的专著类、圣经内容的译著类、

时事政闻类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书籍的发行从编辑到付印的时间称为出版周期，书籍的周期与刊物的发行周期不同，它们缺乏明确的连贯性，往往一版付印发行就标志着周期的结束。由于教会出版物内容的特殊性（主要是关于神学信仰等信息的），信仰并没有时效性，只有内容的强化性，所以对出版时间的要求相对不会很严格。这可以从教会出版物封页刊出的教会书局的售书广告中看出，在年首的广告中有该书的售书广告，等到年尾甚至于两年后的刊物封面上该书还在出售，并且物价腾贵但书价却有所下降，可见教会书籍的发行周期所存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避免不了，根本的原因在于此类书籍的内容过于集中在神学解释，一般的信众尚未理解到此种程度，因此在教会内部就失去了最大的读者群，销路相形滞销也不足为奇。而一般内容较为简浅的书籍，出版和销售周期较短，特别是地方腔的识字课和圣经读本，读者群从垂髫孺子到华发耄耋者以至于青壮女男，群部众多，多为“斗字客”，但该类读者掌握有传教士所创设的拼音文字，所以以音阅读，对阅读更为热心，客观上的读书需要缩短了书籍的出版发行周期。

教会出版物的发行周期特别是刊物的发行周期虽有定期的规制，但往往在发行中由于种种原因而推迟发行，这样造成的后果是部分地丧失了一些没有耐心的读者。造成推延出版的原因来自多方面，上面提到教会刊物的经济筹措募捐式的分散多源、编辑过程的采稿和编辑人员的非专职、刊物内容的相对集中、印刷等设备的阙如以及发行方式的职员兼任制度等等一切教会刊物印发程序，都有可能造成刊物的延期刊出。其它如社会时局动荡的影响、教会当局政策的影响、邮传运输条件的限制、政府新闻政策的变动（如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的邮政特许挂号立券新闻纸制度、内务部核准新闻纸登记制度和福建省新闻机构登记制度等新闻政策）等刊社工作之外的原因等也是个中原因。不同期刊或同一种期刊的不同期卷，其推迟出版的原因各有不同，问题的具体应有原因的具体。刊物的延迟甚至终闭周期因为有相对的原因而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刊物的终刊周期大多都不长，往往悄无声息地断发，这不仅是教会刊物在民国时期的通病，也是世俗书刊所共有的。对延搁出版时间问题的解决方法很具针对性，总结不外这么几种措施是教会出版机构经常采用的：在下期登刊以“本社启事”等形式向读者声明道歉；更改出版时间；更改出版周期等。其中以登刊启事为最常用的常规措施，也是应对一般出版时间错效的措施。

在登刊启事的声明中刊社的态度相当“诚挚”，这样就预示着下一次的延迟有所籍实，易于被读者谅解。常规定期刊物《福声》，本为月初出版，但几乎每期都有推迟刊出的原因籍口，并且原因的籍借相当成立：“本刊的十三期稿件均于三月末脱版，因沪战关系，在沪所制之电版延至月末始得发行，至十四期各栏早印专候专载及附录栏又至衍期，统祈阅者诸君原谅为盼”⁽¹⁴⁾。连续两期的刊物都延期出版，但原因的解釋效果相当成立，战局的影响理由转移了读者的挑剔：战时的出版情形不能以它时的常规来衡量。由于该刊是当时期刊中少有的负载有铜板照片的出版物，但铜版的制作是地方出版印刷机构所力有不逮的，因此要拿至上海等地去刻制电版，所以上海的战局状况的影响是存在的。还是该刊，在延期声明不出两期的情况下又登载“阅报注意”，此次却是因邮传的原因：“本处每月发刊经过许多手续，最后投邮时乃按札照点注册，纵有误差亦册数漏落至于全札并无遗寄”，但“最近三期以来连接各地请补函件竟至有二三十份之多”⁽¹⁵⁾。邮递条件所造成的刊物遗失对于读者来说不异于刊物的延期刊发，这也可以看作“发行周期”刊发迟缓的原因之一。

除了登刊声明“遗憾”之外，一些刊社还采取改变发行时间来应对出版周期的延滞：“本会因教区议会日期关系对编辑势必迟延，嗣后逐月均该为十五日出版，阅者谅之”⁽¹⁶⁾。为了教会议会的需要而不顾读者等候阅读的习惯更改惯常的出版日期，本来该刊是每月十五发刊，但自此后变更为每月月初出版，这也算做教会当局对期刊出版周期影响的一个显例。出版物的教会机构背景越小，发行范围越小，发行周期越长，其出版延迟越少，出版的周期相对较稳定。出版范围越大，出版信誉应该最重，但是由于所受原因限制也较多，所以出版发行往往推迟，这样势必对读者作为阅读的受众而造成对刊物信度的减弱，间接的后果是，常此以往教会籍借出版物来加强信仰影响的目的会受这样时断时续的不稳定的刊物出版周期影响而并未达到，有刊还不如无刊的好，于信仰无益。这是更改出版时间而周期不变的情况。

教会出版刊物还时常变更出版周期长短来适应发行的需要，发行周期长短的变更一般说有两种趋势，分别反映了教会出版机构出版情形的两种倾向：滑坡亦或升腾。教会刊物变更出版周期的两个趋势之一是发行周期由较

⁽¹⁴⁾ 《福声》第十四期中附页“鸣谢与通告”

⁽¹⁵⁾ 《福声》第十八期“阅报注意”附页

⁽¹⁶⁾ 《福声》第二十六期民 22 年 5 月 1 日“本社启事”

长逐渐变短，这预示着教会刊物发行影响越来越大，读者群在增加，刊物的需求周期相应缩短，说明对刊物内容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教会当局而言，是不错的兆头。汉文《奋兴报》出版周期的变更即是这样的趋势，由月刊变为周刊，再由周刊变为隔日刊。但同样是该报，随着地方世俗新闻机构的成长成熟的竞争，而逐渐失去对新闻的地方垄断，面对来自世俗新闻争夺有限的地方读者市场，而逐渐失去独断的优势，其西方差会背景在地方新闻竞争中往往成为教会刊物竞争的不利障碍。对汉文《奋兴报》来说，后期的刊发虽然也坚持到建国初才停刊，但是出版周期的变化长短不一，呈现明显的周期衍长的趋势。教会背景刊物出版周期的另一种趋势是呈现明显变长的势头，这预示着该刊物的读者群正在萎缩，其传递的信息量不是被刊物周期平均分配，而是被集中收集，并等待时间和条件的成熟，集中出版，信息容量相对减少，影响更形减弱。教会刊物大多都是这种的发刊经历，说明差会背景的新闻优先权的逐步丧失，也沦为世俗竞争的参与者之一，从而失去了自身籍借“他力”宣传信仰的优势。教会背景的刊物出版周期的两种趋势与教会当局局情变化密切相关，刊物可以成为教会时情变化的风向标，完全可检测教会的冷热态度，出版周期的变化还与教会出版机构的出版措施有相当的关系，其中地方性出版目标虽是策宜之选，但却不缔为实用的方法，特别是对于只想维持出版状态而没有出版扩展野心的那些刊物而言，更是方便之选。

时常发行滞后于规定出刊时间的教会刊物的发行周期虽有着各种客观主观的原因，在刊社看来这些原因由于是刊社自身的力量所难以解决的，所以这些原因成为面对读者指斥的缓冲借口。从教会刊物所刊出的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缓冲是很有绩效的，这虽是教会刊物出版机构的有选择性的信件，虽有隐瞒指责刊物延期之嫌，但毕竟教会刊物使用这种手量使广大读者产生这样的文字传输意识：刊社的延迟工作得到了其他读者的原谅，所以也不咎其责。本来对于教会信仰者这样的读者群来讲（或许说是缺乏新闻时效性观念的早期的中国读者来讲更为确切），文字出版的阅读有很大的弹性，特别是对于一般刚识字的信徒来讲，对文字的需求虽甚为饥渴，但同时对口头的传学宣传则更为依赖，以至于口头信仰的传播成为大众行为，而文字阅读的信仰传播终端则沦为私人行为，这是文字受众作为教会神学内容接受者的一般态度。

教会刊物出版由于各种原因时常停刊，又由于各种原因对于续刊则缺乏

必要的信心，这样往往造成教会刊物的“无疾而终”。出刊和发行影响很有卓效但终刊却了无声消，连一纸声明都没有，刊物的终刊留下了读者尚在翘首以待的遗憾。刊物出版周期遁潜的结果必然丧失读者对之的信度，信誉的丢失几乎等于教会信仰的丢失，不过这种影响是隐性的，不能为人所量化计算的，也等待教会对其的弥补。就作者所见唯一一篇的终刊词来看，其终刊的语气还不至于萧气，原因是该刊由于出刊的目的已经达到，刊物的宣传任务已经结束，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该刊有续刊的出版，只不过更改了内容、增加了宣传的范围。这篇终刊词出现在《福声》月刊的第三十三期即第三卷第十二期，该期的刊首页载有该刊的年度收支清单，完全可以看出该刊财务“被欠如清，出入平抵”，所欠为报资，共计七元二角，是福清和外埠所欠，此款由于该刊财务终结的需要所以由其主编叶见元“全数垫清”，在此可见刊物编辑人员的热心程度（但他们的身份往往是兼职）和刊物的财务状况，也可看出刊资的征收与世俗的先付款后寄送方式上的区别，这样的区别造成了教会刊物的刊资收入不稳，经常拖欠，甚至成为呆帐，所以不能作为刊物的稳定资金来源，除非改革这种刊资的支付方法，不过这样的话，很容易失去部分读者，是为教会的进退难选。该期的封尾“紧急通告”说明了终刊的原因，对读者很是负责：“本刊原系‘五运’刊物，至本期为出刊终止，经蒙教区常委会认可并议决改组为《福建教区月刊》。”这是刊物的有计划终刊，所以比较容易被读者接受。为了宣传将行刊出的新刊，刊物主编叶见元在该刊的“殿刊词”中还不忘记用文字言情来感化读者继续订阅改组后的新刊：“编者与阅刊诸君。文字缘虽告一别。惟所望从兹改组为教区月刊。仍乞继续初心以光篇幅。此则为殿刊时最后之所盼祷也。”而这时的主编已经被教区议会决定易人，叶已经不再是主编，其对刊物不是“不在其政不谋其事”的推任卸责，而是满怀惺惺留念的情愫为继来之刊铺垫原有文缘较深的读者基础，并且对刊物的终止很是关切悲情，创刊时“引年眉寿”的祝颂却成为殒言，刊物似乎更应该说是“彭殇立判”、“不永其年”更为确切。该刊物虽是旧去新继的新陈代谢，但无论出版宗旨和编辑风格完全改观，看不出前后两者的脉络联系，实则说是该刊的寿终也。但出于对读者的负责（更主要的目的是为圣公会背景的新刊宣传负责），该刊发表了这篇“殿刊词”，述说了刊物的来去脉络。教会刊物的终刊标志着刊物周期的最终结束，所以说刊物的终刊是刊物运转的最后周期。

教会刊物的出版周期自创刊至终刊有自己根据发行规律的需要来具体制定的长短适用的时间截度，周期时间的跨度范围一定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和多寡以及信息量的多少来确定，但定期的刊物常常因各种原因而不能顾及出版的规定时间，这样则造成时间截度的随意拉长，从而使宣传的信仰由于可容的时间度相对增加，浓度相应稀薄。对读者来讲，文字阅读的不定期的等候可能相对削弱文字对其的影响，这样教会刊物所宣行的教旨在基督神学宣传中的作用比重萎缩。而遗憾的是教会刊物的推延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原因无法预知，时有偶发的特点，这是教会刊物发行周期问题中最大的问题，相当棘手，但又只得任由，别无他途。

教会文字出版周期与世俗出版刊物相比，由于内容涉及教会会务、教义解读、会外新闻等诸多内容，其中教义解读的宣传是其主要目的，其余是辅助手段。信仰虽无明显的时效性，但其它内容的时效性特别强，诸多方面只能兼顾不能倚重一面，所以教会文字出版周期一定要考虑到阅读者作为受众的整体接受，而非分割接受的需要，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教会刊物发行范围的教区性、刊物发行方式的堂会负责人集中订阅的制度和订阅的强迫性决定了教会刊物从编辑内容到发行等整个过程都相当缺乏必要的与时间的随动的主动性。而世俗刊物的商业性质浓厚，主要考虑利益的占沾，所以会主动考虑读者的阅读需要，而决定发行周期的短长，调整得相当及时。

从时间跨度最短的日报等来考虑，教会刊物的出版周期在此方面表现得相当无奈。总的看来教会刊物中缺乏周期较短的出版物（如日报、双日报等），闽北六公会曾考虑共同兴办一日报，但由于考虑到神学争执的难以调和而作罢。闽南三公会也有办一周期较短的日报的构想：“日报（这日报是较后的事，若下决心做去，亦必成功，现在只提出来谈谈）……基督教日报代表健全的舆论，报导正确的消息，创立优美的风俗，随着副刊可以另有探讨真道的文字，假使各地信徒，就订阅其他报章的报费来订阅日报，这日报的前途必大有发展”^{〔1〕}。这是教会工作者对抗日战争后教会所应刊行的文字工作中例举的工作之一，正如该作者在括号中所估计的那样办日报事只能权且“提出来谈谈”，并无实际的措施等建设性意见的提出。日报的作用正如作者宣称的那样被教会中事工者所了解，但却不准备将之行入实践，可见周期最短的日报兴办事的难度。教会当局每年的年议会根本没有将筹办教会日报事付

〔1〕 潘醒我：《战后闽南大会——应做的工作》载于《闽南圣会报》续刊第十五期 1934年9月15日出版

之讨论，更不用说付之具体的实施。“发展基督教文字事业，举办一大规模之日报，每日出版一大张，但须与国营最著名之日报相比拟，惟在文艺一版多登教会文化、历史、诗歌、讲题、灵修等，籍以文字深入民心，转移风气，对于社会国家，裨益匪鲜”⁽⁸⁾，在这里虽然日报事的准备构想已经详细列划，但缺乏实践。地方教会如此，全国基督教会作为影响更大的机构，日报的出现也相当可怜：从1815年到1937年间全国出现的基督教会背景的日报才十种之寥。“十年前（1926年）曾有人提倡创办基督教日报，可惜没有什么相（响）应”⁽⁹⁾。关于日报事《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5年）也有“教会有无创办日报之必要”的讨论。日报事之难就难在周期较短，内容的载量太大，教会范围的信息不足敷用，新闻的阙度较大，教会工作人员也深明其中的奥理，因此教会日报的筹办只停留纸上论争的蓝图假设阶段，实施则遥遥无期。

教会期刊的出版周期对于教会宣传决策的影响是显见的，对社会各层接触基督教者也有很深的影响。定期的阅读有时会成为读者与出版机构的文本联系的纽带，也成为编辑和读者同时间段的思想共振的调节器，编辑的宣传意识能否在最可接受的时间里传输到读者的思想中，最关键的在于发行周期的短长适度。基督宣传的信仰主义有时间延度但对于基督教会的会闻和时情却延喘不得，第一时间的传递成为必要的要素，这对于基督教信仰宣传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神学的直接宣传，否则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对俗世所扮演的意义很容易被教会会闻的耽搁所遮盖。除了教会刊物出版周期的时常延搁这样的问题外，刊物的周期还代表了教会辖区事务等，甚至还有与世俗的交接程度等，但总的来说都是缘自教会刊物作为神学宣传的信息容量。

四 “信仰消费”：教会刊物的定价问题

教会宣传物的信仰宣传目的决定了该种刊物的定价要采取“让利”售卖，甚至是折本经营。除了具有世俗刊物的共性特征之外，教会刊物还具有自己定价上的一些特征：对成本的考虑往往不如对发售数量的考虑周切；定价一般随时价变动，但常常滞后于时价；会内外两种公开销售价格区别不大，信仰与否却在优惠购买等事情上体现了购买价格的身份照顾；大量的打折优惠甚至于低于成本、免费赠送等定价行为完全违反刊物发行的规律，造成的后

⁽⁸⁾ 黄宗助《今后的基督教会》载于《广闻录（华南版卫理公会通讯）》第二十一并第二十二期，民34年10月出版

⁽⁹⁾ 汤因《中文基督教杂志总检讨》载于《真光杂志》第37卷第6期

果是文字事业过于倚靠教会经济收入而非自赢收入等畸形发展。

教会出版物由于教会差会的背景色彩，所以呈现出教会的福利性、非赢利性等性质，所以在刊物定价上的措施多是出让赚取，大多都以成本价格出售，哪怕珠米薪桂、洛阳纸贵也是如此，对教会的宣传宗旨相当谨勉，雷池不越。这样则使文字事业连带搭上了编辑、印刷等工时，最大的得益者是教会刊物的阅读者，一两文的小钱可以购买到以优质洋纸刊印的装订入时的印刷品，既了解了时情又彰显自己的“阅读品位”和信仰主张。同样彰显的是教会背景的经济实力：即使这样的出让成本利益，教会文字事业还发行不辍，并且和世俗赢利刊物书社不同，它们则很少顾及刊物的成本，根本的原因是教会当局的经济支持使然。即使有如此的经济背景，教会刊物大多还是采取定价销售的形式，并积极向内务、邮政和省政府当局申请新闻纸的发行身份，这样教会刊物的赠送等福利宣传形式就不合当局的发刊规定，因此大多申请批准的文字出版物都定有报资、刊资等。

与会外的出版机构相比，教会刊物制定的价格更多考虑的是潜在读者量的问题，所以教会文字负责机构对刊物的发行数量的关心甚于对刊物的成本定价，并且把刊行数量作为教会文字事业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这样出版理念支配下的教会文字编写机构和发行机构大多又是义工性的兼职服务，所以无从计较教会当局的文字发行政策。教会的成本发行成为教会各出版机构发行的大势：协和大学每年出版数十种刊物，大多都是象征性地征收一点纸张油墨印刷费用，民二十年协大校方当局出版的十二种公开向社会宣传的出版宣传物，其中定价一元者仅一份，五角者两份，一角者六份，五分者三份，价格定制的相当低廉，重要在于宣传。教会直属的出版机构其出版刊物的定价相比较更加灵活，定价分为全年价格和每期价格，这样就决定了刊物的发售方式：零售和订阅。零售价格往往估高于全年订阅，原因是零售读者对教会刊物的偶然的断续的阅读没有订阅者对宣传意念的整体把握性高，是教会所要争取的读者，但不是教会刊物发行所要倚靠的读者，在教会刊物发行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教会只能把主要的发行目标锁定固定的订阅者。例如《华美报》全年定价报资每份洋银二角五仙，零售每册二十四文（光绪庚子价）；《奋兴报》报头广告“报资全年只收纸费法币二十元，邮费五元，半年共十五元，零售五期一元，概收现款或用汇票”。教会出版书籍则以多购多优待的方法发行，单本定价相当低廉。以民二十二年闽北圣书协会出售

书目来统计在圣书协会出版各类书籍中多数定价在三角以内，几乎占总数的八成半，其余较厚重的工具书等定价也在一元左右，最为价廉的是神学信仰宣行意识最浓的书籍，大多以分为基价单位。刊物定价的保全成本或牺牲成本行为，在教会当局看来是宣传的必需，否则教会的文字事业就会因此而受到教会当局对其工作成绩的诘难。教会当局要的是发行成绩：发行量，对于刊社的发行具体措施则给其定价的自主性，定价大多由刊社申请，辖区会议批准，所以教会当局刊社的发行也单单以发行数量为追求目的，刊社的亏损由教会拨款弥补，刊社只具编辑、印发责任，对经济则不负有直接责任。

教会刊物的定价一般是由刊社向主管教会当局提出定价意见，并申请教会当局批准，这样教会刊物的亏损责任（如果是由于定价问题引起的话）使教会当局染带上责任管辖的失策，而受到教会差会的指责，与人代过，不过这是程序，定价的决定权必需是管辖权机构。而教会刊社无权制定价目，只能目睹教会刊物在发行活动中因定价问题而折亏，良策难寻。福建圣公会的两种主要的机关刊物《福声》和《教区月刊》的定价权都由教区议会议决，每年一次，一经决定则必需等待下次会议才能更改。这样的定价方式成就了教会刊物的定价问题，掌握发行主动权的刊社相对地缺乏主动性，教会文字主管机构由于注意力在发行数量化，而失去定价制定的查察，教会当局议会由于是非出版专业人员的性质，所以连带形成教会官僚气息，上下难于交流协调。牺牲最大的是教会刊物背后的经济，由于教会定价权的公议性，所以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定价虽然也随时价变动，但这个时价的周期太长：以年为单位，所以从总体上说教会刊物的定价经常落后于时价，特别是在物价腾贵的民国后期朝暮价差都很大的时间，如果维持教会的年价格议决方法的话，刊资支持比例较大的教会刊社则要失去这厢收入，从而使刊物发行举步维艰。刊物周期的长短与刊资定价的多寡有着密切的关系，定价周期过长（例如圣公会的年议决制）表明教会出版物的发行周期并不甚符合发行的规律需要，刊资的交纳滞后、刊资的入不敷用、物价迅速的飙升等状况决定了刊物定价一定要与短时期的发行周期相一致，否则就会因经费问题而出现“阻于事而缓发”，甚至有停刊告歇之虞。教会刊物中周期越短的刊物，其定价周期应该相应越短，特别是对于整年订阅者占大宗的刊物。对于零售占大宗的刊物，刊社可以临时调整售价，以便从不稳物价中稳妥成本价格。周期越长的期刊，其定价价格由于期刊的时间段相对较为分散、发行量相对较少（相

对于短周期的数值)，所以刊物受时价影响较小。

在公开的定价上，教会刊物都将刊资以刊物公告或声明等形式公布于期刊的前页或封尾，并且注明货币的种类，洋银、大洋、铜元、铜片、国币、美金，是以邮票代资，还是购买邮局银票等方式，不管用什么样的货币订阅，这样公开的价格是面向全社会的公平的购买价格。更多的刊物由于发行范围的狭定性，所以刊物没有公开登出价格，说明该刊属增刊或是会内发行，由相应的发行组织机构代为征收刊资，此处不与论说。由于价格的公开，所以不管购买者的身份如何，刊资的支付是平等的，特别是有大量时间的具有地方新闻报纸性质的刊物，其发行根本不考虑读者身份背景是否有基督信仰身份。这种公开的定价，面向会外的发行数量较多，而其宣行的基督教内容较之于会内无定价的刊物要少得多。有教会背景的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刊物并不过多考虑教徒的购买身份，起码在公开的定价上来讲如此。但是在刊社内部制定的优惠条件上来看，由于刊物经费来源多来自教会，教会又靠地方教会信众捐输支持（特别是第四次全国传教士大会之后地方教会自养意识的高涨、教会的自立、国籍信众捐输热情的奋兴等所带来的地方教会信徒捐输的增加），刊物的出版对会内教友来讲有“取之用之”之嫌，所以刊物的主管当局和刊社制定了相应的会内优惠政策，这种优惠政策特别是对于信仰宣传较浓的刊物来说更具重要意义。不过教会内部制定的优惠政策是对所属辖区内各地方教会所组织的集体订阅来讲的，对于信徒个人的购买或订阅，则没有这种优惠。地方堂会的神牧和负责管理人员同时作为刊社的发行的终端，对刊社和教友的意义都很重大。刊社通过地方教会的组织购买，靠会内强迫式的订阅方式，既稳定了刊物的读者源，又方便了发行方式，增加了刊社的刊资收入；两兼得之。教（差）会大多采用这种发行方式，所以各种刊物的读者群以教会内教友较多。对于他们教会刊社不能与会外非“上帝选民”等之，所以刊社制定这样一种发行方式，目的之二在于使教会内教友能比会外读者有所优势，以体现教会当局的“牧灵”功能，但前提是必须参加堂会所组织的集体购买的神学消费，否则只能与会外读者等视。教会刊物定价的公开性和有条件的优惠性相结合，也很能说明教会刊社宣传意识开拓性的萎缩，从而产生教会后期刊物发行的地方性，以及教会文字宣传事业的失败，原因产生于教会的信仰身份的确认太过于苛刻，其中包括文字事业意义上的教会内优惠政策的教徒身份色彩和参与教会活动的积极性的牢钳作用。教会

刊物定价的公开性和有条件的优惠性是为其中的显例。

教会各种社会事业的服务态度决定了教会文字出版事业的社会宣传的服务性，文字出版事业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影响效果过于渐进，而非明显见效，也不象其它事业那样创造许多物质性的实物见诸于世，它的作用在于潜传教会的信仰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劝人入教的绝好事工，在教会各项社会工作中属于与神学信仰关联较为直接的一种事业，教会对之的态度当然更看重其社会服务的性质，所以教会背景的文字出版物（包括期刊和书籍等）多取廉价、打折优惠甚至赠送的发行形式。这样的出版理念行走的与文字出版行业的价值规律相悖相左，且不论教会刊物的经济能否承担长期的宣传负担，只看教会刊物书籍依靠低成本经营，已经使社会世俗出版机构对于来自教会背景刊物的竞争瞠目了，更何况教会文字事业的免费赠送。不过免费赠送的前提是赠品多为教义圣经的解读书籍和刊物，这样的书籍不与世俗出版事业相抵牾，发行自有其规律：成本不保，亏额较大。教会出版事业的宣传和读者的信仰需要是否相步而行是出版物发行顺利与否的成因，但往往的结果是教会发行物的数量大于教会读者的需要，这样教会出版物大量积存。美华书局和美兴书局每年广告出售的书籍几乎是数年的积压品，阅年售卖不出，对这种积压品的处理是先采取多购打折，有时大大低于成本，降之三两折，如果还有剩余，则采取分发教会免费阅读，是为教会文字事业的症结之一。不独书籍的发行如此，教会的刊物发行打折也很寻常，几乎每种期刊的定价说明上都有这样的补充：“（报资）五份以上者合寄者八折，十份以上合寄者另有优待办法”⁽²⁰⁾；“购至十份，九扣准收，五十以上，减取八折，报资先惠，邮票亦可”⁽²¹⁾。教会书籍的读者趁打折机会多集中购买，最后造成的教会刊物亏额相当可观：“（读者）多购以百本或十本之数，其价每本即（由二角半）降至一角半或二角，故是报全年约亏银三百五十元”⁽²²⁾。打折情况相当普遍，成为教会刊物采取的经常措施之一，后果经常是接连的经济困境象连片沼泽，跋涉艰难。除了打折之外还有很多期刊在刊物上标明“非卖品”字样，这样刊物的性质便是为赠品，赠品的发送方式一般是：来函即索、即送，或固定地赠送相关人员和机构，以便于各项信息的交流。《新义》等刊就是赠送刊物，不过这样的刊物发行量较小，出版不定期，发行成本不至于太多。

⁽²⁰⁾ 《闽南圣会报》每期的“报资”说明中均有此言

⁽²¹⁾ 《奋兴报》（汉文）每期的“购报者注意”内容载

⁽²²⁾ 《美华书局报单》载于《美以美教会年录》（第23次福州）1899年

除了打折和赠送之外，刊社还采取另一种“赠送”的方式：会员交纳会费，刊社免费寄送。各种青年会的机关刊物和其它学术性机构多采取这种形式，《福州青年会报》、《厦门青年》等青年会机关报和《福建文化》等学术机构的期刊，另外还有其它如《全国基督徒报告团报告》、《教育讯息》等机构所发行的出版物也是会员缴纳会费免费阅读。早期出于传教考虑，传教士个人发行的刊物大多采取赠送的方式发行，往往没有定价，又由于差会资金的充足和没有赢利考虑，所以早期的刊物没有定价是不足奇的。由于教会刊物定价的打折售卖和免费赠送、教会刊社的非赢利发行，教会刊社所担负的经济压力很大，教（差）会的经济拨款成为其所能倚靠的经济来源，这样可以决定教会刊社能在违背出版规律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存在，这也更加加大了刊社对教会的经济依赖性，一直不能象教会医院、教会学校一样成为独营单位，而只能成为教会的机构附庸。

五 “周行赖之”：教会刊物的发行数量

关于教会刊物发行数量的材料记载较为分散，归结起来大致有教会辖区会议的年会报告（这部分的记载较为详细）、刊物编辑人员在刊物中的记载（数量甚少，不易见到）、一些研究性文章和叙述性文章的零星统计（难以收集完全）。本节的研究则主要倚靠教会内部报告和学术研究材料。福建教会刊物发行的地方性特点决定其发行数量的有限性，受读者群的限制，教会发行的数量很难突破一定的发行数量限，大多集中于三千之内甚至于几百的小发行量范围，但也不乏有五千份发行量的例外，这样的例外也在情理之中：《全国基督徒报告团报告》作为全国性的机构其发行范围较广，读者相对较多。一般说来教会刊物的发行数量时常会有所变动，与教会内外的时情变化紧密联系，有时在发行数量上有很大的波动。

对教会书报发行数量的统计，来自教会书社的报告最为准确和详到。从掌握的材料可以看出，教会刊物的发行起落不居，很容易让笔者从发行数量变化的原因这样的问题着手来探讨刊物的发行量。榕腔《小孩月报》在光绪21年（1895年）发行激增原因是读者群的分割块中义塾学生把它作为教材识字用，“榕腔小孩月报每月发出二千五百本，较前增有一千七百本”，这样大的幅度增长令刊社编辑兴奋，索其原因是“其所以增者皆因孟先生用之于

其义塾也”⁽²³⁾，读者群分割块的增加使该刊呈现一时的繁荣。但好花不过秋，1898年该报的发售“较去年约减售一百本”，到光绪庚子年间（1901年）由于“去年（1900年）甚多阅报之人为北方拳匪之害，而中止者甚多”，《小孩月报》的发售量“每月仅售五百本”，所以编辑设法增加销售。政治时局的变动不仅是《小孩月报》这时间的减售原因，也是《华美报》（没有进展，维持在每月三千之数）、《榕城报》（“与旧年同”每月售约六百本）等地方报刊减售的原因。因此教会编辑人员“深望诸位牧师均各戮力同心助广各书报之销路，属尔之人，无粮则人不长善，书乃真粮也，何不购之？”⁽²⁴⁾，其情款款恳挚。与此相反，《闽省会报》的发行却因为战争故，发行量激增，“此报旧年每月发出三千五百本，其所以增之故，概因中日战事之所由致也”，对中日甲午战争消息知情需要致使该报出现一时的繁荣，但编辑却十分透悉其中的奥秘，不免也忧心忡忡：“尝思此报后必不能照此数多发”，因为“当战事将息时，此报有发至四千三百本之多，前六个月本报每月尚发出三千三百本”⁽²⁵⁾，有一千本发行数的差额，可见教会报刊出版中读者的可容弹性有多大。但同样是教会出版物，为何出现因为同样的战争原因而发行量指标上却呈现不同的发售反弹？其中原由作者理解是由于教会刊物与社会的接洽程度如何，接洽程度较高，发行量容易受社会各层知悉时局的需要而出现刊物发行的骤涨，反之如果只维持在教会范围的话，则受教会当局的影响也可能出现反弹式发行，但变化有限，《闽省会报》和《小孩月报》是为其中例子。另外原因是光绪间教会报刊的发行执福建新闻发行之牛耳，是福建新闻界最为健全的唯一机构，没有遇到世俗新闻机构的竞争，这样开先河的创举，决定教会的新闻宣传很容易受到士绅阶层的注意，特别是为了了解北方时局的信息需要。有以上两点原因教会刊物的大起大落起落得都有自己的原因。

没有遇到战局又同样是地区新闻事业祖萌肇始的《奋兴报》，其发行量行走得最为稳健：1907年改月出两册，“每次印四百五十册”；1914年出版周期缩短为星期报每月四次，“每期出版八百号”，全年五十期约计四万号；1915年“每年出九百号比旧年加一百号”全年五十期比旧年加五千号；1916年“每期出版一千零一十号，比旧年加三号”，以后逐年加增并且开版也由四开改为对开，内容增加对半，1929年至1933年每期出版一千五百份，为

⁽²³⁾ 《闽省会报》载于《美以美教会年录》（福州）光绪21年（1895年）

⁽²⁴⁾ 《美会第二十五次年会录》（福州）1901年 福州美华书局排印

⁽²⁵⁾ 《闽省会报》载于《美以美教会年录》（福州）光绪21年（1895年）

历年最高记录⁽²⁶⁾。1916年只增区区三号，几于无增，但至少该刊的售发还在增加，总算令编辑有所慰藉。与《闽省会报》和《小孩月报》的发行的起落比较起来，汉文《奋兴报》的发行逐年增加，幅度渐进，没有骤增骤减的唐突，这与其支持背景美以美会在兴化府的发展情况相一致。美以美会在兴化的发展也是逐年渐进地发展的，信众不断增加，传教区域不断扩大，传教影响不断加深，整个教会的发展是有步骤地渐进的。极具地方色彩的《奋兴报》的发行主要集中于兴化府内兴化年议会辖区内，但购买者却扩大为整个社会阶层，虽然该报登载许多教会事，但同时大量的内容集中在“外国新闻，并所有有益于人之事”，读者也逐年增加，因为“每月有加添数人识字故”，所以该报的增加之数缓慢，不过这样的增加把读者基础打的相当稳固，起码不会象以上两报那样骤起骤落没有稳定读者群。《奋兴报》的发行有稳定的读者群，发行数虽较小但是读者能长期订阅。该报由于这些稳定的读者群的支持，一直发行数十年至解放前夕才停刊，中间虽有来自世俗《闽中日报》等报的竞争影响，发行逐渐减少，但它为兴化内地所带来的近代的新闻意识等影响，早已经通过每月近千份的发行量传输于地方绅士知识阶层，影响相当久远，成为教会背景文字出版物的典范。

以上是教会出版物的发行量与教会内外时情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教会期刊发行数量的统计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宣传目的，有意识地夸大的发行量有助于教会文字事业宣传的影响，容易向教（差）会当局申请资金，有助于会内外读者产生订阅的随流构想，有利于扩大期刊的发行等益处。教会文字出版物的调查结果所做的统计使我们能不完全客观地掌握整个福建教会文字出版期刊的发行数量等情况，不过这些统计有的是相当不甚公允的，大多是刊社一方的陈词，并且也仅仅是单独一年的统计，并不代表整体。不过似乎也能说明其中的些许问题，不妨以叶见秋：根据1936年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进行的文字调查（该调查采取问卷反馈的形式），福建当年尚在发行的教会刊物有38种（统计的标准是有省外影响并被省外图书机构收藏的期刊，所以说当年福建教会的出版期刊数不止此数，种数远远大于此数）。在这38种中，发行量最大的达到五千份/期，该刊是《全国基督徒布道报告书》，因为该机构是全国性的机构，又是采用会员制的发行方式，更具决定作用的是该刊还是不定期的发行物，有如此天文数字的发行量不为奇。在当年的发行量

⁽²⁶⁾ 统计记载见1895—1920年《美以美兴化年议会录》（正年议会录）载《奋兴报票单》

中最小的《协大青年》只有 100 份。作为教会附属机构的文字出版物，《协大青年》的发行主要集中于校内，而当年协太的学生数也不过三百余人。况且该刊是赠刊，内容又是校闻校讯的校刊性质，是青年会的发行物，它的文理体也只能在校内传播。其余发行量情况的记载表述如下：215 份一种，300 份两种，400 份一种，600 份两种，700 份一种，1000 份三种，1600 份一种，3400 份一种。这 38 种期刊中包括校刊、青年会期刊、地方教会期刊、教会教育机构、信徒组织期刊等，几乎包括教会背景的全部性质的机构，所以可说是非常完全的。另外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发行量较大的几种期刊，地方影响相当明显，三份发行量为一千的期刊都是由地方教会出版的；教会背景的期刊大多出现在福州、厦门等中心城市，两个地方共有 32 种期刊发行，其发行影响也主要在城镇市民阶层；在 38 种全数中，赠刊五种；出版周期较长且有不定期刊物，并且其出版数量都不多⁽²⁷⁾。不独于此，《中华基督教会年鉴》所进行的期刊统计结果也大致如此，不过统计数量过 38 之数，也可参考研究。

教会期刊的发行数量对教会来说意义更为重要，教会宣传主义藉此发行物而入门进户使世俗界所闻知，所以，一般来说发行量越大，教会的宣传效果越明显，所以教会宣传物都把发行量作为刊物停续的依据标准，但对期刊发行量的影响因素很多，仅仅以此为衡量标准容易使宣传内容的焦点失衡，最终往往会造成信仰宣传的效果不济，长此以往教会文字事业的劝归目的未必成效。教会期刊的发行数量能说明的附带影响是开化了国人的知悉新闻的方式和途径等意识。全部的教会公开发行的期刊的读者不尽然是教会中人，更多的是会外的传统知识阶层，他们作为教会发行物的读者基数，为刊物数量统计的贡献相当重要。

第五节 “阐扬宗风”：教会文字出版发行的宗旨

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发行宗旨相当明确，“砥励德业”、“起发善端”、“阐扬宗教”、“唤醒沉迷”等等，不一而足。不论怎样地辩称，其实归一的宗旨只有一个：文字布道、宣扬教会天国主义。教会出版物的最终目的不管用什么样的宗旨界说和诠释，本质的目的都在灌输宗教信仰，由西方传教士和其

⁽²⁷⁾*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by Rudolf Lowenthal, Ph.D. (罗文达), Published by The 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 Peking, 1940 (即《中国宗教期刊》)附表二《基督教期刊》中福建部分

之后的国籍教会工作人员来贯彻，他们的神学信仰身份和国别不管怎样的不同，其实质的服务目的是相同的，这样的宗旨目的试图抵磨差会间的神学成见，使之成为基督在世的代言人，但更为细致的神学上的分歧却更显裂痕深沉，难以弥补，这也在出版旨趣上判别得很清楚。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宗旨与会外的文字出版物之间的区别更是明显，圣与俗的境界气息以文字表达出的是互为挞戮的酣畅，笔墨间的争执丝毫温情都没有剩余，宽容的话语成为多余，再怎样地混淆，圣俗间也是不易划等号和近似号的。具体来讲教会刊物的宗旨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体现出来：发刊词、封印、启事等形式的公开宣称的形式和以实践中各类文章数量比例体现出的践行宗旨，后种形式的“宗旨”只能由研究者根据书刊对不同内容的剪裁去“臆断”，不能根据刊物宣传的宗旨去判断，但是其结果更为客观。

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的期刊多把宗旨封印书面，并且相当坦率地说明其基督教宣传的内容，特别是传教开禁后的教会宣传物，更是旗帜鲜明。教会刊物由于教会机构背景有别，所以在明发出刊宗旨时都不尽相同，各个教会机构所办的文字出版事业都把文字出版当作宣传机构的工具。“五运”时期圣公会福建教区设立五运委员会，委员会专门设立《福声》一刊作为五运的宣传阵地，标榜教会工作。所以《福声》刊“特为促进五运而设”，其宣传宗旨与内容“均促进道机，联系讯息”，服务的目的性相当明确。等五年运动结束，《福声》刊也告殿刊，任务的交接相当顺利，由福建圣公会教区接收，并委主编以替代原主编，服务的对象也相应发生变化，“为我教区（圣公会福建教区）之公有物，而冀其对于全教区有所贡献也”。其编辑出版的宗旨也一变为敢于揭橥“交换宗教经验，发扬基督精神”等两义，教会直属性相当明捷，希望借籍该刊以兴同道，“发扬基督之精神，建立天国于闽疆也”⁽¹⁾。同样的设备印刷出来的刊物，从名字到出版内容、出版理念都完全改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主办背景机构的区别是刊物发行宗旨发生变化使然。

教会各种机构所发行的出版物，其出版直接的目的都是为其背景机构直接宣传服务的，这是无庸讳言的。各地方教会发行刊物重在“沟通地方教会消息，促进教会事工”，或“以刊为卫道之坛”，直接宣传信仰；教会附属学校出版刊物的目的在于替学校各学生组织特别是青年会组织宣传该组织的

⁽¹⁾ 《圣公会福建教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刊词”1934年1月15日

工作，间接为信仰服务；教会附属组织所宣行的宗旨主要根据其工作和成立目的，主要分为信仰直接接近者以“共研神意沐神恩”的教义研读，和间接的服务信仰者的以社会事工的宣传为信仰指引之途等两种形式；有教会背景的文字宣传在诸多的宗旨中端露信仰目的，这样的宗旨常出现于教会所办的新闻时政内容较多的出版物上和由诸多差会共办的出版物如《左海公道报》等之上，由于教会间的神学分歧，所以刊物重在于宣传世俗而非为神学争鸣之需。“本报（《左海公道报》）为宗教所组织，意在联络各省基督徒彼此互相砥砺德业，俾吾道昌明，以是为转移人心风俗之用”^②。不仅如此，该报还标明出版目的的“八目”，遗憾的是宗教仅为“八目”之一目，神学讨论内容浅少，时政内容占具很大分量。教会刊物的宗旨一般出现在封面上，包括内封面，几乎每期必述说宗旨意图，刊物的封面设计相当固定，几乎数期不变，宗旨内容也因此而固定。这样，即使偶尔接触刊物的读者也会很快明了刊物出版意图及刊物性质的。教会刊物采用封面编排宗旨的做法与世俗刊物中较为专业化的刊物类似，这样就可以把宣传的内容相应地集中起来，使读者有选择地阅读，避免出刊目的的不明确，所以把宗旨固定地封印出来对教会宣传来讲不啻为适宜之选。

教会刊物的最初发行必有发刊词之出，一如会外刊物，教会刊物的发刊词一般由会内较具影响的人物或刊物的负责人来撰写，载于刊物的前几期以说明出刊的目的、经过、宣传主旨等主要内容，一般刊物的首期已经很难保全，仅具所见整理出不完整的刊词特点。发刊词所述说的宗旨较封印宗旨为详细，它不仅提出宗旨，并就此宗旨进行论说、解说，甚详。教会刊物的发刊词表现自由，由于属有意识的宣传物，所以每篇发刊词都有相应的词说目的和最终宣传目的，不过发刊词中所宣传的宗旨所率行的时间段似乎没有封印等其它形式的宗旨时间长。换言之，发刊词后的宗旨贯彻随着刊物所坚持的周期变化而变化不定，长者可随刊始终，短者几期宗旨就发生变化，这是发刊词所难以后瞻的，也是发刊词先入为见所造成的，刊词中宗旨观点陈述相当明确，但在实践中却不断更张刊行内容，这将在下文论述，此略。刊词的特点是多样性和灵活性，还有目的性等。教会刊物的发刊词由于经跨神学信仰、世俗时闻、教会情状、政治论说等诸多方面，甚至有八目之多，所以教会刊词的陈述表现出侧重点的不同，篇幅上会有不同的倾向性，这样整个

^② 《左海公道报》每期封二“本馆启事”

的刊词就呈现出宗旨本质目的相同、形式不一的多样性。以律言诗，以工整对联，以启事，以题词，以短牍长文，以新体诗歌等等，形式多样。《新义》刊以诗歌和题词两种形式提出出刊宗旨“新义之端，讲道之山，新义之刊，卫道之坛，何谓曰新？康浩汤盘，本圣经者真，顾名思义，做基督徒，像基督者是”。不仅如此，该刊还以启事的形式公开其宗旨：“本刊宗旨在联络海内同道感情、交换意见”^①。教会刊物刊词表现得又相当灵活，不仅指文体而且形式和内容都相当融通，很完整地 and 刊物宣传融合在一起，表现出教会刊物的整体风格，但又不至于过于僵化。例如为短期适应刊物发行的临时需要，教会刊词就相应刊出阶段性的刊词，来叙述阶段性的刊物宗旨，翌后又以续刊等形式发行新的刊词，刊物由于教会辖区的发行范围和读者较固定两个发行优势，所以很容易改面换颜，并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另一原因是早期教会新闻的垄断性。教会刊词的目的性相当明确，除了最终的神学目的外，还有形式上所表现出的刊行目的，最具代表性的个例是《闽南圣会报》（续刊）的刊首言，原本的题目称为“闽南圣会报募捐启（代续刊词）”，这样的发刊词使劝捐的目的很明确，内容述说续刊经过和原因，由于“祇以经济支绌，时刊时辍”，所以希望“爱主兄妹，慷慨解囊”。如此，一篇续刊词不伦难类，但出现在因战事而辗转迁移缺乏差会经济支持的羸弱的教会文字刊物上就可以理解了。教会发刊词宗旨的目的性又有长期目的与适应性的短期目的之分，短期目的如上，长期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向会外宣传基督信仰，招徕劝说“望友”入信，同时加强会内联系，以便强化会内信仰。

不管是以刊词还是以启事、以封印等形式标明出刊的宗旨，它们都属于公开的发行宗旨，是向社会、向会内同工宣传的共同的号召和暗示，这样我们就可以划定宗旨宣传的各种作用和目的的分野：成为来稿登载与否的与宗旨背违借口；政府审查登记时的宗教宣传的招牌；读者订阅时兴趣与否的依据；编辑发行过程中特殊的流程；宗教内容宣传的主题性等。只要公开标明宗旨，一般来说，刊物的发行编辑理念就比较固定，如需变化也只能采取微观渐进的形式，否则将会招致非议，这是教会当局和读者都力行避免的。

如果说教会刊物的宣传宗旨以各种形式公开以后就很难发生骤然变化的话，那么教会刊物宗旨以潜隐的形式，从编辑选择上来更换发行理念则就很容易躲避招致过大的非议和责难，是为教会刊物更换宗旨宣传的明智之

^① 《新义》（不定期第三次）1932年3期 古田新义山诸圣堂出版

法，如果不从长期的编辑实践来观察，则很难察觉这种变化。大多时候编辑实践的变化是由于教会刊物主要编辑人员的更换，特别是主编的更换常使刊物宗旨周转不居，这样频繁变动的编辑理念难以支持长久的宗旨目的，而常常发生信仰障碍，特别对于发行时间较长的刊物尤其如此。这样的编辑实践替代最初公开的宗旨，变化往往也不易于被编辑人员所察觉，每次的力行公事，掩盖了点滴的编辑选择的变化，程序不变，编辑的宗旨内核在销蚀。发行时间较长的《奋兴报》的编辑理念随着该报在不同时期的宣传意识而不同，同时也反过来对之产生深远影响。汉文《奋兴报》的创建是由华人牧师宋学连和张国基向美以美会牧师蒲鲁士建议出版的，蒲氏任总经理，四个国籍董事，最初的宗旨是为地方新闻宣传和为教会宣传服务，内容主要有论说、教讯、国内外电讯、本省时事、本地新闻及副刊《文苑》，教会内容仅占少数。1912年12月兴化教会年议会正式确定其为机关报，教会和信仰宣传内容相应加增。民国后由于受到来自世俗新闻机构的新闻资源的竞争，刊物的编辑内容多集中于教会新闻和神学探讨。其编辑和负责人员的变化较大，特别是后期。其先后的社长几乎都是美国传教士，但是主笔都是华人，先后有九人之多，其记者多人，全部都是华人。四个社长九个主笔的相继更替，不能说丝毫没有对刊物的宗旨发生影响，从前后的编裁体例来看，前期和后期的《奋兴报》异大于同，不论从文体风格还是从内容偏重，不论从版式还是从神学宣传深度考虑，两个时期的报纸大不一样。而该刊的发行宗旨只是在发刊号上简明声明，但是清末的发刊词能否在时情遽变的民国还同样适用？对之持肯定的答案很难具有普遍的说服力。刊物宗旨宣传实践中神学宣传的目的也是如此，随着国籍信众和神牧的成熟，对基督的信仰深化也不能维持同一水准线，所以教会神学宣传的宗旨必须深化，以适应基督神学的汉化，只能从信仰上来揭橥基督的终极目。如果《奋兴报》尚不足说明问题，我们还可以选择同样经历清末民国的《左海公道报》来说明问题。

《左海公道报》创刊于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3月），半月刊，由闽北圣书公会刊发，终刊时间不详，为基督教刊物之一。其编辑工作人员中华人教会人士较多，主要编辑中有对早期福建新闻事业贡献卓勋的黄乃裳等人。他们与教会的关系相当密切，是福建教会比较出名的文化基督信徒。现存《左海公道报》主要藏于福建省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及福建师大历史系地方史资料室，作者根据所见到的《左海》第一卷共二十二期，第二卷一期，大致相

当于该报一年的出版量，来统计该报编辑宗旨和宣行宗旨之间的细微差别。该刊内容分为谕旨、社说、宗教、译谈、政治、教育、实业及时闻八栏。其中“谕旨之外，首重社说”，谕旨每期载量相当占分量，根据整理可知教育、实业、政治三栏不是每期必载内容，特别是教育和实业两栏，缺数尚多。其它六栏每期必载，但所载分量并不能相较等观。该刊发行目的在于使用报馆影响，继续维新事业：“我国十余年来维新事业，未始非报馆之功”，早期粤沪津榕报馆数十家，但“今反寥寥不多见”，只遗五六家而已，“福州安立间、美以美、美部三会同人有见及此，再为组织一报，议定宣统三年二月出版。”该报出版原由如此，其名称来源则很耐人寻味：为“标其名曰：《左海公道报》，盖耶苏教以博爱为主义，其道为世界所共由（有），故以公道为名称”⁽⁴⁾。凡例所载可作为其宣行标底，由于该刊的差会背景，所以其宣行的应该是宗教类极占分量，但事实并非如此，该刊刊行目的之一在于“促进一般人民之道德心与学问、生计”，又惟其由教会出版，以“公道”与“道德”为标榜，所以其编辑目的最终应该是宗教目的，但从实际编辑实践上看来，其世俗政闻的载量数倍于宗教内容。根据笔者的统计显示，该刊八栏中除谕旨每期必载，内容不一，但又相当重要之外，另外七个栏目一年篇目载量统计如下：社说计 84 篇，宗教计 51 篇，译谈计 140 篇，政治计 104 篇，教育计 54 篇，实业计 69 篇。数量最多的是时闻，共计 271 篇，几乎占总数的一半⁽⁵⁾。统计显示的数字表明宗教类在七栏中数量最少，不象常理所推理的那样宗教篇目应该占极优势的数量⁽⁶⁾。宗教类篇目在每期的分布大致较为固定，基本为两篇或三篇，最多一期为四篇，最少期为一篇，是七栏中数量最稳定的一栏内容。其余则以时闻最多，每期十余二十余不等，最多一期占二十篇。其它如教育、实业、政治则有时缺载。宗教内容往往被其它栏目内容所挤占，在辛亥革命的当年，时闻数日期载量最多，刊载量几乎多达每期十七十八篇，在民元年甚至达到二十篇之多。而同时期的宗教类内容几乎减少七成，辛亥之前每期三篇的载量，但一入辛亥革命时期则骤减为每期一篇，接连三期均如此，宗教宣传极占被动，颇形无奈。宗教宣传篇目的作者大多都为英美等

⁽⁴⁾ 《左海公道报》第一期“叙例”宣统三年二月发行

⁽⁵⁾ 根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记录》第二卷（下）《左海公道报》类统计 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⁶⁾ 《福建期刊简介续编》（稿本）康山徐开行稿 福建现代史资料简介之一 1963年8月抄本，徐氏认为“惟因其由教会出版，且又以‘公道’与‘道德’为标榜，所以以其所刊出文章看来，则以属于宗教方面者为较多”，但实际上统计来看，此种说法有误。

国的西方差传教士，英国的季理斐的《宗教天演合论》连载十期，其余如林乐知、何乐益等教会新闻名人多有译著。另外华籍教会人士的宗教论说也多有发表：如陈德侯、美部林则语、官日新、王台镇黄育华、陈壁如、陈观斗、陈守正等教会名人。但他们所发内容多为地方教会新闻和差会新闻，很少有神学讨论，主要是因为早期华籍教会人员多为地方教会的管理人员，少有教会神职，对信仰尚存疑窦，不敢“妄言神事”，这也说明中国汉语神学在成长阶段、在接受消化阶段，尚不够成熟。刊物其它栏目的作者大多尚存传统文人气息：署名上以字号、斋庐名、铭志语、籍地等为主，韬光痴人、知非子、百梅居士、榕南郑鸿、侯官县谢刚国等是为例。至刊物发行经年之后，以上署名发生了变化，多署以名字而少字号等。刊物编辑和主要作者的身份决定了其出刊的实际编辑操作，虽有教会为教会义务宣传的宗旨标明的要求，但在实际编辑的选择过程中，信仰的宣传内容却没有按照三差会所要求的那样取为教会服务的理念作为支持，特别是西方差会中入华多年的西方传教士对世俗活动参与的加深，而对维新等政治活动的参与，使其神学意义上的牧师身份相应减退，其注意点着力于世俗政治，特别是社会的改良主义的宣传，所以刊中宗教内容比重不大。另，刊物中华籍文人的参与也是刊物宗教神学意识相应又减退的原因，这些传统文人的文化底色与基督教的渗合是观念性的东西，影响最深，改易最难。他们虽入教，但只是身份的信仰者和基督徒，真正世界观上的信仰改变需要真实地对基督深化了解之后才有可能。这些作者的编辑活动和撰稿活动无形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对基督教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这些地方文人的参与，使得《左海公道报》八栏中，除谕旨及译谈之外，其余均多与福建地方文献有关，分量极其重要，但是对地方文献来说却有着值得注意的价值，这是桑榆的错种之收。从该刊的编辑实践和宣行主旨来看，两者存在很大的歧途之异，差会背景和世俗社会之间的直接关系的难以区分，特别是教会的各项社会服务事业的兴办，所以刊物从整体上来讲所宣行的是社会改良主义，附带教会主义，而不是相反。其宣行主旨（实践上的）与当时清末社会思潮的主流相一致，不过刊物宣行的主旨要滞后于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形势，这与教会所一贯的温和改良的政治主张是同步而行的，并且一直贯穿始终，直到建国初。因此与其说《左海公道报》是教会所办刊物，宣传的是“主的天国”，尚不如说该刊是社会改良者所宣传的改良主义，是改良者宣传的阵地。因为刊物实际操作的编辑理念和

蕴涵主旨（宗旨？）正合了这样的宣传需要。所以说教会刊物在宣传的公开宗旨和实际编辑宗旨之间存在着差异，原因是多面的，取《左海公道报》为例只是为说明差异，并不在于对评说教会所宣行的主义批判。

教会出版期刊的宗旨不管是以公开宣行，还是实践编辑的偏差都体现了教会在华所宣传的各种主张，不管是神学的还是社会福音的还是政治神学的主张，大多都是各教（差）会中西方传教士和华籍神牧以及教会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具体力行的社会主张。不管是否以刊物的文字形式出版与否，其在传教实践中的行为是其行动的总纲，不管近代神学和历史学者对之怎样分类归结，差（教）会实体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最难述说的宗旨：他们到底在宣传什么？对问题的回答如同对教会刊物篇目实践体现的宗旨一样，只能把差会和教会的事工实践做以量化的分析，用他们所做的去说明他们所宣传的目的，答案可能会很耐人寻味的。

本章小结：全息观察下的教会文字出版事业

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全结构的分析是了解教会文字事业在不同方面所流漏出的多种蕴涵信息的方法之一，其中研究工作的琐碎和细致最能体现教会文字事业所蕴涵的丰富的信息量。教会文字事业与世俗文字事业的直观形式上的区别是显见的，至少在教会文字宣传的初期。但正是在初期，教会文字事业已经与中国传统印刷和装订等发行印刷习惯相妥协，结果是西方新式出版和宣传理念与中式的线装竖排的印刷工艺相结合，促成了最早的铅印、白话、洋式装订等对地方新闻产生极大影响的先河之制的出现，特别是对新闻出版意识来讲，意义更显重大，因为它的非直观性特征可以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它是意识的，是深层结构的。

对教会文字事业结构的分析，本文从文字事业的经费来源和用途、编辑过程、文本制形、发行事项、宣传主旨诸多方面分析了教会文字事业的各个方面，并得出自己的总结。可能由于接触材料的有限，以上诸方面的分析还显得不够完全和深化，难免带有作者先入为见的总结，但是这样的分析方法在方法的选用和分析凡式的本身上都无可挑剔，结论只有深浅之分，并无对错之界。再者本文只对福建教会的文字出版事业进行全维的分析，由于福建教会的地方特点，所以可能得出的结论只具有地方性而缺乏全国的通适性，此章的学术意义在于为教会文字事业的研究提供一点借鉴，一叶知满山秋，希望本文做到了斑对豹的意义。

第四章 文化背景里的教会文字出版事业： 教会文字事业与圣俗的参与

第一节 时间顺序里的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历史、缺陷、特点及四级教会文字宣传意识的更嬗

基督教的入华给中国文化带来新鲜的文化因子，从而使以教会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客场中国景遇，无意识中为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近代化起了肇始的启引作用，文字出版是其中一例。福建基督教会文字出版事业的肇兴较之于南洋和广东、上海等最早的新闻中心尚不能称早。因为在从 1815 年到 1842 年期间，西方殖民者（包括政治殖民者、商业殖民者和神学殖民者）在南洋和华南沿海一带（主要是在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一共创办了六家中文报刊和十一家外文报刊，出版的语种可分为中文、英文和葡文。从 1815 年 8 月 5 日第一份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开始，相继出现了中国境内的第一份外文（葡文）报纸《蜜蜂华报》、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化报刊《东西洋每月统纪传》。直到 1860 年外国教会和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 32 家，1890 年发展到 76 家。而同时期以教会名义编印出版的有一千多种中文书籍，其办报活动由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北。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先后出现了近 170 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 95%，这些报刊的大多数是以教会或传教士名义创办的^①。早期的中国新闻事业的执端者是以“文字布道”为己任的教会和传教士，他们也是中国新闻事业（中文）编辑工作尝试的渊源所在。

而此时的福建尚未出现定居的西方“番人”，更不用说需要周期较短的西方新式报刊及新闻事业的出现了。但是与全国其它地方相比较，福建教会文字事业的出现还是有可比较的时间优势的。鸦片战争结束后，福州和厦门作为两个开放港口倍受商人和教会差属神职人员的青睐，特别是传教士的比趋入闽，开辟了福建福音信仰的新时代，同时又拨占了传统的信仰资源，划分了传统信仰的有神畛域，而他们所用的手段之一便是用中国传统信仰所缺

^① 数据来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乏的向普通信众宣传的文字播道的方式，虽然传统宗教并不乏文字宣传，但由于传统宗教执著于文字的文理，所以影响的是士文化阶层而非寒黎。福建的第一位入闽的传教士颇具争议，但第一份传教士所办的报刊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便是《*The Foochow Courier*》（汉译名“福州信使报”、“福州差报”等）。这是英国人在福州地区创办的一份英文报刊，1858年10月12日发刊，是福建地区早期的近代化报刊，主要的发行对象是商人和传教士等在华西人个人和团体以及国外欲知悉福州埠口情况的机构和个人，其编辑和创办的具体资料阙如，不知其详细出版情况，出版持续时间不长，1859年即告罄刊，是全国早期有西方教会背景的报刊之一，具有全国性影响，在福建有为福建近代化报刊肇始的意义。该报之后相继出现了早期福建教会的第一批新式报刊：1860年《教会使者》（中文）、1867年《教务杂志》（英文）、1876年《福音新报》（中文）、1884年《厦门报》（中文）、1874年《郁山使者》（后改名为“闽省会报”与“郁山使者”合称“郁山使者闽省会报”，1904年改出《兴华报》，后迁往上海出版）和福州方言报章《小孩月报》等最早一批教会背景的刊物相继出现。

这批刊物的特点是文字采用由外文逐渐向中文和地方腔拼音字靠用；读者对象由入闽西人逐渐转向闽省地方士子文理阅读阶层和文白拼音阅读阶层两个服务对象，读者群相应扩大许多，编辑理念的视野也相应扩展；宣行内容由简单的“口号”神学逐渐向神学信仰靠拢，逐渐走上文本信仰，文字布道受到重视；开始出现与地方传统信仰之间文字交锋的齟齬冲突，并深化入信仰的底色争执；为教会服务的意识出现，与世俗活动渐渐绝缘，把神学信仰和世俗活动内容的报道逐渐分离，使宗教游离于早期的西方入闽人员的“侨团”服务意识之外，逐渐神圣化；开始接纳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编辑人员，与中国文人之间的文化隔膜由于传统文人对基督教的深化认知，而呈现出最初的亲和状态，不过其通过传教士发行刊物的阅读所了解的神学知识是其传统思维和生活习尚加工过的神学，而非原宗，基督神学的本地化自此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这是由于传统文人对来自传教士所宣传的神学的初步加工之后，又借用刊物宣传出去，但实际上这时的中国化的神学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称呼，因为其并未真正形成；这批早期刊物是福建地区最早的近代化意识支持的新闻出版品，从各个方面对福建新闻事业的影响颇具可述的贡献；对福建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销蚀了的传统阅读的选择会很快阉门入户地

影响传统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思维方式和信仰方式，供祭的香烛变做祈祷的“心香”，传统礼仪继明末清初之后又起争执，其社会意义早已超出了信仰范围而深入社会的生活层状，福建民间淫祀和佛道信仰做为批判的客体，接受西方新教的审视，同时新教也被不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中国文人作为异端而进行诛伐，闽中民众的反教偏激所导致的教案达百余起，基督教文字事业所招致的传统士绅文人的“辨衡”，给民众所带来的意识影响也许是其中最受非议的对象之一；西方生活方式也作为客属文明籍借早期的刊物传入福建，受教会影响的建筑物的遗存是我们今天所能寻找到的最明显的方式主题。这里所列举的只是作者所能理解的早期教会刊物宣传所带来的最早的“招摇”的影响，其它影响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浸染力而逐渐湮没，踪迹模糊，是为早期教会刊物的特征的些许。

对教会出版物的整理和统计工作，以及对其加工时所采用的明了的分期方法是很难有标准的统一的，本文拟采用教会人士传统的分期方法⁽²⁾，此方法对福建教会刊物同样适用，所以本文力避作者知识的浅陋而采用现成。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物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815—1890年为第一阶段，1890—1913年为第二阶段，1913—1937年为第三阶段，1937—1949年为最后的阶段。我们同时也采用当时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统计标准，对福建基督教会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期刊做大致的统计（此统计由于标准的全国性特征，所以很多地方性的小刊物并未统计入内，只可说明问题，而不能详解问题，对问题的解释可参考本文后附的详细的附表）。福建基督教出版刊物如果向前回溯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1815-1937年间全国共有540种中文基督教期刊出现过，其中福建1815-1890年有6种，1890-1913年6种，1914-1937年35种，一共出现过47种（只统计中文基督教杂志，下同）。而在抗战中大多数刊物因经费、战事等原因，大多停刊，所以战时的基督教刊物无法整理，数据难以收集，而战后教会刊物的发行又出现一次复刊的热潮，大多停刊刊物多有续刊，但很快又由于解放战事的影响而又一次耽搁统计。直到解放后对在华外国机构的整理统计，但是这次统计已经很难恢复历史的真实存在，缺乏相对本真的数据，只具有相对的确度，所以很难作为学术资料利用。在至此的全国540种期刊中约70%出现在江苏（30%）、广东（24%）、

⁽²⁾ 此分期时间段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协进会文字事业干事汤因的划分，见汤因《中文基督教杂志总检讨》载于《真光杂志》第三十七卷第四、五、六期连载。本章材料感谢谢必震教授赴香港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所收集到的材料支持，特表感谢。

福建(8.7%)、河北(7%)，540种中的60%(313种)出现在七个城市，前四位：上海127种、广州70种、北平31种、福州25种。在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中在数量上福州已经超越香港(此时期的香港是著名的基督教会的聚集中心之一，合共才有22种刊物出现)。另外全省除福州之外还有22种中文刊物出现，全国中文基督教杂志分布统计中显示：福州和厦门在早期的教会刊物分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第一和第二时期教会事业开拓时期。福建基督教会刊物总数相当可观：一共出刊47种之多，所以这可以作为福建教会刊物在全国的地位的根据，说明福建基督教会影响和文字布道工作的兴盛。其中大多的刊物出现在福州、厦门等教会影响教为集中的地方，另外如永春、金井等地方由于书局的设立或教会自立自养的充足，所以对地方文字布道事业的支持力度较大，因此也有全国影响的刊物出现。例如在福州发行的期刊中1815-1890年出现3种，1891-1913年3种，1914-1937年19种，合共25种。在出版语言上，福建基督教刊物多取用文言和白话，更富于福建地方语言色彩的是福建方言和地方腔罗马字的采用：在540种有8种是以方言出版的，上海方言5种，厦门闽南方言2种，福州方言1种。另外以地方腔罗马拼音字发行的有8种，其中包括福州话罗马拼音字有3种之多，单就1907年一年间就有两种福州话罗马拼音字刊物的出现⁽³⁾。在这些杂志中值得述说的是《小孩月报》，它是全国儿童杂志的鼻祖，也是第一次采用福州话地方方言的杂志。

福建基督教会的文字出版物以杂志最为著效，总得看来教会刊物的情形大致有如下：从编者来看，第一时期的编者多半是西教士，由于其对中文的最初接触，所以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去学习中文，因此其所编杂志“颇得当时士大夫的赞赏”，不幸的是后来编者应付于社会事工，而疏于中文的学习，所以“基督教文字不能打到社会中心”，这样就大致产生了几种编辑理念：西教士派的西方官僚式的教会审查、“官话先生”派敷衍式的辅助编辑、“留

⁽³⁾ 以上所列数字根据以下文献统计：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cord, 1907, 纽约 A.F.S. 1907, 页 195: “中文基督教杂志一览”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0, 卷 1, 页 343—350 “基督教杂志”

Record of the Missionary Conference, 1890, 上海英华书馆 页 720—724 “中文杂志一览”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5, 卷 6, 页 643—645 “中文基督教杂志”

《通问报》(英文版) 卷 1 号 5 页 7, 民 5 年 5 月 15 日

《教会杂志调查一览》中国基督教会年鉴卷 1—13, 民 3—25 年

《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教会杂志一览”, 上海中华续行委办会, 民 11 年第 455 页

汤因：《中文基督教杂志总检讨》载于《真光杂志》第三十七卷第四、五、六期连载

《中文基督教杂志索引》(华英合璧) 上海广协书局出版 1936 年

学生”派的外文偏向性的译作、“大学生”派编辑意识的附和、“牧师”派自尊式的信仰主义、“作家”派是其中最为合适的编辑人员，因为其有深厚的中文根底，并且不受西教士的掣肘，行文参考价值大，并易于打入社会的中心，但遗憾的是其力量微薄，经济束缚太重，所以容易流于沉闷和敷衍塞责⁽⁴⁾。教会人士所总结的利弊最有针对性，是建议性极强的责任之语，所以可引为教会早期编辑工作得衡错失的根据。从编辑的材料来看，教会早期刊物中也有数端缺点：“教会风”的教会信仰主义使刊物有失去读者之虞、“牵就与曲解圣经”的态度使圣经的真意迁就己意避重就轻的塞责、“滥译英文”的不加审慎使境外糟粕随之泊入、滥肆转载使杂志的实际编辑和宗旨之间出入很大虞害刊物和读者、“介绍与批评”的缺乏只以广告式的介绍而非研究式的斟酌流于肤表、“编辑简陋”的排版等使教会刊物外观看起来相当局促。这些编辑问题的存在也是教会刊物所要更改的地方，但又无法更改。此外教会文字事业的缺点还有：“主其事者不有责任心——做事没有精神，不求事业之发达；主其事者不顺应潮流，不讲求装订，所出的刊物，惹人鄙视；不注重推销，视文字事业为可有可无”⁽⁵⁾。另外尚有多端歧异与世俗刊物缺点相同的地方和更多的失举之处，这里不再赘述⁽⁶⁾。这里虽陈述的是全国教会刊物的弊端，但不妨作为福建教会文字事业的缺陷来看，同样合适。

教会刊物的特点是相对于世俗持各种目的性的出版物而言的，总的看来教会刊物的特点首先重在：教会的信仰组织背景、西方文化的殖民背景、地方出版语言选择的知识阶层与文盲（包括拼音字识别者）的读者群分离背景、中西文化冲突的前锋和传统文化的众矢之的、信仰争端的首当其冲者、与世俗政治等强力因素的信仰妥协的苟合之举使教会文字出现的媚时之字等底色特征。此外，单从文字出版物上来讲，教会文字事业的特征表现得与世俗刊物有很大的区别：编辑理念的信仰化使教会文字宣传表现得更加神圣化，出现的是有理念支配的信仰观念的选择，而不是商业意义上的赢利观念为支配；编辑措施与世俗比较过多地出现教义说教的反复，而不是世俗刊物宣传的内容的“时令”化，对教会新闻的保鲜期较长，延长了教会新闻的阅读周期，从而缺少时效性；编排方法上由于大多教会刊物采用让利或免费赠送等

⁽⁴⁾ 汤因：《中文基督教杂志总检讨》载于《真光杂志》第三十七卷第六期

⁽⁵⁾ 王治心：《基督教新闻事业》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5年

⁽⁶⁾ 可参考：应元道《二十年来之中国基督教著作界及其代表人物》载于《文化月刊》卷1号页5，民15年；陈春生《二十五年来之中国教会报》载于《真光杂志》卷26号6，民16年6月；郭中一《二十年来之基督教文字事业》载于《信义报》卷20号49、50，第109—127页，民21年12月

形式的福利发行措施，所以教会文字事业的负担较重，在编排上缺少图片载量，而注重于文字的表达，喜好小字印刷，以节约经费，并且每期载量不大，通常数页；西方近代化对刊物作用的观念较之于世俗刊物更加成熟，但由于原因所限，这种观念并未一如世俗刊物发展得自由和充分；宣传和发行范围上注重教会辖区的传播，很少具有开拓性的神学拓殖，是教会刊物封闭性的最集中的表现；教会各机构的出版物所发行刊物内容相对集中，具有较深的深度，但缺乏较开阔的广度，虽与世俗刊物的专门化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神学内容的集约。再次，在与支持组织的关系上，教会刊物没有象世俗刊物那样具有更多的自主意识，从经费来源、编辑人员、宣传主旨和发行方式等方面都缺乏必要的自主性，而更多的是其更脱不了的依靠性，这与其非赢利性和世俗刊物的赢利竞争性区别有关，世俗刊物由于是竞争性地存在物，所以都具有自我的“机断”自由，而教会刊物由于在教会发行范围的垄断所以只能从容顺从。

教会刊物的教内认同有着各种观点的争执，但对于教报性质和应持作用上却有着相当统一的看法。早期教会刊物的自由性质较浓，原因是教会机构不完善，差会传教士个人的传教意识比较主观。直到健全的教会（差会）行政组织机构的建立，这时的教会宣传意识由于有教会整体的管理而具有了完整的出版意识，神学和教务是其中两个最大的内容，其余如时政、科学、风俗论较多。后期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减弱，特别是不再是西学或新学的宣传阵地，其读者的范围相应收敛，社会影响也萎缩许多。民元之后，教会由于民国新建，气象也为之更新，其中这样的观点当时最具代表：除一些刊物“微兼社团性质外（是教友所办），余均纯然慈善性质，其内容或专载时事而兼及教务，或专载教务而兼及时事，持论虽广狭不同，要皆传播救道阐扬真理，导人认识救世主基督而已，凡此光怪陆离如火如云，蔚然大观之教报，均此一年时间，纯粹华人自办之印刷物也”⁽⁷⁾。这是民国新立之时教会刊物出版的情形，述说的是当时教会刊物的性质状态，那么到民十三年基督教的新闻事业状况则出现些许新鲜的变化，工作的重点当取什么为重点：“解答这个问题分对内对外两个部分：对内以发展灵性、鼓吹自立、介绍各种知识、鼓励自动精神；对外以发扬基督精神为前提，注重说经辨道、维持风化、改造社会。”这时的教会刊物已俨然以自家人管自家事的主人翁态度来注重社会

⁽⁷⁾ 陈春生：《基督教对于时局最新之概论》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卷1 民3年

教化和维持风化了，说明这时的教会刊物已经完全中国化，已经是熟稔了中华文化而非夷外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精神理念的支配下教会刊物宣传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各个刊物的著作，日趋纯粹尤其是创作多于译述，有相当数量成熟的国籍神学者开始为基督神学做中国式的发幽，这便是中国化的基督教文化或者说是基督神学的本地化。它们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灌输新思想、辩道、发挥宗教知识、传布消息、注重灵修等，新信仰主义又一次在教会文字宣传物上掀起千波，这次的组织编辑的主角不是西方传教士而是国籍神牧和教会职员。而各报刊“更能本各报宗旨，精选材料，合乎时代精神，归纳到发磨基督主义的中心点。”此一时期的教会各报注意的焦点有两个：本色教会的提倡和反教辩衡，是为教会刊物的时期特点。

教会内部文字事业的宣传意识在各级教会组织的观念里都有着理论上重要认识，但在实践上却缺乏必要的与认识相一致的措施。1938年印度“孟都拉”（当时常译做“玛德拉斯”）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大会关于文字工作的讨论大纲，无疑是各级教会里的最高的决定议定，它的主题是“一个适当的基督教文字工作程序”。作为世界基督教会的新贵，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择要译出，印成单行本，发行各地方教会，将世界大会精神传达于基层教会，使教会文字工作意识从最高传递到教会的终端。该次大会关于文字事业的程序问题、作品问题、出版问题、发行问题、文盲问题及别的方法等31个问题进行论说，可谓是一部详细文字工作的大纲⁽⁸⁾。对大纲的态度使中华基督教会的领袖对文字事工在认识上有所注意，并积极采取响应措施，“组织了一个基督教文字事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已经开了几次会议，决定先唤醒国内各差会和教会的领袖以及主政人员对于文字事业的注意，并使他们得以深切认识基督教文字事业与整个教会的进展实有密切的关系和应居于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但要积极提倡使所属的工作人员和教友得以阅读各种基督教的书籍——当然要设法帮助他们购买或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书籍——他们更要尽量设法培植基督徒的作家，使他们得以将经验和研究所得，用文字公诸同道”⁽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适应性的指导方针大致如此，“全国文字事工委员会”经过协进会的指派，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并于民29年2月20日议

⁽⁸⁾ 欲了解详细内容可见：《一个适当的基督教文字工作程序》载于《同工》第171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市会组同工通讯社编，民27年10月30日及陈文渊：《玛德拉斯大会的重要议案》载于《中华归主》第193期民28年2月15日；单行本刘廷芳等译印《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玛德拉斯大会文献丛刊第一辑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行

⁽⁹⁾ 朱立德：《我国基督教领袖应注重基督教文字事业》载于《中华归主》第206期民29年5月

决设立一个协进会的基督教文字事工委员会，推举委员 17 人，代表 14 个单位及所属的差（教）会八个，通过议案多宗，主要涉及编辑、印刷、发行、人才培养及各机关的协作等多方面。

全国协进会文字领导机构成立后对地方教会文字事业态度的影响促成地方教会对出版的重视，上海基督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为谋促进文字事业起见”，特与上海基督徒作者团契联合举行“全沪基督教文字事业会议”就形成议案多起，主要集中于“划清工作区域”、“解决运销问题”、“推行联合事业”等。闽南教会对基督教文字事业的重视缺乏这样的协调会议，但在实践中似乎走的更远，当闽南教会文字事业的负责人员对闽南基督教文字事业回顾时总结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现实的指导意义丝毫不亚于一次大会政策性的议决。《闽南圣会报》主编蔡重光从闽南教会文字的发展历史出发，警醒教会文字出版中存在的问题，说服力透投纸背，相当肯綮。“基督教文字，是本着基督的立场，对于当时的社会、国家和国际有很深切的认识和了解，从生命中，或从上帝在吾人生命的回光中所发出，对于社会国家和国际的一种反映”。这里虽然对教会文字事业的定位较高，但言辞却不甚骄惹人，只是肯定了教会文字事业对教会内外的重要性的一种持信仰的观点。其对闽南教会文字事业之所以“没有顺利光荣的进展”的原因分析：“是由于一班教会主持者——牧师传道，不但不肯介绍会友阅读书报，同样自己亦不愿阅读书报”，作者从文字书报的编辑工作的实践出发，所说当为真实，一份教会摊派订购的教会刊物尚有这样的处境，就更勿言其它自立的报刊了⁽¹⁰⁾。地方教会对全国教会的文字号召，相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回声过程，地方教会的事务千端万机，不如全国教会对分类专门工作的专注。闽南教会对文字事业的重视还只是维持在文字工作者的深刻审视上，而教会的社工人员对文字的态度一如既往，而不管教会文字事业工作人员所提出的“要使‘中华归主’，应先鼓励‘中国人看教会报’，同时亦只有教会报办的好，‘中华归主’才会加快的实现”这样一个口号是多么的具有天国诱惑。地方基层教会所注重的是实践的灵性的践行和教务的展行，对于教会文字事业的考虑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经济条件）则显得有心无力，从而荒疏了许多文字符号的信仰信念。全球、中国、地方教会和地方堂会四级教会文字事业的态度区别，决定了教会文字事业的影响主要在教会的中枢机构，而非地方和基层。不过

⁽¹⁰⁾ 蔡重光：《闽南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回顾与本报的前瞻》载于《闽南圣会报》续刊第 11、12 期合刊“闽南大会廿五纪念刊”民 34 年 6 月 15 日

随着教会文字事业政策的逐渐地方化趋势，地方教会对文字事业的态度逐渐实践化和适用宣传化，从而使文字意识表现在单张和简单的出版物上，而非严格的神学论说，书籍文字的作用找到了最终端的接纳者，但很矛盾的是终端的受众更多的却是文盲和浅阅读者。

对教会文字事业的考虑离不开教会整个情况的背景支持，福建基督教文字事业作为最终的两端组织不管是在时间的发展顺序里考虑，还是在整个教会文字事业存在的特点和缺陷里考虑都具有明显的全国性的共性和地方色彩，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福建基督教差会和教会的文字出版的学术分析价值。作为基督教文字事业的端口之一，福建教会文字事业在时间顺序里表现为是全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的早期表率，原因是福州厦门两个条约口岸的开放相对较早，西人在闽时间较早，教会健全得较早，文字布道意识启蒙得较早，信众识字基础打得较好（特别是地方腔罗马拼音字的教授），这是相对于全国内地和北方地区教会而言的。在为教会文字事业分析的成败原因中，全国性的问题存在同样是福建教会文字事业所存在的，所以在地方文献缺乏时我们可以从教会的文字调查结果来总结，结果同样适用，而对福建地方教会文字事工的分析，上文已有较多论说，别不赘言。

第二节 空间秩序里的福建基督教文字事业：新闻竞争状态下的教会文字事工、文化状态上的比附意义和时政遭遇

教会文字事业所存在的空间秩序状态是教会作为主体物的组织存在所表现出的社会联系、所衍射出的影响和招致的社会反射、本体意义上的时政影响和教会文字所诉诸的态度等等，这是教会连带的附生影响，是教会主观宣传意图之外的“出乎意料”和不愿其发生的“力所不逮”，教会文字出版物的社会状态意义很难就主观宣传意图和客观影响达成和谐的一致，特别是与自己所无力博弈的时政遭遇时尤其显得力不从心和脆弱。

教会文字事业对福建新闻事业的近代化有着极具肇始意义的贡献作用，对早期教会文字出版事业的威胁主要来自福建地方传统文人所籍借的雕版线装书籍的“儒耶论衡”的争执和民绅的匿名帖子的偏激措辞，世俗传统的“新闻”宣传作用虽有着强大的宣传攻势和犀利程度，但影响除了几纸帖张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之外，很少有更大的范围影响（如果说匿名贴纸算做中国传统的新闻纸的话，那么这可以算做是教会新闻事业与中国传统新闻事业之间

的第一次交锋？)。因为传统的公示（主要是传帖或榜式的公布形式）的新闻知悉方式的被动性具有很强的新闻宣传所本有的辐射传递的惰性。而与此相反的是教会西方文本传播方式的传入，对福建传统公示方式的惰性（指榜示形式）和示知方式的封闭性（主要是指“帖子”传播方式的有对象性及针对性而言）的冲击是颠覆性的，教会新闻刊物的适应性措施是采借传统出版物的外状形式，力避非议，内容则是以新式“夷”、“洋”或“新”的内容为重点，宣传一种“异端信仰”，直到被闽人所熟识为至。早期教会刊物的内容多集中于时闻和教务，对传统文化的讨论记载也是重点。《教务杂志》等一批中外文杂志内容的集中点足以代表早期教会文字宣传的主旨：使教会文化和中华世俗文化磨合。而不管谁具有更大的浸染力，教会文化虽有较强的克制力量和主观意图上的试图渲染基督文明，最后使“中华归主”，但缺乏对本土文化的意识影响基础的深明认识，最后的结果是无庸赘说的。

如果说早期的教会文字事业所遇到的文化抵牾是传统宣传模式而缺乏真正“敌对”状态的话，那么在教会文字事业新闻体中所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世俗社会的新闻机构的竞争，就另当别论了。世俗新闻的所有模式均以教会文字出版物为肇始，孕自神圣但又行之于世俗，教会文字出版物对中国现代新闻史的启蒙意义人与共睹。但就是教会文化所胎生的世俗新闻事业给教会文字出版本身所带来的教训意义同样不亚于教会文字的始祖母形象：活版铅印的印刷竞争、新闻资源（包括读者源、信息源、资料源等方面）的竞争、宣传意识上的彼此怀葛、业务关系的羁绊等一些带生的副作用是教会文字事业所难料的。除开教会文字宣传的肇始意义外，其对世俗新闻的意义多在于向世俗教会授受了“两条腿走路”（教会刊物时政和神圣两个主要宣传主题）的难处，世俗刊物从产生开始就避开教会宣传神圣内容的羁绊，行走得相当自在，其往往指靠政治意识一种的支持。最早的非教会背景的刊物《福声》（不是后来福建教区圣公会之《福声》）的创刊虽有主办人黄乃裳的教会出身的影晌，但刊物本身所宣传的却是维新思想，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维新派刊物，这与当时教会所宣行的温和的政治改良路线不谋而合。历史不是机遇的缘合而是有着深刻的思考空间的，黄氏本人在教会出版事业中服务多年的编辑实践，参与编辑了教会报《椰山使者》、《闽省会报》、《华美报》，并有“戊戌北上，以文会友，在京盛言变法，八上书陈政……讲论新学”^①，在

^① 黄贞人：《黄乃裳传略》载于《黄乃裳与新福州》刘子政编著 南洋学会丛书第21种，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1979年

京“则日与六君子讲论新学”⁽²⁾等维新政治实践事。黄氏本人的亲教情缘也是其编辑意识的支配点之一，早期其“籍知赎罪救灵要道”，所以年十八就“奉基督教为依归”，并受洗入教，还获以“劝士执照”，学习传道七年，传道多年，足迹践行福州等地方，从而开始了“天路历程”，并在文牍之余“从事以裕腔译旧约但以理书”，这是其从事教会文字工作的开始。自此“编辑椰山使者月报数十册，继改为闽省会报，又改为华美报，易他手矣”，不仅如此，黄氏本人还在教会刊物上撰文宣传新思想和新生活，“并与保夫人（保灵夫人）合著革除缠足论五篇，都万余言，登报外，摆印单张，裱散上下游三万余纸”⁽³⁾，宣传的影响是显见的。作为早期的文化基督徒黄氏本人的经历完全可以作为早期世俗出版物编辑人员来源的一个显例，如果不足则尚有《鹭江报》编辑连横、冯葆瑛等脱离《鹭江报》而转谋于黄乃裳在厦门所办的《福建日日新闻》案。教会刊物的温床培育了浸带有大量传统情结的华籍文人编辑人才，而当这些人员一旦掌握现代编辑理念就很容易重新组合自己的刊物，宣传自己的社会改良维新革命等政治主张，似乎这是一条新闻从业的惯路。对教会刊物而言，这些新刊物的出现争取了许多有限的文人知识阶层中原本教会刊物的读者，成为教会刊物潜在的有力竞争对手。编辑人员的竞争是遁隐的，而对于宣传意识的竞争则旗帜鲜明，“1904年，华侨黄乃裳在厦门创办《福建日日新闻》，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与《鹭江报》唱对台戏”⁽⁴⁾，这是后人对之的评说，当时的竞争方之一的《鹭江报》有：“《福建日日新闻》每月初一日出版，每脱稿争相传观，销路颇广，而订购又复纷纷”，还为《福建日日新闻》做鼓吹。而世俗报刊《福建日日新闻》不仅在销路上“颇广”，而且在资金资助的来源上也形成了对《鹭江报》不利的局面：原先支持《鹭江报》的厦门富商林珞存、黄廷元和鼓浪屿牧师周寿卿转而资助《福建日日新闻》，加之编辑人员的星散和当时厦门存在的二十余种圣俗刊物的竞争，《鹭江报》最后的发行状况是“读者锐减，销路日绌，终于因经费困难而宣告停刊”。这是教会背景的报刊与孕生其里的世俗刊物竞争的显例。

在教会刊物出版的影响下，福建厦门和福州此时出现了第一批世俗刊

⁽²⁾ 林森：《亡友黄公绂丞传略》载于《黄乃裳与新福州》刘子政编著 南洋学会丛书第21种，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1979年

⁽³⁾ 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载于《黄乃裳与新福州》刘子政编著 南洋学会丛书第21种，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1979年

⁽⁴⁾ 邱艺玲：《辛亥革命前后的厦门报刊》载于《厦门文史资料》

物，并开始从读者资源、新闻市场、出版宣传意识等方面与教会刊物进行竞争。先后在福州和厦门出版的报刊中，福州有政治派别倾向的有维新派的《福报》、《福建新闻》、立宪派的《左海日报》，清政府官办的有《福建官报》、《福建教育官报》、《福建农工商官报》、《福建商业公报》，有君主立宪倾向的《警醒报》，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民心报》，纯娱乐性质的《笑谈报》等一批省垣较有影响的刊物。在厦门的报刊有《厦门报》、革命倾向的《福建日日新闻》、《应声报》，侨务专门的《暨南杂志》等一批圣俗两界的各种报刊多种，纷繁的宣传意识分割了传统的读者，其中存在的竞争是必然的。这是教会刊物所孕生的圣俗层次之间的新闻出版的竞争，会外刊物的宣传竞争是教会文字逐渐萎缩的根本原因之一。教会文字宣传根本目的的神学教化和教会教务的宣传性，加强了教会在宣传领域中的专业化程度，教会刊物受到会外文字竞争后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专业于为教会当局服务，而非世俗时务的舆论宣传，受教会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宣传意识支配下的报刊执掌了时务宣传的责务，而教会刊物则主要转向为教会宣传教务和宣传信仰的目的，宣传领域由于来自教外新闻机构的竞争而相应缩小，相应更加专业，这对教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教会文字出版事业从一开始便把印刷设备的健全作为工作的基石。早在美以美会尚未入华之前便筹划印书局的成立。在福建，教会印刷机构的印刷设备照样是福建现代印刷技术的先河之开。与现代的编辑意识一样的遭遇，教会印刷设备的引进对福建省整个印刷行业是一个彻底的冲击，几十年的光景，雕版印刷的风光不再，这是教会文字事业对福建文明所做的在物质文明方面贡献的一个亮点。会外印刷机构先进设备的引进与教会文字事业的渊源甚深，活版铅印、编排方法、字模铸范、印刷技术等几乎全部来源于教会书局的印刷技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教会出版物早期也同样心仪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也同样印刷了许多雕版的精品。

教会出版物的印刷与会外印刷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印刷业务的承揽上。教会机构由于设施规模的有限等特点不够敷用时，教会书局和地方教会的出版物就另行在教会文字印刷之外的商业机构招揽印刷。福州地方教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出版印刷业务经常与商业性质的印刷机构有业务上的来往，即便在教会印刷机构印刷设施空闲时也是如此。美华书局作为“福建最早的铅印所兼出版社”，晚清福州教会办的书报大都由该书局印刷兼发行，“福州的美华书

局于 1901 年由江龙金接办，改称中华印刷所，时为福建人所办的第一个铅印所”⁽⁵⁾，但即便如此，教会的印务也常常经由福州天泰印书馆、福州城内石井巷宝华印书局、福州南台仓霞洲启明美记印书馆、福州南台观音井公诚印书局、福州斗中街的公教书局印书社等商业印书机构承印。在厦门，与教会印刷物关系较为密切的有数家商业印书机构，由于教会印刷机构根本不够用，所以大多的教会文字出版物向社会招徕承印，不存在竞争，著名者如厦门的萃经堂等。邵武作为战时的文化暂栖地，当地的印刷机构永生堂成为在邵教会机构的主要承印单位，但一旦协和大学的印书局成立之后，几乎所有的印务都由协大印书局承揽，该堂影响相行减弱。

不仅福建省内的商业和政府的印刷机构参与了与教会印刷机构的竞争，来自当时的印刷中心上海的印务竞争也是存在的。上海商务印刷馆参与了《福建文化》等一批高规格要求的刊物的印刷，令华美书局等艳羨不已。《公道报》由于其经理李汝统的东大街晨光堂牧师身份而与教会发生了联系，该报自设有印刷所，是当时少有的有自备印刷所的刊物之一，时人为之羨，但该刊在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入闽时停刊，其印刷所并入福建孤儿院成为印刷科，此例可作为教会参与的刊物印刷的没落（非竞争性结果）的明例之一。闽南教会由于没有自己的印刷机构经常致使《闽南圣会报》，“几至无法赴梓”时常有以印费昂贵为由催付报资的情况，甚至于有“计算起来，（《闽南圣会报》）每字要国币一元”⁽⁶⁾，只字如玃玉，所以编辑重申来稿注意三字诀，特别是“简”一字，目的在于节省印费。该刊的印刷是向社会招揽承印的，所以成本相当贵，印刷馆之设筹议多年也未果。正是商业的印刷竞争又反而使得该教会商业印刷的依赖而，非自办教会印刷机构，是为商业竞争的后果。如果说教会印务向社会的承印使教会印刷机构设备空置是来自商业竞争的话，似乎有些牵强，因为教会印务的非赢利性决定其竞争的态度，即使这样，教会印刷机构向社会的广告招印把这种竞争显得尤其突出。华美书局在教会刊物上几乎每期都有售卖铅印设备和承印的广告，向社会的承印在当时的印刷业中是相当积极的和频繁的。教会印刷机构和商业、官办印刷机构的竞争是以教会印刷机构能否满足教会印务需要为前提的，自需之外设备承印有余的情况下，就必然在效果上构成了对会外机构的竞争，自需不敷时很难满足教外印务，更不用说承印印务，所以与会外的竞争就显出缓和趋势。又由于

⁽⁵⁾ 《福州近代报刊名录》（手抄本）庄可庭（上下册）暑期 1993 年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

⁽⁶⁾ 《编辑的话》载于《闽南圣会报》续刊第 19 期 民 35 年 1 月

教会印刷机构的教会背景特点，所以教会印刷机构与会外商业和官办印刷机构有着截然不同的印务程序，教会机构的服务性目的较明确，这被视为其在印务竞争中利弊端的共同原因。

教会刊物与会外的竞争还表现在教会宣传喉舌的作用上。这方面最著声誉的事件是厦门《思明日报》勒索案中《奋兴报》所起的替教会向社会公开实情的作用。民国九年九月间永春美以美教会接连收到思明日报社的主编吴钝民的“赫索款项”函多件。《奋兴报》作为教会喉舌面对来自会外的新闻挑衅，采取公布事实的措施，在《奋兴报》第三十三期上将原函公示，并将永春美以美教会公启同期刊出，并将恐吓信在邮局的挂号也一并布出，以示认真。据悉，吴氏以在《思明报》上公布“关于贵教会及牧师之黑幕稿件”相威胁，勒索大洋二百元即可销毁该稿。教会的态度相当凛然，婉辞拒之，并指出其行为“为射利之为”，如此勒索则“勒索遂则誉不遂”，《奋兴报》指责该报实为报界“思钱害群之马，在所必诛，报界巨子想必振笔而攻之”^①。实际上《思明日报》是永春吴氏所组织出版的，出版未久屡受各界攻击。

《奋兴报》秉承为教会“据事直书，彰善祛恶，阐扬真道”的宗旨，采大篇幅为永春教会受索案宣传，使《思明报》在舆论上处于被动。该案的解决主要依靠教会报《奋兴报》和《思明报》的口诛笔伐的相互攻讦和《奋兴报》的事实澄清。此案突出体现了教会新闻纸张与商业新闻纸张的公允舆论的竞争，教会服务的目的性很强，与世俗新闻的舆论斗争更加彰显了该目的。

教会文字出版事业文化学上的意义主要表现为教会文化的意识宣传和世俗文化的衔接。作为文化存在，教会文化的主要宣传依靠文字符号的表达，神学意识取径于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宣传，但事实上教会信仰主义的宣行所依靠的两种途径（口头和文字）的借用，会把信仰的观念明确传输给受众，其中文字的贡献最著。问题的存在是：在意识的传播过程中神学的思想未必表达得清晰，暗昧和模糊的文字表达，以及难以言说的神学暗示很难述说为清晰的脉络文字，读者和作者的逻辑思路的衔接之间的障碍之一便是教会所着力宣传的文字出版物，这是问题中的两难。教会文字的符号化宣传使文字的受众直接接受的是教会的神学教化而非神学思想，特别是教会中初识字和未曾“识字”的拼音阅读者，其文字符号的阅读水平窄化了中西神牧所宣传的神学剖白，受众对神学的选择记忆和选择理解所造成的是神学宣传的不完全

^① 《奋兴报》（附张）民国九年十月八号第33期第一版

及神学接受的不完全，表达和接受都同样是问题，这是文本神学的缺陷。

教会文化的宣传籍借文字与中国传统文明相作用，教会文化作为单倾向文化，有着犀利的锋面，直接从传统文化中的边缘文化（民间信仰和泛佛教道教等非文本经典道教和佛教文化）入手，直接切繁掉传统文化的“信仰仪式般的生活文化”。从早期的文化论衡到新教入华所采取的文化批判的挑剔，教会文化就是在这种析剔中渐露自己的文化本体，西方的各种世俗文化和精英文化，以及物质文明的物化文明等意识相继传入，对华籍文明起着不大不小的文化冲击，特别是近代之后，冲击的波度越来越大，最后成为中国的近代化的可肇源头之一。文化意义上的争衡变为可操作的“体用”、“洋中”、“夷夏”、“新旧”等切中实际的透窥点。教会文字作为其中宣传最为积极的文化前锋，宣传的主要意识竟然不是与之身份相合的神学，而是世俗各科，甚至是与神学不睦的科学，神学成为附生的夹带被偷偷传播，但是总的看来，教会神学却是条约准许的，而其它宣传意识却是晚清政府所深恶痛绝的，可以显见晚清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的式微。作为教会文化整体记忆的文字出版，在晚清之后期所宣行的主义逐渐回转为教会主义，否则过度地深入世俗的论说会泯灭教会的宗教品格，过多地表现世俗倾向，这是与差会差遣目的相违的，所以民国后福建教会刊物多集中于神学和教务内容，而缺乏必要的社会世俗衔接就一点都不为奇了。教会信仰意识的收敛也与教会信仰主义的挫折和非教运动的影响有关。对福建来说文字出版更是教会当局发展历史的版本记忆。教会文字记述的几乎均为地方教会的会闻和差会神学的阐幽，直到地方上汉语神学随着国籍神牧的成熟而成熟，这种宣传意识倾向才有所偏移。

教会文字出版物作为教会精神的思想资源对教会的作用相比较讲很重要，是教会信仰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扩张神学所籍借的概念工具。教会文字出版物发行的地方范围化是教会文化传播内容的集中和意识封闭的表现；教会出版物所采取的文字形态的方言区域和教会教区的宣传目的，是教会缺乏远视的视阈内话语运用的显著表现。教会作为一个亚社会层次的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局部话语的述说性质，这种话语主要是通过“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出版意识的宣传来完成的。这样就决定教会文化的主要传播范围、宣传意识、诉诸话语的统一是以信仰为黏合剂的，如果说这样的统一在形式上尚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的话，那么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神学上的分歧

和差（教）会间的传教竞争所造成的，但是在教会整个宣传意识和目的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教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闭性是存在的，与会外文化的渗合是被动的，几乎所有的教会出版物的编辑都在宗旨中申明其“阐教宏宗”的目的，对教会外文化的元文化（特别是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则采取批判的主动，辨教目的相当明确，即便是传统文化显得十分得包容和慷慨。“风水”、“祭祖”、“拜偶”、“禁烟”、“缠脚”、“陋习”等成为明清教会辩难之后教会针对性批判的重点，它们在新教教会早期的中英文著作里重新成为议论的重点。《华美报》、《清英教会报》、《兴华报》等对福建的民间信仰和民俗仪式的批判，已经是出自教会培育出来的华籍撰文作者之手了，措辞相当犀利。后期遇到教外文化意识抵牾的教会文化的宣传在民初几年里主要是护教式的辩驳，所幸非教运动在教会力量较厚的福建地方没有象在北方一样如火如荼，冷寂了许多。教会文化的出版物宣传的批判意识随着差教会中华籍神牧的增多和国籍神学的成长，以及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决策权的下放及传教措施的更张，所以也显得零碎了许多。文化之间的扩散和抵制是以其本身的文化底蕴为凭依的，教会文化作为外来文化，倚借政治军事等附生物质文化的外在，对中华文化只能构成一时的文化威胁，文化交锋的结果是教会文化的中国化和本地化，这便是教会近百年来所走的艰难的适域化的过程描述，不过作为教会文化核心的基督信仰却被保留了下来。正如早期西方传教士比舟之入中国，面对着初入厦门鹭江的施约翰和养为霖喝出的带着英文语调的“讲，天道呀”的吆喝声，地方土著居民用鼻子哼出“番仔讲善书，你讲我不懂”的话，然后跨着步子扬长而去。伦敦会教士在闽南苦口婆心的四年传道，收获仅仅是得到厦门人侧着头半疑地问了声“你们到底来这里干吗？”这样的答案是很难在文化层次上有一个很明确的论述的，迟疑后的西方传教士回答：“昭事上帝，肇（无上部）怀多福，我们来的，为的是要劝人虔事上帝以邀天福”^⑧，答案只能如此，但是这决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教会文化的不经意或者是蓄谋的附带传入的文化和对本土文化的积虑排斥并不是这个回答所能涵盖的了的，教会文化的传播在很广泛的意义上可以称为泛文化主义的扩张，只不过这种文化扩张有着宗教信仰的封闭内核和神学拓殖的外衣，这是问题的另一面目，事例当以教会文字出版物的宣传为观。

^⑧ 《闽南圣会报》（续刊）第一期 民国33年7月15日出版

文化上的攀比和竞争毕竟是温和和欠激进的，时政下教会文字出版事业的维艰之举比目皆是，教会文字的脆弱是显见的，特别是遭遇到其经济来源由于战事而告竭时，教会文化的脆弱使教会文化的精髓难以被文字出版所承载。教会文字宣传从一开始便为时政服务了，只不过最初的服务目的是以西方时政需要为标的的。早期的教会文字出版物多集中在商务、侨务、教务等方面，后来又相应集中于时闻、俗闻和政闻等，最后的集中还是以时闻为版面的主要覆盖物，外加对社会的革新等的讨论。比如发行量惊人的《田家》就是以农村事工为宣传阵地的。教会刊物中的时闻和时政中的教会文字事业的遭遇是本文主要讨论的两点。教会各类文字出版物中除宣传目的所需的专门文字外，内容最多的无非两类：对时俗的批判和对时政的记载。这里的时政主要指时局状况，教会出版物对时局的关切是为了适应读者时情闻知的需要。作为新兴的现代文化传播方式，新闻的需求量很大，也很准确，特别是避免“鱼鲁”之讹的准确性是第一要素，尤其是对时情时局的记载更要精确，这也成为会内外人士阅读教报、知悉时闻的途径，在缺乏视听媒体的状况下，文字阅读成为首选，特别是教会刊物又乐于报道时闻以增加影响，所以各刊对时闻的记载尤其详细。在上文对《左海公道报》的篇目统计中涉及时闻的几乎占总目的七成。在时闻宣传中，教会编辑人员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相当明显，或依靠清政府，或赞成维新，或立宪，或革命，或改良等思想并不划一，甚至在一刊中就有不同的政治意识的宣传。教会刊物成为政治宣传的喉舌，与政治意识的妥协如此，可以说教会刊物的宣传是两条腿走路的，时政和宗教作为弹性较大的关系对子，相互的关系在文字表述上是可以共存一纸而丝毫不觉得有不协之嫌，教会文字出版物的登载内容就是其中相协较好的一例。对时政内容的分配是有选择的，一般说来，教会刊物宣传的政治意识与当时的管辖政府步调有关，但也有由于在地方当局的保护下教报对中央政权的嘶哑批判的声音。教会刊物中的时政内容是教会宣传与时政相协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

作为神圣与世俗相妥协的另一方面是时局下的教会刊物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教会文字出版物林林总总的内容记载中教会刊物的“前言”、“后记”、“编者的话”、“启事”等文字记载了教会文字出版物的时政遭遇。每次大的更刊和延期以及最后的停刊，几乎都把最终的原因归结于教会文字事业所处的单位时间里的时局状况的变化，这是教会刊物本身的记载，这样的记载除

了有很明确的辩白声明之外，还具有细节的详细性可作引借，除了用这些细节的陈述外，教会刊物的时政遭遇还通过向教会当局进行工作汇报时所作的书面“禀单”、“报告单”等表达政治倾向，这样的单状陈述由于是教会人士所列，所以照样具有开脱刊物败落借口的作用，不过这里的禀单是建议性和实务性的，而非刊物登刊的那样书面化极强。除此之外，教会刊物的时政遭遇的现存依据无法它寻，所以本文只能就教会刊物记载和会议记录整理时局下的教会文字事业。

总的说来对教会文字出版物造成影响的时局大致无外乎两大类：来自政局的影响和来自信仰争执的影响，后者几乎全部是清末各地方教案以及民九、民十一年之后由于非基运动而显得比重比例较大。面对来自政治、军事、民间等变局较大的影响，教会文字在刊物中以声明等的形式用该刊物在时局中的变化来陈述对时局变化的态度，措辞相当谨慎，但大多时候视教会当局对时局的态度而定。福建多山，自古匪患较重，所以这种情形在报章上的体现是很多的，甚至于教会刊物的发行虽托付邮电部门，但是由于“匪炽”、“匪乱”等情形，往往造成教会刊物的散失，这使教会文字部门很不满，对匪、对邮电部门的谴责不亚于对信仰异端的驳斥。早期刊物由于篇幅所限，没有过多的编者书面意见的公布，后期刊物中这种话语俯仰皆可拾，此不赘例举。对这种由于地方骚乱所造成的刊物遗失，《福声》等刊物均采用预先多印数本，以备补这样情况下的遗缺之数，牢骚常常诉诸刊头。地方性的小骚乱是突发性的，而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然教会当局的文字称呼不是如此，他们基本的态度是挂靠于“政府”宣传所称呼的，包括对战争双方的称呼等小的细节都是如此）的进展却是宣传的主要内容和所受的最主要的影响原因。辛亥革命的影响是深刻的，它最起码把教会正在宣传的维新改良立宪等政治主张在实践中斥为落后，教会自后则很少宣传维新立宪等思想，甚至于也很少讨论。来自差会背景的西方各国所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教会，特别是对差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西教士的返国和差属西人之间的国籍偏见与神学偏见不分轩轻，战争对文字事业的影响主要在于经济拨款的最大来源由于战事而告紧，甚至暂时停刊。文字事业只是教会诸事业中的一项，但由于教会文字事业的上述非赢利性等特征，所以在差会短款的情况下情形更加凄凉。连实力雄厚的圣经书会也“因纸价增昂等事，消形亏乏”。广学会向来经费仰给于英国，“欧战发生后捐来款少，颇起恐慌，

曾经减入以节其用”。《圣公会福建教区月刊》在三十年代所出的刊物几乎每期都有铜板照片附在刊首，但在抗日战争中，教会情景不如昔，刊物的纸张十分粗糙，页码更少，印刷更加简陋，图面更加简单，铜板照片也很少见了，除了找战争的影响这个原因之外我们不可能再找到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时局对教会文字事业的影响正如上述，可以从对教会文字宣传意识和制形两个明显的方面来看。时局影响的前后阶段性相当明显，前日还在宣行晚清谕旨，今日态度则骤然转为革命，总之教会文字的宣传意识是与执政当局的态度一致的，很少有与时政宣传意识相左的，即便有，也是试探性的温和之笔，前提必然是教会意识许可的宣传。

来自信仰的争执是早就存在的，并且也表现在教会的文字里，作为文本争执，陈述着教会的态度，影响着教会的内外，宗教的争执各持一端。作为教会机构的喉舌，教会文字事业对于来自教外对信仰的驳难和挑战积极地用文字来陈述和辩难。最初的争执是文化上的信仰论衡，双方对于对方的文字表达思想未必清晰，所以偏执言辞在所难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台海两岸教案不断的出现，信仰争执已经由士绅等知识化的争执演变为士绅阶层引领下的激烈的偏激的暴力运动。北方的“拳乱”（教会宣传口气）使教案在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时达到了演进的顶峰，所幸其对南方联省自保的福建各地的影响有限。此时在其影响下的教会刊物的宣传语气与其说是教会式的不如说是殖民式的，但此后信仰争执的极端化趋势减弱，直到非基运动的兴起。作为“沟通文化的机关”，文字出版事业对非基一方的严苛措辞的忍耐是有前提的：涉及教会所办社会事业可，但是决不能涉及信仰的自体。但遗憾的是基督教会所招致的各方的指斥是无甚保留的，所以教会文字事业的反戈也是情理中的。“近来时局转移，反对基督教会的文字时有所见，而闽北教会不得不有相当的表示和解释”。方法措施是子之矛的方法，用文字作为反戈的装备，“前此文字机关不多，教会作品亦无甚发达，只有《左海报》、《公道报》、《教会公报》，最近有《奋兴报》、《崇道报》、《剑声》、《醒社半月刊》、《公理季刊》、《圣公会季刊》、《宗教教育季刊》、《协进公刊》、《觉社公刊》，尚有无定期刊物数种，最近当拟办一日报，以扩充文字工作”^⑨。教会当局对非基的措施是加大教会文字宣传的量度、加快教会宣传的力度，对非基的反宗教态度予以针对性的回击。信仰的有神论与偏激的无神论之间的白炽在

^⑨ 《闽北教会现状》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8年卷

北伐时又一次地表露出来，这次与北方非基的传播不同的是南方革命政权的政治意识的支持是主要的借助力量，并且是随着北伐军北上的军事行动而向各地传播的，军事行动对教会的“革命行为”所招致教会文字的反应是刊物种类的增繁，以维护教会在革命中的舆论支点。但革命本身对教会各种事工从政策上开始正确加以顺引，制定了教会学校的立案政策和各种刊物（包括教会刊物）的重新审查制度等等，在如此形势下教会信仰的“绝对自由”由清末渐渐归于政府的辖权之下，法治信仰开始初步确立，而非晚清的“条约信仰”制度。二十年代末的大革命给国内宗教界的冲击无疑等于向各种宗教注入了该世纪的第一次宗教激活因子。在1927年出版的《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如果说是宗教思潮的一次阶段性的整理，倒不如说是对宗教思潮发展趋势所掷投的一颗问路石，遗憾的是宗教文化最远也只能走到此。在国内形势影响下的教会文字出版事业秉承教会信仰主义，又深受会外政局的影响，不得不采取妥协的策略以迎合教会内部对信仰的需要，使传播范围更加神学范畴化，教区的影响加大，这也是教会在遭受非基后逐渐走向保守的原因之一。

教会文字出版物在与世俗新闻文字出版物的竞争中、在文化交融的胶着和相互附生中、在时政时局影响等状态存在中所表现出的教会方式，是其作为元社会层中的亚社会层存在的群体结构所衍生出的意识处理方式。教会的文字出版物力图保持文字信仰的干爽利朗，但是受囿于本色社会的影响只能做到有条件的抵制，特别是当教会文化正在微式的时候，在两者主动和被动之间的界限析分是暧昧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世俗商业新闻对教会文字宣传的影响，使其逐渐收敛其扩张的内核，也必然是教会文字状态在宣传的文化层面上接受来自中国的传统，更必然地向时政妥协，最后使教会文字宣传重归于信仰主义的本色化，其视阈也进一步缩小，直至国籍神牧学家的成熟和中国基督神学的成熟。当西方传教士二十年代初最后一次讨论完对中国教会的历史总结和未来前瞻之后，再也无力对壮大的国籍教会颐指短长，“中华归主”的蓝图憧憬只能从长计较，然文字的宣传作用照常，影响一直到建国时为止。

第三节 教会文字事业之发幽：赢利亏额的悖论、国籍编辑的传统情结、教会教育的文字扫盲和文字布道对教会及社会之意义

教会文字事业在诸多教会事业中属于消费教会资金最少的一种事业，与教会的“兴学弼教”的教育事业、“觉世醒民”的传教事业、“医病救世”的医疗事业和“赈济活人”的慈善事业相比，教会文字事业的社会意义主要在于“文牍救世”，以最少的经济投入取得最大的教会信仰的受益，成就的是识字者信仰沉迷之觉醒。教会文字机构的赢利目的相比较而言是不为教会目的所取的。文字编辑中国籍人员的传统情结是教会文字中国化的最主要原因。教会核心组织的文字信仰宣传与边缘组织的世俗化倾向之间的协调是教会文字成就的主要表现。诸多问题的存在使教会文字出现的最终结局是“直到今日，中国基督教仍然不能有效的掌握文字的影响力”^①，言过矣。教会文字事业作为时间文化层积淀中近现代印刷出版的最为凝厚者，对教会本身的意义和对社会的意义同样重要，这是教会文字对社会的意义之一点。

教会文字出版中存在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了扩大宣传影响，教会文字事业不断扩大发行数量，发行量越大宣传效果越有效，但同时由于教会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布道目的的信仰消费，所以教会文字多取折价或免费赠送，这样就会出现影响效果在发行量的基础上与教会文字的经济基础发生相辅相挟的密切关系。地方教会文字出版与全国性的书局机构相比，资金更是阙如，受悖论的支配更见明显。地方教会文字事业发行的地方特征是教会文字宣传的优势，同时也是其经济问题的弱势。地方教会一般把本教区或更小一点的堂会作为其文字宣行的标的，读者的本地本教会身份决定教会为谋求文字宣传强化信仰的目的，而采取补价出售或免费赠送等有悖发行行业价值规律的措施，这是由教会文字宣传的信仰目的性所决定的。最终的受益者从根本上来讲也并不是信徒，因为接受文字宣传物的前提和结果是必须接受随带的文字宣传的信仰，反而使信徒成为教会的目的而非决定自我信仰自由的主体，信徒牺牲的是信仰选择和与传统接洽的种种机会，接受的是教会的“归主”规范，最终入教会的意识层管理之套箍。这是教会望教者和初信徒在免费教会文字宣传物面前的遭遇。那么完全教友则在口传身教的业余，主动为教会宣传信仰，其中借用文字也是其惯用。教会文字出版事业的经济来源上面有

^① 林治平 查时杰：《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79 年 9 月

述，其中信众捐款资助也是主要来源，这或许就是教会文字宣传的最后目的的终端？如果说这样的推断太过于把教会世俗化的话，那么文字本身所宣传的宗旨往往开宗明义地陈述：为主奉献，两者之间的间、直接关系还会不甚明了吗？

教会文字在宣传中的效果性往往是挂靠在经济的充沛性上的，中间的途径往往是被教会当局所忽略，最终宣传目的效果和筹措资金支持是教会考虑的两个主要端点，怎样操作是文字机构的事，这样所造就的是文字宣传事业只取宣传目的为是，经济筹措只有教会当局支持力度不敷的时候才考虑。省略的中间过程就是教会的折价销售和免费赠送，这是过程不是结果，更不是目的，所以采用这种发行措施是教会一贯政策，而非时宜之选，因为信仰有多久的持续度，这样的措施就有多长的存在价值。《小孩月报》及其后续刊《开风报》（后在上海出版发行）等断续发行四十余年，其中，间隔停刊的原因就是因为“经费拮据”，作为全国第一份儿童刊物，该刊信仰宣传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最终的结局也未脱经济颓萎的窠巢。《新义》作为地方堂会的出版物采取非卖品的形式，“函索当即邮奉”，在着力扩大自己刊物宣传影响的同时，又在接连的启事中声明：“本刊未筹常费，如蒙雅好诸君惠赐印刷之资，不论多寡均所欢迎”，读者捐输和刊物阅读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显得更为直接一些，编辑人员一手递来印有十字的没有定价的“主招”印刷品，一手托着捐输托盘认捐，刊物的价值几何，了然在心。《闽南圣会报》作为闽南教会的文字机关，创办多年。“只因经济支绌，时刊时辍”，原因也在于该刊多为地方堂会集体订购（这也是教会发行特点之一，受教会当局所鼓励的发行方式），而在该刊刊尾则声明“凡代派满五份或十份以上合寄一地者，均另定有优待办法”，如此发行则对刊物很是不利。但是为了教会“宣传十字福音，报道教会消息”的需要，该刊也只有勉力发行，并掀起了“十友一报”、“五友一报”以致于“一友一报”等售报活动，同时也鼓励“一堂一万运动”的求捐活动。当然这样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教区内部，最终的结果是认捐之数还是不敷发行之需。“查本报续刊宗旨系以宣传十架福音，健全教会组织，推行五运事工，报导教会消息，籍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由于这样宗旨的限制，所以不能以射利为目的，“故对于所收报资，力求低廉，只及印刷费之一部分”，这样发行方式的结果是恶性的。“现今因销售数额，已超过预期三倍”，虽然其宣传效果可以说是相当可人的。但事实上的经济结

果是“致使不敷之款愈多，非请各地兄姊解囊协助，即势难持久与扩大”⁽²⁾，这样下去即便是再扩大，最后的结果还是资金不敷，发行量越大，亏额越大，这是教会刊物发行规律的必然，是教会信仰宣传使然，这样的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教会宣传主义的胜利和教会文字事业的衰落，两悖之选，重轻怎样衡量。教会文字机构作为教会的附设机构，其最终的宣传目的是为教会的布道服务的，是工具不是目的，但教会当局对这样的工具的重视是有限的和不足的，这样的情况不独闽南教会一家，台湾学者所理解的民国之后的教会文字布道工作，“因为缺乏有力的中国籍信徒及教会投入，而一蹶不振”⁽³⁾。教会附属机构情况也不会很乐观，《协大半月刊》起初只印三百份，免费赠送，不敷分配，又增印一百，勉强敷配，到第二十期已增加到六百份，但后来发行量停留在此数上下，由于经济由校方划拨，太过于固定，所以出版发行受限，这是对两难的举措方法之一：限制发行量，但这样往往不为教会直属机构所取，因为这样有违教会扩大宣传的需要。

教会对刊物由于让利和赠送而使刊物经济出现困顿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在教会宣传物上登载世俗商业广告，以此来解决暂短之款。对于世俗商业活动的参与，特别是有偿性质的广告登载是否与教会刊物非赢利性的性质有不和之处，教会刊物义务为教会宣传的性质怎样面对两者之间的芥蒂，对于广告挤占宗教宣传内容的可能性又是如何处理的，史实证明颇有旨趣可窥。福建教会刊物最早登载广告的推断应为早期在福州和厦门出版的中英文报刊，但早期的教会刊物在两个开放港口是随着传教人员的增多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时的两口岸由于集中了些许外侨，其身份多为传教士、商人和领事人员而一般的平民较少，所以读者也多为此类，并有专门的商业广告的报刊出版，如早期的《厦门时报与商业公报》、《福州每日广告报》、《福州广告报》等商业报刊专门有广告的登载。而早期教会刊物则很少有商业广告刊登，也很少参与商业行为。在福州出版数年的《教务杂志》直到迁往上海时也没有登载广告，一直是纯粹的传教内容，而少有商业气息，偶尔出现的是对教会出版的书籍进行介绍，并向社会各界推介，这与纯粹的赢利性广告是不可同语的。无法考证第一则商业广告出现于什么时间，但至少至清末光绪末年大多教会刊物都在尾页登载商业性质的广告，并在刊中明确标明刊登各类广告的价格。光绪时教会刊物上的商业广告以广告售卖洋货为主，多是在闽的洋行。

⁽²⁾ 《闽南圣会报》续刊第五期 民33年11月15日出版

⁽³⁾ 林治平 查时杰：《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9年9月

查在厦门和福州的洋行多在教会刊物中登载售卖广告，原因是教会刊物已逐步健全，影响也逐渐加大，并且早期的商业性报刊由于读者原因而闭刊，所以教会刊物成为各类洋行商业广告的主要刊登文本，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教会所附带宣行的西方文明意识奠定了国籍信徒的洋品消费的心理和生活惯常的基础。广告的物质范围林总：洋药、洋布、洋油、洋纸、洋酒等日常消费品以及洋制机器等生产用器具，多取“洋行白”、“广告”等形式在教会刊物中刊出。商业广告多为数期连续登载，内容一致，这是因为教会刊物在招徕广告的时候多将广告价位在刊中公布，愿者自选。《左海公道报》“广告刊例”出现在刊尾，列出了登载的价钱：期限分为一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和全年，版式又分为全版、半版和全版四分之一，各有价目，刊列在皮页表里的价钱最贵。广告的位置比较固定，一般在刊尾，多无插图，文字表述相对简单。也有如《奋兴报》的插图广告，但是较少。即便是刊物上的广告出现在刊尾也占用了教会刊物有限的纸张空间，如此如何协调刊物正文和广告之间的空间分配成为编辑必须考虑的版式编排问题，如果问题的解决是潦草和敷衍或者是偏多于商业广告，那么就有可能受读者（特别是信仰较深的读者）斥责之虞。在赢利以补助刊物资金的阙如和刊物内容净化要求的两难的夹缝里，教会刊物只能采取限制广告以迎合读者，否则教会当局的态度将取信徒态度为主。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并非全部的教会刊物都以刊登广告来解厄经济呆况，一些宣传时闻较多的刊物或者与教会核心信仰机构较远的机构的文字出版物多有广告，这也无可厚非，但另外如教会的核心信仰机构如教会直属的文字宣传刊物，则严格限制商业广告内容的登载，除非是“无碍教会声誉”的广告。

教会刊物广告在纸张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很难以广告的大量登载为取，教会信仰主义的宣传主题很难与商业的赢利目的相协调，所以教会刊物又多在刊物中声明“士商有广告欲登，请照刊例付件到馆，当即出版”，但是“刊费无论长短期，暨希先行惠付”，这是在广告价位规定后的经济上的限制表示⁽⁴⁾。除此在内容上要求“无碍教会声誉之广告”⁽⁵⁾，正因为如此，该刊一直没有广告的登载，所以以后在刊物的尾注中就不再提及广告事。但教会职员中对教会刊物的广告登载也有支持的言论：“《剑声》无防留些地位招登广告，酌收广告费，像医院学校旅馆商店使需要者有所补助试看很多书籍什志

⁽⁴⁾ 《左海公道报》封二“本馆启事”

⁽⁵⁾ 《闽南圣会报》封末之“广告”

都有招登广告收效颇大，”所以教会文字也不妨受广告登载事，但是前提是“因为普通报纸只知有钱没有审查内容实况，漫为登载，结果是诈欺取财。”所以建议《剑声》也登载审查后的广告“假使剑声销数多、印费轻，一面又得一笔广告费来补助就不至困难，阅者也不至失望”（《剑声》第十三卷第七期民国廿七年六月号）。教会物外宣传主题与商业图利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商业利益的选择是借靠刊物宣传来扩大销售，而教会宣传则取神学宣传为是，涉及教务和信仰讨论，两者的混合难以类同。总得看来教会刊物的商业广告宣传是受教会当局限制的，不是无限制地取广告费收入为刊物解厄基本方法的。教会刊物在出版实践中取的也正是这种态度，所以即便有教会刊物广告与教会信息争取宣传空间，那么也只是由于教会受自己公开广告态度的“招租”行为的限定必需按照协定来登载广告，否则就是违约行为。所以总得说来教会刊物在商业广告的登载问题上控制得较好，没有出现太多的“纷讼”事，这与教会刊物中商业广告的载量有限有关。教会刊物的广告收入在刊物成本中的比重较少，所以对于使教会从事世俗商业赢利（收取广告费）活动的评述则应该持积极态度，起码它对于教会暂时的经济缓和是如此。教会赢利为的是刊物的良好出刊，教会刊物的亏额主要为的是教会的宣传主义，所以两者的目的在出刊顺利与否问题上相衔接，这成为问题解决的根本，教会刊物面对这样的一个赢利亏额的悖论，解决的方法之一是广告费，但这决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教会刊物上广告登载量可说明一切。

教会刊物的编辑人员是教会文字事业的主要责任人员，如前所述，教会文字事业的编辑人员有非专任的特点，人员多由教区内各教会机关职员和神职人员兼职。这样的编辑人员安置使得教会文字出版事业宣传的宗旨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具体的编辑策略会随编辑人员的变化而变化，但不管怎样，教会文字事业的编辑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教会内知识分子信徒，几乎都有基督教家庭的出身经历，大多都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特别是当教会学校成熟之后），接受过多的教会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是从接触到的教会文字事业的国籍编辑人员来看，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表现出的文字意识在表面浮显的是教会文化，但在根深的层次上却是传统的文化情结，甚至表现在写作文体、表达思维、语词采汇、文化陈述的衔接等方面都被传统的影响所笼盖，教会文化只是外装点缀，真正的文化底色是传统（排除传统宗教之后的传统文化）。信仰作为最深层的思维感受，用直观所表现出的仪

式表达是教会文化的主色彩，而起着支配意识，但是作为情感陈述的关键却是以表现传统为取向的。教会文字宣传物中的七言、五言的诗韵和楹联的对整，流呈出的是编辑和教会文化基督徒的传统情结；借用传统典故来比附、诠释教会经典是不经意（或者说是为使教会文化汉化的蓄意？）的传统的流露；和西方文化基督徒在教内惯常采用教名称呼不一样，新教教会文化的基督徒即便是在神学论说意识酣浓的宗教期刊中发表文字也没有采用署名教名，让人回味的是他们的署名采用的却传统字号、书斋、籍贯等，这里所表达的文化蕴涵和文化归属应是国籍的、传统的；言论中对传统宗教（包括对风水、厚葬、面相说等陋习）的驳难是对传统文化的修正而非颠覆，传统情结释然而生的是对传统中非宗教文化（特别是文化精髓）的呵护；文化基督徒的传统情感最为挚深的表现是为会中“乐赴天国”的信众、神牧所做的传记，单从文字看来，这些传记完全与世俗传记无甚差别，笔触所油然而生的绝对是传统文人的那种念怀之情。教会知识分子的传统情怀是伊伊浓厚的文化积淀，析分缕出的是传统文化广博的文化精髓，而非舶来之教会新知。早期的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物中，对传统文化怀意的批驳用意在于传播基督神学，所以早期编辑主要是西人的文化意识的流露，而随着教会教育的成熟和文字事业的国籍本土化，所以在教会文字事业中出现了教会学校出身的华籍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一种群体用自己所体悟的神学理解来影响国籍信众，这是教会文化国籍化中最大的本土化，也可以说是教会文化本土化、民族化的最为显著的神学本土化。教会文化基督徒的传统情结以教会文化的习慕为开始，以传统文化的承袭为结束，在教会文字表述上则更具体、更显见。

华籍编辑的传统情结与教会“天国主义”的宣传原则之间所出现的尴尬、与新式新闻文体体裁以及与差会西人之间的磨和是一个自然的漫长的过程，之间的冲突也是有缓冲的博弈之争。最终的结果是两相妥协，出现文化的杂和，但是在杂和的文化中，言于表的是教会文化，言于里的是传统文化。与西差会传教士的文字表达意识的冲突是很难见诸报端的，大多的国籍译著中传统典故的运用无疑是译者的加工，这样的译著借说是否符合原作者之愿，答案是显见的，而这成为教会知识分子在译述时的惯用。新式新闻体裁的适应是从接受西方文化开始就具备的文化承载力所能够适应的。教会学校出身的知识分子对舶来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能用传统眼光挑剔接受，最后加工，新闻体裁也不例外。在教会文字刊物中文体的选用多取自文白和浅显文理，

文言雅驯之作罕见，这也是两者磨和的结果，更是问题解决的途径。教会“天国主义”的宣扬是教会文字出版的支配宗旨，不管形式采用如何，信仰主义的有神论是宣传的基石，宗旨所标榜的“因信称义”靠传统、靠教会的两条腿行走，无所倚重，形式的选择是早期传教士争论后的结果⁽⁶⁾，所以争议虽在，但呼声不够。教会文化在文字上与传统的争宠往往以教会文人的成长成熟而圆融解决，这是两者相互妥协的结果。

例举几个福建教会编辑人员中最明显地具有传统情结的传统文人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最适宜的。叶见元，隶于福建圣公会，是《福声》等圣公会杂志的编辑人员，一度是《福声》的主编，是当时教会名人，出身于基督徒世家，但“恨未尝得教会教育之栽培”，所以自述“经意道学一知半解”。其基督信仰几乎来自“庭训”的家教言传和“耳目濡染”，对于“翼教辅世之精详条理”也可称为精道，足称为教会中的文化基督徒。圣公会委其文字干事之工作，从而“为主宣劳”⁽⁷⁾。在教会文字编辑的工作之余，叶见元根据其父四十年的传教经验编写《梦园拾遗集》，信笔随录，随辑发表在每期的《福声》上，自言其集“材料粗率，不足值大雅之一噓”，大多的内容是“闻其事者条释而发挥之”，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子用传统的文化模式阐释教会文化的经书等精髓文化的现象相当集中和具有代表性。集中分别对于传道职员、对于能文之会友、对于学生者，甚至还有对于儿童者等分别采用专题讲经、五言七律诗歌、三字五言七字之歌体和谜语解经等与其接受程度相适应的文体陈述。集中文体的适用容度相当大，借用传统的文化表达方式也很明显，使教会的经学遴选内容以不同的形式表述出来。比如为儿童和初信者所出的谜语解经中第一课 34 谜中有“一树不可食”等简单明了的谜面文体陈述。但对于知识信众则采用五言七律等艰深形式，《赋得三圣投炉活四人：得人字五言六韵》就相当具有传统文人借用典故的创作手法。对学生的三五七字诗歌则只取韵脚而无多少典故的运用，很适合学生的阅读理解需要。《马可福音七字歌》经文中事件的陈述较多，没有对经文圣经的熟稔是不能具有如此灵活创作之释然方式的。释然的运用不仅是对教会文化的而且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字表述的熟稔在心，这是教会文字工作者不经意的文化承袭的表露，是至为深层的。教会文化表层的语言的表达出于信仰表述的需要和职责的必需，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其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表达不分文字还是口头

⁽⁶⁾ 参看在华传教士的四次峰会的争执和所达成的一致意见

⁽⁷⁾ 《梦园拾遗集》(序)转载于《福声》“特载”创刊号 民 20 年 4 月 1 日

都是思维和意识的外在化，国籍文化基督徒的传统情结至深至大，大者深者足可包容教会文化而丝毫痕迹不露。《梦园拾遗集》仅是其中一例。

教会文字出版物的文字表述中，作者的传统情结表现出的直接性可能还借用传统诗词的词牌，诸如《忆秦娥·送伍会吏回国有序》、《干戈未定欲何之·仿辘轳体》等传统创作方式则多见于教会刊物的报端。另有“福声吟社”等教会文化基督徒自由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也可以表现教会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做合。该吟社活动多为教会诗歌的创作经验交换和征诗等，很类似传统文社的诗赛等活动。该社“以属草余间，效结莲韵事”。诗歌的征诗第一则就规定“眼字为‘福’‘声’，格用魁斗”，根本没有什么创作形式上的信仰主义，而是严格的传统的律诗创作方法，几乎每个教会刊物都有征文的活动，大多与此同。但是在教会隶属的范围内诗歌征文则勉强赋以神学要求：“迹维五运之工作方兴，不妨寄吟咏，以探索经文”⁽⁸⁾。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教会文化基督徒的传统心理起支配作用，拿福声吟社来讲，其对传统士子文人的风雅事好表现得透彻点滴，对于“今夫剪红刻翠，虽文人之结习难除，而讫雅扬风”，则羡慕不已，传统文人习气俨然。基督徒的基督信仰仅仅是其精神生活方式之一而非全部，世俗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与传统文化衔接的精神表白方式对之更具吸引力。这不是文化基督徒精神的回归而是精神的本初或本原精神的溢露，本原的不是教会文化而是已经深渗于其思维、生活、行为的精髓的传统文字表述方式，教会文化只是其中的精神皈依之一，很难说是其思维的全程。传统文字所表达的神学意识与生活方式的传统文人习尚化之间的不经意的和合，是近代文化基督徒难以脱解的窠臼：神学意识的选择有很多理由，文化继承的被动却一丝的借口都不用找借，传统文化影响的本身就是“与生俱来”的。

文化基督徒在教会文字事业的服务中，所表露的传统文人的期期艾艾和闲适很难适应教会新的新闻文体的快节奏和时效性，教会文字出版物中不乏因文字编辑人员的庸懒或习尚不和而使刊物断续停刊的，《剑声》是其中一例。《剑声》停刊多次，续刊后，期刊号顺序连前。由于该刊“形式叠备，而力量极微”，更由于“不有专人管理之”，出现的情况是“轻文字事业”，如果想求得成效卓著的话，则“非由专门负责办理不为功也”⁽⁹⁾。《剑声》的三次停刊主要原因多在于编辑的非专门化。第一次仅出版到第一卷就歇刊，

⁽⁸⁾ 《福声吟社征诗引》载于《福声》“特载”创刊号 民20年4月1日

⁽⁹⁾ 袁迅：《教会应注意文字事业》载于《剑声》第十三卷第七期 民27年7月

第二次出版到十三卷，“所以停刊，以无人负责为其最大原因”，而教会刊物经常遇到的经济原因则“居其后”，所以有人建议“剑声是文字事业委员所担任编辑的，希望本年文字事业委员个个都能共同负起责任来”⁽¹⁰⁾，因此在第二次复刊的时候就专门“举职员、选总编辑和各部门的编辑，分头任责”⁽¹¹⁾。《剑声》的稿件来源主要是各职员委员的撰述和征稿，这样消极等待的积稿方式无疑会减轻编辑人员的创作热情，还满腹牢骚，埋怨停刊的原因在于“肯负责的义务编辑人员和供给稿件来源太少的缘故”，这样的现象在于“延平年会界内的牧师和教友，足以胜任编辑的人才确是有的，可惜得很，各有各人的事业，要得一个人把他的原有事业放开，来担任本刊专责的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转求兼任的人员来充任⁽¹²⁾。最初15个兼任人员的挑选多是以教会学校中的文化基督徒来兼任的，除了本职工作的繁忙等客观原因之外，兼任编辑的传统灵感与尽兴式的创作方式很难适应即时即事的编辑创作的需要，稿件的滞后推委在所难免，这是主观上的原因。主编一职对刊物作用重大，但是《剑声》刊的几任主编都“抽身引退”，借口很具有传统的“学识不足”、“才不堪任”等谦词，实际上是不堪编辑工作的“任务麻烦”，使之“精竭神疲”，传统文人的清静嗜好被涤荡无存，加之“总编辑一职皆义务式的”，所以“人人惟恐被举为总编辑”，几至于出现副总编辑“叶牧师因职务关系硬不肯就，致此剑声月刊几于停刊”。编辑工作的程序只是“勉强附会的将诸君稿件稍稍看过而付梓”，这虽是作者的谦辞，但至少道出其中的编辑工作草率的要理⁽¹³⁾。《鹭江报》编辑12人可分为三类：厦门地方知名人士、厦门及闽南各地的基督教牧师或教士、受聘的知识分子。后者7人计，他们主要负责日常办报的编辑、记者活动，经常在报上签署真名或笔名文章（大多是向教者或倾向新学者），“在社会上代表英国传教士和厦门一带（包括闽南城乡）基督教会的地方势力”⁽¹⁴⁾。编辑人员编辑活动的趋向之一便是教会宣传的代言者。教会文化基督徒对文字事业参与的热忱是文字出版事业昌盛的主观基础，传统的文化操作模式与新式教会文化操作模式的不同是教会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隔障，即便是两者中间的沟通者——教会文化

⁽¹⁰⁾ 胡贞友：《开头几句话》载于《剑声》第14卷第1期 民29年1月

⁽¹¹⁾ 《卷头语》载于《剑声》第十五卷第一二期 民31年1、2月

⁽¹²⁾ 《复刊的经过和前途之展望》载于《剑声》第十五卷第一二期 民31年1、2月

⁽¹³⁾ 《剑声》第13卷第9、10期 民27年9、10月

⁽¹⁴⁾ 郭稼：《厦门首家现代报刊〈鹭江报〉》载于《新闻研究资料》总第50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7月

的操守者（教会文字出版的编辑者）对两者的倚重态度也是不同的。教会文字工作者的传统情怀是文化继承的个体对文化整体的选择依据，所以教会文化所遭遇的是来自文化上的主客文化的争执，文化参与者的主动倾向性是两者在文化规律的“丛林原则”的竞争中的关键性的偏向力量，适者生存。教会文化参与者传统情结的血亲脐脉联系所表达的是教会的衣钵、传统的血脉亲生子的关系。

教会文字事业与教会的教育事业息息相关，成败挂在一起，教会文字对教育特别是扫盲识字教育所表现出的意义是本文要陈述的要点。教会刊物中有专门为儿童出版的刊物如《小孩月报》，采用榕腔罗马字作为语言文本选择，这从一个角度说明教会文字宣传的干脆彻底，意图将各类读者囊括于会中，文盲也不在排除之外，毫无遗漏。教会诸事业中对文盲识字教育的活动比比皆是，成为教会最有益于中国近代化的措施之一。教会在晚清政府对地方民众的识字启蒙之前就已经在努力此举了，其中教会文字出版事业出力尤其着力。教会文字事业对扫盲事业的贡献主要在文本等印刷品的出版提供、宣传新的易学文字（诸如地方腔罗马字）等方面。教会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可溯源头之一对近代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地方性的各类事业的近代化。教会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亚层次社会组织，有着自己求鹜的各类相应的机构设置，在满足教会必需之外，对会外世俗社会的作用是主观目的之外的意外的桑榆之收，教会的识字运动是其中一例。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国字的拉丁化”的讨论和运动与其说是政府的自觉行为不如说是教会罗马字创始的启发影响⁽¹⁵⁾。罗马字的创设对地方文盲的意义更大，罗字也成为文盲信徒赴奔信仰之国的借助工具，这其中教会的文字创制作用贡献极大。单就福建来说，教会创制的地方腔罗马字就多达数种，福州腔罗马字、兴化腔罗马字、建阳腔罗马字、连江腔罗马字、闽南腔罗马字等。本文拟以兴化腔罗马字的创设过程为例，来探讨教会文字出版对扫盲的文化活动的意义。

兴化腔罗马字的创设是在美以美会兴化年会中西职员共同参与下完成的。美籍传教士蒲鲁士和国籍牧师宋学连将福州音罗马字母平话，改变为兴化音罗马字母，这是一种简易的、新的读法。文字创设之后又由蒲氏组织发行兴化腔罗马字的《奋兴报》。并刊印由蒲氏夫妇等编写的《罗马字母书》、《耶苏图说》、《依经问答》等罗马字书刊，为文字宣传提供识别的蓝本。教

⁽¹⁵⁾ 文见《中央宣传部发表关于中国字拉丁化问题通令原文》载于《广闻报》第五卷第三期 民27年9月

会在制定了罗字之后，凭借教会当局在教区内的影响，强力推行，“命令男女教牧人员及部分负责教徒首先学习，继而用罗马字翻印圣经及其他教会书籍，普遍推广，籍以进行‘愚民政策’”⁽¹⁶⁾。教会文化活动本身的目的和性质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仅就文化扫盲活动的本身做简要探讨。蒲氏对文化活动的挚着热忱是不遗余力的。在文字宣传十余年后，教会的兴化腔罗马字报《奋兴报》并未达如期宣传效果，原因是早期的主笔多为不谙乡情的西人和当时文字的普及力度不够。教会当局为扩大其文字宣传的力度特意于1916年在黄石筹议“按期开办兴化音罗马字识字训练班”，并制定了详细的规定章程，以图长远计。该训练班的宗旨是“补助促进教育普及”，职员为“各传道为所长，招选明识信徒，加以训练，备为教员之用”，并且要求“各处都要开设新字传习所”，“各个堂会应设一所，若要设于乡村，须有五人受业，方能开办，人数愈多愈好”。课程分为两年，最初是从新字母开始学起，所用教材是兴化美兴书局出版的罗字书籍如《圣经图说》、《主日学课》等。此后1933年教会对罗马字的宣传还相当热心：该年开办的识字训练班人员经考试及格，录取发给毕业执照。推行结果令教会欣慰：莆田三连环考取四十名，仙游连环三十二名，录取受业者莆田廿五名，仙游七名，“短期考核结果成绩，能读罗文字母、圣经及教会罗文书刊。仙游东连环受考及格者，男女共241名，仙游西受考及格者，男女230名”，其它不累举。“因为有各次训练兴化平话新字运动，所以兴化年议会，有很多男女信徒，能读罗文圣经及各种罗文宗教书籍，且能运用新字缮写书信和记事记帐等”。文化的普及和扫盲的部分目的达到，这是教会当局借助文字出版事业的宣传品对文化运动的贡献之一。

除开办各种罗文（教师）培训班之外，地方教会还在有条件的堂会举办各种形式的识字班，专门授受罗文和简易汉字，开展识字运动，培养了大量的文字初识者。“各个教堂应实行教人识字读经；各个教堂应开办平民学校；各个教堂应择适宜时间，11、12、1、2诸月为识字运动时间；能读罗文者不可放弃，应努力继续”⁽¹⁷⁾，为教会后继信众的绸缪之举考虑详备。除此，教会当局还开展读经运动，这是变相的识字运动，“每个教友应有一本圣经，每个教友应能读圣经，有基督化的生活，每个教堂应有日常的查经班，每个教堂应于适当的时间举行读经运动”，诸如此的要求繁多，实际上这是教会

⁽¹⁶⁾ 《兴化卫理公会史》（油印本）卫理公会兴化年议会办事处编 1959年9月5日

⁽¹⁷⁾ 《兴化年会录》1930年

当局所组织的文化参与活动。经书教材的来源是教会美兴书局的印刷物，从罗文到简易汉文，从圣经到刊物、宣传单、小册子等不一而足。教会文化氛围的源头意义肇始于此，教会文化的民众基础也奠基于此。不过与文化基督徒的教会文化的参与不同，地方堂会的识字运动对文字的运用是初级的、启蒙的，不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对教会文化的深入，正如同现在的扫盲意义一样，但是教会的文化启蒙作用则褒贬不一，众口烁“金”？

兴化音罗马字的识字班根据教会当局的要求发动全体教徒学习罗马字，甚至学校中以罗文为教科书，年会中以罗文为记录专用文字，新收的学习教友以能读罗文为合格，“其企图是使乡下不识字的会姆会嫂，能用罗文写信，可以与所谓西教士报告各地的情况，同时初来的男女西教士，因语言未通，也可以籍罗文与传道教友互通意见”⁽¹⁸⁾，当时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编排可能有所偏颇，但至少说明了其中可能的目的性之一。教会文字在这种意义上来讲还同样具有文字的专断权和识字的信仰前提等缺点，如果从实践的效果上来看教会的识字运动则有可能是失败的，特别是教会内部的文字表达与会外的文字交流恍若隔世，更别说与其它地方语种的教会交流，所以具有很强的内敛性而缺乏必要的扩展性。但正是在内敛性特点的教会自我张力上来讲，教会的识字运动在罗文的选择上无疑也存在瑕疵可以挑剔。兴化教会 1948 年将罗文定为兴化教会的当局使用文字，规定罗文为男女教友必读，推动各牧区堂会男女教牧人员举办信徒读书会，相形热闹。兴化音罗马字读书会的宗旨是“补助促进教育”，其与汉字传统的争宠是对学习者要求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罗文的结果是客观的：罗文在汉字传统环境下是失败的，沿传于今，罗文字母早已不见踪迹。况且用“左”的时期的文字陈述来看罗文在中国遭遇结果的话更能说明瑕疵所在：有一个女传道控诉说“当她在传习所读书时，美帝分子不许她读汉字，她的丈夫曾经教她读汉字，她一读汉字，就被帝国主义分子责骂”。另有一个女信徒也控诉说“罗马字真没有用，读了罗马字还是文盲，有人问她，你有没有读书，她说‘有’读不识字，她说‘不识得’”（原文如此，作者照引）⁽¹⁹⁾。读书不识字矛盾之根芥在于罗文的传习与汉文格格难一，所以造成文字的分野。汉字的习传者大多是传统私塾和教会部分学校，而罗文作为教会专署文字仅在信徒中传播：会姆、会嫂、小孩、青年、成人甚至老年等。文化扩张工具的选择措施要适当，否则将如兴化音罗文字

⁽¹⁸⁾ 《兴化卫理公会史》（油印本）卫理公会兴化年议会办事处编 1959年9月5日

⁽¹⁹⁾ 《兴化卫理公会史》（油印本）卫理公会兴化年议会办事处编 1959年9月5日

母的文化景遇一样：读书不识字。教授识字本是教会学校的义务，但由于教材等文本的选用与书局等所出版的文字文本相联系，各地方教会的年会“报单”除了把信徒入会人数、信众捐输多少作为年成绩之外，还往往把教会取得的识字信徒的多少作为成绩，向兴化年会报告，以邀其功。事实上教会“扫盲”活动的多数效果多如上述，是读书不识字的结果。不过教会对民众的文字传输的文化普及（有限范围的普及）是具有很深社会意义的，文字出版在这种意义中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来自教会人士的说法是“西洋教士想加速推进福音，乃发行杂志，无形之中又被他们发现觉汉字的缺陷，为便利阅读，他们就采用官话与浅显文理，更采用方言与罗马字，这些而今已成了改革汉字与汉文运动的滥觞了”⁽²⁰⁾。这些文字的采用，教会人士看到的只是一面，正如他们看到汉字的“缺陷”一样，这种文字的出版存在更强烈的缺憾：与传统隔离，造成文字表述的障碍，使教会“扫盲”并不见成效。教会文字适用上的地方方言之选也存在瑕疵：“福州话圣经译文多假音之字，杜撰之文，职此之故也。当日译者或亦知其谬”，之所以没有更张是由于“一则，习俗沿用既久，骤难变更，二则，音存字晦，不得不别制新字，以为替代，或假同音之字，以谋迁就”，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教会人士也承认“此道不可从也”⁽²¹⁾，方言文字的造作也是教会文化的借助途径，但是效果正如此论“不可从”，对扫盲的意义也有与传统文字割袍之嫌。

教会文字出版的最终目的不在传输世俗知识，而在于“文字布道”，世俗知识的授受是不经意的结果，或者说是工具借用途径。教会文字布道的作用自教会印刷品出版的第一次就被传教士论述多次，在近代的教会刊物中、在大会议论中甚至是专著论述中多有讨论。本文作者只想把观点陈述一下，不想就论述本身进行论说。教会文字布道出于宗教宣传目的，是各种布道行为之一，对于它的重要性，教会文字工作者多持支持意见。教会人士对于其传教布道的作用则更多支持，书报使信徒坚定信仰，坚实与教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教友方面为了误会和妄信，而冷淡动摇，离经叛道，甚至暗里破坏，明里反抗，无所不用其极”，出现这种信仰状况解决的办法竟有靠教会文字读物来使其“迷羊知返”，“其中有半数的竟然能够觉醒，他的悔改返正都是仗着书报之力，就是我们的信德也是赖它的保持”⁽²²⁾，书报文字的作用

⁽²⁰⁾ 汤因：《中文基督教杂志总检讨》载于《真光》第37卷第4号 1938年4月

⁽²¹⁾ 丁昌华：《福州话圣经译文之研究》载于《福建教区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 1934年11月15日

⁽²²⁾ 张世尊：《文字与五运》载于《福声》第二期 民20年5月1日

在教会当局观念中依赖程度的痴迷不亚此言。因此下面的鼓动就不足为奇了，“（教会要达到它的目的）尤不可不利用此文字宣传，去唤起全国各教会的注意与努力，鼓励指导全国各职员的发奋进行，和劝告训练全国诸信徒，使一面能够明了五运的意义，而消除种种误会与怀疑，一同起来赞助推行；一面还能奋兴灵性，提高程度，确切认识那稣（耶稣）而效法他，表彰他，籍以引人归主，洗除罪恶，改造社会；并把福音真理，救世大道，及耶稣的人生教训，昭示于社会，灌输于各界人士的脑袋，使他们认识了解，和信从，因而改过迁善得基督的生命”，文字宣教的布道作用也不会乎于此说了⁽²³⁾。文字宣教的价值在于为教会所做的宣传和为神学的传布，文字宣传所做的举措多端，其中一种最富有宣传目的的是一种称为“福音连索”的传单式的宣传物，收到此单者需要誊写七份，辗转传布他人，因因相传，影响极大，但是从实践上来讲，这种连索是手抄宣传单而非印刷品，但是作为文字布道的一种，“福音连索”这种传销式的宣传无疑在作用影响上是巨大的⁽²⁴⁾。基督教文字出版对教会的意义重在宣布教会的各种主义主张，但是在教会文字事业机构的报告书中教会文字事业的成就显然大于教会文字事业实际宣传效果，特别是对会外世俗社会影响的估计过于偏高，从而使教会失去审慎的决策态度。教会文字工作流弊之一（夸大工作效果以使教会工作顺利展开）使教会当局往往流于工作成绩的考虑，而非教会长远计，这也是教会民国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

基督教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也称现代化），时人对之的态度是称其为文化侵略，且置教会文化事业的性质而不论，专就文化输入的方式和效果来看，教会文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是显见的，除上述报刊的肇始意义、局限的扫盲工作等等事工之外，对白话的推波助澜是明显的文化活动之一，并且影响深远。白话作为一种文字表达方式由于其浅显而受市民阶层欢迎，但也正因为此而受到士儒阶层的漠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的三大主张成为时代文学革命的宣言，白话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重开新纪元。白话文体的采用可回溯至元明以来，白话小说、曲本等流行民间市民社会，是为白话的萌芽。进入近代，这种白话伏笔的远因成为教会文化借用传统文化的新途。

“（传统白话的影响与教会对白话运动的影响相比）极大的影响实在是我们基督徒所译的白话圣经，以及罗马字母的拼音字啊！”，教会采用白话文体的

⁽²³⁾ 张世尊：《文字与五运》载于《福声》第二期 民20年5月1日

⁽²⁴⁾ 陈仁义：《文字布道的一种新方法》载于《福声》第九期 民20年12月1日

原因是“当时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见觉我国文学艰深，不便使浅学的人们皆知经旨，因此译成国语土白两种圣经和罗马字母的拼音，做个较易学习文字，传达语音的工具”，该文作者指出“顾颉刚先生说：‘欧洲教士初来东土的时候，嫌华语华字难通，便利用罗马字母拼音来替代，已经伏下文字改革的动机了’⁽²⁵⁾”。中国文字改革特别是民国的国语运动、白话运动、拉丁字母运动等文字改革运动的研究者都有提到教会对白话拉丁字母的推助作用，对此大多持的是文化上的肯定态度，而非传统学者的文化侵略态度。文化的杂和是文化前进的助动力和基本的维持力，单亲的文化繁殖是文化逐渐衰落所力避的原因。教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杂交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可溯源头之一，是近代文化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次，白话和罗马字母是为其中的一例，成为两种文化交和的介质，文化模式的泛化在文化交接的边缘必然是文化的类似，而不是某种文化的专断。文化是精神和物质所表现出的思维意识的加工，特别是诉诸文字表达的文本文化，教会的精神载体和传统载体籍借文字本身来沟通，白话成为沟通的历史介质，是必然的。

先贤对教会文字出版物的评述多集中于新闻和文化载体的交流作用上，本文这里不再赘述，而教会文字对教会本身的作用的论述则是避回态度。教会文字事业对于教会的作用秉承教会的有神信仰主义，宣传基督神学，主要是布道传教的意图。教会文字宣传事业是与其宣传的支持机关在教会信仰中的信仰位置有关的。一般来说，教会的核心机关如教会当局本身宣传的主要支配意识就是教会的天国主义，所以其宣传的神学信仰内容的浓度较高，但是作为教会附属机关所组织的文字事业机构，其宣传的是机关本身的世俗参与内容和教会内容，所以在神学内容的比重上不如核心机构的大。文字宣传对神学宣传的意义决定于组织者与世俗文化的参与程度。核心与边缘组织的神学宣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对教会对社会而言都是如此。教会核心组织（以宣传神学信仰为标准的划分）最具神学信仰宣传意识，教会书局、教会出版的书籍期刊和神学著作等是为观。边缘化或者已经完全世俗化的出版意识在组织机构的出版需要中表现的是世俗倾向，附属机构的宣传内容多与世俗有关。对教会的神学信仰如此，对社会的作用恰恰相反，世俗作为衡量的核心只能以附属机构为取价的标准。

⁽²⁵⁾ 甘施恩：《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化》载于《福声》第五期 民20年8月1日

教会文字宣传与传统文化的机缘之和

教会文字宣传与传统文化的翰墨缘分是西方文化主动的宣行和中华文化的被动承接的过程，但是在接触之后教会文化逐渐失去其本有的附带殖民色彩的扩张力，在中华传统的别景下润饰着传统文化的温润厚博的文化底气，两者的胶合之状使文化承接的个体在两者的选择中首鼠难判，所以在教会文化承袭者中间有叛教之数，在传统文化中有慕教之人，甚至在不同差教会之间也有信仰的选择，两者的机缘和合与其说是文化上的倒不如说是社会层面上的底色相触。传统文化和教会文化和合的途径是文字的籍借，文字在文明的传输中不断软化着两种文化之间的临界界面质的文化边缘，使之表现出文化的可宽容主义，两种文化的有机衔接才成为可能。教会文字宣传物从神学宣传意义上来讲是教会动用的操作工具，是工具而非目的，但是从教会文字所附带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教会文字出版事业本身就具有社会服务的直接目的，是目的而非工具，教会文字对教会的意义和对传统中国的意义并不受教会目的的决定，是受之于文字所带来的客观效果而言的。与传统的接合是不断摩擦的，使中国近代文明受孕于中国传统而襁褓奶养于西洋文化，其中教会文化中的文字事工所起的作用是醒目的。

两种文化的对话需要最初的译传者，教会文化的文字先锋正是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从神学转于对世俗科学、时政等的关心，又从世俗转于神学的纯净，过程是辗转颠簸的，传译的是西方文化的精髓，传译的更是中国传统的精髓。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由于话语文体的差异而造成的文化误解，但是两者的话语对白最终发出的声音归于一个：近代文明的近似性（或全球化）。接触后的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之间交流的媒介已属多余。教会文字所扮演的中国近代文明的先锋和媒介文化，对传统的态度不是否定，而是批判，试图修正传统，使之自觉地进行文化的反思。清末新学的广泛传播是“受鱼”于教会文化的启蒙，教会文化的“渔鱼之技”，则通过暗示的方式传输，传统对之的理解力是近代文明行走短长的重要衡量。近代百年的跋后证明中华传统的试探性革新不能以温和态度而是以冷峻的态度投匕于自身的赘瘤，维新运动的文化反醒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反省的比较是问题的答案。教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表达是教会文字出版的最主要色彩，但是目的之外是传输西方文化的实用来配合教会文化的宣传底蕴，与传统的碰撞是

深层的底色之间的斗争，结果是耐人寻味的。但是教会文字的作用却很是明晰：西方文明的兜售者，文化的掳客，文化侵略的先锋？无论什么样的称呼，它的作用都是客观的，符号化的称呼并不能真正概括包含整个教会文字事业的社会作用，留给思考的人们吧！我们叙述的任务已经完成，或许我们的研究挡堵了智者思考的灵睿之光，我们愿为此而道歉！正如教会文字所表达的对传统的犀利批判和温和劝诱两种态度一样，我们更愿接受贤达反正两方面的陈述评说。

结语：新的文化模式：来自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的表述

基督教自马礼逊开始传入中国以来，几乎两百年已经过去了，其在中国的文化生繁增殖能力可以说是与目共睹的事实。中华文化面对这种强劲的文化拓殖的扩张，其态度由先前的自矜而后审视而后临摹借鉴而后全方位学习引进，最后是文化近代化地趋同，其中的主客文化的分野已经不是十分明晰。这里国人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是附着于对夷学、新学、洋学等的态度的，本来欧美文明就是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对基督文化的承受转载与消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啻为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意义。只是近代化之后的整个西方文明已经近趋多元，而不再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单元文化模式，文化的趋同在近代的演化不再是自然的文化渐进，而是文化交合的骤进，这与近代文明的快速膨胀关系紧密。晚清中国社会在自我演进的漫长文化自然进化中，自然少却了许多外来的助力作用，因此文化的进度明显慢于交流文化模式下的西方模式。但是以坚船利炮所打开的文化缺口是文化的扩张，而非主体平等下的文化交流，但至少这也告诉我们：文化的融合也可以采借文化的单方面主动移植和文化的另一方被动承受这样一种融合的模式。

早期入华的基督教文化主要的借靠工具是语言和文字，语言是地方的方言，文字是中国通用的文白。为了进行文化的拓殖，早期来华的商人、政府代表人员以及为数更多的传教士，他们文化拓殖的各自目的不甚相同，但是其对中国传统的“颠覆”却无多大相异之处：意识上的颠覆，以至于这些都成了中国近代化的最早源头之一，这里我们无意否定中国传统文明进化本身的近代化渊源，而只是强调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在早期的文化交流中，传教士所操守的有神论的异质信仰成为文化拓进的先锋，传教士成为文化交流界面中间的“文化掮客”——买卖西方和东方文化，试图使“神”的国再次回到东方，尽力使上帝成为文化掮卖中最大的利益收受者，最终使“中华归主”。早期传教士在信仰的荆棘丛（中国传统的有神信仰领域在传教士看来是种存在，更是羁绊天途之路的荆棘）中小心地挑开文化之间难容的榛刺，寻找可以教化的“灵粮”果实，首善之人难寻，特别是在传教的早期，在神学的挑剔中不免有粗糙和急率，最大的结果是教案的迭起和文化上的相互抵牾。文化的交融是由核心首先开始还是由外在的肤表开始，这是两条不同的文化交融方式，在中国，两种方式都有历史地尝试：神学信仰作为文化的底质，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基督教文化是作为西方文化精髓的内质而首先

传入中国的，文化的底质交流可能太过于草率，特别是对于一个有着相当文化底蕴的宽博文化来说更是欠缺思考的急率，当然这种以文化底色为先的文化传播方式是传播多于文化摄取的单方面买卖，最终的结果是漫长的天国之路，除了等待还是等待；而另种文化交流是采之于表的主动的文化摄取，这里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从炮火离迷中开眼看世界到洋务求强求富到维新改革尝试直到最后的中国近代化的成功，这是一个过程，其结果很难有成说。

西方差会传教士来华，宣道上所适用的布道方式中影响最为深远者，无非文字布道是也。文字布道由于文字除了独特的传播持续时间的可容度长等特点之外，还由于中国传统的惜字惯常使然。早期的文字布道所采用的单张方式今天还依然是盛，这是基督神学的初始化。随着整个西方差教会的不断健全和各类社会事业的相继完善，神学深化所需要的各类物质和知识资源大体具备，特别是教会学校培育的大量“福利”神学生对教会神学承接上的意义，所以对文字而言，教会信仰已经具备文化采摘的成熟条件。中国传统熏陶下的知识识别者对教会文化的通融改造是必然的，教会文字事业也由原来的西人文白不雅的编辑风格一转为对传统文化的无意识的借用、对神学的有目的的诠释，最后归结于传统下的汉语神学的最终形成，这几乎花用了“上帝”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但是最后的神学信仰和原本的“上帝之笈”在文字意义的授受上的区别已经成为神学分歧，汉语神学的形成似乎已经单独成为一种文化模式，并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中的异彩之元，同时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亚层文化，持信者颇多。在对基督教持信的群体中，特别是识字后的信仰，几乎全部都来自基督教的文字宣传物，口头的布道在强化信仰的意义上更大。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在对神学的宣传上是对神学的选择和加工过程，发行的是整合后的基督教书面信仰，宣传的是与西方元文化有异相的汉籍神学，这是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过程，也是结果。

这篇论文是以福建近百年的基督教文字出版物的实物存存为研究对象的，对于未接触到的，则采取剖析明辨的仔细，来甄别其中记录上的错讹，所以在撰写前提的材料准备上可谓履前试冰，惟恐落汤之虞。本文的材料多集中于福建教会文字出版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期刊和杂志等周期性发行物，对于教会书局所出书籍间或论及，但未列其为重点，原因是受材料存存的限制。之所以留取整个文字出版事业来作为题目是因为作者意图将来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的续貂之意，但是那也只是点滴的补充，分析不至于如此详尽，是为本文文题安置原因之一。另，本文虽大量论及期刊杂志，但是也对整个福建基督教会近百年的文字出版事业全面论说，从出版发行的机构设置，到各个代表性刊物，不厌其细地陈说，以至于对整个刊物当时存在的各个方面的陈述，不仅从代表性的刊物解析而且还从刊物发行的所有方面来解构和重新架铺，这是为本文撰写的方法，也是为文题题目的措施之二。最后本文作者对所掌握的整个教会（福建基督教的，这是为本文的“不完全归纳法”）的文字出版情况出发来得出研究心得。其实本文的观点陈述不仅此数，在各部分的撰写中，作者已经将部分观点在典型个例和全维分析中有所陈述，最后的结论只是观点的统理。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表明了我们的认为：基督教文化籍借着文字所传递的神学信息，有其独特的文化交流模式，其所形成的最终组织（教会）是靠教会信仰文化这一脆弱纽带维系的，而这些都是已经成为中国元文化下的亚文化。它虽然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的近代化有着肇始的滥觞作用，但是支配的作用却寥寥，不足为之记。本文的撰写试图从对大量的基督教文字宣传物的解读中诠释一些过程的点滴，试图还回一点曾经的丢失，在安排寻回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本末的错位颠置，对于这样的颠置我们更愿意负起不可推委的文责。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一、工具书

- 1、《中华民国法令大全》 第五类内务 商务印书馆印行
- 2、《全国报纸通讯社概览》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
- 3、《中国报界交通录》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
- 4、《中宣部编审科定刊物目录》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
- 5、《中国主要杂志新闻索引》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
- 6、《图书年鉴》 南京中国辞书典馆 1933年
- 7、《中国近代报刊名录》 史和 姚福申 叶翠娣等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福州
- 8、《中国近代史词典》 陈旭麓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10
- 9、《中国现代史词典》 王金五 陈瑞云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1988·7
- 10、《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1840—1980) 知识出版社 1982·11 第一版
- 11、《圣经》(新译本)(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1992·3
- 12、《圣经典故词典》 谢金良 卢关泉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3
- 13、《中国教会年鉴》中国基督教协会编
- 14、《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1
- 15、《福建地方出版杂志联合目录》(油印)福建省图书馆编印 1963·3
- 16、《福建省图书馆馆藏解放前期刊目录》福建省图书馆编 1965年
- 17、《中国年鉴》(1924年第一回)主编 元湘(内含宗教统计)
- 18、《中华民国统计年鉴》 南京国民政府编 1948年
- 19、《民国年鉴》上海国民图书公司 1930年
- 20、《福建省统计年鉴》(民26年版)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
- 21、《生活全国总书目》 生活书店 1935年
- 22、《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刘哲民编 学林出版社 1992年
- 23、《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郭卫东主编 刘一皋副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 24、《福建地方文献联合目录》 第三种《福建地方出版杂志联合目录》(油印本)福建省图书馆编印 1963·3
- 25、《福州新闻志·报业志》主编王植伦 副主编潘群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7·6 第一版
- 26、《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宗教卷 北京图书馆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12·北京
- 27、《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8、《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增订本)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全

- 国联合目录编辑组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81·北京
- 2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928—1978)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79·8
- 30、《福安县图书馆建国前图书目录》(油印本) 福安县图书馆编 1984·9·28
- 31、《福州藏书楼书目初编》林之夏 福州藏书楼编 民国纪元十月
- 32、《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华英合璧) 上海广协书局出版 1936年
- 33、《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2年
- 34、《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年卷、1997—1998年卷、1999—2000年卷) 社会科学出版社 98年版,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年版

二、文献类

- 1、《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14年
(台北)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2、《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5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15年
(台北)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3、《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6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16年
(台北)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4、《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7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17年
(台北)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5、《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8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18年
(台北)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6、《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1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21年
(台北)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7、《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24年
(台北)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8、《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5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25年
(台北)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9、《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7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27年
(台北)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10、《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8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28年
(台北)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11、《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9—1930年上、下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
(台北) 印刷 1929、30年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
(重)版
- 12、《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3年卷)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33年

- (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13、《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4年卷)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34年
(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14、《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6年卷)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商务印书馆印刷 1936年
(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橄榄基金会联合(重)版
 - 15、《全国进出口商行要览》(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出版 中华民国 25 年版
 - 16、《福州近代报刊名录》(手抄本上、下册) 庄可庭编 署期为 1993·12
 - 17、《福建期刊简介》徐吾行手稿本 署期为 1963·8 藏于福建师大特藏部
 - 18、《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蔡永春 文庸 杨周怀 段琦译(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7 年
 - 19、《福建宗教史纲》第五章基督教(未刊稿)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 20、《闽南长老会八十年简史》许声炎 泉州金井金声月刊社 民国刊本
 - 21、《左海公道报》福州闽北圣公会刊发 福州美华印书局摆印 光绪年间
 - 22、《福声》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发行 民国年间
 - 23、《神学志·特号·中华基督教历史》中编 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季 第十卷第三号
 - 24、《教务杂志》
 - 25、《圣公会报》圣公会福建教区出版 民国年刊
 - 26、《闽南圣会报》闽南基督教会发行 清末民国间刊行
 - 27、《中华归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月刊 民国间刊发
 - 28、《兴化卫理公会史》(油印本)卫理公会兴化年议会办事处编 署期为 1959·9·5
 - 29、《美以美会兴化年会议年录》光绪、民国间 福州美华书局活板 兴化美兴书局活版
 - 30、《美以美会福州年会议年录》光绪、民国间 福州美华书局活板
 - 31、《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兴化年议会》民国年间
 - 32、《圣公会福建教区年议会记录》光绪民国年刊行
 - 33、《福声》黄乃裳主编 美华书局印行(有别与圣公会福建教区刊行的《福声》月刊)
 - 34、《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议会报告书》圣公会福建教区刊发 民国年间
 - 35、《教区月刊》圣公会福建教区发行 民国
 - 36、《金声月刊》金井教会编并发行 民国间
 - 37、《新义》古田新义山诸圣堂出版 民国 21 年第三期
 - 38、《协大周刊》福建协和大学编发 民国间
 - 39、《协大青年》
 - 40、《协大校刊》
 - 41、《协大半月刊》
 - 42、《协大学生》
 - 43、《协大化学社》

- 44、《协神消息》 福建协和神学院青年会编 民国年间
- 45、《协神通讯》创刊号 福建协和神学院发行 1950年11月出版
- 46、《协大新潮》福建协和大学印行 民国间刊发
- 47、《华南女子学院校刊》
- 48、《华南女子大学》
- 49、《陶中校刊》 仙游县私立托德女子中学编辑发行 中华民国廿四年
- 50、《协职消息》 福建私立协和职业学校出版部编印 1946年6月15日出版
- 51、《圣路加校刊》 圣路加医院附属圣路加护士学校编印 民国
- 52、《活力》 兴化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学术部编辑 民22年4月出版
- 53、《哲理青年》第三期 哲理中学青年会编印 民27年1月28日出版
- 54、《毓德校刊》毓德中学刊发民国37年
- 55、《剑中青年》南平剑津中学青年会编发 民国间
- 56、《教育讯息》第1期（油印）福建基督教教育协会编印 民国27年11月出版
- 57、《广闻录》（华南板卫理公会通讯） 福建卫理公会出版 民国间
- 58、《教育消息》 第五期 1949年8月31日出版
- 59、《鹭江报》鹭江报社出版 光绪、民国
- 60、《奋兴报》兴化奋兴报社出版发行 光绪民国
- 61、《福建文化》福建协和大学福建文化委员会编辑刊发 民国年间刊行
- 62、《清英教会报》 光绪年间
- 63、《华美报》 光绪年间
- 64、《闽中会刊》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协会刊行 民国22年
- 65、《三一消息》福州三一学校 1938年
- 66、《卫理》福州美以美会卫理报社 1929年
- 67、《飞帆半月刊》福州协和大学学生自治会 1931年
- 68、《古星》福建古田基督教学生联合会 1933、1935年
- 69、《动声》福州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学术部 民国
- 70、《协职农讯》福州私立协和职业学校
- 71、《教会新报》
- 72、《福州青年会报》福州青年会刊发 清末民国
- 73、《厦门青年》厦门青年会刊发 民国年间
- 74、《真光杂志》上海中华浸会书局出版 民国间刊行
- 75、《道南》鼓浪屿闽南职业中学校刊发
- 75、《公报》成都四圣祠北街二十二号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编辑
- 76、《同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市会组同工通讯社编 民国年间刊发
- 76、《东方杂志》清末民国刊行

- 77、《全国基督徒布道团报告书》福州基督徒总布道会发行
78、《福建省政府公报》

以及福建各地方文史资料近百种、部分福建地方方志、解放前旧报刊数十种以及福建省档案馆、福州市档案馆部分馆藏档案

三、专著类

- 1、《中国宗教通史》(修订本)(上下卷)牟中鉴 张践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2
- 2、《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顾长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1·4
- 3、《福建史稿》朱维干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6·3
- 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 人民出版社 1981·6
- 5、《康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美)费正清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北京
- 6、《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3
- 7、《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4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82·7
- 8、《中国教会学校史》高时良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10
- 9、《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 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民国71年3月四版
- 10、《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初编、甲编、乙编、丙编、丁编(上、下)、补编)张静庐辑注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58·北京
- 11、《中国新闻史》十四所高等院校中国新闻史组编著 王洪祥主编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北京
- 12、《出版史研究》(第一辑)主编 叶再生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3·10
- 13、《东方学》(美)萨义德著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5
- 14、《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董丛林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2·6
- 15、《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杨光辉 熊尚厚等编 新华出版社 97·北京
- 16、《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秦家懿 孔汉思著 吴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0·12
- 17、《百年烟云 沧海一粟——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李志刚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 北京
- 18、《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方汉奇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6
- 19、《中国新闻史》(古代至1949年)梁家禄 钟紫 赵云明 韩松 广西人民出版社 84·6
- 20、《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胡太春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7
- 21、《中国编辑史》姚福申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1 第一版
- 22、《国语运动史纲》黎锦熙 商务印书馆 民国23年12月初版

- 23、《中国新闻事业史》谷长岭 俞家庆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87·5
- 24、《中国基督教史》杨森富 台湾商务印书馆 台北·1968
- 25、《中国基督教史纲》王治心 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
- 26、《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王治心 中华书局 1933年版 上海
- 27、《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徐宗泽 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8年版
- 28、《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下卷)查时杰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 1983·北京
- 29、《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法)J·谢和耐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年中译本·沈阳
- 30、《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王文杰 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 1947年版
- 31、《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顾长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 32、《基督教史纲》杨真 三联书店 1979年版,北京
- 33、《基督的人生观》(英)詹姆士·里德 三联书店 1989年中译本,北京
- 34、《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顾学稼等编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 35、《自西徂东》(美)花之安 上海美华书馆 1897年排印
- 36、《教会教育》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 37、《教务纪略》李刚己 上海书店 1986年重印
- 38、《黄乃裳传》詹冠群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年
- 39、《福建宗教史》陈支平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 40、《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杨天宏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 41、《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林治平 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80年版
- 42、《上帝基督教会》郑明鲁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年
- 43、《中国教会大学史》卢茨 曾巨生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 44、《二十世纪宗教思想》麦奎利著 高师宁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 45、《基督教简史》穆尔 福建师大外语系编译室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
- 46、《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邵玉铭 台北:中正书局 1980年版
- 47、《古教汇参》韦廉臣 光绪 29年(1903年) 上海广学会校刊
- 48、《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 三联书店 1957年版
- 49、《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魏外扬 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85年版
- 50、《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吴雷川 上海青年协会书局 1936年版
- 51、《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开沅 林蔚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
- 52、《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国基督教调查团 上海 1922年版
- 53、《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卫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54、《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黄新宪 福建教育出版社
- 55、《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卓新平主编 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年版
- 56、《天国之道:基督教》张文建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版

- 57、《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张西平 卓新平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版
- 58、《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章开沅 马敏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 59、《宗教学原理》陈麟书 陈霞 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1
- 60、《中国基督教简史》姚民权 罗伟虹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11
- 61、《论基督之人与小：1900—1950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德基督教》卓新平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11
- 62、《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吴义雄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3
- 63、《中国的基督教》周燮藩 商务印书馆 1997·北京
- 63、《中国近代之报业》赵君豪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十六辑 沈云龙主编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民国72年10月
- 64、《八十年来之江南传教史》(1839—1923) J·Dela Servie' re, S·J 著金文祺译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五辑 沈云龙主编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65、《在华出版机构 1800—1912年》白瑞华 上海 1933年
- 66、《英国圣公会福建传教史》施友琴 伦敦 1877年
- 67、《基督教哲学》尹大贻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
- 68、《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宋原放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副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4
- 69、《中国出版史》宋原放 李坚白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1·6
- 70、《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1、2、3、4卷) 叶再复著 华文出版社
- 71、《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林治平 查时杰(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 1979·9
- 72、《基督宗教研究》(第三、四辑)卓新平 许志伟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年版
- 73、《基督教的本质》(德)费尔巴哈著 荣振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2
- 74、《在信仰与实践之间：福建基督教史钩沈》朱峰 (香港) 汇美创意 2002年
- 75、《中国基督教史略》(韩)李宽淑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9
- 76、《中国基督徒史》(法)沙千里著 耿升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98·8
- 77、《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杰西·格·卢茨著 曾巨生译 浙江教育出版 1987
- 78、《基督教入华一百七十周年纪念集》林治平编 宇宙光出版社 1977年
- 79、《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查时杰 宇宙光出版社 1993年
- 80、《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 1990年
- 81、《中国基督教大学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 1992年
- 82、《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简又文 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 1960年
- 83、《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李志刚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年
- 84、《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一)李志刚 (台) 宇宙光出版社 1989年

- 85、《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二) 李志刚 (台) 宇宙光出版社 1994年
- 86、《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8年
- 87、《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吴利明 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81年
- 88、《基督教会史》威利斯顿·沃克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 89、《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第一辑《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综览》吴梓明 梁元生主编
崇基学院宗教研究丛书 1988·5 第一版

四、论 文

- 1、《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吴义雄 近代史研究 2000·2
- 2、《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谭树林 山东师大学报 2000·5
- 3、《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启动与基督教教育策略的调整》王伦信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99·4
- 4、《教会大学兴起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 杨启福 扬州大学学报 2000·1
- 5、《近代中国教会学校述论》 丁柏传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0·2
- 6、《基督教哲学与中国》 孙尚扬 北京大学学报 2000·2
- 7、《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 刘晓多 山东大学学报 1999·2
- 8、《基督教的中国化：历史和现实》 莫法有 复旦学报 1999·3
- 9、《论20世纪初中国民教矛盾的缓和》 肖爱树 临沂师专学报 1999·5
- 10、《西方传教士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 刘增合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2000·1
- 11、《百余年来美国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 温钦虎 甘肃社会科学 2000·3
- 12、《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文化的传播》 刘丹 贵州社会科学 2000·4
- 13、《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 胡卫清 江苏社会科学 2000·4
- 14、《从基督教的汉化说开去》 谭立铸 读书 1997·6
- 15、《福建省基督教地理的研究》 郑耀星 人文地理 1997·4
- 16、《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赵敦华 天津社会科学 1997·5
- 17、《论文化与政治交织中的“非基督教运动”》郭若平 理论学习月刊 1997·8
- 18、《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吴邦江 史学集刊 1997·3
- 19、《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吴洪成 高等师范教育 1997·2
- 20、《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效应》赵慧峰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97·4
- 21、《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宋剑华 海南师专学报 1998·1
- 22、《莆田最早的报纸》 郑金灿 福建宗教 2003年第1期
- 23、《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王树槐 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 林治平编 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 1980年版
- 24、《近代中国的书报名录》张玉法载于《新闻学研究》第七册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
闻研究所出版 1971·5

五、英文文献

1. A·J·Garnie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34
2. *Fukien Conference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 ----held in Foochow, July 26 - Aug, 3, 1943,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Herald Industrial Mission Press, Foochow, China
3. John K·Fairbank,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4. D·Mac 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1907
5. K·S·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6. Stock, Eugene *The Story of Fuh-kien Mission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877
7. *List of Periodical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Records of Missionary Conference, 1890, Appendix F*
8.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by Rudolf Lowenthal, Ph. D. (罗文达), Published by The 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 Peking, 1940(即《中国宗教期刊》)附表二《基督教期刊》中福建部分